外国军事战略丛书

# 南亚大象

## 印度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

NAN YA DA XIANG

YIN DU JUN SHI ZHAN LUE FA ZHAN YU XIAN ZHUANG

曹永胜 罗 健 王京地 著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外国军事战略丛书

# 南亚大象

## 印度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

NAN YA DA XIANG

YIN DU JUN SHI ZHAN LUE FA ZHAN YU XIAN ZHUANG

曹永胜 罗健 王京地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亚大象:印度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曹永胜等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ISBN 7-5065-4191-2

Ⅰ.南… Ⅱ.曹… Ⅲ.军事战略-研究-印度

Ⅳ.E35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289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375

字数:216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18.60 元

# 目　　录


前　言……1

第一章　战略文化环境……1

——印度军事战略溯源

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印度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多元化特征”造成了国内政局的不稳定，经济改革则使“行动迟缓的大象”的比喻成为历史，全方位的灵活的外交开展得更是红红火火，为其赢得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战略环境。但历史上饱受侵略的创伤和曾经有过的短暂辉煌，却在印度历任统治者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铸就了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心理。印度军事战略正是在这样一个战略文化环境中孕育而生。

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印度社会的基本特点……2

“大象”的脚步——印度经济的现状与改革……12

左右逢源中谋利——印度的对外关系……16

寻求昔日的光辉——印度的历史情结……27

第二章　国家安全观与安全环境判断……53

——印度军事战略的基本依据

特殊优越的地理战略位置，是印度坚持地缘政治

思想的物质基础，英国殖民主义的领土扩张理论和安全观由印度统治者继承和发展，为印度军事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世界战略环境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对周边地区安全威胁的评估，又为其提供了现实依据。

地理环境与安全谋划——印度的地缘政治思想……54
“点”、“圈”互佑——印度的国家安全观……58
战略安全评估——印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64
做世界军事强国——印度军事战略的基本目标……76

第三章　大国梦的延续……79
——印度军事战略的历史演变

英印殖民时期的印度被誉为“英王皇冠上最亮的明珠”，其扩张掠夺性质的军事战略为独立后的印度统治者所推崇。尽管印度军事战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本国国力和军力的增长而不断发展，但固有的继承性、扩张性，以及随后表现出的排外性和威慑性等特点却一直得以延续。

扩张与掠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军事战略……79
顽固的地区扩张主义——独立后印度军事战略的发展……83
“惩戒威慑”——21世纪军事战略的若干变化……92
进攻与威慑并举——军事战略的基本特点……98

第四章　西攻、北防、南进和中部机动……107
——印军的战略部署

根据新形势下各作战目标的威胁性质、自身实力及历史经验教训，印军在战略部署上对各战略方向采取不同的方针。西部的巴基斯坦是重点，北部的中国

是次重点，南部的印度洋地区是今后扩张的努力方向，战略纵深地带则配置战略机动力量以应付国内外的突发事件。
“西攻”——对巴基斯坦采取积极进攻战略……108
“北防”——对中国采取威慑防御战略……113
“南进”——对印度洋地区采取扩张控制战略……119
“中部机动”——应急快速部署战略……124

第五章　称雄南亚的武装力量……132
——印度实现军事战略目标的工具
印度历来信奉“实力至上”的原则，从独立后长期推行扩军路线，到目前还维持着百万大军规模的现代化武装力量，其三军兵力结构趋向合理化，武器装备加速现代化和国产化，其总体战斗力在实战和训练中得到提高，成为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推行其大国政策的有力工具。
实力至上——印度武装力量发展概述……132
建设现代化合成武装力量——印度的建军方针……137
地区称霸的资本——印度的三大军种……153
庞大的后备军——印度的非正规武装力量……166

第六章　谋求大国地位的王牌……171
——印度的核威慑战略
印度对发展核武器痴迷已久，把“中国威胁论”作为其悍然进行核试验的挡箭牌，在核试验15个月后抛出“最低限度有效的核威慑”战略思想，把核武器当做威慑邻国和称霸印度洋的利器，仿照美、俄模式建立“三位一体”的核力量，还在印巴边境举行设定核背景

的军事演习，为打赢核条件下的战争预作准备。
疯狂的核痴迷——印度的核发展轨迹……172
“最低限度有效的核威慑”——核战略思想……187
“三位一体”——核攻击力量的发展模式……193
打击与防护并重——对核战争的准备……200
第七章　印度洋是“印度之洋”？　……203
——印度的海洋战略
控制印度洋，做“海权国”，是印度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为了弥合“安全圈”上的“海洋缺口”，印度运用“文”、“武”两手“遏制威胁”，向广阔的海洋空间推进，把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远洋海军作为实现其海洋战略目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印度海军又开始把战略触角伸向南中国海。
追求“海权国”——印度长期的海洋战略目标……204
战略方针——文武并举……210
战略举措——建设现代化的远洋海军……216
进军南中国海——海上扩张的新尝试……224
第八章　扩张与冒险……229
——印度推行军事战略的实践
印度崇尚武力在实现军事战略目标过程中的作用。在建立地区霸权的战略实践过程中，印度与巴基斯坦屡次兵戎相见，把中国当做最大的潜在威胁和主要作战对象，控制周边弱小邻国，排斥区外势力，企图独霸印度洋，最终实现它的世界大国梦
不共戴天的“孪生兄弟”——印巴在对抗中成长……229
“中国威胁论”——印度对华扩张与遏制政策的装饰…250

稳定“后院”——控制弱小邻国……266
“新德里版的门罗主义”——排斥区外势力……274
先发制人——战略实践中体现的战略原则……277
附录　印度“核武器政策草案”全文……280
后　记……285
主要参考书目……286

# 总　　序

刘亚洲

当今世界，正处于世纪之交、格局剧变、社会转型、科技变革的历史关头。面向世界的中国，没有全球的视野，便很难追求战略的目标。全球化使世界变得很小很小，然而，我们的眼界应该更宽更宽。

当今之中国，正处于非常之时。之所以说非常，不仅在于我国内部正在进行着前人闻所未闻的事业，而且还在于我国的周边及更远的外部世界正在经历着波澜壮阔的剧变。作为这种剧变的冰山一角，世界主要大国或军事集团所进行的军事战略调整，已经或者正在浮出水面。

在新的世纪，俄罗斯这个欧亚双头鹰投向东西两个方向的目光射得更远；南亚大象印度北进南下的脚步已经迈开；日本这把富士军刀已经从日本海指向广袤的太平洋；本该追随华约而去的北约却摇身一变，成为一部全球化的联盟战车；世界超强美国牛仔山姆更是雄心勃勃，要当世界的警长。

古人说：知己者明，知人者智。作为面向新世纪、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人，了解和热爱我们的祖国，是建设家园所必不可少的。然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16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不了解外国军队，特别是不了解强大的外国军队，我们将失去与人类历

史同步前进的机遇。我们走近外国军队，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习和借鉴，不仅要把目光盯在别人的先进武器上，而且，我们更要研究外国军队的军事理论、军事思想，吸取外国军队的思想机制和管理机制之经验。

古人还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盲目的军事行动终将带来灭顶之灾。知己者可能不胜，但不知彼者必败。研究外军具有取他山之石而攻玉的功效，学习和借鉴固然是重要的，但是防范、抵御甚至必要时战胜是更重要的。

江主席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旨在提醒我们居安思危。本丛书的作者在进行理论研究之余，出于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历史责任感，力图向读者真实、全面地展示当今世界主要军事强国（集团）的真面目，不啻是为全社会的国防教育尽了一份自己的力量。丛书所展示出来的严谨学风、翔实资料、活泼的文风、灵活的框架，使读者在阅读时免除枯燥之虞。对于广大的军事爱好者和初涉外军研究领域的人而言，本丛书不失为一套深入浅出的入门书。

是为序。

2001年6月于红山口

# 前　　言

2001年3月，印度内政部长阿德瓦尼专程赶到位于印度洋上的安达曼群岛发表了一番高谈阔论：“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这番话出自这位印度政府第二号人物之口，反映了印度当局积极谋求21世纪世界大国地位的雄心。

印度是中国的西部邻国，是南亚次大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翻开印度独立后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印度一直是一个“不安分”的国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印度先后发动了三次对巴基斯坦的战争，将其肢解；挑起中印边界战争；吞并锡金王国，使不丹成为它事实上的“保护国”，对尼泊尔施加种种影响；出兵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干预泰米尔少数民族与当局的冲突；公然进行核试验，挑战世界核军控机制等等。当然，所有这些“不安分”的举动，都是为了实现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推行其军事战略的重要步骤。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在近代却饱受了英国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1947年，印度统治者从英国人手中和平接过政权后，建立了一个既有西方议会政治特点又保持了古老印度文化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从以尼赫鲁为代表的第一代执政者开

始，就把“富国强兵”、称雄南亚、确立印度的支配国地位和跻身世界大国之列作为印度的长远战略目标。尼赫鲁曾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印度以它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尼赫鲁的“印度中心”论，成为以后印度历届政府推行民族主义区域强权政策的思想基础。这个国家今天以其地处南亚中心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在次大陆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军事实力而雄踞一方。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印度已经不再满足于仅做一个地区性大国，而是梦想成为21世纪世界秩序的“实力中心”之一。印度长期奉行的军事战略，旨在以军事实力谋求大国地位和实现国家战略总目标。这种战略既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又打上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烙印，具有明显的扩张性、霸权性以及实力与目标值的不相称性。

印度与中国新疆、西藏接壤，边界线全长2150公里（包括与锡金边界），全部属于未定界，争议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印度长期以来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潜在威胁”和主要作战对手。自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以来，印度当局的地区霸权主义政策推动着其武装力量高速畸形发展，超过了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和印度的经济实力，对世界事务，尤其是南亚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印军实力急剧膨胀，特别是在1998年，印度政府逆潮流而动，先后进行了两轮5次地下核试验，给地区及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了新的变数和挑战。

# 《外国军事战略》丛书编委会


主　　任　刘亚洲　朱冬生　濮继红

副主任　朱荣榜　周世华　郝玉庆　高建国

　　战　捷　苗　华　尹义良　王久荣

　　马安骏　张凤崎　耿卫东　刘占琪

　　寒天阳　韩庆华　李鸣生

委　　员　王小健　盛　欣　周柏林　杨育才

　　曹永胜　侯小河　吕有生　韩旭东

　　姚灯镇　赵　波　徐　勇　李贵富

　　何映光　张明智

# 第一章　战略文化环境

## ——印度军事战略溯源

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印度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多元化特征”造成了国内政局的不稳定，经济改革则使“行动迟缓的大象”的比喻成为历史，全方位的灵活的外交开展得更是红红火火，为其赢得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战略环境。但历史上饱受侵略的创伤和曾经有过的短暂辉煌，却在印度历任统治者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铸就了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心理。印度军事战略正是在这样一个战略文化环境中孕育而生。

战略文化是一个国家历史、地理和政治文化的积淀，它有助于“塑造在诸如国际政治中的武力使用、对外部威胁的敏感程度、军民关系和战略思想等问题上的行为模式”。研究印度的战略文化，可以帮助我们从该国的历史渊源、民族情结与现实政治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去理解印度军事战略形成的土壤和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内部因素。

# 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印度社会的基本特点

2001年，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印度政治稳定有序，经济改革成就斐然。从表面上看，这个南亚大国正逐步迈向世界实力中心。但海面的平静，往往预示着更大的波澜。一心致力于营造“实力”大国的印度，竟忘记了头上高悬着的“达摩克利斯剑”——一系列尖锐的社会政治矛盾正严重威胁着这只南亚“大象”。进入2月份，刚从古吉拉特大地震中醒过神来的印度政府，又被军火交易受贿丑闻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向自信的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由此感到了空前的执政压力。实际上，在欣欣向荣的表象下，伴随着自然灾害、政治丑闻和黩武政策，印度社会的固有矛盾日渐激化，危机四伏。印度国内外舆论认为，若没有一个相对长期的稳定政局，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受阻。

印度全称为印度共和国，自称国土面积328.78万平方公里（实际应为297.47万平方公里），列世界第7位，是南亚次大陆及印度洋沿岸的最大国家，首都新德里。1947年独立后执政的印度资产阶级仿效西方国家，建立了联邦共和制（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政体，实行相互制衡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其权力分别由议会、内阁和法院行使。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任期5年，连选连任，一般只任两届。总统拥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和宣布紧急状态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但这些权力必须按照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的建议才能行使。政府设立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协助总统行使职权，国家的政治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手中，总理一般为议会中多数党的领袖。这种特殊的地位使总理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中心人物。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实际上均由总理通过内阁实施。部长会议由总理和全

体部长组成。部长分为内阁部长、国务部长和副部长三类。议会（国民议会）由联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组成。最高法院监督和控制着整个司法机构。行政机关分为中央、邦（直辖区）、县、区、乡5级，其中，直辖区与邦平级。印度自称设有25个邦和7个中央直辖区，把有争议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中国的阿克赛钦地区称为“查谟—克什米尔邦”，把中印边界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被其侵占的9万平方公里地区称为“阿鲁纳恰尔邦”，把1975年被其吞并的锡金列为“锡金邦”。

印度独特的地理特征，历史上存在的地区、种族和宗教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印度教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分离心理影响，都决定了印度社会的复杂现实特点，可以概括为“六多”。

1．多人口

目前印度人口仅次于中国，是世界上年人口增长率最大的国家之一。根据印度2001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统计结果，截至当年3月1日零时，印度人口总数已达10.27亿，占世界人口的16%。人口专家预测，如果印度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到2025年人口将会超过15.3亿，成为远超中国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为此，印度的人口学家认为，印度的人口问题已成了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印度的人均产值仅为430美元，贫困人口达1/3。

印度政府官员把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归咎于其人口基数太大、育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太高、计划生育服务措施不够等。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印度是个宗教国家，几千年形成的传统陋习与宗教思想，产生了极为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在印度教的《摩教法典》中这么写道：“女子幼年从父，成年从夫，夫死从子，女子不得享有自主的地位。”印度教实行火葬。火葬时，必须由儿子点燃焚尸的柴堆，并用木棒敲碎头颅，这样死者的亡灵才能升天。万一没有生儿子，女儿是不能代替的，只能请死者的侄子和近亲的

长子代办。此外，男女结婚时，女方要送来首饰、衣服、现金、家用电器，有的甚至还陪嫁汽车和住房——嫁妆的多寡决定了新娘在夫家地位的高低。凡此种种，印度社会认为生男孩幸运，生女孩倒霉，甚至连生女孩的母亲也会遭到歧视与虐待。因此，在今天的印度社会，仍然有虐杀女婴的旧习存在，造成整个印度社会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印度的大多数家庭主要是迫于宗教思想、家庭与社会的压力，才接二连三地生了一大堆孩子。印度独立后的英迪拉·甘地时期，因其子桑贾伊对计划生育采取严厉的措施，也就成了1977年3月英迪拉·甘地在大选中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另一方面看，众多的人口为军队准备了充足的兵源。不仅三军及准军事部队可以招募需要的适龄青年，而且一、二线后备力量为军队储备了足够数量的预备军官。印度现有后备力量310余万人。

2．多民族

印度在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致使民族多次融合同化，形成了血统混杂、人种繁多的特点，印度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该国几乎包括了世界上蒙古、欧罗巴和尼格罗所有三大人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印度雅利安人、达罗毗荼人、蒙古利亚人、雅利安—达罗毗荼人、蒙古利亚—达罗毗荼人、西徐亚—达罗毗荼人和突厥—伊朗人。此外，还有数十万英印混血人。印度还是亚洲民族和部族最多的国家，现有印度斯坦族、泰卢固族、孟加拉族、马拉地族、泰米尔族、古吉拉特族等10个较大的民族和几十个人数少的民族。在10个较大的民族中，竟没有一个民族在印度总人口中超过半数，人口最多的印度斯坦族在全国人口中仅占46.3%。印度的部族多达414个，100万人以上的部族就有6个。而由于民族问题要求独立的就有锡克族、泰米尔族、廓尔喀族。锡克族在历史上曾主张建立卡利斯坦国，制定了国旗，发行了纸币和邮票，同时还在国

外成立了流亡政府。

1998年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由于推行在印度教派主义影响下的强硬的民族主义政策，激起了印度少数民族与部族对印度人民党的不满情绪。为此最近几年，特别是克什米尔和东北地区要求独立和自治的叛乱活动持续不断，各部落的武装游击队与军警的流血战斗也时常发生。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党派为利用民族与部族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举行集会和游行，使本来就复杂的民族、部族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激烈，且变化莫测。尽管中央政府采取了软硬两种政策加以镇压和安抚，但收效甚微。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部族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印度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多民族特点为民族的统一、军队的组成以及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为了便于控制和利用矛盾，陆军仍沿袭英国的作法，按民族、宗教、种姓或地区编为联队。第一种是单一民族、单一宗教、单一种姓联队，如锡克、廓尔喀；第二种是多民族、多宗教、多种姓混编联队，如旁遮普等联队，规定锡克族占50%，其他民族占50%；第三种是全民族联队，如警卫军、近卫军联队等。这种编队方法，有其利于控制的一面，但却加深了各部队之间的矛盾。第一种类型的部队喜欢夸耀本民族的“攻无不克”和“战无不胜”，而多民族或全民族的联队，则自诩打破了民族、宗教或种姓的局限，是“印军团结的象征”，“不愧为祖国的代表”。由于各部队自恃高明，彼此隔阂很深，平时不相往来，战时不善配合。1962年中印战争中，印军第48旅马德拉斯第一营，在其友邻锡克第一营被围时不去支援，反而独自南逃。结果被中国军队全歼。又如在瓦弄战斗中，当锡克营失利，向友邻廓尔喀部队求救时，也遭拒绝。战后总结教训时，印度一些人认为，军队协作精神差是整个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

3．多宗教

印度还是个极富宗教传统的国家，常被称为“宗教博物馆”，人民绝大多数各有所皈依，信仰虔诚。宗教不仅是教民个人的精神支柱，而且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最早的宗教是雅利安人创立的婆罗门教，发展到8世纪吸收佛教和耆那教的某些教义，经过改革而成为今天的印度教。印度教信奉多神，崇拜偶像，主张非暴力、不杀生，奉行严格的种姓制度。信奉印度教的人占80%以上，印度教的教义对印度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影响极大。印度的主要宗教还有伊斯兰教、佛教和锡克教。其他如基督教、耆那教、拜火教、犹太教等也有一定信徒。山区一些部落民族信仰原始宗教。

印度的宗教矛盾历来十分突出，其中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尤为尖锐。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有着几千年的冤仇，历史上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爆发过无数次流血冲突，死伤人员和毁坏的财物无法用数字来计量。1992年12月6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因阿约迪亚“庙寺之争”又一次发生了全国性流血冲突，狂热的印度教徒高呼“罗摩”、“罗摩”，把有着464年历史的巴布里清真寺夷为平地。这次冲突导致数千人死伤。自此，印度全国陷入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流血冲突中。就在时隔8年的2000年12月6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向全国宣布：“重建罗摩庙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这项工作还将继续下去。”此言一出，宗教教派冲突又掀波澜。舆论说这是瓦杰帕伊对“国民志愿团”及激进的印度教徒的安抚与承诺。宗教矛盾与党派斗争的相互交织，使印度政局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内部有些党派因瓦杰帕伊不遵守执政加盟时“搁置建庙日程”的协议准备弃他而去。与此同时，印度国内激进的印度教徒因罗摩庙迟迟未建而产生的骚动情绪有所增加，也向瓦杰帕伊政府发出了一个危险信号。

印度与其邻国间的分歧、矛盾以及战争也往往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利益冲突既是印巴分治的内在动因，又是印巴分治后严重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因素。宗教矛盾同样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武装力量，表现最突出的是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1984年，印军进攻锡克教圣地金庙，引起5个锡克营的士兵哗变，并导致英·甘地总理被锡克士兵刺杀身亡。

4．多种姓

印度的种姓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它起源于古代印度，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打败达罗毗荼人后，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并与婆罗门教的教义紧密相连的产物，流传3000多年，迄今在印度社会仍有很大影响。按照婆罗门的教义，将人分为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贵族）、吠舍（商人和农夫）、首陀罗（工匠和高级佣人）四个等级。此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之外的“不可接触的贱民”，这是被剥夺了社会地位和人格的苦力，从事最低贱的工作。随着生产的发展，各种姓又派生出许多副种姓，据说全国已有3000多种。各种姓实行世袭制，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享有不同的社会地位，种姓之间等级森严，禁止通婚和交往。马克思曾指出：“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尽管印度独立后于1950年颁布了废除种姓制度的法律，但是几千年来以宗教教义形式形成的制度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广大落后的农村，情况还十分严重。今天，种姓制度已成为各种政治组织与势力的基础，成为其政治斗争的工具。

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深入，印度社会也在不断出现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认识到传统种姓制度的不合情理，一些人勇敢地改掉自己的姓氏，以便无拘无束地参加工作。社会历史学家已发现这种“社会偏见”对青年人的影响日益减少。商业活

动由较低级种姓阶层所为的观念也在发生改变。一些极其成功的商业集团的老板恰恰出身于名门贵族。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很深刻，过去的大家庭体系正在崩溃，人们越来越趋向独立，追求自我。对西方文化影响的“吸收与平衡”、借鉴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的崭新课题。当然，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数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思想和习惯，也必然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军队也存在严重的种姓矛盾。目前，印军中约有5%的“贱民士兵”，属“非战斗人员”，一般只能拖地板、掏大粪、洗衣服，政治地位十分低下。“贱民士兵”对遭受的种种歧视和压迫，内心充满被压抑的怒火，反抗军官和高种姓士兵的事件屡见不鲜。

5．多政党

印度还是个政党林立的国家，一类为全国性政党，另一类是地方性政党。主要党派有：印度国民大会党（英迪拉·甘地），简称国大党（英）、印度人民党、人民党、阿卡利党、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简称印共（马）、泰米尔马阿尼拉大会党、社会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泰卢固之乡党等。国大党产生于19世纪后期，其他党派均出现于20世纪。

国大党于1885年成立，是亚洲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之一。建党100多年来，该党曾经三次发生分裂（1969、1977、1978年），三次大选失利（1977、1989、1996年）。国大党主张以和平的合乎宪法的手段建立一个以议会民主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议会民主、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是国大党意识形态的四大支柱。该党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以及在建设印度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1991年6月至1996年5月重新执政期间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全面开放政策，更是取得明显政绩。由于党内存在腐败现象及贫富差距拉大等原因，国大党已在1996年全国大选中惨败，沦为议会第二大党。高等法院对该党前主席、前总理拉奥的

审判，加剧了民众对其贪污腐败的痛恨。但是，该党必将继续对印度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一俟时机成熟，仍会东山再起，重掌权柄。

人民党最早成立于1977年，主张在印度建立民主的、世俗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与政治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深受普通民众尤其是贫苦阶层的欢迎。继两次执政后，该党又在1996年大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由人民党等13个党派结成的联合阵线组成联合政府，人民党的德韦·高达于1996年6月1日正式出任印度第12任总理。

印度人民党是1980年4月由从人民党脱离出来的人组成的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它要求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主张弘扬印度教传统文化，有条件地支持经济改革，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增加国防预算。党内极端民族主义力量具有很大影响，他们主张严格限制跨国公司和外国资本进入印度，对穆斯林、天主教徒以及其他少数族裔持排斥态度。而以瓦杰帕伊为代表的温和派力量主张进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世俗主义的包容态度，尊重少数族裔的权利。随着冷战后印度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该党实力大增，从1984年大选中获2席到1996年大选获得161席，成为印度议会中最大的政党，其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色彩也愈加强烈。他们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激化了印度教与其他宗教间的矛盾，导致了1989年烧毁阿亚约提穆斯林清真寺事件。该党于1996年大选中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该党第一任主席瓦杰帕伊担任总理13天后便宣布辞职，曾经成为印度历史上最短命的一届政府。

地方性党派近年来也迅速发展壮大。1996年大选中分享人民院545个席位的约有30个政党。一些小党派近年来开始走联合竞选的道路，74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与此同477度各政党

为了争夺更多议席和执政党地位，曾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进行过激烈、复杂的政治较量，甚至不惜打宗教牌发展势力，捞取资本。

1998年，瓦杰帕伊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与24个小党派结成全国民主联盟，在竞选中获得胜利，在议会525个议席中控制了 300多个席位，印度人民党在其中居首要地位。瓦杰帕伊得以东山再起，组成联合政府，执政基础远远超过他的前两次执政时期。靠着核试验、经济发展以及赢得格尔吉尔冲突等方面的影响，联合政府似乎得到了大多数印度国民的认同，瓦杰帕伊总理的声望也如日中天。但这一切就像一个漂亮的玻璃外壳，被泰赫尔卡网站记者设计的军火交易圈套击得粉碎——牵涉受贿的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的党、政、军高级官员达34名之多。印度政坛发生如此激烈的震荡和骤变，自印度独立以来少见。丑闻曝光后，作为反对党的印度国大党自然抓住机会向联合政府发起攻击，并要求瓦杰帕伊总理下台，同时联合其他反对党导致议会休会。此外，国大党主席索尼娅与印共（马）巴苏的“人民阵线”联合，商议共同分享权力，放弃以往国大党单独执政的目的。紧接着铁道部长班纳吉断然辞职，放弃了她领导的基层国大党对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的支持。为了稳住阵脚，瓦杰帕伊不得不把涉及丑闻的党、政、军高级官员撤职查办，以平民愤；同时紧紧抓住泰卢固之乡党，请求奈杜继续支持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因为如果少了奈杜领导的泰卢固之乡党29个议席的支持，印度人民党必然垮台。

党派林立与党派斗争不仅导致政局长期动荡不安，而且成为三军及辅助性武装力量职能扩大化、任务复杂化的重要原因。

6．多语言

印度民族与部族众多，也带来了多语言的特点，独立后迄今，印度也未能统一全国的语言。据统计，全国约有200多种不同的语言，如果连方言也计算在内，印度的语言有800多种。与其民族

比例类似，无论哪一种语言使用的人数都未超过总人口的半数。在印度现行10卢比的纸币上便印有15种语言文字。有人说只有国歌堪称印度各邦惟一的统一语言。自古以来，印度一直没有形成一种各民族都认同的通用语言。古代梵文曾作为通用语言工具，但只能在贵族中通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语成为一种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语言，但仅限于知识分子，在军队中也只限于通过院校培训过的正式委任军官。基于这种原因，不仅印度的行政区划按语言划分，就连军队也为了管理上的方便，不得不在营以下分队采用按同一民族编组的方法。

为了洗刷耻辱的殖民印记，印度独立后，圣雄甘地和国大党政府主张把印度斯坦族的印地语作为印度的通用语言，在全国普及。印度政府还决定经过15年后用印地语取代英语为全印统一的官方语言。用印地语代替英语，表面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却同时伤害了其他民族的感情和自尊心，因此印地语的普及遭到了非印地语民族的强烈不满和抵制。1967年底印度下院不得不在官方语言修正案中提出英语继续为官方语言。而英语在今日印度的普及程度较独立之初有增无减。语言障碍仍将是印度的一个突出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引发地方民族主义的再起。

多语言现象的存在，也给包括部队官兵在内的人际交往和语言交流带来诸多不便。

总之，印度多人口、多民族、多宗教、多种姓、多政党、多语言的“六多”特点，既为国家的统一、变革与发展造成制约因素，也为军队的建设和管理带来众多难题和繁重任务。由于西方式的政治结构与落后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巨大脱节，西方的政治制度在这里同民族、种姓和宗教的结合是难以协调的。如今印度已结束了国大党一党统治的时代，在一定时期内印度政坛上还没有哪个政党具备左右政局的能力。“多元化特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更加凸

显，呈现出全国政治力量分散、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政府脆弱的政治局面。1996～1999年间曾出现5届政府更迭，其影响延续至今。目前，以印度人民党为主组成的24党联合政府正全力巩固统治，稳定政局，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但由于社会上种族、宗教和种姓矛盾根深蒂固，各种摩擦甚至严重的流血冲突时有发生，国内政局的变化存在着不少变数。

## “大象”的脚步——印度经济的现状与改革

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历届政府都是比较重视发展民族经济的。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中国和巴西，居第三位。但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速度一直比较缓慢，印度因而被形容为行动迟缓的大象。

冷战结束后，印度政府开始顺应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明确了发展经济在各项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决心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将印度建成世界经济强国。1991年，印度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当时预算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急剧增加使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设计师”、“印度经济救星”的原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曾经形象地比喻说：印度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做“井底之蛙”，二是跳出来争一片自由天地。可以认为，印度已经选择了后者，而且在世界政治与经济新秩序这个“自由天地”中显示出一定的实力与潜力。1991年7月辛格宣读他的第一个预算案时，意译了雨果的话：“一个观念成熟时，地球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它”；“印度将要成为经济强国就是一个这样的观念”。

基于对40多年探索经验的总结和急于摆脱危机的考虑，政府决定对尼赫鲁确定的经济政策进行转折性重大调整，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新战略方针，注重借鉴

国外经验，坚持从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向更具竞争性的以市场为主的经济过渡，许多国有化行业的私有化正式启动，很多领域开始实行自由化政策。吸引外资，发展经贸关系既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被提上日程，又以经济改革的基本保证之一显示出巨大作用。改革十年来，印度经济“复苏”速度之快，发展势头之猛，已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有关印度由“象”变“虎”的议论日渐增多，印度已经达到了“化危机为革命”的基本构想。

印度的经济总量占南亚的77.5%以上，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6%的水平上，有些年度达到7%，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5000亿美元。印度政府的目标是，使21世纪的最初10年成为“印度的10年”，在10年内使经济增长率达到年均7%～8%的水平，20年内力争使经济增长率达到9%的水平。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印度政府正在大胆推动“第二代经济改革”，加紧解决基础设施短缺的问题，加大在金融、保险等领域的改革力度，加强吸引外国投资的工作，同时发掘海外印侨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使之为印度经济的腾飞服务。现在，不仅美国将印度视为世界经济中“最后一个潜在市场”，而且国际社会纷纷将印度看做是经济合作领域中的重要国家。印度与工业发达国家、独联体、东盟、周边邻国的经贸合作也已出现全方位上升势头。其中，印美关系的升温格外引人注目，美在印投资已占印政府批准的外国总投资的40%，超过了欧洲和日本在印投资的总额。

印度拥有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雄厚的科技力量和训练有素的人才，而这正是智力立国的显著成效之一。印度多年坚持用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发展的战略，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高水平的科技队伍，现有科技人员300万左右，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印度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也有鲜明特色和成功经验，每年可输送百万大学生。旨在使1亿人于1997年前脱盲的扫盲运动被

称为独立以来最重大的社会运动。政府对发挥世界各地2000万印侨的作用也格外重视。印度高科技的发展及对经济改革的促进已经引起世人的广泛瞩目。目前，印度正准备在一些新兴、尖端边缘技术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其中计算机、核能和空间等领域更是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并逐步完善其科学技术基地，以便充分发挥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巩固国防中的作用。

1985年，被称为“计算机总理”的拉吉夫·甘地提出了“用计算机把印度带进21世纪”的口号。此后，印度历届政府充分利用科技人才的优势，大力扶持计算机软件工业，为鼓励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优惠政策，使信息技术产业呈现年递增60%的惊人速度，2000年的软件业产值已达62亿美元，预计到2008年将达到500亿美元。现在，印度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软件开发中心。在美国《全球》杂志评选出的世界500家大公司中，有203家同印度的软件公司签订了编制软件的合同。在全球按客户要求设计的软件开发市场上，印度的份额已经达到16.7%，在美国市场上甚至达到60%。连微软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都十分赞叹印度的软件开发能力，认为它在21世纪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软件超级大国”。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信息技术将成为“印度在21世纪的增长引擎”，印度将创造出以信息技术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开辟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振兴的新路子。

目前印度国防科研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从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到激光技术和隐形技术，只要是发达国家正在研究的国防尖端项目，印度基本上都想争一个立足之地。在航天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领域，印度自然也不甘落后。作为能够独立发射大型卫星的国家之一，印在空间计划的发展上取得重要经验和丰硕成果，已经具备参与国际空间招标的能力。印度建立了完备的航天组织机构，掌握了制造和发射运载火箭、人造卫星、地面控制与回

收等技术，独立发射了若干人造卫星，建成了一套完整的空间体系。据报道，过去25年，印度太空研究所已把5颗通讯卫星、4颗遥感卫星及3颗实验卫星发射太空。印度开展航天科研的领域包括火箭和卫星的制造，卫星的发射、跟踪、制导及控制，宇宙射线、天体观测、大气研究等。此外，印度还在研制多功能航天飞机。据印度专家介绍，这种飞机既可将小型卫星送入太空，也可用于情报收集、监视和侦察。2000年3月，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还宣布，计划向月球发射无人驾驶宇宙飞船，希望在2008年实现“太空大国梦”。2001年4月18日，印度在其南部的斯里哈里克塔航天基地将新一代GSLV—D1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升空，并将一颗重达1.54吨的试验通讯卫星送入对地同步轨道。这标志着印度航天工业的一个重大飞跃。印度从此成为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之外第六个掌握这一技术的“航天大国”。与此同时，它的军事意义也不可低估，表明印度在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

印度人自己声称，开放市场、深化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经济自由化不能倒退”已成定局。但是，经济的腾飞绝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国内政局的不稳、工业能力的薄弱、财力的匮乏、经验的不足以及国外的制约因素，都会影响到改革的速度。尽管如此，印度经济仍保持着增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国防事业的需要也将得到进一步满足，印度的公路长度已居世界第二位，本世纪初总长将增至270多万公里。不久的将来全部机场将达到发达国家机场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各项高新技术的发展与突破，将会直接提高整个武装力量的现代化程度，因为“目前所有高技术力量皆用于双重目标——民用和军用”。其中，计算机系统正在并将继续广泛

应用于装备发展、模拟演习、武器保养、后勤管理、目标识别及战斗管理。印还投资7000万美元加入于1997年启用的全球卫星通信系统计划——“钛”计划，这对提高三军C3I系统水平显然具有深远意义。

从发展趋势看，印度的战略目标可望在本世纪初的25年中实现，即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和法国，名列世界第四。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将继续提高，在南亚、印度洋地区、整个亚洲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将具有相当影响力。与此同时，印度经济地位的突显仍受到不少因素的制约。首先，它的经济发展仍受制于旧的传统模式的束缚，经济改革的政治阻力和社会压力仍然很大，对国内民族资本的过度保护限制了外资的大量流入。其次，人口的急剧膨胀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拖累，现已超过10亿的人口是任何政府都深感棘手的沉重负担。

## 左右逢源中谋利——印度的对外关系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8年时曾经讲道：“如果你有友谊，你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安全；如果你有对手，你就多少有些危险。因此，制定一项同其他国家友好的政策，在获取安全的问题上比任何其他措施都重要。”长期以来，印度既把不结盟运动作为其外交活动的重要支柱，也非常重视与超级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开展全方位外交，缓解矛盾，寻求支持，扩大影响，争取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树立地区安全主导形象。

按照印度防务专家的解释，作为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印度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项国家战略，“不结盟”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所谓“消极的不结盟”和60年代至90年代的“积极的不结盟”两个阶段。

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根据当时的现实考虑了印度的国家安全问题，面对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和对立，尼赫鲁提出了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尼赫鲁对不结盟的概念作了这样的解释：“大国政治集团的相互对立过去已经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且还会再次导致规模更大的灾难。为此，我们打算尽可能地躲开大国政治集团。”印度的防务专家对尼赫鲁这一思想解释得更明了，认为“一个新独立的国家想要自立并置身于斗争与动乱的漩涡之外，不结盟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独立和机动的余地”。在整个50年代，印度执行的是“消极的不结盟”政策。所谓“消极的不结盟”，一位印度国防部长于1954年解释道：“我认为中立是当今世界最好的防御武器，如果一国的中立受到另一国的侵犯，就会有对此关心的大国出现，使侵略者受到抵制。因为有另外一方的保护，任何一方都不能进攻一个中立国家。”根据这种消极的不结盟政策，印度在1962年前确实未与任何一国结盟，他们可以与两大阵营的国家建立关系，左右逢源。但是，从军事战略上讲，“消极的不结盟”，被认为是影响了国防计划的制定和军事力量建设。

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失败后，印度及时调整了军事战略方针，针对过去“消极的不结盟”政策，尼赫鲁作了深刻的反省，承认这项政策导致了对印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忽视，从而采取“积极的不结盟”政策。此后，印度在军援上左右逢源，各取所需，得以从英、美，法、日、苏等国大量吸收军援，走上依靠大国大力扩军备战的道路。

应该说，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已从中受益匪浅。正是在不结盟这面大旗的掩护下，在“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传统战略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印度谋求在发展中国家中充当领袖，争取在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中拥有更大发言权，并在美苏争霸中利用矛盾，左右逢源，捞取好处，多年来一直处于战略上的机

动地位，一步步实朝着地区称霸的目标迈进。

然而，随着苏联于1991年解体，印度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不确定。印度过去之所以能够从不结盟政策中受益，首要前提是大西洋集团和苏联集团之间存在着均衡的僵局，而苏联集团的出局标志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告终，实际上结束了这一僵局，不结盟运动的筹码作用便不复存在。

尽管如此，由于南亚“一超多弱”的战略格局继续向印度倾斜，有关大国都为实现自身利益竞相“取悦”印度，印度仍然具备比较优越的“外交气候”。为了给建设和发展争取一个较为长期和稳定的外部环境，印度适时调整了对外政策，展开灵活、务实、多方位外交活动，亲俄近美，稳欧拉日，在对华关系上采取有缓有抑的态度。首先，采取大国均衡战略，特别注重改善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同俄罗斯的传统关系，改善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通过外交均衡战略，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左右逢源，以获取军事、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削弱美巴关系，并借大国力量遏制中国。其次，大力改善同南亚各国的关系，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并发展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此外，印度在国际舞台上还充分发挥其作为发展中国家大国的作用，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主张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并努力争取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1．印俄关系由温变热

冷战时期，印度同苏联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友好关系。苏联曾是印度最大的贸易经济伙伴和有求必应的武器供应者。在过去的40年间，印度从俄罗斯（含苏联）总共获得价值3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1971年两国签订的《印苏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安全领域特殊关系的基础。迄今为止，印军至少有70%的武器装备是由苏联和俄罗斯提供的。因此，印度被称为“可

能是对苏联的解体感觉最痛苦的一个国家”。冷战结束之初，俄罗斯自顾不暇，印俄关系因而趋于平淡，印俄都根据形势变化进行了某些政策调整，两国的贸易额也一度大幅度下跌，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双方很快意识到战略利益的一致，并很快修复了关系。2000年10月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印度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受到印方极其隆重的接待。两国领导人经过深人会谈，发表了《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俄罗斯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认为印度是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过程中“最现实的竞争者”。作为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印俄在军火贸易和军工生产方面达成了4项协议，其中包括双方建立政府间防务和技术合作委员会、印度从俄罗斯购买航空母舰、购买T—90型主战坦克以及俄罗斯特许印度生产苏—30MKI战斗机等内容。双方还签署了和平利用原子能备忘录，其中包括俄方援建一座核电站的内容。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2001年5月，印度向俄罗斯提供了其位于钱迪普尔的导弹试验场，用于试射新的OSA—AK防空导弹，并称“这是印度首次将其导弹试验靶场设施出租给外国。不过印度没有向俄收取费用”。该报认为“必须从印度与俄罗斯极为密切的防务关系背景来看待这一特殊安排”。

可以预料，印俄的全面合作将在务实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某些国际问题上也会相互协调。但是，综合国力大不如前的俄罗斯，对印度的援助显然有限，冷战期间那种使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密切关系已经变成了历史。尽管印美存在芥蒂，但目前印度全球外交的棋盘上，美国的位置将会摆在俄的前面。

2．印美关系急剧升温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一度将印度视为在印度洋地区需要加以遏制的力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逐渐停止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并向印度示以友好。此时印度

正由苏联解体而处于孤立无助中，也迫切希望与美国修复关系。90年代中期，美国明确提出“必须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看待南亚对美国的重要性”，近印疏巴的意图十分明显。1995年1月，两国签署经贸及防务关系协定，开始了“加深和加强安全关系的进程”，揭开了两国历史上的新篇章。此后，印美关系开始升温，各路高官频繁互访，两国间的商贸往来明显增多，军事合作也有所加强。但这种改善关系的势头曾因1998年印度悍然进行核试验而一度受挫。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印度采取不少主动姿态向美国靠拢，争取美国“谅解”。很快，讲求实际的美国人更加重视印度在南亚乃至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美国政府一方面对印度宣布实施制裁措施，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对印度的接触。美方希望印美两国“在和平时期要协调，危机时期要合作”，并认为这是维护南亚地区稳定的“一个关键”。2000年3月，印度终于迎来了22年来首次到访的美国总统。在克林顿总统这次引起全球注目的访问中，印美签署了旨在指导两国发展新型关系的框架性文件《印美关系：21世纪展望》。这表明，美国正在重新定位印度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地位。2000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报告《2025年的亚洲》，明确写明要重视印度。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当年秋天回访美国，受到隆重接待。于是，这两个所谓“民主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用瓦杰帕伊的话说，忽然之间又成了“天然的伙伴”。

美籍印度人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游说也是美印关系升温的重要因素。据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2000年3月23 日文章称，最近几年，美籍印度人开始从经济上的成功转向扩大政治影响，他们正在利用自己日益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影响美国的南亚政策。印度和美籍印度人问题国会核心小组拥有117名成员，是国会中最大的少数民族政治组织，比支持中国或巴基斯坦的类似组织要大得多，并且更有势力，“在美印度人游说美国国会和其他政

府机构的努力正在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美国疏远巴基斯坦、克林顿访印等重大事件都与美籍印度人在改变美国对印政策方面的努力有关。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印美关系更是急剧升温。布什政府希望进一步发展同印度的关系，一方面在美、印、俄三国关系中进一步拉近美印的关系，从而为自己的全球战略体系建立又一个支点；另一方面通过对印度采取怀柔和拉拢的政策，利用印度达到挤压和牵制中国的目的。为向印度示好，美国政府在2001年2月宣布进一步放松1998年开始对印度实施的制裁，允许向印度出口美国制造的军用直升机零配件。这也是为全面解除制裁发出的信号。

印度为了争取早日解除核试验以来受到的制裁，并期望从美国获得高技术武器，也乐于投桃报李，甚至不顾老伙伴俄罗斯的反应，积极表示支持美国的NMD计划。印度当局希望借支持布什政府核政策的机会，使美国重新审视其对印度长达几十年的技术和军事制裁，取消对向印度出口商用高科技技术施加的任何限制，并在加入国际核俱乐部问题上获取美国的支持。对印度而言，迎合美国是其借力美国实现大国梦想难得的“捷径”。近年来，随着印度科技经济实力的增强，瓦杰帕伊政府日益显示出提升国家地位的意图。为此，印度不断增加军事开支，加强军事科研，连续试射中远程火箭，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制定“最低限度核威慑”战略，势态逼人。不过，印度政府也清楚知道其大国进程困难重重。印度的核大国地位并未得到公认。印度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计划进行了自我理解，认为美国部署NMD将不会危及印度的安全，如果印度能够灵活地处理好此事，将从中受益无穷。因为该计划将打乱目前的国际安全体系，建立起一个新体系，印度完全可能利用这个契机为自己寻求一个位置。另外，印度甚至还希望加入导弹防御系统的实施，从而实质性地密切同美国的关系。

与此同时，印度也不希望因此使老朋友俄罗斯过于尴尬。它一方面支持美国的核政策，另一方面又迎合俄国不允许单方面修改《反导条约》的立场，从而在美俄之间达成一种默契和平衡。目前，印美双边关系正在不断深化和发展。美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当然，印美之间目前也表现出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两国在人权、核不扩散、高科技和贸易限制等方面仍存在着重大分歧，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冲突将不可避免，两国关系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排除。

3．印欧关系持续升温

印度在独立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独立后印度逐渐脱离了西方的阵营，但与欧盟国家的关系一直保持良好，这种传统的友好关系并未因印度进行核试验受到严重影响。在这方面，英国过去是印度的宗主国，印英传统友好关系自不待言，现英国又提出建立“新世纪的平等伙伴关系”的倡议，得到印度的积极回应。法国不但要发展与印度的经济关系，而且要发展两国在军事工业领域的合作，两国的“全面伙伴关系”已经启动，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都取得新的进展。法国对印度进行核试验表示理解，只是呼吁印度应表现出“负责态度”，尽早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促进两国政治合作机制化方面，双方高层不断互访，开展“战略性的、互信的对话”。希拉克总统明确表示，法国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要为建设一个多极的、和谐的世界共同努力。德国也已经宣布与印度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0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意大利、梵蒂冈和葡萄牙，并参加在里斯本召开的“首届印欧首脑会议”，使印度同欧盟各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4．印日关系由冷趋暖

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后，日本作为世界上惟一遭受原子弹

灾难的国家，做出了十分强烈的反应。日本政府决定对印度实施经济制裁，印日关系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随着形势的发展，考虑到印度正在呈现出振兴乃至崛起的势头，日本不得不对印度的核态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即继续要求后者在核问题上采取克制态度，但同时增加高层互访，加强对话。2000年初，印度外长、国防部长相继访日，双方展开“安全磋商”，同时建立定期的防务对话机制，加强海军合作，“共同保护”从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到日本的“能源运输线”，并以联合打击海盗为名，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演习。

由于印日在经济上互有所补，在政治上互有所求，在安全上也互有所用，印度核试验给双方的关系带来的阴影悄然淡化。其最明显的标志是2000年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对印度的访问。这是10年来日本首相对印度首次进行的正式访问，对于弥合两国矛盾起了很大作用。据透露，双方已达成相当默契，即互不妨碍对方跻身安理会、日本支持印度以亚太大国身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印度承认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

5．印中关系有缓有抑

随着冷战的结束，印度谋求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外部因素逐步增多：一是与苏联的特殊关系不复存在；二是在国际政治斗争的某些问题上，印中合作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三是在国际与区域政治上，印的优势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四是随着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突出，印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以发展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印双方在建立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强权政治、人权、环境保护等方面，共同语言明显增多，两国关系进而得到重大改善。双方国家领导人相继互访，正式签署了《关于在印中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及其他文化、经贸协定，并都表示愿意以建设性的态度来处理双边关系。两

国双边贸易额呈现增长势头，在农业、生物工程、冶金甚至军事工业等方面的技术合作已经启动，两军的联合演习也已提上日程。两国外长的互访、安全对话，特别是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华、李鹏委员长访印，为改善两国关系的气氛、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奠定了基础。当然，印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还存有障碍和困难：其一，印度仍视中国为“潜在威胁”；其二，印度对中国继续保持和发展长期友好的中巴关系颇具疑虑；其三，在达赖集团及其他一些问题上，印度的对华政策仍有两面性；其四，双方边界问题只是暂时搁置起来，并非得到实质性解决。

6．印巴关系斗中有缓

近年来，印巴两国均失去了超级大国的支持，对抗强度明显下降。两国都在积极调整外交政策，力求继续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都已开始制定有限的信任与安全措施。这种努力反映了两国对核武器带来的新危险以及继续努力减少南亚次大陆潜在冲突的必要性的认识。双方现已签署了互不生产、储备和使用化学武器以及建立外交人员行为准则等协定，交换了关于防止军用飞机侵入对方领空和部队调动须事先通报对方的文件。瓦杰帕伊邀请穆沙拉夫前往印度和谈，也是在缓和关系方面迈出的新步伐，强调通过对话解决存在问题已经成为两国外交活动的基调。但是，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领土争端等问题上的基本矛盾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双方仍互视对方为敌手，边境交火事件时有发生。另外，双方的核军备竞赛仍在进行，且有逐步升级的可能。目前有所改善的双边关系还十分脆弱，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巴矛盾仍将是世界上最容易引起大规模冲突的热点问题之一，边界爆发“有限战争”的可能性将长期存在。

7．印与其他邻国关系积极改善

为了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不断推动与邻国关系的改善

并提高自己的地位，印度在冷战后十分注意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它采取高姿态，对一些久拖未决的争端问题做出让步，改善了同不丹、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周边国家的关系。长期困扰印度与孟加拉国的河水资源分享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两国在2000年底还决定成立一个共同的边界工作组，以解决两国的边界划定和飞地（注：指在本国境内的隶属于另一国的一块土地）以及双方有争议土地的互换问题，但2001年4月18日两国发生的边界流血冲突使这种努力遭到挫折；多年悬而未决的“庭比加走廊”难题得到了解决；印度对尼泊尔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已就共同开发尼的水资源问题制定了时间表，并答应为其军队的现代化提供帮助；印度与缅甸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国边界的传统贸易在逐步恢复，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两国军队还共同合作对付印度的反叛者。外电报道，“联合军事行动有可能为该地区新的战略联盟打下基础”。但是，印度与周边小国在“难民”问题上仍有很大分歧；各国间经济合作的实质性进展不大；对印度的“老大”思想尚存在疑虑与恐惧心理。

8．印与东盟关系不断发展

整个冷战时期，印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实际上处于停滞和不信任状态。1971年印巴战争中，印尼还出动海军支援巴基斯坦。随着苏联解体，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相继得到解决，印度积极主动地接近东盟这些海上邻国，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取得了较大进展。2000年，印尼、越南、新加坡、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相继访印，使印度与东盟的关系获得稳步发展。而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对越南的访问及与后者签订的防务协定，被认为是印度在东盟地区取得的重要成果。印度陆军参谋长对缅甸的访问，对于探讨改善双边关系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在印度的提议下，印度还于2000年11月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五个东盟国家

共同成立了恒河—湄公河流域合作组织，以加强与东盟成员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2001年1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越南和印尼，加强了与它们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印度与东盟国家密切交往，明显表现出借助东南亚国家牵制中国的企图。尽管如此，印度与东盟在长远战略目标上仍有抵触，互存戒心，在现行政策上也存在一些分歧。

9．印度与伊斯兰国家关系取得突破

由于与伊斯兰邻国巴基斯坦的长期冲突和纷争，印度多年来一直遭到伊斯兰世界的排斥和冷落。久而久之，印度也将这些伊斯兰国家看做亲巴基斯坦而予以回避。多年来，在印度的外交格局中，与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与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难解的疙瘩。

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开始认识到它必须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因此确立了以西亚、中亚及海湾国家这些伊斯兰国家为目标的“西进外交”路线。从拉奥政府开始，印度外交的方向就开始亲近伊斯兰国家。但“西进路线”仍因巴基斯坦因素而困难重重。有鉴于此，瓦杰帕伊政府决心撇开巴基斯坦这个因素，以外交中的实用主义代替了过去的以意识形态划线，着力改善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2001年，瓦杰帕伊总理成功地访问了海湾地区的最大国家伊朗，并就印伊两国确立友好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发表了《德黑兰声明》。这次访问，被认为是印度同伊斯兰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转折点”，印度外交从此获得了向伊斯兰世界推进的立足点。

在国际交往中，印度政府总是依据自身的根本利益，多方发展同大国的关系，力争在世界多极化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重量级”，以便跻身多极的行列。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不断扩大经济外交分量，以建立经济联盟为主旨的“全方位外交”开始具有更多的独

立性、务实性、灵活性和建设性，使印度不仅能充分发挥自己市场广阔、高新技术发达的优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基本扭转了印度1998年5月核试验后外交上的被动局面，赢得了在新世纪国际舞台上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为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力争实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打下了基础。但是，印度同一系列国家战略利益的冲突难以迅速调和，印度的外交政策仍然存在着众多难题，致使其国防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任务。例如，与南亚诸国关系还存在一些麻烦；与中国的关系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还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难题。从整体看，印度将继续通过外交努力与加强战备的“文武并举”对策，确保国家利益。

## 寻求昔日的光辉——印度的历史情结

缅怀昔日的民族光辉，恢复昔日大印度的繁荣强盛，是独立后印度制定的国家战略目标之一。印度著名防务专家V·朗格尔对此评论道：“经过两个世纪的被奴役，印度人民第一次昂起头来，他们向往阿育王王朝的日子，想要恢复古老世纪神话般的和平与繁荣。”然而，印度在历史上值得炫耀的时期并不多，却是饱尝了外族入侵和民族分裂之苦，以致于在独立后印度的民族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一方面要求印度强大和统一，成为受世界尊重的大国，不再受外族的侵略；另一方面也部分地继承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对外政策思想。这些都为独立后掌权的印度资产阶级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打下了社会和文化基础。

1．饱受外族侵略的历史

马克思于1853年在总结印度历史发展的特点时指出：“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

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那么印度就自然“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且它的全部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次大陆的社会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分裂进而饱受外族侵略的历史。

印度社会历史的发展深受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影响。次大陆北接高山、南临大海，天然造就的半封闭式地形，使得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与外界接触极为困难。外族几乎只能从西北部的“瓶口”进入，从此很难再出去。地形复杂和交通不便，使印度社会长期处于闭关自守、分裂割据状态。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印度，没有一个帝王曾越过德干高原统一过印度。这种局面又使它极易遭到外族从陆地和海上的入侵。历史上的印度曾经屡遭外族入侵和征服。这些征服者有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希腊人、鞑靼人和突厥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但是，“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印度也不例外，但毕竟由于经常受到来自西北方向洪水般的入侵者的摧残，甚至造成了历史性中断，印度教文化曾让位于伊斯兰教。到了近代，又被来自欧洲的入侵者所征服。由于他们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反被他们“消灭了”，还建立了空前统一的英属印度殖民地国家，将其“西方文明”强行根植于印度，并进行了将近200年的“培育”。

综观印度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基本脉络：

达罗毗荼人和雅利安人创造了印度的基本文明。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南亚次大陆地区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并经历了新、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灿烂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在印度本地原始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元前4000～

3000年，达罗毗荼人从中亚移居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创造了十分发达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即著名的“哈拉巴文化”，地址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此时的印度属原始社会后期，已开始出现阶级。大约在公元前2000～1500年，一支中亚细亚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从印度西北部越过兴都库什山脉的山口，进入印度河流域。雅利安人不断向东推进，打败了当地的达罗毗荼人，并将其赶到南方。此后在近千年的时间里，雅利安人由印度河流域逐渐向东南发展，移居恒河流域。这一时期在印度历史上被称为“吠陀时代”和“史诗时代”，奠定了今日印度文化的基础。

割据纷争致使外族多次入侵。由于雅利安人的入侵和定居，大批达罗毗荼人沦为战俘，奴隶社会随之形成。印度社会开始出现以肤色为标志（雅利安人为白色，达罗毗荼人为褐色）的种族制度的萌芽。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不断侵入印度，吞并了健陀罗（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以及印度河流域，印度的政治、经济中心也由印度河流域转到恒河流域，最后出现了16国争霸的“列国时代”。16国中的摩揭陀国日益强大，在难陀王朝时期曾一度统一了印度北方的大部地区，为尔后的孔雀王朝统一全印奠定了基础。难陀王朝后期，诸侯纷争，外族相继乘虚入侵。首开其例的是公元前4世纪初的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他率军越过兴都库什山，东征印度河流域，打通了西方同印度的联系。随之而来的是安息人、大夏人、塞种人等。他们有的很快退出印度，有的作为征服者定居下来，与本地人血统混合并被同化。公元前3世纪，月护王起来打败了难陀王朝，驱逐了西北印度的希腊残存势力，于公元前324年建立孔雀王朝，定都华氏城（今巴特那），形成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273年，月护王之孙阿育王即位，统一了全印，建立起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大帝国。其版图西起阿富汗、俾路支、信德等地，东至孟加拉

湾，北至尼泊尔，南抵佩内尔河，囊括了南亚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阿育王时期，工商业发达，佛教远播海外，是印度有史以来首次统一、兴旺的时期，是印度人迄今引为自豪的一页。阿育王被后世的印度人誉为印度历史上的第一明君。印度的现行国徽，便是以阿育王的“法胜”象征狮子头柱为图案的。阿育王死后不久，孔雀王朝即开始动乱、分裂，终被来自中亚的大月氏人和南方的安度罗国所灭。公元3世纪，旃陀罗·笈多一世驱逐大月氏、灭安度罗国，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笈多王朝。这一时期，由于政治比较开明，印度教盛行，经济繁荣，文学艺术与科学也有很大发展，被称为印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但是由于笈多帝国没有建立起真正高度的中央集权，实权都掌握在地方种姓集团和宗教势力手中，致使其好景不长，统一的局面很快又让位于四分五裂的纷争。公元7世纪初出现了一度统一印度北部的戒日王朝。戒日王死后大臣篡位，国家大乱，印度长期出现小国分立、群雄割据的局面。于是从阿拉伯兴起的穆斯林便乘虚而入，又拉开了中世纪穆斯林入侵并统治印度时期的帷幕。

中世纪穆斯林的入侵和统治给印度社会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开始侵入次大陆，占领印度河下游几乎达半个世纪。12世纪末，阿富汗境内赫拉特地方的突厥统治者侵入印度，定都德里，在南亚次大陆北部建立了伊斯兰王国——德里苏丹国。到16世纪，在整个印度境内形成了外来穆斯林王国同本地印度教徒王国对峙、穆斯林居统治地位的局面。此时期的阶级与种族矛盾不断以教派形式爆发。随着穆斯林的入侵，波斯语同印地语混合形成了现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所使用的乌尔都语，北印度的文化艺术与建筑也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然而，由于德里苏丹实行采邑（封地）制，军事贵族各自为政，不听中央指挥，致使政局动荡、内部分裂，从而又为以后莫卧儿人的入侵大开了方

便之门。

1526年，成吉思汗的后裔——一个突厥化的蒙古贵族乘印度内乱分裂，南下攻到德里，击溃印度诸侯联军，建立了印度历史上著名的莫卧儿帝国，其统治长达331年，版图囊括了印度大部地区。阿克巴是莫卧儿王朝时期杰出的君主。他把王权置于宗教之上，主张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合作，努力缓和当时的民族、阶级与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并将波斯文化和印度原有的文化融合起来，创造了今日印度的基本文化。1707年阿克巴的后代奥朗则布死后，各地省督独霸一方、自立国家，印度再度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至此统治达200年之久的集中而统一的莫卧儿封建王朝解体，随后便遭到了来自欧洲列强从海上的入侵，从而拉开了印度近代史的帷幕。这段历史正如马克思在1853年所总结的那样：“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提人打倒，马拉提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长达数世纪的穆斯林的入侵和统治，为印度带来了新的民族成分和穆斯林文化，并给以后印度社会的发展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

英国殖民统治使印度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1510年，葡萄牙殖民者首先入侵印度，占领了果阿和柯钦等沿海地区。从此，来自海上的西方人开始了对印度次大陆的侵略掠夺活动，同时也揭开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南亚次大陆争夺霸权的序幕，荷兰、英国和法国等欧洲殖民主义者相继而来，在1600年以后分别设立“东印度公司”。它们先是通商，进行贸易掠夺，然后逐渐兼备政府职能，并拥有军队和舰队。欧洲各殖民主义国家都企图乘印度处于莫卧儿王朝四分五裂的衰落时期独自征服印度。经过长期角逐争夺，英国势力逐渐占据上风。1757年6月，英军在加尔各答附近的普拉

西战胜了印度，夺取了富庶的孟加拉，掠夺了大量财富，奠定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基础。以后经过4次迈索尔战争、3次马拉塔战争、2次锡克战争，最终排除了其他列强在印度的势力，在1849年完成了对印度的全面征服。从1757年开始，英国对印度实行了长达19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并在印度实施了一系列改革。1858年8月，英女王签署改革印度政府法，撤消东印度公司，由英王直接统治印度，统治印度的最后一个封建帝国——莫卧儿王朝从此名副其实地灭亡了。

英国近200年（1757～1947）的殖民统治使印度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并对印度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于1853年在其《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总结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主义统治时指出：“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 关于 “ 破坏性的使命 ”，马克思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 “ 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 ” 英国殖民统治者把从印度掠夺来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又把印度变为他们的销售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和军事基地，从而使印度成为英国海外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换来了英国工业的高速发展。他们垄断控制了印度的一切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矿山、对外贸易，彻底摧毁了印度的手工业和工业，使历史上以纺织品闻名的印度变成了英国机织品的市场，同时还使占印度人口90%以上的农民都骇人听闻地日益赤贫化。这种以外力强加给印度社会的殖民主义怪胎所造成的破坏，为印度独立后的经济复兴带来巨大的困难。关于 “ 建设性的使命 ”，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破坏和消灭印度文明的同时，不自觉地也开始了一些建

设性的工作。它把一个封建割据、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的印度，变成政治上统一的附属于英国的典型的殖民地，用印度人民廉价的劳动力，在印度的土地上建设了铁路、矿山，兴修了水利，发展为英国殖民主义和官僚买办所垄断的工业，开办了学校，并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随着英国资本的流入，印度本国的民族工业作为附庸也开始缓慢地发展起来，这就使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后来能够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出现在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舞台上，代表印度资产阶级利益的印度国大党于1885年诞生。

在印度全民反英斗争高涨的形势下，莫罕达斯·甘地的不合作思想趋于成熟，并率先在哈里发运动中发起群众性的抵制殖民政府的立法机构、法院、学校、封号与洋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进而推广为全民反帝斗争形式。甘地是印度人民的精神领袖，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现代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印度人当他是国父，尊称为“圣雄”、“巴普”。甘地非暴力的思想来源于宗教，他通过研究印度教、耆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经典，领悟到宗教的要义在于不杀生，即非暴力的意思，由此形成了甘地一生的非暴力信仰。非暴力是甘地制定政策和一切活动的基础，是甘地认为反对英国统治、改变印度现状的惟一正确方法。不过，甘地一心期望看到的种族和平，却并未在1947年印度独立之日取得，他在第二年丧命于一名印度教极端分子枪下。1920年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12月的那普尔年会上，正式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及甘地起草的党纲，使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国大党的指导思想，争取“印度自治”成为国大党的现实斗争目标，国大党也因此由一个少数上层分子主要依靠宪政手段从事活动的团体变成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依靠群众性直接斗争进行全面反帝斗争的现代资产阶级政党，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有了新的理论、纲领和策略。在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中，特别

恪守的是非暴力的信条，这种信条在民族独立斗争中起到了唤醒民众的巨大作用，但拒绝一切暴力也导致了运动的多次挫折。在甘地和国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锻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得到全民的响应，在工人罢工、农民抗租税、军队兵变的配合下，形成了全国性的反英民族独立运动，终于在1947年实现了印度独立。

从印度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脉络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基本特点：一是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赋予印度历史以独特的发展形式。次大陆的半封闭式地形，使印度社会长期处于闭关自守、分裂割据状态，造就了印度民族的“堡垒”心态，也是地缘政治思想形成的客观基础。二是长期分裂和饱受外族入侵的历史给民族心理造成多种影响。印度处于分裂的时间大大多于统一的时间，即使在短暂的统一时期也仍是土邦小国林立，就连在英印帝国殖民统治时期，全国仍存在500多个大小王国。马克思曾经指出：“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那些贯穿于整个历史的分裂因素，在独立后的印度仍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印度民族心理，明显具有追求平等和弱肉强食等不同的层面。三是历史上征服印度的外来民族文化对印度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达罗毗荼人和雅利安人创造了印度的基本文明，奠定了今日印度文化的基础，而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近代英国人征服的结果，既未能取代印度教文化，又未被印度教文化所同化，而是作为印度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下来，实现了外来的、异质的文化和印度原有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今日印度的基本文化。四是英国殖民统治使印度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英国消灭了旧的亚洲式的印度社会，同时也在印度奠定了西方式社会的物质基础。独立后的印度就是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方式的联邦制国家。

2．印度战略意识中的历史情结

“凡用语言、文字、符号、标志或其他方式，对印度的领土完整提出异议，足以或可能危害印度的利益、治安或安全者，将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罚金，或判刑并罚金。”这是1961年通过的《印度刑法修正法案》中的一段文字。

在经历了数个世纪被奴役的历史之后，1947年的突告独立，使印度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心理在瞬间获得了极大的排解。由此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就是产生了一种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独立和继承殖民遗产、渴望被承认和被尊重的强烈得近乎偏执的决心。这种“后遗症”突出地反映在印度执政的政治家们所制定的战略方针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全面继承英属印度的殖民疆界。

英国历史学家贡纳尔·米达尔曾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指出：“每一个新生政权的最初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保住遗留给它的那份领土。凡是殖民国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新兴的国家就一定要统治。”

尽管印度过去在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4～151年）和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曾经盛极一时，但在版图上远不及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扩展的范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东至东南亚的空前范围。但正如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988年出版的《印度》一书中所指出的：“印度，甚至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按照欧洲人的看法，现在没有，而且从来没有过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统一。”在为印度确定各处边界的种种努力中，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为一个现存的国家做出标志，而是相反——通过规定其界线来创立和扩大一个政治实体。这个实体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像其他帝国一样的一个帝国，被英国多年来的军事威

力、外交技巧和欺诈弄到一块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然后凭借强力推行英国人控制非英国人民的手段来维护其存在”。印度独立后，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精英阶层雄心勃勃，梦想以大印度“联邦”的形式全盘继承英帝国留下的“遗产”。在印度第一代领导人的头脑中所反映的是，其“传统和习惯边界早就存在并自然地演化出了，因为它们是基于人口和文化的活动，是基于诸如山脊和分水岭等的地理特征”。实际上当初英国殖民者也正是这样做的。以军事手段和外交手段全力继承英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疆界，不管是已占领的还是未占领的领土，这实际上成了印度独立后的一项既定国策。从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思想观点出发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不像其他国家那样认为有必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其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印度便已经拥有了同邻国的固定边界，因而谈判已经成为多余。

对巴基斯坦，印度甚至一直对英国操纵该国的建立耿耿于怀，认为正是英国一些官员“竭力建立巴基斯坦，使克什米尔问题成为这一地区长期不和的原因之一，并称这种分离古老印度的行动为‘巴尔干计划’，显示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险恶用心”。事实上，巴基斯坦的分立不仅造成了印度版图的减小，更重要的是使印度统治者建立“大印度联邦”的梦想遭到首次重挫。印巴分治后，尼赫鲁痛心地说：“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不可能实现的神权概念的中世纪国家。它不应该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国人支持真纳的愚见，这件事决不会发生……总有一天合并必然会到来”。印度的印度教徒怀有强烈的反巴民族情绪，公开宣称要为1947年分治时所受到的损害“报仇雪耻”，要取消分治。印度军方曾一度主张彻底打垮巴基斯坦军政府，夺取克什米尔巴占区，“一劳永逸”地解决印巴之间的一切争端。其解决方式为：或动摇肢解，或成立亲印政府，最终实现印巴合一、把次大陆连成一片的政治目标。在独立后的很

长时间里，印度将军事战略的重点放在与巴基斯坦争夺克什米尔未定领土上，为此不惜兵戎相见，迄今占领了克什米尔3/5的地区。

中国是印度实现其“大印度联邦”梦想不可回避的近邻大国。尼赫鲁对华外交存在着他既想与中国联合，又不想放弃以“麦克马洪线”为印中边界线和控制西藏地区的企图这一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尼赫鲁认为，“不论从长远角度或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应做朋友，应该合作，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所以早在1949年12月30日，印度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与此同时，印度开始在中印边境线上默不做声地蚕食中国领土，以图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中国政府承认。

印度历届政府都坚持以非法“麦克马洪线”为两国的“正式边界”。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1913年11月中、英两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西姆拉召开所谓“中英藏会议”（或称“西姆拉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在会外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确定的。这条非法炮制的所谓“印藏边界线”，西起中国、不丹边境的331高地，向东延伸至底富山口，把历来属于中国的门隅、洛隅和下察隅地区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版图。历届中国政府都未承认“麦线”，因此它是非法、无效的。在1914年以后相当长时间内，英国既不敢公布这个换文，也不敢改变地图上这段边界的历来划法，即按照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线的划法。印度官方地图直到1937年才以“麦线”显示“边界”，但仍注明“边界未经标定”。而英国侵占传统习惯线以北、“麦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则是迟至上个世纪40年代才开始的。而尼赫鲁却于1950年在人民院辩论中蛮横地宣称：“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

不让任何人超过这条边界。”对此，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评论道：“奇怪的是英国官员们所画的边界线，居然被英属印度帝国的非英籍继承国尊奉为宝贵的国家产业。英国当初画出这些边界，并没有在英王的印度臣民中引起风波。假如那时印度有人注意到杜兰和麦克马洪所干的事情，他们必定会认为这是英帝国主义者用印度纳税人的钱，又一次玩弄强权政治的缺德把戏，而把它一笔勾销。现在，继承国把这些英国制造的边界线奉若神明，当做民族遗产中的传家宝，这是历史上没有预料到的、不幸的发展。”

1950年中国进军西藏，年底印度三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反对中国出兵西藏，要求中国政府用和谈来解决“西藏自主”问题。此后，印度在外交上继续发展同中国友好的同时，在军事上便加紧了向“麦线”以南未占领地区推进。这样，截至1954年底，印度基本控制了中印边境东段“麦线”以南包括达旺地区在内的9万平方公里属于中国的领土。在中段，印度除继承了英帝国主义对桑、葱莎的侵占外，1952～1958年间又先后侵占了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和拉不底等地区，面积为2000平方公里。在西段，印度于1954年后侵占了巴里加斯地区约45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对中国3.3万平方公里的阿克赛钦地区和日土宗部分地区公开提出领土要求。

印度对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主要根据是英印殖民时期关于所谓阿克赛钦问题的边界线。英国殖民者的边境政策是，一旦控制了新攫取的地区之后，便开始着手划定边界。其步骤和手段为，先派员赴边境地区进行各种调查，之后即写成书面报告提供英印政府参考。报告内容除了调查的各种情况之外，均以调查者个人或官方的观点提出边界线位置的建议。英国人甚至将这些边界线建议刊行于官方出版的地图上，企图以此造成错觉，使人误认为地图上的边界线即英印政府实际的领土范围。时间一久，英国再

据以对相邻国家提出勘界要求，从而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显然，英国单方面标画边界的行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侵略性。英国正是用这种办法来标画中印西段边界的，从而产生了所谓的阿克赛钦问题。

所谓的“约翰逊线”就是这样来的。19世纪中叶，为了防止俄国势力向南渗透，英国人决定在克什米尔和西藏之间标定边界。英国的边界事务官员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合作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了勘察边界工作。经过1846年和1847年两年的工作，划了一条从班公湖稍为偏北的地方到司丕提河的界线，而对从班公湖到喀喇昆仑山口继续往北的一段“无法准确地加以确定”。英国人认为，既然那个地区渺无人烟，因此边界走向就关系不大。然而正是那个地区，在100多年后成了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问题，它就是阿克赛钦（Aksai-Chin，意即“白石滩”）。这是一个夹在喀喇昆仑和昆仑两大雄伟的山脉之间的极度寒冷荒凉的高原，一条古时的商路穿过此地，商人们在短促的夏季从新疆经过这里前往西藏。后来，印度测量局的一个名叫约翰逊的官员提出了一条边界线来填补班公湖到喀喇昆仑山口之间未划的一段。他在1865年到了和田，经由阿克赛钦返回。根据这次冒险旅行，约翰逊在一张地图上把阿克赛钦以及一大块喀喇昆仑以北的地区都划入克什米尔境内。当时其他英国人对约翰逊替克什米尔提出的领土要求都表示怀疑，认为这是“把一块他（克什米尔的大君）并不拥有一寸土地而居民又全是另一国家的人民的地区画入了他的境内”。英国历史学家内维尔·马克思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指出，尽管在1868年后英国的一些地图曾长期沿用约翰逊线，但这实际上只是英国人用于预防俄国人挺进的一个战略上的方案，从来没有作为正式的边界建议提出来过，也从来没有在地面上把行政管辖扩展到那里——英国当时不愿也无力这样做。直到英国

对印度的统治行将告终之时，英国也没有企图对阿克赛钦行使权力或设立哨所。所谓阿克赛钦问题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然而，独立后的印度当局却对阿克赛钦提出了断然的要求，声称这块领土属于印度。

1954年，印度在官方出版的地图上把印度在中印边境的主张线公然以已定界标出，并按照尼赫鲁“应沿边界全线建立一系列的边境哨所，特别是在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必须建立边境哨所”的指示实行“前进政策”。1959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发生在中国西藏的武装叛乱并鼓吹“西藏独立”。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到1962年达到高峰，中国政府被迫实行反击。

但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失败教训不仅没有引起印度后来政府的足够重视，相反，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思想却为印历届政府所继承，并在其实践中以不同（温和或强硬）方式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地区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实践：继1947年后，1965年印度对克什米尔再次采取军事行动；1971年由印度军事支持导致巴基斯坦分裂成东巴和西巴；1975年印度正式吞并锡金王国。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印度国内经济日益下滑及国际间斗争日益向经济竞争转化，执政的国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为发展经济注意改善和发展对中国及与其他邻国的关系。90年代拉奥政府改革使印度经济有了长足进步，90年代中期，经济自由化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加上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印度国内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骤然抬头，最终把反映这种情绪的印度人民党推向印度政治舞台中心。印度人民党原主席阿德瓦尼在1998年2月大选之初就声称：“印巴分裂不符合印度任何一派的利益。”阿德瓦尼这句话与尼赫鲁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印度人民党眼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应与印度是一个整体。

由此看来，印度“大国”概念的潜在含意应是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中国西藏乃至印度洋沿岸诸国在内都被纳入印控“联邦”的历史概念。印度人民党的“国家安全”概念与印度从尼赫鲁以后所追求的南亚霸权目标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

印度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分南北两面。在北面印度要求对巴基斯坦—西藏—孟加拉的实际控制权，南面印度则要求对印度洋的实际控制权。要实现此目标，就不能回避北方中国纯粹是由地缘因素产生的所谓“威胁”。而要解除这一所谓“威胁”的最根本的途径，按印度霸权主义的主张，就是促成西藏与中国分离。西藏独立可使中印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可使印度在避免受到腹背夹击的条件下，在南亚大陆继而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所说的“中国是（印度的）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要大于巴基斯坦”。这句话的深层语义应是：中国是印度推行南亚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中国抵制印度南亚霸权主义的力量要大于巴基斯坦。

第二，要阻止外部势力重返南亚及印度洋地区。

印度历史上曾饱尝外部势力入侵之苦，因此在独立后表现出了明显排外的民族主义倾向。印度统治者公开宣称，印度不能容忍外来势力干涉任何南亚国家的内部冲突，任何南亚国家不得接受具有反印倾向的外来军事援助。印度的防务专家指出，正如美国不允许任何区外国家在巴西以北占据一个战略位置一样，印度同样也“不能允许在它的任何一个小邻国建立针对印度利益的军事基地或政治影响”。这种观点是与美国建国初期的门罗主义相类似的。为了确保次大陆的安全，必须“将美、中、苏三国的影响全部排出次大陆”，以避免“如果其中一国的影响进入次大陆，另一国会寻找一切借口干预次大陆的事务，从而造成更大的安全问题”。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英·甘地政府鉴于印度与苏联的传统

友好关系不便公开谴责苏联，但也提出了希望苏联从阿撤军的呼吁。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印度对印度洋在印度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视，认为无论从经济发展上看，还是从地缘政治上看，印度洋必须是印度的势力范围，不容外来势力进入。出于这种认识，对于美国、苏联或西方等外来大国向印度及其势力范围施加影响的企图，印度往往公开予以抗拒。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距离印度最近的国家，其东北部的亭可马里海港在斯里兰卡独立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是英国在亚洲地区极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在印度洋上具有战略地位。长期以来，印度对一些区外大国在该港口建立军事基地的企图深感不安。特别是美国，一直想使亭可马里港成为供美海空军使用的一个中途港口，因为相对于迪戈加西亚来说，该港口不仅自然条件好，而且战时将更靠近阿拉伯海的作战地区，能够控制通往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印度认为，一旦该港口落入美军之手，就会“招致超级大国撞到印度的大门口”，“严重危害印度东部海域的安全”。鉴于此，1987年斯里兰卡出现内乱时，印度对事态的发展极为关注，甚至不惜扮演不光彩角色，迫使斯里兰卡“邀请”其出兵“维和”，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防止斯里兰卡落入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势力范围，特别是防止亭可马里港被美国海军所占用。

第三，要做亚洲和印度洋地区的中心和领袖，做世界“一等强国”。

做亚洲和印度洋地区的中心和领袖，这既是以尼赫鲁为代表的第一代印度统治者对印度前景的勾画，也是印度历代战略家们不断重温和向往的国家目标。尼赫鲁在他的著作《印度的发现》中指出：“在过去23年中，为了争取印度的独立以及所有我们对英国当局冲突的背后，在我和许多人的心中存有一个复兴印度的愿

望。”这个复兴的愿望，正如他援引的G·D·柯尔先生的话，就是“印度注定迟早要成为一个巨大的超民族国家的中心”。印度的战略家们在这个基础上恣意发挥，比如V·朗格尔就在《印度的防务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提出：“印度将会成为亚洲各部分的中心，不管是中东、中亚还是东南亚或中国，他们都将在经济上、政治上和为了防务目的而依靠印度。”

印度的防务专家们对印度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是颇为自恃的。正如K·苏布拉曼耶姆在《印度的安全前景》一书中所提出的：“印度拥有世界第二的人口，是最大的农业潜力国之一，依照海洋法可有辽阔的海域，因得利于天气而需较少的能源，在技术发展阶段拥有数量充足的人口可借以同其他大国竞争。即使以一般速度发展下去，印度也将如尼赫鲁所预见的那样，在合适的时候跻身于世界四大或五大国的行列……不期望这种前途的人必定对印度的统一和完整持有保留。一方面敦促印度将发展置于优先地位，一方面又希望印度不要成为重要的大国，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像耗子或小鹿一样行动的大象是不会得到人们承认的”。印度退休海军将领K·奈雅尔说得更直截了当：“世界已经学会同美国、苏联甚至中国等大国相处，它还得学会同印度这个大国相处。”

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在组成印度新政府后，更是实行“印度第一”的民族主义政策，公开宣称印度要在全球“占主要地位”，要成为一个“美国、欧洲、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必看重的国家”。

3．正在抬头的印度教民族主义

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势力，以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教的激进主义派为核心，从独立后逐渐发展，在冷战后壮大起来，是在印度现实社会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左右印度政坛的一种强大社会力量。20世纪90年代印度人民党上台组阁就是一个明显的事

例。他们受到民族文化和宗教的深刻影响，渴望在21世纪获得强盛，但他们仍然抱着19世纪的严格的民族主义观念不放，推动印度教复兴运动，淡化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差异，企图以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一种语言取而代之。

这种最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是在印度新近全球化的经济中崛起的、由高种姓组成的中产阶层，他们平时更多关注的是时装设计师和选美皇后，而不是国家贫穷动荡的现实，其表现可以从新近改头换面的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略见一斑。印度1998年的核试验令他们欢欣鼓舞。美国《纽约时报》2000年9月16日一篇题为《渴望强大：印度迷失了方向》的文章指出，随着这些富裕的印度教中产阶层的兴起，“逐渐地，印度步履蹒跚地且付出巨大代价地建立非宗教民主制的尝试，被一种含糊的但却是咄咄逼人的单一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思想所取代”。针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印度教理论家逐步接管了政府的研究机构，中学和大学都增设了宣讲印度教的课程，这一切都使人们体味到那种不兼容的氛围。

目前主导联合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就是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该党脱胎于印度教的激进组织“国民志愿团”，推行在印度教派主义影响下的强硬的民族主义政策，主张弘扬印度教传统文化，有条件地支持经济改革，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增加国防预算。如果没有“国民志愿团”等激进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印度人民党联盟和瓦杰帕伊是难以支撑印度政局的。印度教的民族主义者深受英国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郁积着宗教固有的狂热情绪，表现为寻求“公平”心理，攀比心理以及堡垒心态等等，对印度的现实状况和政府行为的效果有着巨大的反弹作用。

寻求“公平”心理：核威力的诱惑

1998年5月，全世界以忧心忡忡的目光，眼看着印度人在街

上狂欢，庆祝他们的国家出人意料地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这些试验激发的民族主义热潮使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府得以苟延残喘。这种欢庆的热潮并不亚于独立之日。

东西方阵营对抗时期，印度曾经自诩和被认为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可以算是一个政治大国。随着冷战结束，不结盟运动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印度的国际地位也就逐渐式微。联合国安理会选举非常任理事国时，印度居然败给日本，就是最足以反映经济利益取代政治考虑的国际现实。印度政界与报界对印度国际地位之今不如昔的状况经常表示愤懑，比如对亚欧峰会把印度冷落一边，印度政界与报界就有诸多不平。印度发现除本地区外，其他国家很少关注印度。印度既没有经济上的影响，也不愿冒成为地区不稳定根源的风险。印度因此失去了引起其他国家关注的两个最重要的条件。

战略地位的不确定，在印度民族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失落感，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势力因而日渐抬头，决心重新开始寻求全球地位和公平待遇。以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主宰的政府试图提高印度在世界的地位。它希望借助核能力牌成为国际上的大国，因而急急忙忙进行了核试验，四处活动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对西方大量需求印度熟练的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大加宣传，甚至对美国小布什政府推行的即便在其盟国中都“曲高和寡”的导弹防御计划公开鼓掌。印度当局急切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是，赢得美国对印度自称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支持。

由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建立在核力量的基础之上，尽管一直面临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印度也不可能单方面在发展核能力方面有所退却。当批评印度核计划的国内外人士认为发展核武器对于像印度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而言直接代价过高、时机也极为不利时，印度核条例的一位制定者则强调，拥有核武器给印度带

来的战略优势是第一位的，而经济因素则是第二位的。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造成了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局面。一方认为经济实力和稳定是作为当今世界大国的前提，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以拥有核武器为标志的世界大国将能够带来安全并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战略文化的底蕴是对国际社会充满不信任和要求摆脱外部压力而进行自主决策，它进一步强化了印度主张发展核计划的要求。

在印度看来，印度在发展核问题上已“克制”了51年（从1947年到1998年）。这种看法在博克兰核试验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所发表的政策声明中表述得非常清楚：“我们的核计划一直带有克制和开放的印迹。但是，克制必须在实力基础上实现，而不能基于疑虑和犹豫不决。只有当疑虑消除的时候克制才有效。印度进行的一系列试验已经消除了上述疑虑。”认为印度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相当“克制”并不意味着推动印度核计划的鼓吹者的热情有丝毫减弱。印度的国内政治、当局的战略企图以及对国际秩序的看法，都在印度的核计划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确定印度今后的核走向之前，有必要对目前印度核扩散的战略实力、道义感和政治动机进行评估。国内政治始终是印度发展核计划的催化因素。从印度在1999年举行的大选中，就可以捕捉到印度的政治脉搏。1998年的核试验，使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受到极大鼓舞，从而激起了席卷印度全国的欢庆浪潮。此后，国内政治转向了基础设施、人口、文盲以及贫困等问题，可惜核武器不能带动经济发展，在这些领域无所建树，使人民党在1999年初失去了许多支持者，并且导致了联合政府的垮台。在担任看守内阁期间，瓦杰帕伊将关注焦点重又转向了他在1998年大选中所主张的议题，即基于军事实力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在举行大选前的3个月内，有三起事件表明人民党将继续以核问题作为国内政治斗争

的工具。

第一起事件是对印巴格尔吉尔冲突的政治利用。人民党成功地将此次军事行动宣传为印度的胜利。对印度士兵和飞行员受到拷打和处决的报道更激起了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格尔吉尔事件在印度国内推动了发展核武器的浪潮，因为人民党宣称格尔吉尔事件证明了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的正确性，巴基斯坦由于害怕印度的全面核报复而避免了冲突升级。当然这一观点也遭到一些批评，批评人士称如果不是巴基斯坦步印度的后尘进行核试验而取得了与印度的战略均势，格尔吉尔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

第二起事件是1999年8月瓦杰帕伊和其他人民党领导人在数篇独立日讲话中公布印度将“烈火”导弹编入作战序列，并广泛宣传此举旨在对付中国的导弹。这些讲话在大选前一个月出台，再次表明人民党将“中国威胁”作为国内政治工具的意图。

第三起事件是人民党利用核武器作为拉选票手段，操纵印度政府决定发表核条例草案。尽管该草案已经通过了两个多月，但人民党领导的印度政府直到大选前几周才予以公布。

这三种情况都表明，在没有解决好贫困、人口和基础设施等国内焦点问题的时候，人民党继续以发展核武器来保住其政治地位。

印度绝大部分人信奉印度教，而印度又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就有了民族主义与西方文化理念之间的矛盾，随着印度在南亚的势力一天一天的膨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逐渐占了上风，印度人民党的瓦杰帕伊就是靠打民族主义的民意牌获得了连任，而其内阁主要官员——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所宣传的“中国威胁论”在印度也颇有市场。

攀比心理：中国的阴影

或许是出于一种长期作为殖民地国家而被扭曲的心态，抑或是受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太深，对过去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奴役，在

类似的烂摊子上发展起来的北部邻国——中国，印度一些战略家常常表现出一种酸溜溜的感觉和敌视的态度，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最使他们愤愤不平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优于印度的地位——不仅占有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位子，而且是一个核大国。为此，印度处处以中国为攀比对象，把中国作为其扩充军备的靶子。这种心态在1962年与中国的边境武装冲突受挫后表现得尤为突出。E·A·瓦斯中将就这样写道：“当中国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印度拒绝接受与中国不对称的地位，并开始悄悄地为未来做准备。经过20年，印度研制了自己的原子弹，到90年代能拥有可靠的洲际弹道导弹。这种导弹显然不是用来对付巴基斯坦的，因为印度的美洲虎、米格、幻影飞机就能轰炸巴基斯坦，甚至连中程导弹都不需要。印度的洲际弹道导弹旨在打击中国的任何地方，以反击来自那个方向支持巴基斯坦的合谋威胁。这种战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没有言明。”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更是公开宣称所谓“中国的威胁”导致了印度1998年公然进行核试验。2001年5月31日发表的印度国防部年度白皮书再次宣称，“目前印度每个大城市都在中国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核军力对比上，中国占有较大优势”，以强调印度发展远程导弹计划的必要性。印度极力传播的就是这样一种信息，即只要中国拥有核武器，印度就不能放弃核选择；如果不发展核武器，就永远不能与中国抗衡，永远不是中国的对手。虽然印度当局对“中国威胁”的鼓噪别有用心，但与中国作攀比的宣传，往往能唤起印度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

相比之下，他们对巴基斯坦则又表示出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印度的核弹》一书的作者乔治·珀尔科维奇是这样形容的：

——印度像中国一样，想要被看做是一个新兴强国。被与无能的小国巴基斯坦相提并论，这有损于印度的自尊。对美国官员

的一种说法，有实在的抵触情绪。美国人说：“ 你们真的必须与巴基斯坦搞好关系。 ”印度人说：“ 你们为什么总要把我们与巴基斯坦相提并论？你们难道没有意识到我们比巴基斯坦优越得多吗？ ”了解印度人看法的美国人说：“ 去你的吧。去年（1999年）夏天在同巴基斯坦的领土冲突中，你们刚刚折损了几百人。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而且是瞄准你们的。 ”

实际上，印度在与中国攀比的背后反映出的还有一种渴望得到世界承认和尊重的心理。印度前外交秘书A · P · 文卡特斯瓦兰就曾在1989年对美国《时代》杂志提出：“ 为什么中国的大国地位——它的庞大的陆军及其洲际弹道导弹——被视为完全可以接受的，而印度却不行？为什么西方分析家对印度努力建设远洋海军一事说三道四，而对中国潜艇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却沉默不语？不让印度像中国一样拥有与其幅员相一致的军事实力是毫无道理的。 ”

2001年1月16日，印度再次成功试射了射程为2200公里的“ 烈火—II型 ”中程弹道导弹，这种导弹如果用特殊的平台发射，它的有效打击范围据说可达3000公里。对“ 烈火 ”导弹的试射成功，印度朝野一片欢呼，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称之为印度国防工业发展的里程碑。其实早在1999年4月11日该型导弹第一次试射成功时，费尔南德斯就曾得意地对记者说：“ 我们已经达到这样的境地：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能再威胁我们了。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委员、核武器分析家布拉马 · 切兰西进一步解释道：“ 这次试验填补了印度对付中国的核威慑力量中所缺少的最后一环。印度打破了中国在亚洲的核垄断地位，并发展了打击中国腹地的能力。 ”官方普遍认为，“ 烈火 ”导弹成功发射，使印度最终获得了最低限度的核威慑能力，印度的国家安全从此有了保障，因为从理论上讲，该导弹可以有效地打击中国内陆包括成都在内的许多大城市。

印度学者以为，既然印度发射导弹是以中国作为假想敌的，中国理所当然会给予充分关注，并会做出适当的反应。但没有想到，“烈火”升空之后，中国官方并没有表现出往日对某些国家发展军备的忧虑和担心，以及继之而来的愤怒声讨，反而全国上下一片沉默，这令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们十分失望。他们认为，中国显然没有认为印度的导弹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挑战，同时也没有把印度放在中国外交首先考虑的范围之内。可能在中国人看来，印度所谓的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只处在一种非常原始的发展阶段，对中国的战略行动和目标没有丝毫威慑力。因为核威慑只有在具备两个条件的基础上才有效：第一，核威慑应该具备可操作性；第二，核威慑只有在对假想敌的心理具有潜在巨大影响的情况下才有效。

印度战略专家认为，相比之下，印方加强其核打击力量在巴基斯坦就引起了强烈反应，1999年印度发射“烈火II”后，巴方就是以发射“高里II”导弹作为回应的（“高里”取名于击败过印度的古阿富汗王“高里”）。所以他们开始怀疑中国的沉默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种阴谋，也就是中巴携手共同对付印度在南亚的核优势，来限制印度力量的向外扩张。因此，为了更好地迎接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安全上对印度的双重挑战，印度别无选择，惟一的出路在于在短时期内赶超中国，以实现其最低限度核威慑的目标。于是，印度又在加紧研制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洲际导弹。

印度还以一种少有的、甚至比美国的一些“铁杆”盟国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公开迎合美国布什政府的导弹防御计划，这也明显地表现出针对中国的因素。《日本时报》2001年5月9日文章对此评论道：“任何可以遏制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和傲慢态度的计划对印度的利益都应该是有利的。看到中国因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而忐忑不安，对印度来说应该是一件快事。”

## 堡垒心态：封闭环境的产物

印度防务专家称“印度就像一个两面临海、依山为墙的堡垒”。印度漫长的历史发展一直深受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影响。天然造就的半封闭式地形，造成了印度民族与外界接触的极大困难，使印度社会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而历史上异族的进入带来的又往往是侵略和奴役，由此也逐渐造就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堡垒”心态，就是拒绝外界的进入，悠然于自己营造的小圈子里。

印度统治者在处理与邻国边界问题时不是按照各国民族的传统活动范围和习惯，而更多依据的是地缘政治思想，把诸如山脊和分水岭等地理标志作为“早就存在并自然地演化出”的传统和习惯边界加以维护。实际上在他们的头脑里，边界线就等同于安全线。尼赫鲁在20世纪50年代明确提出喜马拉雅山是“印度的安全线”，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越过，同时极力通过前进政策将自己的势力向那里推进。印度防务专家巴拉克里希南·奈尔则就此解释说：“对于印度来说，只有将它的军队驻扎在喜马拉雅山顶时才能确保它的防务”。从这里可以看出，印度统治者仍然囿于历史观念，企图以地理上的安全屏障将自己与外界隔开，“躲进小楼成一统”，尽管这种地理上的安全屏障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已经不能再起多大的保护作用了。

这种堡垒心态还明显反映在经济上。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各国都在利用这一机遇积极发展经济。亚洲其他国家通过全球市场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推动了印度“堡垒”的崩溃。苏联的解体使印度失去了传统依靠，印度从此无法再从两大集团之间的平衡中维持安全，这同时也对印度的“堡垒”心态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实行了长达30多年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后，印度被迫放弃由苏联支撑的“堡垒心态”，转而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振兴其经济。

印度和尼泊尔、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和缅甸等国有共同边界，可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印度在是否应对这些国家开放边界问题上举棋不定，有时甚至开倒车，如对尼泊尔边界就实施了更严厉的检查。中国政府10年来启动“沿边开放”政策，鼓励云南打通东南亚、南亚各国，人们想到恢复二战时期美国史迪威将军开辟的中印公路。1999年8月在昆明举行了现在被称为“昆明倡议”的加强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国四国之间经济交往合作的讨论会。2000年12月在新德里举行了第二届“四国座谈”。印度东北地区开始积极响应来自云南的打通四国障碍的倡议。阿萨姆邦派了政府部长去参加8月昆明大会。但是印度中央政府却表示出深深的顾虑：一怕东北大门一旦打开了，已经令人焦头烂额的武装叛乱问题越发不可收拾；二怕中国的政治影响伸延到印度；三怕印度东北步缅甸后尘变成中国工业品市场。2000年4月，印度《前线》杂志一篇署名文章就形容了印度政府的这种“堡垒心态”。文章说，作为印度“堡垒”的“墙”，从里面看起来好像有十丈高，但因为印度国界外地势高于境内，从外面来看，恐怕只有五尺，外人容易侵入。文章主张印度拆掉“碉堡”，加强与孟加拉国、缅甸和中国的交通来往，认为“过重的外交、政治、财政、安全理由”将会使印度东北的“孤立”持续下去。正像前印度驻华大使任嘉德在昆明所说：“要耐心等待印度克服所有的反对理由”。估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印度政府心理上的“碉堡”还会与喜马拉雅山的雪峰并存。

# 第二章　国家安全观与安全环境判断

## ——印度军事战略的基本依据

特殊优越的地理战略位置，是印度坚持地缘政治思想的物质基础，英国殖民主义的领土扩张理论和安全观由印度统治者继承和发展，为印度军事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世界战略环境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对周边地区安全威胁的评估，又为其提供了现实依据。

一个国家制定和调整军事战略，首要前提就是要依据其国家安全观和防务理论，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和面临的主要威胁因素进行慎重思考和判断。这些观点和认识决定着这个国家国防开支的规模和投向，武装力量的编成，武器装备的发展，以及应当采取的战略战术。

印度统治阶层在从英国人手中接过政权的同时，也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想、领土扩张理论和安全观，并将其发展为“印度中心”论和“安全圈”构想，从而作为制定和调整其军事战略的理论依据。而世界战略环境的影响和对周边地区安全威胁的评估，则是印度制定和调整其军事战略的现实依据。

# 地理环境与安全谋划——印度的地缘政治思想

印度地处亚欧大陆南缘的中心，印度洋北部沿岸，是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最大的国家。特殊的地理战略位置，成为印度坚持地缘政治思想的物质基础，也是制定和调整军事战略，特别是发展海洋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

南亚次大陆北倚高山，南临大海，其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三面与亚洲大陆主体有高耸绵亘的山脉等天然屏障相隔，从而形成一个半封闭型独立地区。印度恰好处于其主体地位，占其总面积的67%。从印度自身的自然地理环境看，其西北部和北部横亘着苏莱曼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山高入云，绵延数千里，是天然的壁垒，为印度武装力量设防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东北方的若干山脉将缅甸与印度隔开；中部及沿海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便于大部队实施机动作战和向印度洋扩张；东、西、南三个方向呈尖刀形居中朝南向印度洋前伸，使其海上兵力向远洋活动的航程大大缩短，为其控制印度洋提供了天时地利的优势。因此，印度防务专家称“印度像一个两面临海、依山为墙的堡垒”。

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它既是贯通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的海上桥梁，又是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交通要冲。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家所必需的石油与矿产供应都仰赖于印度洋。这一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印度洋成为近代海权国家争雄角逐的舞台。17世纪以后，它曾沦为大不列颠的“内湖”，20世纪70年代又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角逐之地。印度是印度洋沿岸最大的国家，其本土由北向南深入印度洋1600余公里，海岸线长达6000余公里；西临阿拉伯海，东濒孟加拉湾，南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隔海相望；

其位居阿拉伯海的拉克代夫和阿明迪维群岛，是通向海湾、非洲和经由红海、苏伊士运河至地中海的必经之地；其位居孟加拉湾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则犹如坚守印度洋的前哨，扼制着马六甲海峡。这种关口式的海洋地理位置，既为昔日落后的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充当了跳板，也为独立后日益崛起的印度向印度洋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18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使用坚船利炮，从海上叩开了印度的大门。南亚次大陆优越的地理环境，给大英帝国带来了丰厚的地缘战略利润，使其得以对印度进行长达近200年的统治和经营。按照强权政治的逻辑，处于扩张时期的帝国，总是要向外扩张它们的边疆，直至遇到强大邻国的抵抗、或天险的阻挡、或是向前推进的动力消耗殆尽时，才会停顿下来。在18和19世纪，英国在印度就是这样不断扩张它在这个半岛形的次大陆上的统治，一直扩张到喜马拉雅山这个大弧形。近代英国侵占次大陆绝大部分地区所建立的统一的英属印度，囊括了现今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占据了南亚区域的中心地位，成为“英王皇冠上的明珠”。北边的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内陆山国和南面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岛国则成了英属印度的附庸；就连南亚之外的阿富汗和缅甸也被纳入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

独立后的印度受英国殖民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自认为是“大英帝国的当然继承者”，它的地缘政治观念根深蒂固。从独立之日起，印度就以近似于西方的地缘政治思想确立国家利益，谋划国家安全，制定国家军事战略。印度军事战略调整的方方面面也都深深地打上了地缘政治的烙印。由于在原“不列颠”的印度境内建立了一些独立国家，如斯里兰卡（锡兰岛）、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印度的“国界”发生了变化，疆域有所减小，但仍然占据着次大陆的中心地位。印度的陆地边界长约15200公里，西接巴基斯坦，北临中

国、尼泊尔、锡金、不丹，东与缅甸接壤，东南与孟加拉国为邻。成散射状分布在印度周边的南亚其他7个国家，与印度形成了一种“众星捧月”的态势。这些国家无论在国力和军力上都根本无法与印度抗衡。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为现代印度统治者在南亚次大陆推行以军事为后盾的所谓“地缘战略”提供了现实条件。印度人甚至把自已比作大象，把南亚其他国家比喻成一群围坐在大象身边的鹿和兔子。这种优越地位培养了印度统治者的傲慢自大和扩张野心，更使他们念念不忘“昔日的辉煌”，尽管这种所谓的辉煌实际曾经是异邦的侵略带来的。

在印度对外政策的实践中，也处处体现出它的地缘政治思想。例如，在处理与邻近国家的边界领土问题上，印度政府为了防务安全需要，不仅极力维护固有的地缘战略地位，而且还千方百计营造和完善新的、更加有利的地缘战略环境。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邻近小国，或邻近国家占据的战略要地，一旦认为与其安全利益攸关，印度总要想方设法加以控制，至少也要使之成为它与现实或潜在对手之间的缓冲区，决不能被对手直接控制。否则，它就会寝食难安。

印度的战略家、防务专家和政治、军事政策的决策者们把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西北部的苏莱曼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都看做是印度安全的天然屏障，认为只有控制了这些山脉中具有战略价值的要害地区，把这些战略要地构建成名副其实的作战平台，才能充分发挥出地理战略优势；而如果失去了对这些山系中的战略要地，尤其是常年通行孔道的有力控制，就等于面对自上而下蜂拥而来的军队敞开了自己的胸膛，只能拱手把印度洋—恒河广阔富饶的平原地区奉送给对手。

正是基于这种战略心理，印度长期以来一直渴望以喜马拉雅山作为对中国的防御壁垒。早在20世纪50年代，尼赫鲁就明确

提出，喜马拉雅山是“印度的安全线”，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越过。印度的防务专家巴拉克里希南·奈尔在《论印度防务的方方面面》一书中，从军事意义上解释说：“对于印度来说，只有将它的军队驻扎在喜马拉雅山顶时才能确保它的防务；否则，一旦分水岭被突破，敌人就可能长驱直入抵达印度平原”。基于这种认识，印度后来的统治者和战略家们对失去西藏这一所谓的“缓冲区”，造成喜马拉雅山区被中国占据的事实，一直深感痛惜。它加强对喜马拉雅山三国的控制，甚至吞并锡金，都使其战略防线得以向喜马拉雅山延伸，改善了它认为在中印边界东段地区面临的不利态势。孤悬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由于印度政府非法侵占了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而使其战略态势得到根本改观。经过印度数十年经营建设，这里已经成为向北屏蔽中国，向南威胁孟加拉国，向东加强与东南亚各国间战略联系的重要地区。

印度一次又一次与巴基斯坦兵戎相见，不惜用战争手段争夺对克什米尔的控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在其周边建立作战平台，构筑起一道安全“墙”。印度在有争议的克什水尔地区夺占星峡冰川并构筑工事，也决不仅仅是为了监视中国通向巴基斯坦的公路运输，更重要的目的，如萨廷达尔·辛格在《印度国防战略》中所说，是要“阻止巴基斯坦与西藏西部之间的往来，致使巴基斯坦同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协同行动非常困难”。这就把一个小小哨所的建立与印度在南亚所谋求的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了。

环绕印度南部的印度洋，为印度发展经济和走向世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在同时，印度面向印度洋地区的防务又是最为薄弱的，一旦失去海上优势，沿岸地区无险可守，国家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昔日的印度正是由于忽视了对印度洋的经略，造成长达数个世纪民族屈辱的历史。独立后的印度统治者自然不会忘记

历史的教训，只是由于初期国力虚弱，不得不把次大陆内部的防务作为当务之急，既无暇也无力去争夺对印度洋的控制权。好在当时印度洋还在英国人的控制之下，而印度是英国的自治领，它的海上安全无须过多忧虑。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势力逐渐撤出印度洋。此时，印度军事实力有了大幅度提高，在南亚次大陆的霸主地位最终也得以确立，它便不失时机地把战略眼光投向印度洋。而印度洋地区的形势远比陆上复杂得多，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继进入印度洋，并展开了激烈争夺。印度海军的力量还很有限，特别是缺乏远洋作战能力和有效的威慑手段。印度便制定了分阶段控制印度洋的目标，通过大力发展海军的近海防御能力和远洋进攻能力，先建立起对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慑止这些国家与印抗衡的企图。对于实力远比自己强大的区外大国驻在印度洋上的力量，印度力求通过某些威慑手段，阻止大国渗透，最终把区外大国驱逐出印度洋，实现完全控制印度洋的战略目的。

印度所处的战略地位也是它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印度著名战略家萨廷达尔·辛格在《印度国防战略》中指出：“印度处于深入到印度洋中的半岛上，能控制通过该地区的贸易路线，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战略地位，使得印度在西亚、东南亚地区举足轻重。正是这个原因，使印度成为包括东非在内的英联邦的一个主要国家，并使它严守中立，不倾向于任何超级大国。这正是吸引两大集团之所在。”这就是说，处在这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上，不结盟对它是最有利的。

## “点”、“圈”互佑——印度的国家安全观

在坚持西方式的地缘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印度统治阶层接受了英国殖民主义的领土扩张理论和安全观，并将其发展成自己的

国家安全观，对印度军事战略的制定和调整起着理论指导作用。它的代表性观点就是“印度中心”论和“安全圈”构想，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以印度为中心，在周围划一个圈，作为安全范围，“点”、“圈”互佑，以维护其战略安全利益。

1.“印度中心”论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早在1944年就为印度的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蓝图。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在将来，太平洋会代替大西洋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要在那里发挥重要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必将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1949年10月，尼赫鲁再次提出要使印度成为亚洲的中心，他在写给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声称：“今天全世界都公认亚洲的未来将强烈地由印度的未来所决定。印度越来越成为亚洲的中心。”

“印度中心”论的形成，客观上依据的是印度所处的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地位。从欧亚大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全局看，印度位于亚欧大陆外缘弧形地带的中心部位，介于东南亚和西亚这两个当今世界上最动荡的区域之间，是东南亚至西亚的陆上交通要冲；印度南部辽阔的印度洋，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战略通道，向西通过苏伊士运河可进入地中海，或经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直达欧洲；向东经印度洋与西太平洋的交通咽喉马六甲海峡可进入太平洋或直抵澳大利亚。印度洋被西方称之为“海上生命线”，印度半岛则是打入这个通道的“楔子”。中东的海湾地区是世界石油宝库和欧洲战略侧翼，而印度恰恰位于中东的门户。这种地理上的先天优势，使印度半岛成为扼控东亚、澳洲、太平洋地区和非洲、欧洲、大西洋地区之间国际航空及海运的战略要冲。

马克思曾把印度比作“亚洲规模的意大利”。这个比喻直到现在仍能反映出这个大国的地理特点。马克思写道：“印度斯坦——

这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注：指斯里兰卡）相当于西西里岛”。如果说意大利的古罗马帝国曾以其在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中心地位而称雄过世界，那么，昔日的印度斯坦也曾以其在南亚、印度洋的中心地位，而在大英帝国拓展疆域过程中起到过类似作用。

英印殖民时期，印度曾被英国视为东方殖民体系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英帝国主义曾在这里维持了近200年的统治和经营。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断拓展和实力的逐步增强，“印度中心”论的战略观点逐渐形成。其主要内容是：借助印度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逐步向亚洲大陆和海湾地区拓展，进一步扩大印度的殖民体系。19世纪英国对缅甸、老挝、中国、阿富汗、波斯、埃及等国家进行的侵略战争，就是以印度为基地展开的。

独立后的印度，虽然比英印殖民时期疆域有所减小，但仍然是南亚第一大国，仍然位居南亚—印度洋地区的中心，其历任统治者深受大英帝国“印度中心”论战略观念的影响。以尼赫鲁为首的第一代统治者就以“大英帝国的天然继承者”自居，全面继承了英印殖民时期的战略思想，把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建立“印度中心”作为印度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决心在新的战略环境中扮演过去英国在该地区曾扮演过的角色。尼赫鲁在其著作《印度的发现》中写道：“印度以它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根据尼赫鲁的“印度中心”构想，该地区小的民族国家“可以作为文化上的自治地区而苟延残喘，但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要纳入他所设想的印度大联邦，再以南亚和印度洋为支撑点，将印度的影响力扩展到亚洲和太平

洋地区，通过亚太地区“印度中心”的确立，最终成为“有声有色”的世界性大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印度中心”论思想的实质就是：以印度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将印度的影响力由近及远向外辐射，最终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印度中心”论成为以后印度历届政府继承英国殖民主义遗产、推行民族主义区域扩张与强权政策的思想基础，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确立的。

2“安全圈”构想

为了防止区外大国插手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事务，确保自己的中心地位，印度还提出了“安全圈”构想。这种构想来源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建立所谓“缓冲区”的理论和实践。

历史上，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后，便把印度乃至次大陆的安全纳入帝国安全体系之中，作为维系日不落帝国统治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看待。当年英印政府安全观的基本点，一是防止来自海上的威胁，一是防止来自陆地，主要是沙皇俄国的威胁。由于英国海军已经控制了印度洋，完全有能力保护印度免受海上威胁，所以英印政府把建立陆上安全体系作为主要任务。

为减少在向周边扩张侵略过程中与强大对手的冲突，保障以印度为核心的殖民利益的安全，英印政府会与那些有一定实力的竞争对手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一些比较敏感的地区人为地制造“缓冲区”，在这些地区双方都不去部署针对对方的军事力量，更不越过缓冲区进入对方控制地带，使双方不至于发生直接接触的危险，以此调整相互之间的矛盾，使双方的根本利益得到保证。著名的缓冲区有三个：第一个缓冲区是中国西藏，目标是阻止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将西藏分裂出中国；第二个缓冲区是印度洋，目标是全面控制印度洋，使之成为英印殖民帝国的内湖；第三个缓冲区是阿富汗，目的是挡住沙皇俄国南下。

缓冲区的建立，是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为避免在势力扩张过程中发生碰撞和冲突而相互妥协和形成默契的结果，是它们置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在当事国人民无力抗争的情况下达成的肮脏交易。

独立后的印度，全面继承了英殖民统治时期建立缓冲区以保障印度安全的思想。在印度统治者看来，由于历史、社会、人文和地理诸因素的影响，印度洋应成为印度的安全区，过去作为陆上缓冲区的缅甸、阿富汗和中国的西藏如果不能纳入其势力范围，至少必须在其影响之下，成为印度在陆地上的安全边疆。

印度洋被视为印度安全圈的主体。印度洋在国际斗争舞台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价值，印度领土插入印度洋1600公里，俯瞰着西方国家视为海上生命线的印度洋运输通道。历史上，印度洋曾给印度带来深重的灾难。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征服并非始于陆地，而是首先抢占印度沿海的滩头阵地，建立桥头堡，尔后逐步向纵深地区推进的。这一悲惨的结局，使印度遭受了近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印度防务专家认为，“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印度著名外交家潘尼迦在《印度和印度洋》一书中是这样阐述夺取对印度洋控制权的重要性的：“如果在适当的地方布置下海空军基地，造成一个环绕印度的钢圈，又在圈内建立一支力量强大、足以保卫内海的海军，那么，对于印度的安全与昌盛有关系的海洋就可以受到保护，变为一个安全区。”

阿富汗被视为印度安全圈的重要环节。历史上，阿富汗常常是外国势力入侵南亚次大陆的跳板。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脉和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苏莱曼山脉互为依托，成为犄角之势，对屏护印度河、恒河一带的安全具有非常明显的战略价值。独立后的印度与阿富汗之间有巴基斯坦相隔，使阿富汗的“安全圈”作用有所减弱，但印度的统治者在潜意识中不愿承认巴基斯坦是一个独

立国家，梦想着有朝一日巴会重新回到印度“大联邦”内，所以对阿富汗在历史上的缓冲区作用念念不忘，认为印度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一旦达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其西部和西北部的安全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印度的战略家认为，“从长远观点看，如果要建立与西部或西北部邻国的可靠边界，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三国间的联合势在必行”。

中国的西藏被视为印中两国间的缓冲区。独立后的印度从其战略和地缘政治观出发，继续视西藏为其势力范围，“印中两国理所当然的缓冲国”。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几乎在瞬间就使西藏这个独立的缓冲国消失了”。印度不少防务专家至今还对1950年印度不得不放弃英属印度在西藏的特权而耿耿于怀，认为失去了在西藏的战略利益，就意味着印度的安全边界没有达到理想的范围，那战略价值极大的作战平台——喜马拉雅山区被中国占据，印度不能安睡。可见，印度独立后始终没有放弃在西藏重新获得战略利益的意图，建立“西藏缓冲区”的梦想至今仍潜留在印度统治者心目中，这也就是印度长期容留从西藏叛逃的达赖集团在印度从事分裂中国西藏活动的原动力所在。

缅甸也被视为印度的缓冲区。缅甸虽然位于东南亚地区，但在历史上曾经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937年与印度分离。印度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缅甸同过去的西藏一样，充当着缓冲国的作用”。虽然印度宣称印缅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印度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加之阿萨姆和东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持续动乱，不能绝对排除印度的影响重新返回缅甸的可能性。一旦印度的影响在缅甸重新出现，它的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安全“钢圈”将在东边的缅甸和西翼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合拢。基于这种思想，印度当局对中缅关系的发展十分敏感，认为中国发展对缅合作关系，意在通过缅甸向印非法侵占的“阿鲁纳恰尔邦”地区和孟加拉湾渗透。

# 战略安全评估——印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0世纪90年代初是世界新旧战略格局交替的重要时期，世界和地区安全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印度军事战略来讲，可以认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世界战略环境的影响和对周边地区安全威胁的评估，都直接影响着印度军事战略的制定和调整。

1．冷战后世界战略环境的影响

印度认为，由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战略格局加速向多极化发展，战略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美国成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完全有能力对它国政治、军事或社会经济政策施加影响。可以预料，美国将继续采取强制性外交政策，以保持其全球霸权，维护其国家利益。西方发达国家间虽存在利益冲突和摩擦，但它们仍将采取一致行动，共同保持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并防止新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力量中心形成。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力求保证地区稳定，以保障世界贸易的自由运作，这对其经济持续繁荣至关重要。俄、日、中三国将逐渐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全球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目前一定时期内，它们还不大可能具备对西方发达国家内外政策走向施加影响和进行挑战的能力。印度认为，这些“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形成将产生影响的趋势正逐渐显现”，对印度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一定的不利因素，印度必须作出相应的反应。

有利因素主要表现在：

第一，两极格局完结后，印度可以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左右逢源。冷战期间，印度基本上倒向了苏联，而与美国处于一种对峙状态。两极格局结束后，由于印度开始采取务实平衡外交，加之印度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俄罗斯和西方国家都希望与印度发展关系，

印度战略地位得到明显改善。对于俄罗斯，印度既是其军火的最大买主和硬通货的可靠来源，也是它维持大国地位必须依靠的战略伙伴。俄罗斯每年向印度提供大约1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现在印度军队有70%的武器装备是苏联和俄罗斯制造的，军用飞机更是占到了总数的85%。对于西方，印度是“第三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是按西方价值观塑造世界可以借用的力量，特别是在印度成为核国家后，它的地位变得更重要了。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9年访问南亚的动向可以看出，美印关系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已经上升。小布什政府更是把印度当成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一枚重要棋子，使美印关系再度升温。美国甚至很明显地把巴基斯坦抛在了一边。美、俄双方如此积极主动地拉拢印度，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印度凭借巧妙地平衡与俄、美（包括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仅从双方都能得到军事援助，而且也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

第二，冷战结束后发展经济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给印度提供了独特的机遇。首先，印度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列为必须大举进入的十大“新兴市场”之一。其次，印度处于中东的门户，扼印度洋的交通要冲，想获得或控制中东石油的国家，都要和印度建立某种默契或战略合作关系。再次，南亚各国要搞经济区域化，有求于印度，也为它提供了在南亚搞地区霸权的机会。

第三，“中国威胁论”再度泛起，为印度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遇。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冷战思维出发，认定中国是潜在的敌人，因此，“中国威胁论”不时泛起，尤其美国和日本，不时散布“与中国的冲突”的怪论，毒化亚太安全环境。印度认为这种形势是可以大加利用的。1998年印度大搞核试验，公然跨入“核门槛”，就是以对付所谓“中国威胁”为借口的。

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

第一，世界和地区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冷战后世界大战

的可能性小了，但是各种原因引发的局部战争频繁发生，世界仍很不稳定。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军事领域的一些关键技术，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略打击手段、空间技术及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权利被剥夺。与此同时，大量常规武器却在全球范围扩散严重，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军费不断增长。印度认为自己没有分享到冷战后的和平红利。

第二，冷战后国际裁军和军控深入发展，机制日趋完善，制约着印度核战略的发展。《核不扩散条约》、《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核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等一系列核军控条约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拥护，印度面临着被纳入这些制约机制中的压力。尽管印度对此采取了异常顽固的不合作立场，但这种声势浩大的核军控潮流，毕竟使印度导弹武器发展和“核选择”战略受到了极大压力。

2．周边地区安全威胁判断

印度一直以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中心自居，将该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印度历来十分关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判断在周边地区可能面临的安全威胁。印度防务专家认为，区别敌友的标准是要“观察永久性因素而不为短时的趋向和态度所迷惑”，要观察潜在敌人的“作战能力”而不是其在“某一具体时间与某一邻国的关系状况”。受英印殖民时期势力范围的诱惑，在称霸南亚思想的推动下，印度对其周边地区“安全环境”进行了评估，进而判断自己正在受到哪些现实“威胁”。

第一，巴基斯坦是主要的“现实威胁”。

巴基斯坦与印度原为一个国家，于18世纪下半叶沦为英国殖民地，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曾经携手为使英国撤离南亚作了不懈斗争。自1947年8月印巴分治以来，两国基本上处于对抗状态。印度认为，巴基斯坦的成立从客观上缩小了它的势力范围，削

弱了印度在南亚的地位、作用。它不能容忍巴基斯坦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于它的东西两翼。因此，两国在独立之初就成了死对头，曾经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的大小冲突事件更是不断发生。迄今两国之间尚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几乎构成了两国对外关系的主体。

印度一直把巴基斯坦看做是它称霸南亚的重大障碍。1971年，印度发动战争肢解了巴基斯坦，解除了来自东翼的威胁，并从此在南亚占据了支配地位。冷战结束后，巴基斯坦由于不再起遏制苏联南下的“绊马索”作用，加之它的伊斯兰特性，在西方的全球战略中地位日渐下降，对印度的威胁进一步降低。但巴基斯坦也变换了对印军事斗争策略，尽可能不与印度发生直接对抗，而是采取“低烈度冲突”和“代理人战争”的方式，给印度施加了强大压力。1999年5月至7月中旬，两国爆发的格尔吉尔冲突是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武装冲突，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而巴基斯坦军事政变以后执掌军政大权的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本人正是策划格尔吉尔事件的关键人物，所以，今后双方围绕该地区的争斗难免会继续下去。在军备竞赛方面，巴基斯坦也总是与它针锋相对：1998年4月，印度进行了一次导弹试验，巴基斯坦就进行了两次。尔后，印度试验了5件核武器，巴基斯坦则宣称它自己试验了6件。1999年4月，两国又竞相进行中程导弹实验：印度发射了一枚“烈火”—II型中程导弹，巴则发射了自己的“高里”中程导弹。巴基斯坦在政治、军事及经济方面的某些活动也使印度深感不安。印巴国内还都存在着一股以军方为代表的反对两国和解的势力，除去历史、经济、政治、民族、边界原因之外，这实际上成了制约印巴关系逐步缓和与根本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

印度认为，南亚各国中敢于向印度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战的惟有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不甘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有寻求与印度“平

起平坐”的决心，因而使印度的战略“安全圈”出现了大缺口。印指责巴不仅“勾结”区外大国抗衡印度，而且一贯支持印占克什米尔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煽动和支持克什米尔及印度其他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并通过向克什米尔派遣武装人员和输送武器对印度展开“圣战”。巴今后还将继续制造低强度印巴冲突，破坏南亚次大陆的安全环境，力图使两国的冲突国际化，从而获得对巴有利的长远战略优势。因此，印度认为，从历史和现实看，巴基斯坦是其主要的“现实威胁”。

第二，中国是主要的“潜在威胁”。

印度防务专家习惯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和世界战略格局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印度看来，这与其说是竞争或挑战，不如说是巨大的威胁。印度统治者不但要继承英国殖民者对其邻国非法享有的特权和领土，还要沿着其侵略足迹向北部中国领土进行新的扩张。西藏地区和平解放，使印度当局把西藏作为“缓冲区”的美梦破灭，于是向中国领土推进就成了印度扩张欲望的选择。印度向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总计约为13万平方公里之多。为实现其无理要求，印度当权者曾不惜使用武力推行“前进政策”，从印中东西段全面推进，进而挑起了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最终自食其果。

除边界领土问题外，长期以来，印度统治者一直把中国视为其称霸南亚、进而争夺“亚洲领导权”的主要障碍。80年代后期以来，印中关系虽有明显改善，但印度把中国视为战略上的主要潜在对手的既定方针始终没有改变。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个：

一是中国在与印度争夺亚洲领导权。“中国和印度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两种完全对立的政治意识”，“两个亚洲巨人令人无可怀疑地在追求亚洲大陆上的大国地位，它们之间显然的利益冲突将导致相互间的威胁。虽然这种目标无疑是未来的，然而

获得所需的大国地位，将是一个不断引起有关具体矛盾的过程”。

二是中国的强盛是对“印度安全的潜在威胁”。印度防务专家认为，随着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一进程本身就对印度构成了“意味深长的潜在威胁”，尤其是中国国防现代化更令印度“忐忑不安”。中国的核力量对印度“形成了现实威胁”，在中国西南部地区部署的中、远程导弹“更加大了这种威胁”。

三是中国“孤立和包围了印度”。印度一些防务专家把中国发展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关系看做是“卷入印度的安全势力范围”，认为中国至今不承认锡金并入印度“在本质上是为中国将来插手锡金留下伏笔”，并将中国不承认印度在非法侵占的印中边境东段9万平方公里领土上建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看成是中国“领土收复主义派”日后进攻印度的口实。他们还认为中国在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中“支持克什米尔的自决立场”、赞同尼泊尔的和平区建议以及向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提供援助等等，“无一不是着眼于在南亚建立一个孤立印度的包围圈”。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印中关系改善，特别是1993年印中两国签署了《关于在印中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后，印度对“中国的威胁”重新进行了评估。他们认为，由于印中关系改善，中国在短期内对印度的“威胁”降低，但两国间的根本矛盾并未解决。中国综合国力增强，“核武库扩大”，军队现代化目标逐步实现，加之中巴、中缅等国进行军事合作，这些都对印度构成了“战略包围”。就连中国目前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被印度一些人认为“中国会借此打开通往印度洋的西南战略通道，对印度构成新的威胁”。所以有人说，在这方面印度是得了“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综合症”。

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曾多次公开指称中国是印度“最大

的威胁”。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曾在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致信美国总统克林顿，称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威胁”迫使印度进行核试验以自卫，意在争取美国的默许和支持。印度认为，从长远看，印度面临的“中国的威胁”不是减轻，而是加强了，中国将是印度长期、潜在的主要战略对手。

第三，南亚诸国对印度有“离心倾向”。

印度防务专家在分析周边安全形势时认为，长期以来，南亚地区并未形成一个“利害与共和政治制度一致的共同体”，围绕印度这个“民主国家”周围的不是君主制国家，就是军事独裁国家，或者“形势危机、政局不稳的民主国家”。这些邻国内部普遍存在着多宗教、多种族的情况，有的还存在跨国界的宗教和种族问题。这些问题引发的动乱和冲突如果控制不力，还可能会波及其他国家，甚至发展成地区性冲突。这些国家与印度存在领土、领海、河水、民族、宗教、难民等多种纠纷和矛盾，对印度使用武力和依靠军事上的实际控制和威慑的做法心存疑惧和不满，对印度有离心倾向。特别是有些国家政局不稳，可能会给外来势力插手干涉以可乘之机，这是印度最为担心的。

巴基斯坦被肢解后，为寻求安全更加向阿拉伯世界靠拢，特别是在巴基斯坦不能像以前那样依靠美国的情况下，在对外政策中打伊斯兰教牌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加，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也将更难采取现实性对策，印巴关系的改善也会变得更加困难；从巴基斯坦肢解出来的孟加拉国也“没有为印度东部边疆提供安全保障”，而是“与某些大国勾结，形成了比过去更为严重的威胁”。由于印孟两国存在大量殖民时期遗留的边界划分等问题，双方的边界纠葛一直不断，2001年4月，孟加拉国强行收回自1971年后被印度控制的博杜瓦，随后双方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边境冲突，造成至少18人在冲突中丧生；尼泊尔曾一度打出“和平区建议”的口

号，意在脱离印度北部安全防御体系的束缚而“靠近中国”，此目的一旦达到，“中尼之间的喜马拉雅天险对于印度将不复存在，印度的边境防御将处于危险状态”，因为“印度不能进入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去防守它的边境”。

第四，区外国家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对印度安全构成间接威胁。

印度防务专家认为，从印度洋地区形势看，对印度的海上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印度洋沿岸诸国，因为印度在印度洋沿岸国家中块头最大，地理位置最好，其他国家的海上力量相对太弱，不会对印度的安全构成大的威胁。对印度的海上威胁主要来自外部大国军事力量在印度洋的存在，其中主要是指美国、苏联的军事力量在印度洋的存在以及双方竞争、角逐的加剧。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就认识到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从英国人手中接管了查尔斯群岛中的迪戈加西亚岛，并将其建成了印度洋上的重要海空军事基地。该岛位于印度洋的中心，从该岛上起飞的侦察机和轰炸机能飞抵沿岸的任何地区。由于美国投资5亿美元的建设规划，迪戈加西亚岛上的设施在80年代中期就已十分现代化了，经过几次扩建，该岛已成为美军作战物资储备充足、可停泊航母和潜艇、起降战略轰炸机的重要海空军事基地。在迪戈加西亚岛基地大约有8架B—52轰炸机、7架空中加油飞机和数架P—3C“猎户座”巡逻机。

印度的防务专家认为，对美国及西方国家来说，他们最为关心的就是要保持通往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海湾地区航道的畅通，几个重要海峡不落入潜在的敌国之手。虽然美国逐渐减少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但大多数西方国家仍离不开该地区的石油。为了维护其在海湾地区的利益，美国在1990年8月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相继抽调陆海空三军近50万人前往海湾

地区，并于1991年1月联合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从海湾战争中可以看出美国为维护自己及其盟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决心。对印度来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无疑是印度在海上扩张的一大障碍。

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美国派“企业号”航空母舰驶入孟加拉湾，印度至今记忆犹新。美国导弹在海湾战争期间对阿富汗目标以及1998年对苏丹目标的袭击，都显示出美国对内陆水域国家实施军事打击的能力，美海军曾用于对付苏联的公海海上战争理论正在改变为从海上向内陆国家发起进攻。此外，印军还认为，美国对斯里兰卡的亭可马里港觊觎已久，一直想使其成为供美海空军使用的一个中途港口。战时该基地将更靠近阿拉伯海的作战地区，并能控制通往太平洋的海上通道。一旦落入美军之手，印度在印度洋的扩张战略将难以实现。

从历史上看，南下印度洋，打通苏联中亚通向远东的海上暖水通道，一直是苏俄的既定战略目标。1979年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就是这种扩张战略的实践。苏联人十分清楚，印度洋沿岸国家在联合国占有1/4的投票权；苏联可以使用埃塞俄比亚、索科特拉岛和亚丁湾的基地设施，并试图通过这些基地来控制红海的入口。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也不会轻易放弃在该地区的种种既得利益。

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泛滥也引起印度的忧虑。日本自卫队的主要部分正转变成高度现代化的海上力量，可以自由地沿着战略通道穿越印度洋。鉴于日本进口石油的70%以上从海湾取道印度洋，印度必将继续警惕日本海军的潜力。

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及围绕中国南海局势的变化，也已成为印度国防决策者们关注的焦点。印度认为，“中国将海军力量延伸至孟加拉湾的能力对印度的海上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拥有核潜艇

并已掌握潜射中远程导弹技术的中国海军迟早将进入印度洋。

印度防务专家认为，区外大国的海军进入印度洋，必然要将其紧张的争夺引入南亚，导致外来势力对南亚的干涉，从而进一步加深南亚各国间的矛盾，这是印度所不愿看到的局面。

在印度洋沿岸国家中，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海军能够对印度构成一定威胁。尽管巴基斯坦海军在规模上远远小于印度海军，但其通过现代化的建设已具有了重要的优越性，现已拥有武装导弹的海上攻击机，随着新装备的不断增加，巴海军将有能力同印度进行有效的海上抗衡。位于印度东南的印度尼西亚，控制着从远东到中东甚至欧洲的通道。印尼西北部的顶端距印度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仅80海里，印尼在20世纪60年代曾对该群岛提出过主权要求，并称“印度洋是印尼的印度洋”。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印尼曾派遣两艘潜艇和数艘导弹快艇支援巴海军作战。在印度看来，印尼海军目前虽尚未对印度构成直接威胁，但无疑也是正在该地区发展的竞争力量。

第五，海湾地区持续动荡。

印度防务专家们认为，当东亚、东南亚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缓慢、平稳的变化之际，海湾地区却变得越来越脆弱。这里在冷战时期就是民族、宗教、领土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局部危机和战争频繁发生的地区，冷战结束后，形势依然十分微妙复杂，仍然面临着局部危机、冲突和战争威胁。笃信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与海湾国家有一种天然的联系，随着该地区穆斯林国家在军事上的崛起，未来印巴战争中，不能排除许多海湾国家站在巴基斯坦一方的可能性，中东地区国家可能会在任何形式的印巴冲突中帮助巴基斯坦运送武器，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特别是伊朗，“一贯热衷于支持巴基斯坦同印度的竞争”。伊朗作为海湾地区的最大国家，其现代化海军设施发展很快，实力日益引人瞩目。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

失败，更加重了伊朗在海湾的分量。与伊朗相比，其他大部分国家在土地、人口方面微不足道，但它们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极易受到外来军事威胁。在世界经济脆弱的今天，石油资源供给的混乱也可能造成海湾地区持续的政治动荡，对南亚的安全环境产生较大影响，许多不确定因素随时可能出现。

第六，核战略环境不断恶化。

印度认为，苏联解体前，“ 印度处于美、苏、中三个核大国相互作用的十字路口 ”，依赖苏联的核保护来对付 “ 同美国友好并拥有核武器的中国 ”，使印度处于 “ 软弱无力 ” 的地位。随着苏联解体、中俄关系改善，印度成了 “ 无核保障的国家 ”。在当今核武器与弹道导弹在全世界日益扩散的情况下，核战略环境不断恶化，印度受到多元性的核威胁，不仅受到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直接现实核威胁，而且受到印度洋外来势力和中西亚地区极端民族主义国家的潜在核威胁。印度在核禁试问题上还受到国际制裁和打压。这对于没有核武器的印度是非常危险的。印度必须 “ 依靠自己的核力量 ”，“ 勇敢地迎接核挑战 ”，才能确保本国的核安全。印度国防部在历年发表的《国防报告》中，都无一例外地无端指称：“ 中国的核力量不但对印度构成最为严重和长远的威胁，而且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核保护伞，使印度的安全环境十分脆弱 ”。从地区范围看，“ 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发展了核武器和核运载工具，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常规军力优势被巴基斯坦的核威胁所抵消 ”。因此，印度只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保持对巴基斯坦的核优势，才能巩固对巴的军事优势，“ 遏制 ” 巴基斯坦的 “ 侵略 ”。这些观点促使印度数十年里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最终在1998年跨入核国家行列。

第七，国内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印度过去屡遭外部入侵、长期分裂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印度

内部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必然对军事战略的发展产生影响。印度经济落后及国内长期存在种族、宗教矛盾和民族分离主义活动等不安定因素，是印度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

印度是一个由各种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的国家，国内阶级矛盾、民族和宗教矛盾、地区之间的矛盾以及地区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等方面的问题十分突出，这些内在矛盾和冲突从印度独立之初就已成为困扰印度政府乃至影响社会安定、发展的主要因素，印度国内甚至先后发生过多次反政府武装活动，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印度各邦政府在其不同文化传统背景影响下，有着相当的排他性，以致于中央和各邦之间经常发生争执，中央和邦的关系长期难以理顺，从而损坏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导致了政局的持续动荡。其他如锡克人的问题、少数民族的地位问题，也都长期困扰着印度。印度边境地区的那加兰、曼尼普尔、米佐拉姆、特里普拉、旁遮普、阿萨姆等地都曾发生动乱。国内动乱使印度历届政府深感头痛，历经数十年，由于产生动乱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宗教和民族等方面的因素没有消除，至今仍得不到有效解决。尤其在东北部和西北部，在一个时期内，反政府武装很活跃，政府不得不动用陆军正规部队进行干预和镇压。当印度统治阶级自诩为“第三世界中最民主的国家”时，不知有多少人死于种族、宗教和种姓冲突的械斗之中。

印度防务专家认为，印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比如经济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社会地位低，宗教矛盾尖锐，广大农村封建宗法统治严重，文化落后等等，是造成冲突和骚乱不断发生的主要原因。动荡的社会政治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缓慢发展和长期的沉重财政赤字，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人口的过快增长，又往往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动荡。而势力强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则认为，只要军事强大，一个国家就可以承受境内的任何冲突，就可以

无所顾忌。例如，在印占克什米尔，政府未能满足主要以穆斯林为主的当地居民的愿望，从而导致那里发生了反印度人统治的起义。印度将一切都推诿于巴基斯坦，却不认为印度的残酷统治和克什米尔人几乎完全丧失公民自由是导致起义的部分原因。政府动用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其中包括大约40万兵力——同起义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巴基斯坦人作战。西方评论家指出，用武力而不是用对话来解决问题，最终可能会破坏印度脆弱的民主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印度的国内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综上所述，印度的国家安全观以及对安全环境的基本评估，都始终以印度的所谓安全利益为表现形式，并直接服务于印度国家战略的总目标，成为制定和调整其军事战略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 做世界军事强国——印度军事战略的基本目标

印度军事战略是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直接服务的。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是“称霸南亚，控制印度洋，争当世界一流大国”。在这一目标指导下，基于对世界和周边地区安全威胁的判断，印度军事战略提出的基本目标归纳起来就是：以国家战略为指导，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威慑巴基斯坦，遏阻中国，控制弱小邻国，拦阻区外大国，加强内卫治安，并通过发展海洋威慑和核威慑能力，争当世界军事强国。

### 1．威慑巴基斯坦

印度将巴基斯坦视为“印度安全与统一的最大威胁”、“现实的”主要作战对手，进而将其作为首要慑服对象，准备与巴打一场全面战争。针对巴基斯坦的“防御型”战略、“代理人战争”以及巴战略预备队的实力，印度提出：“在确保领土损失最小的同时，保持发动反攻的能力，以便迫使巴撤出它所侵占的领土，并迫使其预备

队投入作战，从而摧毁其军事能力与政治意志。”印度防务专家扬言，印军能“随时随地”对巴实施军事打击，“有能力取得彻底胜利”。

2．遏阻中国

印度以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和遏阻对象，其具体目标包括：一是巩固业已取得的扩张成果，确保对边境的有效控制，特别是对印中边界争议区的控制，维护既得利益，并以实力为后盾，促使边界谈判朝着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发展；二是遏阻中国武力收复失地，即使动武，印军也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战争，使中国付出“难以忍受的代价”；三是遏阻中国在南亚扩大影响，促使中国承认印度在南亚的大国地位。并认同印度的地区利益，特别是不与印度的邻国发展军事关系；四是加速与东盟建立经济上的“战略联盟”与军事上的“合作与信赖”关系，防止中国“成为本地区的支配性强国”。

3．控制弱小邻国

对南亚弱小邻国实施有效威慑和长期控制，一直是印军战略目标的核心内容之一。出于保障周边和平环境，稳定国内政治局势的战略考虑，印度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与南亚邻国缓和关系的措施、但战略目标并未变化，即以外交努力、军事“合作”、经济渗透、政局监控或直接干预等综合方式谋取和维持对它们的威慑与控制，在南亚地区充当警察，使用武力介入和干涉别国内政，要求邻国俯首听命，在政治上接受被支配地位，军事上受其保护，经济上受其控制，成为其附属国或缓冲区。

4．拦阻区外大国的渗透

其具体目标包括：一是慑止区外大国卷入南亚内部事务，特别是阻止区外大国与南亚国家进行军事合作，谋取军事基地；二是限制世界军事强国的海军进入印度洋；三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保护印度的领土领海安全和海上权益。

5．强化“维稳”、“维和”职能

“维稳”就是强化内卫治安，维护社会稳定。在印度这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里，军队还承担着繁重的“维护国家统一”的任务，多次应召援助民政当局维持法律与秩序。在党派斗争加剧，民族矛盾复杂，宗教冲突不断，“恐怖主义、毒品贩运、原教旨主义和分裂主义”等新威胁迅速蔓延的今天，保障国家统一，维护国内安全，支援国家建设等关系到国家安危和发展的问题更加突出，并进而成为军事战略调整后的重要内容。

“维和”就是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藉此不仅可以“捍卫祖国尊严”，提高国际影响，为印度早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创造条件，而且可以加强与外军的联系与合作，通过与其他国家现代化军队的共同训练和工作，锻炼部队，扩大视野，提高素质。

6．发展海洋威慑和核威慑能力

印度认为，“海军是力量的象征，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国，就必须有一支世界一流的海军”。随着海洋地位的日益提高，未来印度与周边或区外国家发生战事的可能性增加。为确立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支配地位，防止区外大国染指印度洋，必须建立一支“世界级”的海军，增强战略威慑能力。为此，印度把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远洋型海军作为实现其海洋威慑战略的主要途径。

印度把发展核力量作为谋求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同时对巴基斯坦和中国形成有效的核威慑，并在印度洋地区建立起一支全面的核力量，遏阻其他力量插足南亚事务。为此，印度强调要建立一支最低限度的可靠的核威慑力量，这支力量将由战略轰炸机、机动陆基导弹和海基武器系统组成，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和二次核打击能力。建立导弹核武库的规模试图以能与中国核力量相抗衡为目标。

# 第三章　大国梦的延续

## ——印度军事战略的历史演变

英印殖民时期的印度被誉为“英王皇冠上最亮的明殊”，其扩张掠夺性质的军事战略为独立后的印度统治者所推崇。尽管印度军事战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本国国力和军力的增长而不断发展，但固有的继承性、扩张性，以及随后表现出的排外性和威慑性等特点却一直得以延续。

任何军事战略的形成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印度军事战略起源于英印殖民统治时期，独立后在继承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并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本国国力和军力的增长，以及同周边国家力量对比的改变，按照国家战略总目标在军事上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

### 扩张与掠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军事战略

独立前的印度是英帝国在亚洲最大的殖民地，被誉为“英王皇冠上最亮的明珠”。英国人以其自身的利害得失作为考虑次大陆局势、制定战略的根本依据。英国的战略总目标是保住已经获取

的殖民利益，并伺机将其势力范围进一步向外延伸。其军事战略方针可以概括为：依托海洋，重点防范西北部的俄国，向北部扩张，把西藏变成英国的势力范围。

1．牢牢控制印度洋，建立海上霸权

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控制了从非洲经印度洋至远东的所有战略要地及运输线，建立了空前强大的海上霸权，把印度洋变成了英国的“ 不列颠内湖 ”。英国凭借这种无与匹敌的海上霸权地位，在亚洲进行大肆扩张，使从东南亚到西亚，包括南亚次大陆在内的各国，基本上都被囊括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在巩固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海上力量有力地看守着南亚次大陆，使印度伸入印度洋的漫长海疆从未遭受过任何敌手的侵扰，进而保障了英国人在南亚次大陆全力向北推进而无后顾之忧。同时，依靠这种畅通的海上运输线，英国得以将它在印度掠夺的资源和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英国本土与印度之间的军事运输，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中从印度出兵非洲以及东南亚的兵员物资输送，都是从海上进行的，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2．控制西北部，防范俄国势力南下

当大英帝国在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进行掠夺扩张的同时，雄踞欧亚大陆的沙皇俄国也在极力向外扩张。沙皇俄国一直企图南下印度洋，在印度洋沿岸占据一席之地，夺取可供其海军使用的暖水港，作为沟通分处太平洋、大西洋两大洋之中的海军相互协同作战的基地。于是英俄两国在亚洲开始了激烈的争夺。以印度为主要基地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把印度的西北部作为它在次大陆的战略重点，因为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历来是外部势力入侵该地区的陆上通道，而当时俄国正是从中亚细亚逐步向南亚推进的。英国历史学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 当英国在西北方向将边疆推进到接近兴都库什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会合

处的时候，沙皇俄国从另一方面也朝着同一处推进。”为维护自己在次大陆的利益，英国在控制了海道后，力图关闭陆路，这是当时英国对于靠近印度帝国边疆各国——阿富汗、俾路支斯坦及缅甸等邻邦的政策目标。“英国方面定下了一个始终一贯的基本目标，这就是要俄国人离开印度愈远愈好。”在整个19世纪，英国人把注意力集中于对阿富汗的边境政策以及在它之后的俄国。从1883年到1919年，英国人曾三次发动对阿富汗战争未果，便考虑把阿富汗变成西北方向的缓冲区，以阻止俄国南下。20世纪初，出任英印军总司令的克切纳尔勋爵明确提出，印度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抵御来自西北边境的入侵”，并以应付较大的对外战争的设想对部队进行全面的改编。英帝国“南部控制印度洋、北部向西藏扩张和西北部防范俄国”的战略思想，为后来印度军事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对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向北扩张，试图使西藏变成英印的势力范围

西藏以其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历来为战略家们注目。英国人认为，谁占领西藏，准就能控制次大陆。对于处在扩张时期的英帝国来说，在占领整个次大陆，到达喜马拉雅山麓之后，必然要乘中国虚弱之时向西藏扩展势力。为控制中国的西藏，或使西藏变成印中之间的缓冲区，英国先是控制了北部的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建成了英国所谓的“保护国链条”，扫清外围，为入侵西藏建立前进基地。此后开始出兵西藏，试图以武力占领西藏，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此，英国先是向边境地区用兵，1888年3月占领亚东，打开了入藏大门。1890年3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使锡金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并划则里拉为边界，开放亚东等地为商埠。然后向西藏内地入侵，订立城下之盟。1903～1904年，英印殖民统治者出动万余兵力，以锡金为基地分兵两路进逼拉萨，在1904年8月3日占领拉萨，逼迫西藏地方政府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使西藏实际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因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清政府派使赴印度与英国重新交涉，英方阴谋才未得逞。英国并不甘心失败，又在设法使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英印统治阶级感到，与其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直接出兵侵占西藏，结果导致藏汉联合反英，不如转而采取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寻找代理人、诱使西藏上层人物同中国政府离心的办法，使西藏脱离祖国成为英印的势力范围。1909年夏，清政府派川军入藏整顿西藏内政，英国公然表示反对。它一面策动亲印分子发动藏军叛乱，一面由驻北京公使出面干涉，以实力助藏独立相威胁，迫川军撤退，并诱使达赖十三世逃往印度。在此期间，英帝国主义乘机同西藏达赖集团达成了秘密协议：英国支持西藏独立；达赖集团同意将中印边境东段喜马拉雅山以南至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广大地区划归印度。1912年，英趁中国辛亥革命刚成功政权未稳之机，提出召开中英藏三方会议，与中国就西藏地位问题重开谈判。1913年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中英藏会议。会上英方提出关于内外藏界线及西藏和中国内地的界线问题的草案，并提出“外藏”完全独立，“内藏”由“中藏共管”，西藏内政暂由英印政府监督，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议时由英印政府裁决等无理主张。英方代表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还于会外背着中国代表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炮制了以喜马拉雅山的主脊为印藏边界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但这个问题根本就未被列入会议的议程。此草案遭到中国人民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爱国人士的坚决反对，当时的北洋政府也断然拒绝，使英国阴谋未逞。

殖民者留给印度的政治、军事遗产，对于独立后的印度军事战略的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从政治方面讲，一是英国依仗强大的海军，从海上而不是从陆地上征服了印度，因而海洋对印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二是英国充分利用次大陆自然地理

的特殊性，即独立于亚洲大陆主体之外的特点，将其建造成向周边发展的基地，充分运用经济、文化方面的条件，拓展影响。三是在发展实力的基础上尽其所能拓宽安全疆界，必要时在适宜的地区建立缓冲区，以保障印度在次大陆利益的安全。英国殖民扩张主义的军事战略，成为印度独立后军事战略形成的基础。

## 顽固的地区扩张主义——独立后印度军事战略的发展

印度历届统治者对英国殖民者在南亚次大陆的辉煌一直魂牵梦绕，他们以“大英帝国的天然继承者”自居，要继续扮演过去英国在这一地区曾经扮演过的角色。随着印度独立地位的确立，国家政权的建立和武装力量的组建，印度的军事战略初步形成。从1947年印度宣告独立至今，围绕“争当世界大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在半个多世纪里，印度的军事战略从形成到不断调整，直至战略体系的逐步完善，数经变迁，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有限进攻”阶段、“两线扩张”阶段、“保陆制海”阶段和“区域威慑”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也可统称为“地区进攻”阶段。

1．20世纪50年代推行“有限进攻”的军事战略

1947年印度独立后，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美苏插手南亚，使该地区出现了新的战略态势。美国试图利用美巴联盟抗衡中苏联盟，抵制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也在经济上拉拢印度，在整个50年代，美国在与巴基斯坦结盟的同时，在经济上仍然大力扶植印度，使之成为亚洲的“民主橱窗”，使之不倒向苏联并能抗衡中国。印度虽声称奉行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但对美巴联盟持有异议，政策上倾向苏联。苏联则希望利用印度抗衡美巴，遂于1955年开始同印度发展关系。1955年12月苏联领导人访印，公开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的要求，并开始向印度提供长期贷款。而此时的印度政治家

们则认为“印苏关系大改善并最终使苏联站到印度一边，对于印度是个巨大的安全收获”。尼赫鲁此时也深信他能同时利用美苏的力量服务于印度的战略。

1947年爆发的第一次印巴战争和1950年中国西藏和平解放，都对印度军事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印巴分治后不久，双方便为争夺克什米尔地区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战争，印度虽然占领了克什米尔2/3的领土，但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巴基斯坦并没有取得多大优势。1950年中国解放西藏以及随后对西藏边防的巩固与建设，又使印度将西藏作为“缓冲国”的企图落空，印度人似乎一下子感到中国人几乎来到了它的大门口，“喜马拉雅山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所谓“西藏问题”成为印度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的最大障碍。

在国内，刚获独立的印度国家穷困，民生凋敝，百业待兴，国力和军力不强，尚无力同时实现其对巴基斯坦和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感到对南亚次大陆各国的有效控制应当是占主导地位的，也就是说，用实力做后盾确立在南亚次大陆的支配地位，应是其军事战略的当务之急。自独立伊始，印度便以军事手段和外交手段全力继承英印殖民主义遗留下的疆界，并解决分治后遗留的问题。以首任总理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府一方面在外交上推行不结盟政策，扩大印度在国际上的影响，另一方面扩充军备，等待时机。对于次大陆西部和北部两个传统的战略方向，印度因独立后国力与军力薄弱，只能将军事战略的重点放在与巴基斯坦争夺克什米尔未定领土上。对于中国，一方面以政治外交手段抵制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另一方面则以准军事部队积极抢占中印边境本属中方管辖的地带，主要是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广大地区，并在印度北部建立起针对中国的所谓喜马拉雅安全体系，形成攻巴遏华的军事战略。

这一阶段，印度推行了有限进攻的军事战略。一是以巴基斯坦为主要作战对象。在第一次印巴战争后，两国一直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印度将巴基斯坦当做最直接的威胁和印度称霸南亚的主要障碍，将主要兵力部署在印巴边境，在军事上由独立初期的军事进攻转为对巴保持强大压力下的军事对峙。二是对中国实施领土蚕食策略。尼赫鲁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同中国保持友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另一方面却派地方部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上设立据点，逐步蚕食，到1954年底基本上完成了对这块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的军事占领，并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当做已定中印边界标在印度官方出版的地图上。三是控制北部弱小邻国。印度一独立便开始对锡金、不丹和尼泊尔这些昔日英印殖民帝国的缓冲区加以控制，利用这三个北部弱小邻国在对外交往和贸易上必须经过印度的特殊地理环境，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建成了对付中国的缓冲地带。截至50年代末，印度以军事和外交手段继承了英印殖民主义遗留下的大部分疆界，在中印边境占领了中国领土9万多平方公里；占领了克什米尔3/5的地区，并建立起遏制中国的北部“安全体系”。四是实施有限扩军。印度在对外政策中不惜动用武力，实施了有限扩军，三军总兵力增加到40余万人，其武装力量建设以整顿军队为重点，谋求理顺内外关系，建立健全作战指挥体制，降低军队的政治地位，调整军官队伍，提拔重用印籍军官，尽快实现军队的印度化。这一时期印军的武器装备几乎全部从英国采购，其作战指导思想停留在保守、落后的“消极防御”阶段，实际作战能力很低。尽管如此，其军事战略的进攻性已经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得到初步显示。

2．20世纪60年代推行“两线扩张”的军事战略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印度利用对其有利的国际

环境，以武力称霸南亚次大陆的时期。随着印中矛盾的加剧，美国改变对印政策，不仅在中印边界争端上公开支持印度，而且对印度的援助也从经济转向军事。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后，美国立即把大批军火空运给印度，在3个月的时间里就提供了价值6000万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1963年，美印两国总统发表联合公报，表示双方将“分担对中国的共同防御事务”。1965年，印巴再度爆发战争，美国同时停止了对印巴双方的军援。60年代后期，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对印度采取支持纵容政策，苏印交往开始密切，印度想借苏联来压巴反华，苏联则希望联合印度抗衡中美，印苏两国在反华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印关系则由热变凉。为抗衡中、美、巴三国，印苏两国于1971年8月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签订后不久，印苏又达成了苏向印提供武器装备的秘密协定，从而使印度的实力在11月21日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前夕有了迅速加强，印军取得了对巴军的绝对优势。

在这期间，印度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综合国力有一定加强。“印军1962年印中边境武装冲突中的惨败，使印度产生了新的国防意识”。印度不仅获得了美国的大量援助，而且找到了靠山苏联，结成印苏联盟，印度通过大规模扩军，谋求对巴基斯坦的全面军事优势和对中国的局部军事优势，朝着地区性超级大国的方向迈进，印度军事战略的进攻性更加明显，为自己向外扩张创造了一定的外部条件。

在这一阶段，印度推行的是“两线扩张”军事战略。第一，对中国先“北进”后“北防”。印度乘中国遇到内外困难的时机，于1959年策动西藏农奴主叛乱，并在叛乱失败后收留了逃亡印度的达赖集团。1960年，印度提出对中国的“前进政策”，即在北部印中边境全线实行北进的强硬军事方针，派地方准军事部队抢占印中边

境争议区，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1962年10月，印度进一步挑起了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结果遭到惨败。之后，印度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将国防建设置于优先地位加以考虑，大规模扩充军备，加强军队和战场建设，对中国转而采取纵深防御方针，从思想上准备在西部和北部两线作战，在策略上开始采取“西攻北防”的军事战略方针。第二，对巴基斯坦由军事对峙转为军事进攻。1962年与中国边境战争的失败使印度意识到，在军事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印度应调整政策，将战略重点置于西部印巴边境方向，力争先从战略上削弱巴基斯坦。印巴两国不断发生摩擦，终于在1965年9月触发了第二次印巴战争，双方两败俱伤，打成平手。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印度对巴战略意图更加明显，进攻态势更加逼人，印军同巴军相比已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便于1971年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肢解了巴基斯坦。第三，进行大规模扩军。印度武装力量建设的重点是扩充陆军和空军，1962年印军三军总兵力51万人，其中陆军45.8万人，海军1.6万人，空军3.6万人；到1969～1970年度，印军三军总兵力已发展到92.5万人，其中陆军84.8万人，海军2万人，空军5.7万人，兵力数量增长了接近一倍。在作战思想上，印军在中印边境战争后开始抛弃消极防御思想，代之以积极防御思想，作战方法也开始朝着灵活、多样的方向发展。但是，印度的武器装备自给率低，尤其是大型武器装备对外国依赖较大。

3．20世纪70～80年代推行“保陆制海”的军事战略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基本上处于一个有利的战略环境中。1971年8月印度与苏联签订具有明显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表明印度所标榜的不结盟政策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印度依靠苏联的帮助增强实力，在当年年底发动了第三次印巴战争，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一举肢解巴基斯坦，在南亚建立起印度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格局。美国也在不影响美巴关系的前提下进一步缓和与印

度的关系，印美关系逐步走出低谷。印中关系也逐渐松动，1976年印中恢复互派大使，1988年12月拉·甘地总理访华，使印中关系恢复正常，双方就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确定了原则。

这一阶段，印度洋地区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迫于财力和军力的不足，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印度洋撤军，印度洋一时出现了“力量真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随即在该地区展开激烈争夺。苏联在1979年12月占领阿富汗后在坎大哈附近的查布贾克空军基地，同其已在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建立的海空基地遥相呼应，并通过在印度半岛取得的苏舰在印度东西两岸四个主要港口的停泊权、在安达曼群岛上的布莱尔海军基地的秘密使用权以及在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的使用权，建立了一条保护苏联暖水通道及其南部软腹部的弧形战略圈，其常驻印度洋的军舰到80年代已经增加到30艘。苏联向印度洋地区大举渗透，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构成极大威胁。美国国防部在1980～1985年的防务计划中规定，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网和长期驻扎快速部署部队，以“确保进入海湾石油通道持续畅通”并“防止苏联对其实行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和政治控制”。美军在迪戈加西亚修建了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的大型综合军事基地和指挥中心，并以此为轴心，同设在肯尼亚、索马里、阿曼、巴林、沙特、塞舌尔、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巴基斯坦等地的海空基地相互呼应，建立了针对苏联威胁的强大的海上威慑网。除超级大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存在外，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可能进入印度洋的区外国家海军的发展与动向也受到印度的高度重视。

从70年代初在南亚次大陆的主导地位得到巩固后，印度便开始调整军事战略的重点，除仍然坚持以巴基斯坦、中国为主要作战对象之外，逐步将战略重点由南亚次大陆向印度洋及周边地区转移。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开始进行全球性战略收缩，减少对南

亚地区事务的干涉，美苏在南亚地区由长期对抗开始走向缓和，苏印联盟和美巴联盟由稳固变为松散。随着原有的战略格局走向消亡以及美国对巴、印两国政策的调整，南亚战略态势开始由均势转为失衡，向印度倾斜，为印度向印度洋地区扩张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这一阶段，印度推行的是“保陆制海”的军事战略。第一，遏制中、巴，威慑弱小邻国，巩固在南亚次大陆的霸权地位。尽管巴基斯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被肢解，减弱了对印度的威胁，但印度仍视其为“印度安全的主要威胁”，声称对巴防务不可“掉以轻心”。对中国，印度仍推行“增强实力，在边境对峙中抗衡中国”的政策，沿印中边境部署重兵，同中国武装对峙，并伺机对中国实施蚕食政策。为巩固在次大陆业已取得的有利战略地位，印度继1971年肢解巴基斯坦后，又于1974年强行兼并了锡金，使之成为印度的一个“邦”。与此同时，印度还从军事和经济上加紧控制尼泊尔和不丹，以巩固其对付中国的所谓“喜马拉雅安全体系”。对东邻孟加拉国，印度也施加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压力，试图将孟加拉国纳入其防务体系。印度还于1987年7月“应邀”出兵斯里兰卡“维持和平”，1988年11月派兵前往马尔代夫帮助马政府平息政变。第二，加强海军建设，把战略触角伸向印度洋。第三次印巴战争后，印度政府认为其陆地扩张目标已基本实现，南亚霸主地位得以确立，同时也看到了印度洋的巨大经济价值，便开始注意发展海上力量，企图填补英国撤军后印度洋地区出现的力量真空，谋求在印度洋北部的海上优势。进入80年代以后，印度加快“南下”步伐，以次大陆为依托，向海上扩张范围。印度把海军列为建设的重点，对海军编制和装备进行了重大调整，增加了2个海军地区司令部和1支舰队，成立海军航空兵，添置航空母舰、潜艇、导弹驱逐舰等新舰种。依靠这支力量，印度由近海防御转为远洋扩张，保卫本土和远

海岛屿免受“来自海上和空中的攻击”。第三，实行“最后一根导线”的核发展战略。印度大力发展其核能力，秘密生产和储备核武器零部件，但不生产核武器。一旦需要，在24小时内进行组装，接上最后一根导线，就可以“无可非议地制造2万吨级原子弹”。1974年5月18日，印度试爆了第一个核装置，显示了印度决意进入世界核俱乐部的雄心。第四，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为适应向印度洋扩张的战略需要，印度确定了在重点发展海军的同时，稳步增长陆军、空军实力的方针，加快三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步伐，全面增强作战能力，其三军总兵力由1971年的93万人增加到1991年的126.5万人，其中陆军110万人，海军5.5万人，空军11万人，另有准军事部队70余万人，后备力量约255万人。印军在增加数量的同时，开始注重提高军队素质，调整军兵种比例，以发展海军为重点，促进三军协调发展和武器装备现代化。印军武器的自给率也因国防科研、生产的进步而有所提高。

4．20世纪90年代后推行“区域威慑”的军事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战略格局和地区安全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由衰弱而迅速解体，东欧剧变，使美苏两极冷战格局消失，新的格局尚在形成的过渡时期。在南亚地区，以美苏争夺南亚霸权为主要标志的苏印结盟对抗美巴联合的格局消失，使印度失去了主要战略盟友和大国的保护，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方面处于一种“既尴尬又不知所措”的局面。俄罗斯仍把印度作为维持其大国地位必须依靠的战略伙伴和其军火的最大买主，继续与印度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向印度出售大量武器装备。但由于俄罗斯与当年的苏联相比，实力已大大下降并受到危机的影响，印度同时开始寻求同西方发展关系。美国鉴于冷战结束后巴基斯坦在其全球战略中地位下降，也在积极调整与印度的关系，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印度成为核国家后，印美关系明显升温。美、俄双方都

在积极主动地拉拢印度，使南亚的战略天平更加向印度倾斜。巴基斯坦在实力被削弱后逐渐变换了军事斗争手段，以“低烈度冲突”和“代理人战争”给印度施加了强大压力。1999年5月至7月中旬，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爆发了自第三次印巴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给双方都造成了很大损失。

从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印度大体上一直奉行的是地区性进攻的军事战略。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世界和南亚战略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印度军事战略开始向区域性威慑方向发展。从这一阶段起，印度当局在内政方面由封闭保守转向灵活开放，对外政策则由依靠苏联的平衡外交调整为务实平衡外交。同时为适应政治外交需要，其军事战略也开始由地区性进攻向区域性威慑方向发展。第一，对巴基斯坦保持绝对优势地位和进攻态势。印度将战略重点置于西部的印巴边境，平时把近50%的陆、空军兵力部署在印巴边境一带，海军兵力部署以西部的阿拉伯海为重点，对巴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防止巴进行军事冒险。第二，对中国维持局部军事压力。印度在印中边境地区陈兵20余万，继续保持“攻势防御”态势，巩固已非法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维护在边境地区的既得利益，谋取在印中边界谈判上的战略主动。第三，加快向印度洋扩张步伐。印度强调对印度洋地区敌对国家保持绝对军事优势，想方设法限制大国海军在印度洋的行动自由，慑止这些国家对印度进行军事冒险，不断扩大在印度洋的发言权，使印度洋出现对印度最为有利的局面。第四，公然发展核武器。在失去苏联的核保护伞后，印度更加强了发展核武器的信念，立场更趋强硬，最终改变了“最后一根导线”的核战略，于1998年5月连续进行5次地下核试验，宣布成为核武器拥有国，并大力发展导弹武器等核运载工具，确立“最低限度有效核威慑”的核战略，拒签核不扩散条约。第五，停止扩军。在推行区域性威慑的军事战略的同时，

印度军事力量的建设不再单纯强调数量，而是突出强调在保持一定数量的基础上，通过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调整武装力量内部结构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增强整体作战效能。截至2001年，印军总兵力维持在130余万人的水平上。

综观印度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军事战略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印度以地区性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军事战略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印度在独立初期国力和军力的落后状况已经得到根本改观，成为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举足轻重的区域大国。这其中既有向往昔日“光辉历史”方面的动力，也有继承和发展国家战略思想的一贯努力；既有印度自身所处战略地位的优势，也有超级大国的纵容和支持。随着印度军力的逐年上升，印度正在从地区走向世界，一步步地向始于印度第一代统治者的世界大国梦想迈进。

## “惩戒威慑”——21世纪军事战略的若干变化

回顾印度军事战略发展的历史，印度对军事战略做过多次调整，其中有三次调整的幅度比较大：第一次是在1962年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失败之后，第二次是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胜利之后，这两次可以说都是以吸取战争的经验教训为发端的。第三次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调整的目的是要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需要。1998年5月的核试验事件也对印度军事战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印度仍然坚持“地区威慑”这一大的军事战略框架，但军事战略的若干内容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分析这些主要变化，可以更加清楚地把握印度军事战略发展的基本脉络，了解其现行军事战略反映出的新情况。

印度军事战略内容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以下6个方面：

1．在安全威胁判断上，更加强调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

在印度看来，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虽然是最现实的和第一位的，但是由于巴基斯坦在国力和军力上相对于印度都是一个弱国，而且冷战后因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地位下降而受到冷落，印度对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并不十分忧虑。而对于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印度认为虽然不是迫在眉睫的，但却是战略性的、长远的和最为严重的。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99年《印度国家安全展望》专题报告中称：“预计未来十年，中国随着现代化计划的实施，其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将不断得到壮大，并将对印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成为全球性大国，这意味着中国将开始把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周边邻国以外的地区。”印度国防部在2001年5月31日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再次提到“中国威胁”。今后，印度将把中国作为主要作战对象，印度军队的主要任务是迎接来自中国的“真正挑战”。

2．在战略思想上，核威慑思想上升到主导地位

威慑思想在印度军事战略思想中由来已久。早在建国初期，印度就提出不但要有航空母舰，而且要有核武器，使印度成为有威慑力的军事强国。1974年，印度试爆了一个“核装置”，标志着它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核门槛”，成为一个准核国家。但在当时的两极格局下，印度拥有核武器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所以它不再向前迈出第二步，而是实行“最后一根导线”的核发展战略，秘密贮备核技术和核武器零部件，以便在需要时能够造出原子弹。到了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印度失去了主要战略盟友和大国的保护。为了“有效地对付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印度明确提出“要发展自身的强大战略威慑能力”。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一直试图进行核试验。据闻1995年12月印度就曾准备进行新的核试验，只是由于美国国防部及时获取了该情报，并被《纽约时

报》披露，印度被迫取消了这次核试验。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仅两个月就进行核试验，也只不过是将上述企图变成了行动。这之后，核威慑正式成为印度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3．在战争准备上，立足于打“有限战争”

印度认为，现代武器系统的杀伤力及其昂贵造价，使任何旨在摧毁或完全征服他国的持久军事行动难以实现。同时，这种持久的军事行动会为国际干预增添机会，增大核交易的危险，加大经济崩溃的可能。因此，核时代前的有关军事冲突的战略和理念需要更新。未来战争短暂而又激烈，是为执行特定打击任务而设计，并迅速做出决定，时刻准备应付对方报复的军事行动。这预示着，战争各方只能达到有限的政治目的。而旧的战略概念，即用军事力量向纵深挺进或完全摧毁敌国战争资源的传统概念已不再适用。未来作战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在于彻底打败敌方，而在于通过给对手以必要的惩罚，迫使其回到谈判的轨道上来。

印度认为，从近年来世界范围局部战争的特点和中印、印巴关系的发展现状看，印中、印巴之间因领土争端引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中、印、巴三国现都拥有核武器，在未来战争中必会顾及对方的核威慑能力，尽力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使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战争规模的可控性增强。今后印度对中、巴作战的规模和手段都将是有限的。而且印度与中、巴边境地区地理条件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今后战争和冲突的有限性。常规的山地作战仍将是印军的主要作战样式。与此同时，印度认为，由于印巴军事实力对比悬殊，巴基斯对印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正在减小，而将更多地采用小规模边境渗透、代理人战争、低烈度冲突等形式。1999年以来，这一趋势尤为明显，特别是5～7月间发生的印巴格尔吉尔冲突，是一场典型的由小规模边境渗透引发的边境军事冲突，这种“低强度冲突”将成为印军今后必须应

付的主要作战样式之一。

有鉴于此，印度新的军事战略方针由过去准备与巴基斯坦和中国“两线作战”、“打一场半”全面战争，转变为立足与巴、中打“有限战争”，打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边境局部战争。正如印度前国防部长在2000年1月所宣布的，有限战争将是印军未来作战的基本样式。这要求印军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能力，以确保及时、正确地作出战略反应，达到一定的外交或军事目的；必须使现有战略武器系统拥有强大的威慑力，以防止他国的战略攻击；需要从质量上增强印度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能力，以适应新的挑战。自2000年以来，印军在演习中重视演练“有限战争”背景下的反渗透作战，强调快反及特种部队的使用。

4．在作战理论与指导上，强调联合作战和主动出击

印军重视总结历次局部战争的经验，潜心研究对手的战法，并注意吸收苏、美等国军队的作战思想，研究借鉴现代局部战争的新经验，不断丰富作战理论，逐步形成了符合其军事战略的、突出进攻性的作战思想。

由于印军大量装备的是苏联武器，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印军重视吸收借鉴苏军作战理论中“大规模报复”和“把战争推向敌国”的思想，认为苏军机械化大兵团、大纵深、高速度进攻的作战理论十分适用于未来印巴边境地区作战。1986年印军举行的代号为“铜钉”的大规模三军联合演习，就是对这一理论的学习和检验。

海湾战争以后，印军认真研究了美军的“空地一体”作战理论，确立了联合作战的指导思想，着手将空海、海陆和陆空三种协同作战能力转化为三军联合作战能力，革新作战理论，制定相关作战条令，并结合印军的实际在演练中进行检验。印度军事研究人员认为，印军目前已具备了在南亚次大陆有选择地应用美军“空地一体”作战理论的条件，主张空军应做好在未来战争中发挥主导作用

的准备。

在此基础上，为了适应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需要，争取战争主动，从2000年1月起，印军决定将过去重在防御的“反制威慑”战略转变为重在进攻的“惩戒威慑”战略，就是说，印军今后在必要时可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给敌方以教训和惩罚。“惩戒威慑”战略是一种以实力为后盾的进攻性战略，其实质是通过先机、主动的有限打击迫敌就范。这种指导思想将使印度在军事上更具冒险性，对周边相对弱小的国家构成巨大威胁。据此，印军可能会在认为时间、地点和军事实力对比对其相对有利时进行军事冒险，以武力谋求所谓的“有限目标”。当前印度最可能冒险的地区是克什米尔，而今后在中印边境地区再次进行军事挑衅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增加。

5．在军队建设上，重视稳步提高质量

从20世纪90年代起，印度将军队建设的重点转向质量建设，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停止扩军。为实现地区称霸的国家战略目标，印度一直推行扩军政策。90年代以来，由于对军队的数质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印度放慢了扩军速度，军队员额至今保持在130万人左右。

二是保持军费的稳步增长。扩军暂时停止了，但军费开支却是逐年上升，2001～2002年的军事预算将达到170亿美元。长期的大量军费投入，保证了武装力量现代化程度的稳步提高。

三是优化军队结构。印军在编制调整中着力优化陆军结构，同时加大了海、空军和技术兵种的建设力度，重点发展快速反应部队和信息战部队。

四是提高国产武器装备比重。印度的军事工业发展虽然迅速，但发展不平衡，自主开发能力差。印度自行开发的阿琼坦克、LCA战斗机、潜艇战舰等等都“千呼万唤始出来”，迟迟不能列装。

印度虽然能制造氘元素核弹和低温火箭发动机等世界一流技术的产品，但却不能为本国士兵生产简单、廉价的5.56毫米步枪枪弹。为此，印度下大力量在1994年制定了“自主防卫十年规划”，决心到2005年使印度国产武器装备的比例由1994年的30%提高到70%。

6．在军队使用上，正式赋予军队“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青年时期曾经在英国留学，西方的民主政治对他影响较深。独立后的印度照搬着西方的“民主”、“选举”和“政党”制度，也曾明确规定军队不能干预国内政治，试图以西方式的民主将印度引向繁荣强盛。但由于印度的生产力还不发达，国民教育程度也很低，人们仍然生活在旧的社会关系中，民族的、种姓的、宗教的关系支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样一个语言繁杂、人种众多、宗教纷呈、种姓不断分裂和政党林立的国家里，社会被划分为许多狭隘的集团，各个阶层、集团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历史矛盾和尖锐的利益冲突，造成国内局势长期动荡不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其规模甚至超出了警察的能力范围。为此，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为对付频繁发生的民族和宗教冲突或暴乱，不得不引进“反叛乱作战原则”，允许军队有限度地参与镇压民族暴乱。进入90年代以后，印度的民族、宗教等矛盾进一步激化，有10多个邦的少数民族要求自治或独立，并常因此而发生流血冲突，有些冲突事件死伤严重，甚至震惊了世界。因此，印度又进一步制定了“低强度作战原则”，打破禁规，不但允许军队参与“镇压民族暴乱”，而且赋予“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这样，印军的职能由单一的“对付外侵”转为双重的“御外安内”。自20世纪80年末起，印度陆军中有20多万人参加内卫治安，最多时曾达到50万人。

为了有效提高“国内安全作战”能力，在印度陆军改革构想中，国内安全问题受到应有的重视。院校也在围绕国内安全作战进行

改革。有些院校增设了突击队员系；负责对基层指挥官和班长施训的“反叛乱丛林作战学校”增设了山区、丛林等恶劣条件下的“特种作战”内容。针对叛乱分子和恐怖主义者的特点，印度各特种作战部队对于作战中的技术技能也有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其中包括各种条件下作战、跳伞、爆破、破坏、引导作战、搜集情报、机载介入和撤出及战俘审讯等。

## 进攻与威慑并举——军事战略的基本特点

印度军事战略既有对大英帝国扩张主义军事战略的继承，也有对当代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威慑思想的借鉴；既有“军事能力和军事信心”这些促使印度成为地区性大国的“现实基础”，也有国家战略总目标同当前有限国力与军力之间的矛盾。在固有的继承性、扩张性基础上，又表现出了有限的进攻性、全面的威慑性、强烈的排外性以及现实的区域性，作为一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构成了印度军事战略的基本特点。

1．有限的进攻性

印度前副总统M·希达亚士拉曾对印度的军事战略有一个比较权威性的概括表述，他说：“仅靠防御不能避免战争，防御也不能赢得战争，我们不仅要有防御准备，还要有进攻能力，能发起攻势”。这位副总统先生认为，印度的武装力量必须具有向预想的敌人发起攻势的进攻能力，直至全面赢得战争，这就清楚地揭示了印度军事战略的进攻性。

就印度军事战略的进攻性问题，印度政府或军政要人大都是遮遮掩掩的，对外申明更多的是，印度奉行的是防御性质的军事战略，至多是军事战略具有攻势防御的性质。但是，翻阅一下20世纪印度独立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实：

40年代进行印巴战争，企图一举夺得查谟—克什米尔；50年代派兵进驻主权国家锡金，控制不丹王国，在印中边境地区前推重兵，侵占大片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60年代先是挑起中印边境战争，后又进行第二次印巴战争，并开始执行旨在大规模扩军备战的防务计划；70年代与苏联结成军事性质的联盟后，公然入侵巴基斯坦并将其肢解，以后又吞并锡金，将一个享有国家主权的独立王国划为印度的一个“邦”；80年代与孟加拉国交恶，多次发生小规模交火事件，并构筑铁丝网，封锁印孟边境，出动数万军队进驻主权国家斯里兰卡，以及在印巴、印中边境地区采取“前沿部署”或者“前沿展开”的军事政策。

从这些战略行动中可以看出，印度武装力量的运用突破了传统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国界的约束力，构成了进攻他国领土的性质；运用武装力量的动因就是印度扩大势力范围、确立在次大陆支配国地位的战略意图；在与周边邻国解决双边关系，其中包括边界争议问题时，运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意向明确，行动坚决。因此，这些战略行动与进攻性的军事战略基本上是相吻合的。

还可以从南亚战略格局的演变情况出发，研究一下印度独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所积极奉行的利己主义的外交路线，客观地分析一下南亚次大陆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看一看印度在南亚地区各国，尤其在几个小国升降沉浮的变化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它在该区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比一下印度独立后出版的地图上版图变化情况，特别是在仔细研究了印度武装力量的编成、装备、战略展开态势和演习情况后，就不难发现印度所奉行的军事战略所具有的进攻性质。正是印度政府和武装力量50余年来战略实践活动的轨迹，充分证明了印度所奉行的是实战型并且有进攻性特点的军事战略。

印度军事战略的的进攻性，是随着印度国力和军力的迅速增

长和边境防御态势的改变，在美苏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之下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因为受到国力和军力所限，这种进攻性又是有限度的，并带有地区性和防御属性。这主要反映在，面对一些区外大国对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的威胁和渗透，印度作为地区性大国，无论经济力量、军事实力都无法与之相比。在综合国力尚未发展壮大起来的情况下，印度只能以南亚次大陆作为它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壮大力量，伺机控制印度洋。因此印度将南亚次大陆作为它的支配地区，对于大国在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的活动只能采取防御战略。就现阶段的对华战略来讲，在整体上是防御性的，但在贯彻这个总的战略原则时，又强调在中印边境长期重兵压境，战时以局部优势的进攻来创造有利的防御态势，并通过平时的不断蚕食为下一步由防御转为进攻创造条件。从这些意义上讲，印度的军事战略才具有一定的防御性质。从现有综合国力，尤其武装力量的实力、装备情况看，地区性进攻的军事战略这种概括是比较符合印度实际情况的。

2．全面的威慑性

全面威慑是指在各个领域实行全方位的威慑。印度目前奉行的军事战略就具有全面威慑性。从理论上讲，印度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当今时代，军队的作用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是为占领领土而发动战争。军队的首要任务“在于遏制战争”，“遏制的目的在于使敌人发动的侵略变得对其不利”。与此同时，在现代条件下，“无论是在超级大国的全球争夺还是地区性争夺中，要建立绝对的军事优势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建立或保持相对的军事优势。从实践上讲，独立以来，尽管印度的军事实力得到迅速发展，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它的国力和军力还是有限的，距离其地区称霸目标的实现还有较大差距。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确保其国家安全和地区霸权地位，印度历来提倡发展足够的威慑能力，并在

当代盛行的威慑思想影响下，逐步将以往重实战转变为重威慑的战略。

首先，建立“一支足以威慑侵略的现役军队”。有效的威慑意味着可以保卫印度领土的完整和南亚盟国的安全，确保对本地区有利的军事平衡。它要求具备足够的实力优势，在多个战略方向上实行有效的威慑，争取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佳的效果。因此，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为军事战略所规定的任务，要求印度必须“有一支足以威慑侵略的现役军队”，即常备武装力量。印度提出要仿效美军建立一支具有“足够威慑能力”的快速部署部队，实行“第一次打击”并承担“地区国际警察”的任务，以巩固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霸主地位，确保对现实的和潜在的敌对国家形成“有效威慑”。

印度历来信奉实力至上的原则，认为“对威胁惟一有效的反击是实力和警惕”，强调“军备必须威慑侵略”，“必须足以打败侵略者”。这一思想在印度的国防政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目前印度仍保持着一支兵力数量居世界第三位的常备武装力量。它之所以保持这样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并且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对而坚持发展核武器，提高远洋作战能力，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威慑周边邻国，尤其是应付印中、印巴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积蓄力量挺进印度洋，以及镇压国内各种武装冲突和骚乱，进而把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威慑能力对周边邻国（包括印度洋沿岸地区各国）和区外国家所产生的威慑效应，作为谋求地区性大国地位进而成为世界性大国的现实基础。

其次，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威慑周边邻国。印度1971年肢解巴基斯坦之后，南亚次大陆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特征是，印度在该地的惟一对手巴基斯坦受到了空前的削弱，印度则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南亚次大陆“无可争议的大国”，它的军事力

量比本地区其他各国军事力量的总和还要大很多，使周边小国对它敬畏有加。在这支数量极为可观的军事力量上再装上“核牙齿”，对南亚次大陆各国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就更大了，即令任何国家单独甚至是联合起来，也不敢对印度的支配地位进行挑战。然而印度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采取实际步骤，对周边邻国尤其国小力弱的国家形成实际威胁。在武装力量部署上，印度采取前沿展开政策，一旦需要，可立即出动，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在战略手段上，军事、政治和外交、经济紧密结合，软硬兼施，打拉结合，迫其就范。长期以来，印度的军事力量确实对周边小国产生了一定的威慑效应。这是印度威慑原则运用的一个方面，即不使用武装力量对邻国实施干预，只发挥其“慑止”作用。另外，从现实斗争情况看，在充满了矛盾、动荡不安的南亚次大陆，印度要卓有成效地维持其大国支配地位，仅靠威慑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周边各国进行实际的武力“干预”，“像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那样”，“超越国界使用武力”，解决在与印度利益攸关地区内的政治动荡，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印度曾在20世纪80年代迫使斯里兰卡政府同意它派兵进入其国土执行“维持和平”任务，以及派兵进入马尔代夫平息政变。

再次，以战略威慑力量遏阻区外大国。印度认为，对区外大国的威慑仅靠常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使用战略威慑力量，特别是核威慑力量，拥有与印度洋地区核国家相匹敌的能力。印度防务专家指出：“战略环境要求我国核化，在我国的能力、资源及发展计划的范围内，能确保不让支配性的军事影响出现在我国周围，我们需要有适当的军力，并以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后盾，向未来的任何侵略者表明，要在印度周围进行干涉的代价将十分惨重，使之望而却步”，“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优柔寡断都将危及印度的安全。印度只要拥有核潜艇，就可以进攻或威慑对手”。为此，印度加紧

研制、购买航空母舰、核潜艇和潜射弹道导弹，提高海上机动作战尤其是远洋作战能力，并借助核威慑手段维持与区外大国的力量平衡，力图“劝阻”区外大国干涉印度洋地区事务的企图。

3．强烈的排外性

在“印度中心”论的影响下，印度一直坚持遏制和排挤外部军事力量进入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的主张，并将其作为一条长期起作用的战略原则。

印度自认为已经成为第三世界的超级大国，现有军事实力虽然根本无法与超级大国相比，但在数量上确实可算作是世界性军事大国。独立后的印度当局在接过英殖民者移交的政权的同时，以当年大英帝国统治南亚的天然继承者自居，视南亚为印度的家天下，对南亚其他国家的独立愿望和要求感到不能容忍，急欲将其完全置于印度的监控之下。印度的统治者公开宣称，印度不能容忍外来势力干涉任何南亚国家的内部冲突，任何南亚国家不得接受具有反印倾向的外来军事援助。印度的这种明确企图被西方称之为“新德里版的门罗主义”。印度对周边邻国频繁用兵的目的，在于使南亚次大陆各国具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安全观乃至统一的政治见解，这就是各国都要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从而在南亚地区建立有利于印度的地区新秩序。因此，印度把外部势力企图进入南亚次大陆、印度洋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企图，均视为对印度利益的侵犯，必须加以排斥，以确保印度在上述三个地区的战略利益。印度反对美国在印度洋查尔斯群岛的迪戈加西亚建立军事基地，把中国海军对南亚国家的友好访问说成是企图染指印度洋。印度还认为，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也有在印度洋向其提出挑战的可能性。

印度从独立之日起就梦想着要成为地区大国、世界强国，企图称雄于南亚次大陆、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而南亚和印度洋地区

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是大国争夺的主要地区。20世纪70年代，继英国势力退出这一地区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继进入，为谋取各自的战略利益角逐。这些大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必然发生激烈碰撞。由于当时的印度经济落后，综合国力弱，军事力量不强，达不到推行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印度只能在一定时期内把基本着眼点放在依靠超级大国的力量，重点发展军事实力上。这是因为“印度必须确保能获得两个超级大国或者其中之一的核保护”，以实现和巩固印度在次大陆的霸权地位。它先是接受美援，后又与苏联结盟，在两大政治集团的对立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战略利益，实力有了很大增强。但是，印度不能容忍超级大国动摇其在南亚次大陆所居支配地位的根基。例如，当美国与它的死敌巴基斯坦亲近时，印度便冷淡了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投靠苏联；而当美国调整了南亚政策，开始冷淡巴基斯坦后，印美关系迅速升温。印度可以大量接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当其邻国巴基斯坦接受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时，印度则指责为美、巴在搞针对印度的阴谋。一件事情，两个标准，其实质就是在南亚次大陆只能允许印度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

4．现实的区域性

尽管印度的最终战略目标是要做世界一等强国，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但到目前为止，以印度综合国力和三军编成、装备以及可能具备的作战能力，还仅能作用于南亚次大陆包括喜马拉雅山地区。陆军严重缺乏机动能力，尤其缺乏远距离、高速度机动能力，其作战范围局限于南亚次大陆战区。海军的发展尽管已被印度政府列为军事力量的发展重点，就目前情况来看，难以与世界性军事大国在印度洋争雄，如果再加上缺乏两栖作战部队这一因素，那么印度海军的作战能力仍然仅限于近海范围。印度空军因缺乏远程作战飞机和预警机，印度本土之外也没有可资利用的空军基

地，空军只能在南亚次大陆战区范围内遂行争夺制空权和有限的陆空、海空协同作战任务。总之，印军虽有130余万之众，但是由于武器装备的限制，尤其缺乏现代化的指挥、控制和信息传输系统，缺乏远程投送工具，目前，印度军队只能在南亚次大陆遂行作战任务。印军要具备在印度洋地区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还需一定时日。

国力不强，制约着军事战略的发展。1985年拉吉夫·甘地先生就任印度总理以后，为印度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到21世纪，“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有生气的国家”，以加入世界强国之列。根据这一战略目标，拉吉夫·甘地在执政的几年里，实行经济改革，推行灵活的进口控制政策，开展市场竞争，发展私营经济，允许企业自由发展，再加上实施计算机政策，准备建立全国信息中心等，确实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甚至有的外电称拉吉夫·甘地为印度的经济带来了“大跃进”。但好景不长，1990～1991年度，因政局动荡和海湾战争的影响，尤其苏联解体的冲击，印度经济又坠入低谷。1991年，拉奥政府发起经济改革，此后印度的经济发展一直较快。瓦杰帕伊政府更是雄心勃勃，企图以发展核武器带动军事实力的全面提高，在“走向世界”的步子上迈得更快。但印度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差，底子薄，起点低，按当前的发展速度看，要想在短期内进入世界性大国谈何容易。印度国家经济缺乏高速发展的动力，很难说会有惊人的“奇迹”出现，这就意味着综合国力，尤其是强制能力，包括军事力、战略物资和技术、经济力、外交力不会有超越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因此，印度发展国防的雄心与其薄弱的国家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短期内还会存在。印度现在是国际公认的信息产业大国，每年的软件出口为印度赚来大量美元。但在“实力政策”的指导下，急于要塑造大国形象的印度政府大力增加军费开支，加快核武器的研制和武器

装备的更新换代，使印度的“软件美元”被急剧增长的军费开支所吞没。印度在军费开支上一再加大投入，已经“超出了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印度舆论担心，当瓦杰帕伊政府大把大把地将美元扔进军火商的大嘴时，印度的基础设施将面临超负荷运转；停电、断水、火车出轨、交通堵塞、住房极度短缺等时常见于报刊电视，人们为此苦不堪言。

印度薄弱的国家经济对国防建设的影响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有明显的改善，这势必影响军事战略的推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虽然印军的结构、实力和装备有所变化，尤其是军队数量可以和世界性军事大国相比，但印度军事战略的作用范围尚难以达到整个印度洋地区。尽管如此，印度走出“地区”奔向世界的步骤和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两者之间的距离正在日趋减小。

# 第四章　西攻、北防、南进和中部机动

## ——印军的战略部署

根据新形势下各作战目标的威胁性质、自身实力及历史经验教训，印军在战略部署上对各战略方向采取不同的方针。西部的巴基斯坦是重点，北部的中国是次重点，南部的印度洋地区是今后扩张的努力方向，战略纵深地带则配置战略机动力量以应付国内外的突发事件。

印军的战略部署是根据新形势下各作战目标的威胁性质、自身实力及历史经验教训而确立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坚持以巴基斯坦和中国为主要作战对象，准备应付并打赢不同规模的局部战争，同时对付来自印度洋的各种“威胁”。印度认为，未来战争可能“首先在印巴边境爆发”，而且中国“很可能与巴配合，对印采取军事行动”，牵制西藏当面印军，“并乘机夺取印中边境争议区”，相反，如果印中爆发战争，巴基斯坦也可能在印巴边境进行牵制作战，从而迫使印军处于“两面作战”的境地。据此，印度在争取以政治、外交等手段力避“两面作战”的同时，在军事上也做了对巴、中同时作战的准备。当前，印军的部署态势已经形成西、北、南三大战略方向和中部战略机动的

特定格局。其中，西部是部署重点，兵力占总数的45%左右，主要用于威慑巴基斯坦；北部是次重点，占总兵力的25%左右，主要用于威慑中国；南部主要配置海军力量，用于对付近海小国和来自海上的威胁；中部为印度的战略纵深地带，驻军占总兵力的30%左右，用于对各战略方向实施快速机动支援。此外，印军还担负着维护国内安全稳定的任务。鉴于这种突出重点作战方向、集中使用现有兵力的布势特点，以及地方武装、准军事部队和正规军交叉配置的部署原则，印军自称具备了同时对付巴、中“两面作战”的能力及快速反应、机动支援的能力。

在战略部署上，印军对各战略方向采取不同的方针，这些方针分别是“西攻”、“北防”、“南进”和“中部机动”。

## “西攻”——对巴基斯坦采取积极进攻战略

所谓“西攻”，就是对巴基斯坦采取积极进攻战略，以优势兵力始终对巴保持进攻态势，时刻准备与巴打一场全面战争，一旦需要就摧毁和肢解巴基斯坦。

印度把巴基斯坦看做是主要作战对象之一，认为巴基斯坦是南亚次大陆地区惟一敢于公开同印度抗衡的国家，是印度争霸南亚的主要障碍，也是现实的主要作战对手，两国存在爆发全面战争的现实危险。但由于巴基斯坦国力相对较弱，印度认为应对其采取攻势战略以慑服巴基斯坦。同时，巴基斯坦地处南亚腹地，是中东、中亚的战略交汇点，控制该地可为印度势力在陆上的扩展提供地缘优势，因此，摧毁或控制巴基斯坦是印度近期和长远战略利益的基本目标，这也是印度对巴采取进攻战略的重要原因。

印度战略家认为，巴基斯坦有发动战争的主动性，可能搞一场短促的突然袭击，以夺取印度的部分领土或城镇，以求在谈判桌上

讨价还价，要求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让步。萨廷达尔·辛格少将在《印度国防战略》中分析：“ 由于巴基斯坦的部队驻在边界附近，几乎不需要调动即可投入战斗。利用这一优势实施突袭，巴就可以夺取战争的主动权，因此，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出其不意，使印度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速战速决，夺取胜利。 ”印度认为，在未来的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有可能选择查谟—克什米尔地区和阿姆利则、古达普斯尔地区实施进攻，发动一场突然的速决的进攻战。这种选择对于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巴基斯坦多次声称对查谟—克什米尔地区拥有主权。战争将以巴基斯坦对印度发起突然袭击的方式展开，巴基斯坦陆军部队在空军积极配合下，将向印占克什米尔地区的低凹地带发起猛攻，夺占斯利那加后继续发展进攻，以全部占领查谟—克什米尔地区为最终目的。由于巴基斯坦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处于劣势，印度认为不能排除巴基斯坦在这场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当然，印度更清楚，从印巴实力对比上看，印度不仅在军队数量上，而且在武器装备上都占有优势地位，巴基斯坦在正常情况下还不具备挑起巴印全面战争的物质基础；相反，它可能只够进行有限时间的防御作战。而印度却早已具备对巴基斯坦实施全面进攻的条件，不能绝对排除在国内外环境有利时，或为适应某种政治需要，印度有可能对巴基斯坦主动实施大规模进攻。

在目前的战略部署中，印度把西部边境作为重点，将50%左右的陆空兵力部署在西部边境，两大舰队之一的西部舰队部署在阿拉伯海，在印巴边境一线和与巴毗连的海域形成绝对军事优势，保持进攻态势，使巴不敢轻举妄动。

印度军事专家注意到了巴基斯坦在战略态势上具有的一些先天性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战略纵深小。巴基斯坦国土面积只有80余万平方公里，而且地势狭长，东西宽度一般仅有500余公里，

这种地理条件使巴基斯坦几乎没有多少战略纵深可言。巴基斯坦的全部国土，尤其是较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均在印度战术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内，即全境处于印度空袭范围之内，给巴的空防、民防造成极大困难。二是地形不利。印度河平原地区地势开阔，无险可守，便于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突袭，容易达成突击效果。三是海岸防御薄弱。巴基斯坦的海岸线仅有980公里，加之海军力量小，缺乏潜艇，不但不利于登陆作战，而且难以保障海上安全。

根据巴基斯坦存在的上述弱点，印度对巴采取的战略方针可能是：陆海空三军密切协同，集中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实施先发制人的猛烈进攻，首先夺占位于巴浅近纵深地带的战略要地，同时相机发展进攻，歼灭或重创巴重兵集团，以迅速达成迫使巴屈从的战略目的。一旦开战，印度将实施先发制人的猛烈进攻，迅速扩大战场，夺占巴基斯坦浅近纵深地带的战略要地，并迅速发展进攻，在国际社会要求停火前充分发挥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优势，给巴以沉重打击。

印巴边界为南北走向，全长2468公里，其中印巴正式边界1600公里，印巴停火线770公里，克什米尔未划线98公里。边界线分为三段：北段为克什米尔的高山地区；中段为旁遮普地区的印度河上游平原；南段为拉贾斯坦邦的沙漠和古吉拉特邦的一段沼泽地。印巴之间的陆上交通（包括铁路与公路），几乎全部集中在旁遮普邦段的拉合尔地区，但大部分已封锁，南段仅有一条直线铁路经巴方的米尔普尔哈斯通到印方的巴尔梅尔。根据印度防务专家们的观点，印军可能将在印巴边境“北段防御，中段和南段进攻”。

“北段防御”，就是在北部克什米尔地区积极防御，伺机反击。印军认为，克什米尔地区多为山地，易守难攻，不便于大兵团展开。

巴方的克什米尔部队因长期保持与印军在实际控制线上接触，作战经验丰富，“显示出比巴正规军更大的耐力和抵抗力”，并可以得到当地穆斯林居民的支持。所以，这里应以积极防御为主，伺机进行反击，配合印军在中、南段的胜利，乘势收复克什米尔巴占区。

“中段和南段进攻”，就是在中段和南段投入重兵，突入巴基斯坦腹地，在海上封锁巴基斯坦的港口，切断它与外部的联系。印军把巴基斯坦中段的拉合尔地区列为印军战略出击方向之一，因为这里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尽管巴方在该段防守严密，构筑了密集的运河网和反坦克障碍网，但并非不可逾越。印军强调要计划一次“强有力的反攻”，利用巴基斯坦缺乏战略纵深的弱点，一举突入巴的腹地，并坚持反攻到巴方的旁遮普的重要地区，设法“拦腰切断”巴军北部旁遮普的心脏地带同南部沿海卡拉奇海港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沿海港口的对外联系。为保证反攻成功，印军必须投入重兵，方能突破配备有装甲部队的巴军防线。

在上述方案中，印军在全线各段有攻有防，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战略出击方向集中在中、南两段。1986～1987年冬季进行的“铜钉”三军联合演习就体现了这一战略方针。从1986年1 1月开始，印军在印巴边境全线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铜钉”大演习。演习检验了森德吉关于在未来印巴战争中如何吸收苏军机械化大兵团、大纵深、高速度进攻的作战理论。印军在演习中共出动2400辆坦克，在数百架作战飞机与直升机的配合下，以每日推进90公里的速度穿越沙漠，实施远程快速奔袭。演习还检验了改组后的陆军原步兵师的机械化作战，检验了陆军获得的通信新装备、C3I野战系统、近距离空中支援和大量装甲兵的机动性。印度媒体对此指出，“森德吉使人们确信，为了使印度的强制性外交思想形象化，进行‘铜钉’演习是必要的。换言之，‘铜钉’演习是向巴基斯坦发出信号，说明印度有能力和意志为了印度的民族利益而发动

一次攻势”。它对印军的战略和建军产生的影响是“如此广泛和深远，以致只有历史才能得出最后的答案”。

与此同时，为防止中国配合对印实施军事行动，印军不准备过多地抽调位于印中边境地区的作战部队。当然，印度更希望“最好的情况就是中国按兵不动，这样印度就能从中印边境抽出3个师”用于对巴作战。

在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成为核国家后，两国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急剧增大。印军认真分析了未来可能与巴发生核战争的情况，研究了对付巴基斯坦核武器袭击的形式和手段。为帮助部队提高核战争条件下的战场生存能力和防御进攻能力，2001年5月，印军出动陆空6万名官兵、100多架战机以及陆军的重型装甲武器，又在印巴边境的大漠深处举行了自“铜钉”演习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这场代号为“全胜行动”的军事演习，设想的背景就是与敌国发生了动用核武器的战争。通过演习，印军进行了在核条件下如何作战并夺取胜利的训练。印度资深军事分析专家、退役空军副元帅皮尔·卡克评论说，此次演习，向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印度军队处于“高度战备状态”，可以对入侵之敌进行大规模的严厉打击。

1999年，印度借格尔吉尔冲突中赶走克什米尔“渗透者”、印度民航飞机被劫持事件所获得的国内国际有益战略态势，对巴基斯坦采取了日益强硬的态度。2000年1～3月之间，在克什米尔爆发的印巴武装冲突中，印度又占了上风，这会更加坚定印度的“西攻”战略。印度企图通过慑服巴基斯坦，进而控制其他弱小邻国，为把印度势力延伸至中东、中亚地区和地中海地区奠定基础。

## “北防”——对中国采取威慑防御战略

所谓“北防”，就是对中国采取威慑防御战略，以核威慑为后盾，在印中边境建立大纵深、立体化的防御体系，保持相对军事优势，以达到遏阻中国的目的；同时防止中国突入印度洋以及从北边陆上、南边海上及印度邻国三面对印用兵。

印度认为，在巴基斯坦被基本征服后，对印度的威胁将主要来自中国。印度把中国视作战略上潜在的作战对手，在与中国的领土争议中持顽固、僵硬的立场。但由于西有战略宿敌巴基斯坦，总体国力又无法同中国相抗衡，加上有20世纪60年代中印边界战争的教训，印度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在确保“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伺机进行新的扩张，在总体上对中国采取防御战略，期望在解决西、东和南三个方向战略问题后，再同中国作最后的较量。在此方针指导下，印度在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在中印边境建立了大纵深立体化的防御体系，屯兵达20余万人，始终保持着局部地区的兵力优势，以确保对中国的有效威慑。

边界问题是中印之间的主要争议问题之一。两国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从未划过边界线，但实际上两国间存在一条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习惯线。印度却从地缘政治观点出发，拒不承认这条习惯线，而顽固地坚持以英国殖民者当年单方划定而没有法律依据的某些所谓界线为标准处理边界问题，致使中印边界全线存在争议。中印边界全长1700公里，全部属于未定界，争议总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印度在处理中印领土争端问题上一贯坚持顽固和强硬立场，企图以武力为后盾保住它的既得利益不放，同时在边境地区虎视眈眈，窥伺时机以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并为政治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一种对己有利的谈判环境。

目前，印军在中印（锡）边境地区部署了总兵力的20%、约20万人的部队。印度长期重视在印度北部地区的战场建设和兵力部署，并逐步把战略重点向山地作战转移。部署在东部平原地区的部队将执行在平原和山地作战的双重任务。近年来，印度加快了北部地区，特别是印中边境西段地区的交通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了对西藏地区侦察和情报搜集手段及覆盖中国内地的卫星综合侦察系统的建设，并加紧对中印边境印军武器装备进行更新换代，对中印边境山区的守备部队进行调整和重组。此外，为提高战略威慑能力，印度还加速发展包括核武器和导弹在内的对华战略打击力量。

在兵力部署上，印军将正规军同准军事部队、特种部队相结合，一线部队同战略预备队相搭配，建立梯次纵深防御体系。印度防务专家从中印边境的特殊地理环境出发认为，“ 山地作战不同于平原作战，它需要有一支边境守备部队，一支用于在战略地域遂行作战的突击部队和一支用于在敌后作战的特种部队 ”。印军对各种作战力量的任务做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准军事部队，其中主要是阿萨姆步枪部队、中央后备警察和边境保安部队等，长期担任印中边境前沿地区的边防任务，包括哨所驻守、边境巡逻和情报搜集等；正规陆军担任主要防御地段（边境前沿20公里至本防区底线）的攻防作战任务；印度中央情报局和印藏边境部队担任敌后派遣与特种作战任务，即平时搜集情报，战时潜入或空降至敌后战役纵深偷袭敌指挥部、通讯中心、炮兵阵地和后勤设施，以及进行策反等。准军事部队在作战指挥上由当地陆军统一指挥。陆军在本战区以内的纵深地区还部署有相当于一线部队1/3的一线预备队和数量相当的二线预备队，遇有紧急情况时，陆军一线部队前推至主要方向之前沿，与准军事部队协同作战，一、二线预备队呈梯次开进，到战区主要防御阵地接替一线陆军的防务。这种前轻后重、梯

次配置的部署，其特点是进可攻退可守，平时分散，战时集中，便于印军战时遂行快速机动作战。

印军还着眼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作战，在印中边境实行整体优化防御。印度防务专家认为，中国对印度安全的威胁将长期存在，印度必须持续不断地加强对印中边境的战场整体防御建设，为今后再次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做好战场准备。几十年来，印度在印、中边境印占区精心构筑了一系列战地工程、通信网络、地空电子侦察、陆空交通和后勤设施。按照战场综合建设计划，印军在边境地区建立了纵深梯次配置的现代化永备防御工事，包括由钢筋水泥和耐寒特别材料筑成的双层碉堡、地下指挥所，各种明暗子母地堡群和与其相连的外围掩体、堑壕、交通壕、坑道，遍布阵地前沿的地雷区、铁丝网、陷阱和鹿砦等障碍物，以及与阵地相结合的各种多层明暗交叉火力网。在通信手段上，建立起了由各种通讯枢纽站、通讯中心、无线电中继站、卫星通讯线路、有线通讯和陆军无线电工程网络系统组成的现代化通讯网。印军由多种技术手段组成的陆空侦察网则包括卫星侦察、空中遥感与红外线照相侦察、无线电技术侦察、各种电子传感器、战场监视雷达等。印军在印中边境前沿广泛建立大功率的侦收点，从事无线电窃听、密码破译、电报分析等活动。印军为了改善印中边境地区恶劣的交通状况，自1962年以来，印度“边境公路组织”指挥数万名筑路工程兵，在边境高山地区建设了四通八达的陆空交通网。公路网由柏油或水泥面的干线公路、碎石面土路、简易公路和前沿哨所之间的横向道路组成，向北可通往各前沿哨所，向南连接东西横向干线公路和东北边疆铁路。空中交通网由大小机场、直升机坪和空投场组成，可供包括伊尔—76巨型运输机、安—32中型短距起降运输机和米—26重型直升机在内的各型运输机使用。公路网与空中交通网相结合，形成一个覆盖整个前沿战区的立体交通网，可以保障对边

远前沿的后勤供应和部队向前沿的快速机动。在后勤建设上，印军在战略要地设立了由兵站、医院、仓库、油库、弹药库、营房等组成的后勤补给网，进行物资储备，以备战时供战略预备队开进时使用。

根据进攻性战略防御思想，印军对中国的战略方针可以归纳为“东防西进，重点前推”。即在印中边界东段和中段巩固非法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维护既得利益；在西段争夺阿克赛钦等战略要地；全线确立以前沿防御为重点的军事态势。

“东防”，就是以优势的防御力量确保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被其非法占领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东段边界西起中国、印度、不丹三国的交界处，东至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的库阳山口，传统习惯线全长650公里，实际控制线全长1100公里，争议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目前为印侵占。印度防务专家指出：“麦线以南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是一大块不可多得的“宝地”，决不能再退还中国；但这一地区“北高南低，是中国进攻印度恒河平原理想的兵力集结出发地”。这里还有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西里古里走廊”，“对印度的防务至关重要”。印军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实施重兵重点防御，并且不断改善边境地区的公路和交通，以便在后勤保障上保持一个切实可行的前进姿态。印军认为，印中边界东段是“最容易遭受攻击的方向”，其中的达旺—错那方向和锡金—亚东方向，是整个中印边境地区仅有的双方能展开1个师以上兵力的地区。对印军来说，受地理和交通条件影响，达旺—错那方向不适于进攻，应采取守势；锡金—亚东方向则适于发动进攻。未来如果中国军队向达旺地区进攻，印军可能向亚东方向进攻，以减轻达旺方向的压力。因此，印军长期在达旺、锡金各驻防一个军，一攻一守，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东西呼应、攻防兼备的防御整体。一旦开战，印军准备以较小的代价或无代价地占领对方未占领或防守薄

弱的地域，作为对敌方“入侵”的反应；以空中或地面，或空地联合的力量将敌人从可能占领的地区逐出；占领能够威胁敌方交通线或发动“入侵”的基地的地域。

印中边界中段也是印度的既得利益地区。中段边界北起位于西藏阿里、印度喜马偕尔邦、印占拉达克地区三地接壤处的扎达县的6795高地，南抵中国、尼泊尔、印度三国交界处的里普列克（强拉）山口，传统习惯线长450公里，争议区四块，总面积2480平方公里，均为印侵占。印度认为，中段不像西段那样复杂，争议领土相对较少，并且没有两线作战的顾虑，所以部署的正规兵力相对较少，准军事部队相应较多。

“西进”，就是在西段边境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就打进西藏，切断阿克赛钦地区和整个西藏与中国内地联系的战略公路，扰乱其后方”，以策应其“东防”的战略任务。西段边界北起中印巴三国交界处的喀喇昆仑山口。南至6795高地，传统习惯线长600公里，争议区三块，总面积约3.35万平方公里，除巴里加斯地区450平方公里为印侵占外，均为中国控制。西段边境多是高寒山地，交通和生存条件差，本不适合部署更多兵力，但由于这里与巴基斯坦邻界，有两线作战的危险，同时这里也是美、俄传统势力范围的交汇点，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印军一直非常重视西段地区的部署。1984年，印军发动攻势抢占了位于印巴中三国交界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星峡冰川的大部，基本控制了该地区，并投巨资构筑工事，使其扩张的触角从冰川地区伸出，同其在班公湖地区的攻势作战部署相联系，将以攻助防，东西配合，在破坏巴基斯坦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协同行动的同时，构成对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南北夹击之势。

阿克赛钦位于中印边境西段，新疆、西藏交界地区，属高寒山区、不毛之地，经济意义并不大。印军要夺占阿克赛钦，不仅仅是

因为把它视为自己的领土，更看重的是它特殊的地理战略地位。阿克赛钦一旦被印度夺占，这一带的争议地区就会全部落入印度手中，中国将彻底丧失边界谈判的主动权；中国的新藏公路将被拦腰切断，阿里地区孤立无援，将不攻自破，完全丧失中段边境对敌斗争的条件和依托；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边界将名存实亡，中巴两国的战略协同将遭到破坏，印军还会对巴基斯坦形成地理上居高临下的优势。

基于此，印军在完成东段防御体系后，又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西段地区的军事部署。特别是从1999年开始，印军重新确定了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将该战略的重心调整到“西进”上，企图以“西”制“东”。为此，印军再度加强了西段的兵力部署，在印占克什米尔的列城组建了第14军，将第15军所属步8师划归该军，并将部分师、旅级部队向边境前推，使在该地区对中国一线作战力量增加了1个军部和1个整师，二线就近支援力量增加了1个师；在列城组建了侦察与观察中队和通用直升机中队，部署了战斗机分遣队；积极进行战场建设，加强边境控制，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战时交通、通信、后勤补给系统和布建合理的纵深梯次作战阵地体系。通过这次较大调整，印军在西、中段地区的总兵力由过去不足4万人猛增到6万余人，加上它的战役、战略预备队实力的增强，快速投送能力的提高，使得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印度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优势更加突出，不用调整补充，印军就可以对中国发动一场小规模边境战争。

与此同时，印军在全线确立以前沿防御为重点的进攻性军事态势，并以海洋威慑牵制中国。在边境重点地区，印军以主力部队尽可能前推，并准备越过边境打一场短期高强度的进攻战，占领中国防守薄弱或未占领的地域，以期加强印方在边境谈判中的地位，迫使中方作出让步。在经过20多年的长期准备，印军在印中边境

的军事实力大增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印军于60年代初期推行过的“前进政策”又有所抬头。与过去孤军深入、后方兵力空虚、后勤补给跟不上的情况相比，印军此时已具有巩固的纵深防御、完整的后勤设施和雄厚的后备兵力。因此这种前推政策也被称为“新前进政策”。

在陆上大力加强对中国作战准备的同时，印度还大力提高自己的海军作战能力、整体威慑能力及对印度洋的控制能力，试图保留和扩大印度在东盟地区和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重要航道——马六甲海峡的影响和存在，准备在陆上与中国发生武装对峙时，通过海洋威慑对中国实施牵制，慑止中国进入印度洋。

## “南进”——对印度洋地区采取扩张控制战略

所谓“南进”，就是积极向印度洋扩张，有效地制服邻近小国海军，有限地遏阻大国海军，最大限度地控制印度洋水域。

控制印度洋是印度坚定不移、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印度在夺取和巩固次大陆战略支配地位之后，便开始加紧准备对印度洋控制权的争夺。20世纪70～80年代，印度竭力填补英国撤军后在印度洋出现的“力量真空”，谋求在印度洋北沿的海上优势。90年代后，印度更加重视海洋在印度国防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加紧实施“印度洋控制战略”，力图全面“执牛耳于印度洋”。

印度防务专家认为，人类大陆资源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日益枯竭，海上丰富的资源将成为人类争夺的新领域。未经开发的印度洋，21世纪必将成为众多新崛起的地区强国角逐之地，印度必须为此及早做好准备，“确保那些理应属于印度的部分不被别国抢走”。不仅要反对超级大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存在，而且还要警惕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可能进入印度洋的区外国家海军的发展与动向。

为此，印度在南部地区积极发展海军力量，针对印度洋地区的中小国家实行海洋控制，确保印度本土、沿海岛屿专属经济区以及近海的安全，并且有针对性地取得对远海的控制，向远洋实施“软控制”，伺机向印度洋以外海域发展。针对区外大国海军则实行海洋威慑，最终达到挤走大国海军、独霸印度洋的目的。

印度海军甚至根据防务专家们对印度洋未来的四种挑战形式，即“正常条件下的挑战”、“低强度作战”、“高强度作战”和“全面战争”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一是“正常条件下的挑战”。这是指和平时期发生的紧张局势、危机甚至对抗。为了对付这种情况，海军需保持一支“具有最低战略威慑作用的投送能力”。为此，印度海军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战备”，并拥有海洋监视卫星、海上侦察和海上打击能力，以便能预报潜在敌国对印度采取的突然行动。

二是“低强度作战”。通常它的作战目的、范围和地区有限，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经常充作所谓“炮舰外交”和“强权政治”的手段。其样式视其能力和条件分为显示权力和决心、撤运侨民、反非法活动、海上援救等。为对付这种挑战，印度需要建立一支实力雄厚的现代化近海防御力量。

三是“高强度作战”。它属于有限战争的一部分，其军事目的大于政治目的。这种挑战的形式有两种：一是敌国对船运的遮断。由于进攻手段比保护手段更具有经济效益，而且进攻既可在水上又可在水下，这种拒止通行的方式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为对付这种挑战，海军需具备远海空中优势和反潜能力。二是敌国传统的炮舰形式，即以舰载飞机、舰炮和舰载导弹轰击本国海岸港口与设施。为对付这种挑战，印度海军需具有遂行远洋反潜作战能力，包括拥有足够数量的航母、潜艇与核潜艇（能发射中远程导弹），必要数量的飞机和足够数量的各种水面导弹舰只，以支持上述反潜行动。

四是“全面战争”。它涉及超级大国，而且可能迅速升级为核交火。

印度的防务专家认为，印度海军应立足于确保对付第一、第二种，随时准备对付第三种，防止发生第四种。

印度海军正在建立以航母为核心、以潜艇兵力为主体的海上机动作战力量，计划为其东部、西部舰队和远东海军司令部各配备一个航母战斗群。在兵力部署上，印度海军将在原有东、西、南三个海军司令部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兵力，加强重点方向的部署。

印度认为，在海上力量尚不足以控制整个印度洋时，应首先控制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以保障印度东西侧的安全。为了加强对阿拉伯海的控制，印度海军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在濒阿拉伯海的卡尔瓦修建了一座大型现代化的海军基地，近年来，又继续加以完善，同时进行设施配套。印度还想把影响力扩展至位于亚丁湾口的索科特拉岛，以达到控制亚丁湾、曼德海峡的战略目的。对于东部海域及马六甲方向，印度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布莱尔港设立了第四海军司令部，并计划在2001年9月底建立战略防御司令部。

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位居印度洋的东部边缘，紧邻马来半岛和马六甲海峡，在战略上与印度次大陆主体形成环抱孟加拉湾之势。面积最大的布莱尔港地处马六甲海峡西部出口，距印度本土的加尔各答1255公里，而东南距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仅550公里，东北距缅甸仅500公里。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印度在地理上既地处南亚次大陆中心，又贴近东南亚，并为印度本土提供了1000多公里的防御纵深。作为把守印度洋东部水域的主要门户，安达曼—尼科巴群岛西可控制孟加拉湾，东可卡住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咽喉——马六甲海峡，既是保卫印度半岛安全的前哨阵地，又是印度向海上扩展、对东印度洋周边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施加影响

的前进基地。因此，该群岛是印度控制东印度洋最主要的战略支撑点，在印度国防战略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印度多年以来不间断地在群岛上修建军事设施和建设军事基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印度军事战略的重点由陆地向海上转移以后，印度政府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不断加大对群岛军事设施以及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1968年，印度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首府布莱尔港建立气象观测站，1973年建立了海军前沿基地，作为对进出孟加拉湾一切船只的侦察站和警戒中心。在这以后，印度逐步建立起以布莱尔港为中心的群岛防御体系。布莱尔港位于南安达曼岛东海岸的罗斯岛地区，港口有南北两个航道，舰船主要由此出入。70年代以来，该港口基本设施逐步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完善。1987年从日本引进了一座3万吨级的浮动船坞，并建成了深水码头，可驻泊8000吨级舰船，港区附近建有一个中型机场。现在，布莱尔港已建成了相当规模、设备齐全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和后勤保障设施，成为具有一定前沿防御和远海作战保障能力的综合性军事基地。该港口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尚有较大开发余地。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基地与印度本土东海岸的维沙卡帕特南海军基地、西南部海岸的柯钦海军基地以及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相呼应，构成了控制东印度洋、特别是孟加拉湾的完整的基地体系。印度海军根据海上作战需要和印度海洋地理特点，分别在印度半岛东海岸的维沙卡帕特南、西南部的科钦、西海岸的孟买设立了东部、南部、西部司令部，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布莱尔港设立了海军要塞区。要塞区兵力由海军舰艇和飞机，陆、空军兵力以及海岸警备队等组成。随着印度海军的不断发展，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战略地位的日益提高，印度海军将群岛要塞区升格为与其他三个司令部同一级别的第四个海军司令部。在此基础上，印度将于2001年9月底在该群岛建成一个新的战略防御司令部，以统领印

度陆、海、空三军的部队和海岸警备队。此举也是印度军队在世纪初实施“南下印度洋”战略的一个大动作。

对于进出印度洋的海峡，印度更加意识到它们具有的特殊战略意义。与太平洋和大西洋不同，印度洋洋面辽阔，中间岛屿较少，进出印度洋的海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18世纪时英国就是通过控制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而独霸印度洋的。印度防务专家认为，一旦印度的海上实力达到足以控制印度洋，尤其能对印度洋的两个最主要的咽喉要地——曼德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实施有效控制的时候，印度洋就有可能回到印度的“怀抱”。为了达到全面控制印度洋的战略目的，印度提出要控制与其邻近的苏伊士运河、保克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五个海峡通道，保持对印度洋地区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控制邻近国家的海域，使它们不敢对印度进行军事冒险。

不仅如此，印度还要在印度洋上继续“东扩”、“西出”和“南下”：向东，将其影响和活动范围扩大到南中国海及部分太平洋；向西，穿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波及地中海；向南，将远洋兵力一直前伸到印度洋南端，甚至绕过好望角到达大西洋。对在印度洋地区驻有军事力量的区外大国，则力求通过核威慑等手段，同大国形成“力量均势”，限制大国海军在印度洋的行动自由，阻止其渗透。通过采取文武并举的方针策略，以军事控制与战略威慑相结合，最终实现控制印度洋的战略目标，把印度洋变为“印度之洋”，甚至“印度湖”。

一旦完全支配和控制印度洋，印度必将重建“印度中心”，将其势力扩展到全球。

## “ 中部机动 ” — — 应急快速部署战略

**所谓“ 中部机动 ”，就是在印度的战略纵深地带保持一定规模的战略机动力量，用于维护国内安全稳定、对各战略方向实施快速机动支援以及向南亚、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快速部署，以维护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

**灵活运用武装力量是印军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国内的民族纠纷、宗教冲突、恐怖活动以及跨国界的种族纷争等问题，严重威胁到国家稳定与安全，印度当局不得不动用一定数量的军队来维护社会治安。与此同时，印度统治者认为，印度的安全是与它的邻国联系在一起的，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最，并能有效地控制南亚次大陆的局势，是南亚次大陆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印度战略家分析，未来一定时期内，在与印度毗邻的国家中，巴基斯坦和中国分别会构成对印度安全的主要威胁和潜在威胁，“ 它们可能单独地或联合起来，甚至与其他国家勾结在一起威胁印度的安全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印度的领导人“ 开阔了自己的视野 ”，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印度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安全问题，认为只有从全球角度重新审查印度的安全观和国防政策才是现实的。**

**从地缘政治分析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的地理位置，该地区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仍不会失去它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超级大国加强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复杂局势。印度历来认为，南亚次大陆的中心、主宰是印度，在印度洋沿岸各国中只有印度具有控制印度洋的资格。从印度的基本立场看，它不仅负有南亚次大陆的安全与稳定的责任，而且还负有印度洋安全与稳定的责任。**

印度对邻近的东南亚地区也予以高度重视。印度在东部海洋中的群岛贴近东南亚地区，也使它把自己当成是东南亚国家。印度对东南亚之所以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固然有英印时期东南亚的缅甸曾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因为东南亚所占据的战略位置在印度的海洋战略中举足轻重。P·N·卡特帕利亚在《印度国家安全展望》中指出，“对于印度来说，这一地区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不仅因为它地处印度翼侧这一战略位置，而且它又是重要的海上通道，并拥有巨大的贸易潜力，从而关系到印度的经济利益。……对印度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确保该地区不受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控制”。因此，印度感到它有责任为促进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稳定作出积极努力，并通过东南亚与南亚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和相互依赖，来改善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实际上，印度对这一地区有着更深层的战略意图。东南亚地区是印度进入太平洋地区的捷径和门户，印度要实现海上东扩，将其势力进一步延伸到太平洋地区，就必然要经过东南亚地区。印度插手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的意向是比较明显的。

基于上述分析，印度为军事力量的运用和作用范围规定了十分宽泛的任务，胃口可谓不小。现在印度已经建成了南亚次大陆乃至印度洋地区首屈一指的武装力量，这支规模庞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为数不多的。然而，目前的印军就其整体素质，尤其是武器装备和综合作战能力而言，是难以胜任维护国内稳定、威慑周边邻国、控制印度洋和涉足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事务等任务的。

为了更好地遂行上述复杂任务，增强对现实和潜在“敌人”的威慑能力，保持在南亚地区的大国地位，并能在关系到印度利益的地区实现其政治意志，印度当局仿效美、英、以军快速反应部队的模式，于1986年开始组建本国快速反应部队。迄今，印度除建立

起一支以空中突击师为主体、可得到其他军种部队支援的快速部署部队外，还相继组建了各军种的特种作战部队和准军事部队快速行动部队。

1．快速部署部队

1986年，印度根据其防务专家马图·托马斯退役中将的建议，并依照美国快速反应部队的模式，以印度陆军南部军区驻赛肯德拉巴德的步兵第54师为主体，组建了第一个专门担负快速部署任务的空中突击师。全师约1.5万人，编有2个空中突击旅、1个伞兵旅、1个空降炮兵旅、1个空降轻型装甲团以及其他战斗支援和后勤保障兵力。目前，印度的快速部署部队还没有明确统一的领导和编制体制，因此，海、空军担负快速部署任务的部队仍然在海、空军的建制内。根据马图·托马斯中将的设想而组建的快速部署部队是“军际性质的”，“动用部队的决定权将属于国家最高行政当局”，战时通过参谋长委员会由内阁秘书处直接指挥，平时由各军种司令部实行技术控制和训练。托马斯中将强调，快速部署部队作为第一次战略打击的主要力量，它的基本任务是：“一旦我国的利益受到威胁（包括在我们的友好邻邦请求我们去协助他们稳定局势时），我们就动用这支部队，采取先敌行动以制止替在敌手突然入侵的意图”。

空中突击师在战时还可得到1个装甲旅、1个两栖作战旅及海军舰只和空军飞机的加强。该师可在24小时内机降1个加强营，48小时内机降1个加强旅。空中突击师不仅具有快速反应能力，而且可以在各种地形条件下遂行多种作战任务，包括两栖登陆作战和核、生、化条件下的作战。该师一经部署完毕，在不增加任何补给的情况下可持续作战72小时。今后，印军仍将继续执行和完善“优先发展快速部署部队，着力提高机动能力”的方针。印军计划在本世纪初再组建1至2个空中突击师。目前，印军的独立

伞兵旅已由1个增加至2个。同时新建1个独立两栖作战旅，为下一步快速反应部队建设作准备。

2．特种作战部队

印度特种作战部队，作为快速反应部队的一部分，对外主要担负印巴克什米尔和印度东北边境地区的作战以及出兵国外的军事行动，对内主要执行特殊任务，如作战救援、情报搜集、反恐怖、反暴乱等。印度陆、海、空三军的特种部队均担负有快速部署任务。

陆军特种作战部队的主体为山步57师和伞兵突击队，实力约1万余人。山步57师是印度特种作战部队的主力，下辖3个步兵旅、1个炮兵旅及其他兵种部队，配有民事处理分队、心理战分队、无线电侦察分队等，并编有1个武装直升机中队和2个直升机分队，实施空中打击及负责对作战部队的人员、武器装备和物资的输送等。该师熟悉印度各地区的社会、文化和民族背景，适合在各种气候、地形条件下担负复杂的作战任务。该师曾在80年代末出兵斯里兰卡参加过贾夫纳半岛战役。伞兵突击队现拥有4个伞兵突击营。

海军陆战特种部队编有3个突击分队，分别配属给3个海军司令部，驻扎在印度南部的孟买（西海司）、科钦（南海司）和维沙卡帕特南（东海司）。据称，在1998年其两栖登陆队员实力为1000～1500人。印军特别重视对该部队的建设，计划将其骨干力量（不包括两栖登陆部队）由目前的3个分队扩展至10个分队，每个分队编200人。该部的任务是在战前对滩头、沿海、沿河地区实施侦察和控制，摧毁敌港口和海上设施，袭扰敌海上运输和秘密渗入敌领土执行任务等。目前，海军陆战特种部队装备有11艘意大利生产的GOSMOSCE—2F/X100双人潜艇、2艘5600吨的“马加”级登陆舰、8艘小型“波诺切尼”级登陆舰、7艘500吨的通用登陆舰、6架海王直升机和一些印度豹轻型直升机等。

空军特种作战部队主要担负全天候侦察和战斗支援任务，配合其他特种作战部队作战，编有2个米—17直升机中队。另外，印空军还经常为特种作战部队提供运输机支援，并时常派出米格—25和“美洲虎”飞机实施侦察任务。

此外，印度还建立了分别由内政部和内阁控制的特种作战部队。印度内政部控制的特种作战部队总实力约有3000人，主要来自印度准军事部队，主要担负反恐怖等作战任务；印度内阁控制的特种作战部队约1200人，担负平暴、解救人质等任务，其下属的特种作战大队是印度特种作战部队的精华，曾参加支援印度驻斯里兰卡维持和平部队的秘密任务以及在印度东北地区的平暴行动。

今后，印度特种作战部队的作战任务将继续扩大，并在直接配合快速部署部队作战中成为印度人称的“第五支武装力量”。

3．快速行动部队

快速行动部队是印度政府为有效地维持社会治安，迅速平息各地出现的宗教、民族冲突和突发暴力事件，于1992年3月5日正式组建的一支突击部队。该部队由印度中央后备警察中的部分现役人员改编而成，其最高编制为营，每营约600人，目前已发展到1万余人，主要部署在首都新德里以及安德拉、比哈尔、北方、古吉拉特和拉贾斯坦等邦的10个动乱区。该部队最显著的特点是装备精良，并受过特殊训练，可在24小时内向指定地域机降1个加强营并实施有效战斗。

印军快速反应部队的作战能力包括快速部署能力和突击能力。由于担负的任务不同，印军对各快速反应部队作战能力的基本要求也不同，特别是空降兵在常规作战和反暴乱作战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例如，作为战略快速部署部队的第54空中突击师，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南亚地区任何地方发生的冲突做出快速干预。印军要求，空中突击师必须能在24小时内机降1个

加强营，48小时内机降1个加强旅的兵力。在24～96小时内，印军应出动1个加强营或加强旅远程机动至南亚次大陆的任何地区实施打击。一经部署完毕，在不增加任何补给的情况下，部队应持续作战72小时。印军对伞兵突击部队的作战能力要求是，第50独立伞兵旅应在接到命令18小时后，第1架飞机可运载部队起飞，其后，每隔20分钟起飞1架飞机直至运完所有部队。印军还提出，近3000人的加强空降旅必须通过伞降或机降方式迅速突击目标区域。并具备3～5天的持续作战能力，以保证与后续地面支援部队会合。

印军快速反应部队的快速部署和高度机动能力主要取决于印空军的空运能力。印度为此制定了加速发展战略空运力量的方针，并计划在2000年前后建成一支能够应付各种紧急情况的战略空运部队。目前印度空军可用于遂行战略空运任务的力量包括装备36架伊尔—76型运输机的3个中队，装备112架安—32型中程运输机的7个中队，以及米—8、米—17、米—26、印度豹和猎豹式直升机200余架，可用于支援快速反应部队。预计在21世纪初，印空军固定翼运输机将增至300架以上。其中，将从俄罗斯购买20架伊尔—76重型运输机，同时考虑购买先进的美制C—130大型运输机或俄制安—124运输机，加强其战略空运能力；将现有的安—32中型运输机的数量增加至150架以上，以遂行中距空运任务；继续仿制道尼尔—228轻型运输机。这样，印军的空运能力将至少提高1/4至1/3，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以一次将2～3个师空运到2000公里以外的作战地域。印军还拟成立战略空运指挥机构，以提高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和快速机动能力。

为了训练其快速机动和远程奔袭能力，快速反应部队参加印军每年秋春季举行的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演习中的陆空联合演习，这些演习一般都包括有紧急出动、空投、机降和伞降等适用于快速

反应部队的演练课目。印度空军准将贾斯吉特·辛格曾经指出，空降部队是印度实现其新军事战略的重要手段，它可以迅速机动到南亚地区的任何潜在热点。因此，空降作战演习要求空降部队与其他军、兵种协同配合，行动做到隐蔽突然，即符合“隐蔽进入，持久作战”的要求。

印度快速反应部队是一支既可担负特殊使命又可支援常规作战的有效的作战力量。今后几年，印军除进一步增强快速反应部队的实力外，将着力提高其作战能力。针对叛乱分子和恐怖主义者的特点，印军从军事院校的课程设置到部队的日常训练，都增加了山区、丛林等恶劣条件下的“特种作战”内容，要求具备在各种条件下遂行作战、跳伞、爆破、破坏、引导作战、搜集情报、机载介入和撤出及战俘审讯等任务的能力。目前，印度快速反应部队的装备较印军一般部队尚有优势，但同世界许多国家特种部队的装备相比则大为逊色。所以，印度认为必须要尽快装备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了提高快速反应部队的机动能力，印度至少需要35架能够进行空中加油的远程作战飞机、3架预警飞机、200架攻击直升机和两艘航母。由于印度研制上述这些系统缺乏独立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因此，未来10年，印度至少需要200亿美元进口装备才能满足快反部队的需求。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2001年5月14日报道，印度军队又制定了新的快速机动战略，该战略计划要求加强快速反应部队建设，使印军能够实时向印度洋沿岸的国家部署军队，并且要及时采购能使印军快速部署的军事装备。这份战略计划是由国防政策与计划局在三军的协助下完成的，计划要求能够快速部署部队、装甲人员输送车、坦克、轻型装甲和监视平台。印度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这一蓝图被视为印度的“战略设想”，是在1988年高达政府后期制定的计划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但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印度新的快速机动计划还包括为这一地区的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和越南提供保护伞。

印军快速机动力量的部署，是其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为平息国内和地区突发事件所必需，又为其他战略方向的部署和作战提供了迅速补充和支援的能力，同时也适应了未来有限战争条件下作战思想的要求。可以预见，在对付低强度冲突和反恐怖活动等方面，印度快速反应部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第五章　称雄南亚的武装力量

## ——印度实现军事战略目标的工具

印度历来信奉“实力至上”的原则，从独立后长期推行扩军路线，到目前还维持着百万大军规模的现代化武装力量，其三军兵力结构趋向合理化，武器装备加速现代化和国产化，其总体战斗力在实战和训练中得到提高，成为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推行其大国政策的有力工具。

印度的武装力量在独立后经过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从一支英印殖民军发展成一支拥有百万大军规模的现代化武装力量，成为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推行其大国政策的有力工具。

### 实力至上——印度武装力量发展概述

英国统治印度期间，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在印度先后建立了陆海空三军。因此，英国的撤离，不仅为印度留下了经济和政治“遗产”，同时也留下了一笔军事“遗产”。

印度军队的前身是英帝国主义在印度建立的殖民军。从17世纪末至印度独立的200年中，它一直充当着英国维护其在亚非

地区殖民利益的重要工具。随着英印军队数量的扩大，为便于对印度士兵的控制，建立了总督委任军官制度，设立一、二、三级总督委任军官，以充当英国军官和印度士兵之间的联系人。在英印军队编成上，采取按不同民族、宗教和地区建立联队体制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在印度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许愿“让印军实行印度化”。英国不仅把印度变成了英国军事供应品的基地，而且当做为英国提供兵员的主要场所。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74万印军到欧洲战场随英军参加作战，充当英国的炮灰。战争结束后，印军迅速缩编，到1923年英印军实力减缩为12万人。印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印军进入现代化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大量征集印度人入伍，使印军人数猛增，到1945年7月，印军已经达到230万余人，其中陆军220万人，海军2.7万人，空军7.5万人，比战前扩大近20倍。这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受命于英军，在东南亚、中东、北非和南欧等地参战，为大英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印军再次缩编，到1947年7月，三军总兵力减少到53万人，其中含陆军约50万人，海、空军各1.5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最终在1947年以印巴分治的形式获得了独立。印巴分治随后带来的是印巴“分军”。印度得到了这支军队的2/3，约35万人，其中陆军33万人，海军1.1万人、舰艇20余艘，空军约1.2万人、7个飞行中队、200余架飞机。今天的印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由于英国当时的海空军完全有能力保护印度的海上安全，英属印度只需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陆军就可以维持次大陆的防务，所以长期以来就形成了“大陆军，小海、空军”的极不平衡的状况，海、空军只是作为一个兵种隶属于陆军总司令的指挥之下。印度

军队在编成上的这种畸形状况，实质上是英帝国要求印军的发展必须适应其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利益的结果。

独立后的印度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英印军队的遗产，从作战条令到战术思想和编制体制全部照搬过来。

在英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为维持其统治而采用雇佣兵役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支志愿军”（邱吉尔语）。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世界上除美军之外最大的一支全志愿军。由于印度继续推行军队职业化，实行志愿兵役制，军官的待遇好、社会地位高，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而由此产生了官兵雇佣观念强、缺乏创造性、年龄偏大、社会影响面小等消极影响，用于军人的经费开支占去了军费的33%。

印度还继承了英印军队的联队制。印度的民族多、语言多、信仰宗教多和种姓制度森严等特点，对军队建设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1857～1859年，印度爆发了民族大起义，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是英国发给印度士兵的新式弹药涂有牛脂或猪油，这一做法严重冒犯了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禁忌。这次起义后，英国当局采取措施改编军队，由原来不分宗教、民族或地区混编的部队，改为按不同宗教、民族或地区分编，以便利用矛盾，分而治之。这一做法同样为独立后的印度所沿袭。尽管这样编组军队有便于控制、管理联队的长处，但又造成各联队之间的矛盾突出，平时训练协调性差，战时很难使他们协调一致地遂行作战任务。因此，近年来印军又开始实行多民族混编联队、全民族联队的编组方式。

在继承的基础上，印度根据自己的国情，对武装力量进行了“印度化”的整顿和改良。为了实现争当世界性大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印度长期奉行地区扩张性质的军事战略，把拥有一支能征惯战的庞大军队作为国家全面建设的重点之一，不遗余力地加强武装力量建设。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印军真正开始了正规

化和现代化建设，其实力不断膨胀的势头在世界大国中也是罕见的。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印度已经形成了以陆海空三军为骨干、与准军事部队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印度军队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据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三军总兵力已增加到126.5万人，其中陆军110万人，空军11万人，海军5.5万人，另有准军事部队70余万人，后备力量约255万人。印军武器装备也有了重大改善，建立健全了管理和训练制度，并经过多次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考验，具有一定的实战经验。

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世界和地区安全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印度的军事战略开始转向区域性威慑。同时印度认为，其武装力量从数量上已基本适应其军事战略的需要，但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和综合作战能力与军事战略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便转而采取质量建军的方针，即在保持总兵力相对稳定的同时，增加军费，调整结构，提高装备费比例，增加科研费用比重，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以后，印军开始拥有核威慑能力。印度自行研制的可作为核武器运载工具的“烈火”中程弹道导弹经过多次试射也已完成定型，使印军逐步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目前，印度正在通过大力研制核潜艇，尽快发展和完善其“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系统。

印度历来信奉“实力至上”的原则。国际军界人士认为，印军目前已成为一支兵力较庞大、兵种较齐全、装备较先进、训练较有素、实战能力较强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的军队。其陆军已具有较强的机动、持续作战和从事现代化战争的能力；空军已形成近距离空中支援、中距离战役空中攻击、远程纵深打击和要地防空四种

力量，具有相当的空战能力；海军已具备较强的水上、水下和空中立体作战及一定程度的远洋作战能力。

为保障军队建设的顺利进行，印度长期保持着高投入，其军费投入随着经济发展稳步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15%，平均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4%。1999年度，印度的军费已经高达124.9亿美元。在印巴格尔吉尔冲突后的2000年度，印度政府又把它的国防预算增加了28.2%，这样它的军费一下子就增加到了136亿美元。这在印度年度国防预算史上也是增幅最大的一次。印度财政部长亚什万特·辛哈当年在向议会递交政府的年度预算时说：“我们不应该在保卫我们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节省开支。”印度议会也对政府的国防预算情况给予高度重视。2000年6月，印度议会国防常务委员会曾举行听证会，对当年国防预算的增长幅度表示满意，希望政府今后继续保持国防预算的增长势头。据悉，在2001～2002年度的国防预算中，印度的军费达到历史性的170亿美元。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军费开支只是由国防部支配的费用，并不包括国防部行政费（属政府费用）、原子能部支配的用于发展核武器的费用、航天部支配的用于发展弹道导弹的费用、准军事部队的费用，以及采购大型装备的费用等。诸如采购苏—30飞机等大型装备的费用都有专项拨款。因此，印度的隐形军费相当可观。

与此同时，印军专家指出，为了争夺军费，印军各军种之间恶性竞争的现象很突出：在全局上三军各自为政，在局部上互相掣肘。印度的高层国防体制中没有可以进行国防建设协调的委员会，官僚机构对三军不负责任的领导，缺乏对威胁和作战进行一体化全面规划的联合参谋机构等，也是造成这种现状的直接原因。

印度认为，建设和保持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是保证国家安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最重要途径。为此，印度借鉴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改革军事思想，调整军队编制，改善武器装备，提高人员素

质，大力推进质量建军，着力增强陆军的机械化大兵团协同作战能力，提高空军的战役进攻能力，加强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确保军队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保持对周边国家的军事优势，并能在印度洋同大国海军较量。

印度军队建设的总体趋势是：以全面提高威慑能力为主要目标，贯彻精兵原则，实行陆、海、空三军协调发展的方针；采取武器来源多样化的措施，以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步伐，同时逐步提高国产化的比例；进一步调整作战指挥体制，建立健全全军统一的指挥控制系统；增强电子对抗能力，全面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和整体作战能力。随着印度军事实力的进一步提高，印度已不满足于仅做一个地区性大国，而是梦想成为21世纪世界秩序的“实力中心”之

## 建设现代化合成武装力量——印度的建军方针

目前，印度的建军方针是：以现有的“足够”实力为基础，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为中心，相对稳定数量，重点提高质量，建立一支能够同其战略目标相适应、保持地区军事优势、具有攻防兼备能力并可满足国内安全作战需要的现代化合成武装力量。

1．协调军兵种建设，加大海、空军和技术兵种的发展力度

目前，印军仍保持着130余万人的总兵力，相当于南亚地区其他各国兵力总和的2倍以上，目前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已超过俄罗斯，跃居第三位。印度自称其陆、空、海军兵力分别排在世界第三、第四和第七位。印度军事力量的崛起与其空军、海军及导弹与核力量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

印度独立后，一改英印殖民军陆军一统天下的格局，确立了陆、空、海三军独立平行的体制。这种体制提高了印度弱小军种空

军和海军的地位，便于政府直接向空、海军拨款，给予其特殊优厚的发展条件。在这种体制下，印度空、海军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陆军。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使三军发展逐步达到均衡和现代化，印度政府根据南下印度洋的海洋战略之需要，确定了“优先发展海军，持续提高空军，全面改编陆军”的建军任务，通过多种手段调整军队编制，主要包括：保持陆军兵力，适当增强海、空军力量；改编普通兵种，增强技术兵种；加强特种部队和快速反应力量建设，以求全面提高综合作战能力。目前，印度空、海军不论是在军费总开支中所占份额、三军兵力结构中所占比重，还是在联合作战中所起的作用上，都比印度刚刚独立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势头还在继续发展。

一是优先发展海军。印度海军将大力扩充各种大型作战舰只，建立一支力量均衡、具有威慑力的远洋海军。印度防务专家认为，英阿马岛战争的经验表明，当代的海战需要由军舰、潜艇、航母舰载机和高技术电子装备组成的综合力量，在三维空间进行高度复杂的诸兵种协同作战。因此，在水上、水下和空中的三种作战力量缺一不可。为实现控制印度洋、走向太平洋的战略目的，印度近年来加大了海军的建设力度，以求尽快使之变成一支能攻能守的远洋海军。海军兵力计划由5.3万人增加到10万人，编为3个舰队，重点是加速南部舰队的组建工作，继续调整、扩充、完善海军航空兵、海岸警卫队以及作战舰船，特别是航母和潜艇的编制和结构，力图建成以航空母舰为核心，以导弹巡洋舰、驱逐舰、常规和核潜艇为主体的东、西、南3支舰队。现在，印度海军已成长为舰种基本齐全、能遂行远海作战任务、可快速向印度洋投送兵力的海上力量，规模居世界第7位。

二是持续提高空军。印度空军将全面更新技术装备，建立一

支机种齐全先进，结构合理，具有战略打击、战略预警和战略空运能力的高效能空中力量。根据印度军事战略的要求，空军的建军目标是建立一支能有力配合陆海军作战，具有全方位空中支援、纵深打击、战略机动与综合防空能力的空中作战力量。空军改革的重点是将作战部队按同型兵器集中编组，使之具备以上四种作战能力。空军兵力计划由15万人增加到20万人，飞机增加到2000余架。印军还为若干飞行中队装备改装过的直升机，使之具有全天候执行特殊作战任务的能力。印度空军未来将重点发展远程作战飞机，变“战术空军”为“战略空军”，成为强大的“空中和空间力量”。现在，印度空军已发展成一支机种齐全、结构合理、骨干机种精良、战斗力较强的空中力量，规模居世界第4位。

三是全面改编陆军。印度陆军将更新武器装备，建立一支质量过硬、具有多种作战能力的现代化陆军。印军认为，陆军只有经过全面改编，才能适应印度在次大陆的军事战略需要，并同海空军同步协调发展。根据1980～2010年的远景规划，陆军将控制数量，提高质量，重点提高火力、机动能力、突击能力、立体作战能力和攻防能力。印军准备将部分步兵师、山地师及作战旅增编装甲部队，增配直升机，增加机械化装备和电子设备；改编陆军航空兵；加强陆军导弹部队，并将部分特种地地导弹部队逐步发展为战略核部队；以部分平原步兵师和适当数量的山地步兵师全部取代目前的普通步兵师。陆军航空兵改编已基本完成，现编有200余架直升机和部分固定翼飞机。现在，印度陆军的规模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三位。

在军费投入上，印度政府也进一步向海空军倾斜。在印度洋成为未来军事战略的重点后，印度不断提高海军军费比例，准备在下世纪初建成一支舰艇大型化、装备导弹化、指挥与火控系统电子化的现代化海军，以提高远洋作战能力。印度海军军费占军费的

比例1991财年约5%，1992财年突破10%，1993财年为13%，1994财年为16%，2000财年达20%。在加强海军建设的同时，印度也十分重视空军的发展，1992财年空军在军费预算中所占份额为14%，1993财年提高到15.5%，1994～1996财年的印度军费中，空军所占份额平均为20%。由于军费一直有增无减，印度军事实力增长较快，海空军建设步伐较大，军事技术发展的后劲也比较足。

2．加速发展武器装备，提高印军武器装备的总体水平

印军认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一支装备过时的武装部队不仅形同虚设，而且有百害而无一利。为此，印军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采取“引进、改造和自行研制相结合”的方针，努力加快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进程。其中，引进是借鉴手段，改造和仿制是权宜之计，自制方为最终目标。为尽快提高自行研制武器装备的水平，印度十分重视引进国外的先进武器装备和技术，以提高自己的研制起点，通过许可证生产、掌握消化技术、改进创新的过程，逐步走上自行设计、研制、生产的发展轨道。经过多年的努力，印度的国防科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在因核试验受到制裁、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受到限制以后，印度更加重视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高技术常规武器。一是加快主要武器装备的研制进度。近年来，印度自行研制了陆军的“阿琼”主战坦克、“皮纳卡”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和战场监视系统，空军的轻型战斗机、先进轻型直升机、无人驾驶靶机、无人驾驶侦察机、中型战斗机和空中预警与控制飞机，海军的核潜艇、驱逐舰、护卫舰、测量船和导弹艇，以及各种电子干扰设备、机载雷达、全球定位系统、隐形技术等一大批高技术武器装备。“烈火—Ⅱ”型中程弹道导弹已两次成功试射并开始生产。二是积极引进各类先进武器装备。其中包括从俄引进新式T—90型坦克、“通古斯卡”弹炮合一防空系统、苏—30MKI多用途战斗机、米格—29M战斗机、S—300V反导

弹系统、空中预警与控制飞机、空中加油机、R—77空对空导弹、先进教练机和电子战设备等。在引进武器装备时，印度把技术转让和生产许可作为进口武器装备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注重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大都不愿提供技术转让，而苏联则同意与印度签订包括转让生产许可证条款的军事合同。这也是苏联（俄罗斯）成为印度武器长期供应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印度军工企业已经能够仿制俄罗斯的T—72坦克、BMP—2型步兵战斗车、米格—29、英法合制的“美洲虎”战斗机、德国的1500型潜艇等先进武器系统。三是不断改进现役武器装备。主要改进项目包括与俄合作改进125架米格—21战斗机、2个中队的“美洲虎”及“幻影—2000”或米格—29战斗机、对100辆“常胜者”坦克及部分T—72坦克进行改装、对“海鹞”舰载机进行改进等。目前俄罗斯正着手对米格—29战斗机等进行现代化改装升级。改装后的战斗机的技战术性能将比原机提高至少一倍以上，并配备更强大的雷达和武器系统。其武器装备包括固定在机身的6枚远程制导导弹和固定在机翼的中程机动制导导弹。36架计划升级的改型飞机中，2000年已经有6架改装完毕后交付印度空军。最终印度将把其拥有的125架米格—29全部升级，延长其服役年限。

1994年，印度制定了“自主防卫十年规划”，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尽快扭转主要武器装备配件依赖外国的局面；第二步，开发新技术，使武器装备的关键部件现代化，提高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并延长其寿命；第三步，提高科研水平，生产高技术武器装备，包括导弹零件、预警系统、雷达和激光等。根据这一规划，印度武器装备的国产化程度将从1995年的30%提高到2005年的70%。目前，印度的军工综合体基本上能够完成坦克、步兵技术兵器、各种武器和弹药以及军事技术装备零部件的生产任务，而这些以前

都是靠俄罗斯和苏联提供的。

陆军在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方面的主要措施：

一是重点改装新型主战坦克和战斗车辆。为提高战斗能力，印度把重点放在了坦克的更新换代上。印军对70年代装备的1400辆T—72型主战坦克进行升级换代，陆续装备自行研制的“阿琼”（ARJUN）式主战坦克，并对“阿琼”坦克进行试验工作，设计这种坦克的改进型。2000年9月底，印度陆军宣布订购124辆国产“阿琼”主战坦克。“阿琼”是印度研制的第一种国产主战坦克，从1974年开始研制，并借印度教神话里的战神“阿琼”为之命名，但由于印度的技术力量相对薄弱，这位“战神”的降临十分艰难，印度陆军整整盼了26年。“阿琼”坦克的正式投产，对印度陆军来说意义重大。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曾鼓吹说，“阿琼”坦克的所有技术指标都达到了陆军的要求。印度陆军计划在2004年前生产120辆“阿琼”坦克。但与此同时，印度国防部却又于2000年与俄罗斯签订合同，向俄罗斯订购了310辆T—90型坦克。T—90坦克是俄罗斯最新型主战坦克，机动性能优异，采用125毫米滑膛炮，射速为6发／分，携弹量39发，可使用多种弹种，并有一种对付直升机的带近炸引信的炮弹，采用复合装甲，有先进的三防系统和激光报警装置……更重要的是，T—90主战坦克比“阿琼”轻10吨多，性能比“阿琼”有过之而无不及，价格却只有“阿琼”的60%。T—90坦克的大量订购，也反映出军方对“阿琼”缺乏信心。

二是配备新型反坦克导弹和车载地地导弹。比如“针式”、“短号”式反坦克导弹，“红土地”激光制导炮弹等。2000年7月，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宣布，印度已经从俄罗斯购买了1000发激光制导炮弹。

三是引进先进的防空系统。为了建立有效的综合防空系统（ADS），根据印俄1999年签署的十年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从俄

罗斯购买的6套S—300V防空系统，与印度研制的相控阵雷达和“天空”近程地对空导弹组合在一起，构成能反飞机、飞机发射的导弹和地对地弹道导弹的一体化防空武器系统。据说ADS将部署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毗邻的边境线上，其目标是对付巴基斯坦的M11导弹和中国的“蚕”式导弹。印度还引进了法制“罗兰特”型和法、德合制“米兰—2”型地对空导弹及其生产线。

四是研制和配备轻型多用途直升机和无人机，提高侦察、机动和火力打击能力。印度自行研制的ALx轻型多功能直升机，融联络、侦察、反坦克、对地攻击、运送物资和救援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将逐步取代原国产“猎豹”、“印度豹”和从俄罗斯进口的米—35直升机。印度自行研制生产的“尼尚特”型无人驾驶侦察机也在2000年4月试飞成功。

海军在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方面的主要措施：

一是重点引进或建造新型航母和护卫舰，更新水面作战舰艇。印度海军将继续建造自行研制的“德里”级导弹驱逐舰和隐身护卫舰，以及配套的舰载武器和航空兵武器装备。在大力维修“维拉特”号航母的同时，它又接受了俄罗斯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母，并准备花巨资进行现代化改装，使其海军特别是远洋的作战能力大幅提高。印度轻型航母的自行建造也已开工。

二是引进或建造新型常规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着手生产导弹核潜艇，建成一支强有力的水下作战力量。印度2000年7月从俄罗斯接收的第10艘“基洛”级潜艇，首次配备了俄最新开发的“俱乐部”反舰巡航导弹，射程达220公里。

三是研制和装备各种新型声纳，提高反潜作战能力。

此外，印度还为海军航空兵和海岸警卫队更新装备。

通过这些措施，印度海军要逐步实现舰艇大型化、武器导弹化、指挥与火控系统电子化、作战能力“远洋化”和“立体化”。

空军在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方面的主要措施：

一是改进现役飞机，重点发展第三、四代作战飞机。印度打算对全部现役飞机进行现代化改进，在这一计划范围内已同俄罗斯签署了重新装备米格—21歼击机的协定。预计在装备下一代现代化装备、新的电子设备和领航设备后，这些飞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落伍。印度空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逐步以新型多用途作战飞机淘汰过时装备。印度政府已决定用新的机载航空系统装备苏—30MKI歼击机，以前购买的苏—30K和苏—30MK也要装备上这些系统。印度空军还要大力研制和引进第三、四代作战飞机，使第三、四代战机的总数达到作战飞机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本世纪初，印军计划装备600架第三代作战飞机、400架第四代作战飞机。

二是逐步增加自行研制机种，提高作战飞机的国产化程度。例如，它自行研制的新型多用途的LCA轻型战斗机，国产化程度达到了70%，大量采用复合材料和先进技术，结构小巧紧凑，就像“幻影—2000”的浓缩版，号称“小幻影”，其战斗性能相当于美国的F—16，第一架LCA样机已于2001年1月4日首次升空试飞获得成功。

三是改装空中加油机和电子侦察机，提高空中作战能力。印度目前装备有乌克兰制造的伊尔—76空中加油机6架，以及少量的电子战飞机和电子侦察飞机。

四是引进大型运输机，如C—130、安—124等，形成一次将2～3个师空运2000公里的能力，成为仅次于美、俄的世界第三大空运力量。

印度空军还在2000年4月从俄罗斯租借了2架A—50空中预警机，并计划向以色列购买预警机，以全面提高空中作战能力。

与此同时，印度特别把加快发展核力量作为谋求地区霸权和争取成为世界军事大国的有效战略手段，于1998年5月进行了5次地下核试验，使其正式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目前，印度已具备年产多枚核弹头的能力。在高速发展核技术的同时，印度还大力研究和开发弹道导弹技术，发展空军远程核打击能力，研制核动力潜艇和潜射导弹。

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早已为印度所认识。印度是亚洲地区的导弹大国，装备的导弹种类和数量较多，先期的导弹武器主要来源于英、法，后来主要来源于前苏联。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的导弹武器开始向国产化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是印度全面发展核导弹武器的时期。印度目前已装备部署包括地地导弹、地空、空空、舰载、空对地、反坦克6大类约60多种导弹。

1983年初，在当时的总理英·甘地的亲自主持下，印度政府启动了“综合导弹发展计划”。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印度已研制出“烈火”中程弹道导弹系列、“大地”近程弹道导弹系列、“天空”中程地空导弹、“三叉戟”短程地空导弹和“毒蛇”反坦克导弹，成果颇丰。

有关“大地”（又译“普里特维”、“地球”）和“烈火”（又译“阿格尼”、“火”、“火神”、“火焰”）弹道导弹的发展情况在以后章节中还将专门介绍。其中最值得骄傲的是射程达2200公里的“烈火—II”型导弹的成功发射，被视为印度国防工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印度导弹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印度一举跨入导弹大国的行列。目前，印度还在积极研制射程为3700公里的“烈火—III”型中程弹道导弹，以及射程达5000公里以上的“太阳神”（Surya，又译“苏里雅”）洲际导弹。

“天空”地对空导弹（SKY，又译“阿卡什”、“蓝天”、“闪电”、“闪光”）是印度研制的多弹头中、低空防空导弹，射程为25公里，可携

带55公斤炸药，能同时击中数个目标。该导弹1974年2月3日首次发射成功，印方一直在不断地对其进行改造升级工作，从2001年2月27日起，印度在东部奥里萨邦试验场又进行了一系列成功试射，印度国防部官员称很快将开始生产。“天空”导弹系统由3联装导弹发射架、3坐标相控阵雷达、射控中心、电源车及导弹装填车组成，具有作战适应性强、抗饱和攻击性能好、火力强、机动性好、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其3坐标相控阵雷达可对多个目标进行搜索和跟踪，控制数枚导弹同时拦击一个或数个目标，且配有敌我识别系统。预制破片战斗部在命中目标时可撒出大量破片予以摧毁。其发射架装在改装的BMP—2战车底盘上，每部发射架至少装2枚导弹，可自动装填，有利于捕捉目标，迅速转移火力，适于在各种地形上部署且进入战斗状态快。“天空”将主要用于替换俄制的“萨姆”地对空导弹。“萨姆”导弹于1974年开始进入印度空军服役，现有35个“萨姆”导弹中队。“天空”对“萨姆”的替换工作预计可在10年左右完成。

“三叉戟”地（舰）对空导弹（TRISHUL，又译“特里舒尔”）是印度研制的近程低空防空导弹，射程为50公里，可供三军使用。1986年2月开始试验发射，目前已装备印陆、空军防空部队，与“萨姆—3”一起配置在印巴边境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查布亚、巴拉克普尔等地。该系统由6联装发射架、搜索雷达与跟踪雷达、车载控制系统与导弹组成。火控雷达采用多波段、多频率搜索和跟踪目标，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反应时间短，在能见度差的条件下仍能使用。陆军将用“三叉戟”取代俄制“萨姆—8”导弹，主要用于攻击低空飞行的飞机。空军将用“特里舒尔”取代现有的“萨姆—3”导弹，亦用于攻击低空飞行的飞机。专为海军设计的“三叉戟”导弹的传感器系统中，装配有一个十分准确的无线电测高计，可使导弹在贴近海面7米的高度飞行，能在海浪中穿行并拦截沿海面飞

行的敌方导弹，如法国的“飞鱼”和美国的“鱼叉”等反舰导弹，因此可作为反导导弹使用。用于“三叉戟”导弹制导的改进型“捕蝇器”（FLY—CATCHER）雷达现由印度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生产。据报道，该雷达改进后不仅具备了连续制导能力，而且不受敌方强大电子干扰的影响。可在25公里的距离内，搜寻地面上10米至1.5公里空间范围内的飞行物。

“毒蛇”反坦克导弹（COBRA，又译“纳格”、“眼镜蛇”、“蛇”）是印度自行研制的第三代反坦克导弹，最大射程4公里，1996年第一次试射成功，被认为是印度导弹开发史上的第三个重大里程碑。“毒蛇”导弹采用无线电指令加红外成像寻的头制导方式，利用多个电荷耦合器件可以精确地探测和跟踪各种不同类型的装甲目标，具有“发射后不用管”的能力。动力装置采用先进的固体冲压式火箭发动机，其推力达到普通固体发动机的两倍。有70%的弹体材料用碳纤维和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制成，具有强度高、重量轻、体积小的优点，便于第一线士兵携带和操作使用。包装筒兼作发射筒，武器全长0.8米，弹重9千克，最大射程6公里。采用两级串联式聚能装药战斗部，可击穿挂有爆炸式反作用装甲的主战坦克。可由士兵扛在肩上发射，也可用四联装的方式装在BMP—2步兵战车或其他装甲车上发射，但最适于装备在攻击型直升飞机上。因为在战场上大多硝烟弥漫，尘埃飞扬，能见度很难达到4公里，而直升飞机在空中则可利用“毒蛇”导弹准确击中坦克的炮塔。

“海洋”潜射导弹（SAGARIKA，又译“萨加里卡”）是印度在俄罗斯帮助下自行研制的第一种潜射导弹。1998年，印政府首次公布这一消息。该型导弹射程约322公里，计划首先装备在2005年前后服役的印国产核潜艇上。西方防务专家预测，该导弹是一种可携带核弹头、能打击巴基斯坦的新型弹道导弹。印海军专家称，“萨加里卡”并不是西方所说的弹道导弹，而是一种潜射巡航导弹。

俄罗斯提供了火箭发动机和技术帮助。

可以预计，印度导弹武器的发展总的趋势是：继续实现它的“综合导弹发展计划”，实现其导弹装备由引进外购方式逐步转向自行研制和发展阶段。导弹核武器是印度未来发展的重点，并将形成一定规模；机载导弹武器随着航空技术装备发展将有进一步提高；防空导弹系统将在目前的规模和水平上有所提高。

3．大力推广C3I系统，提高作战指挥效能

印军认为，作战指挥现代化已成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计算机和通信的结合日益紧密的新形势下，印军近年来一直密切注意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发展，将战场和战略领域通信状况的改进视为当务之急。

作为当代军事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战术C3I系统正在全军推广，同时计划逐步建立战略C3I系统，其总的发展方向：一是实现领率机关办公自动化。微机网络、软件中心、大型计算机中心、固定通信中心的建立，使总部和各战区之间的作战、训练和管理等工作实现了计算机化。二是实现野战部队无线电通信网络化。“陆军无线电工程网络”作为世界上三大成功的战术通信网之一，已在次大陆战场发挥“力量倍增器”的作用。“静止转换通信网络”、“普通纸激光电传网络”及对流层散射通信也在日益完善。通信卫星则得到偏远地区驻军和快速反应部队的有效利用。三是逐步实现野战指挥自动化。以微机、个人计算机和传感器为基础的战区C3I系统正在迅速发展。早在1986年的“铜钉”演习中，印军便试用了C3I系统。在军指挥所，指挥官通过操作盘和电视屏幕调用数字地形图，随时了解数英里以外最新作战态势，并通过传真系统将指令连同地图一起传送到前沿阵地。各级指挥所和连以上分队部有一套向上级指挥所通联的微机系统，能在屏幕上看到所需的情况，并据此及时定下决心和采取行动。四是实现通信标准

国际一体化。考虑到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全球环境，印军通信开始着手解决以国际公认的军事标准为基础的问题。将来，所有计划均将以国际上商业标准化通信网络为基础，以便易于引进国际技术，易于与国外通信网络联网。

印军不断在训练实践中改善现有信息网络系统。在“东线太空”联合演习中，就大量使用了电子侦察、电子对抗、雷达预警、卫星通信等信息技术手段，陆军还使用了“陆军无线电工程网络”以检验其野战部队传递及分发作战信息的能力。在演习中，各级部（分）队都可以通过终端设备、局域网与指挥部联结，指挥员也可通过网络观察到近实时的战场态势图，并通过网络及时下达作战命令，其指挥控制能力得到了提高。

4．坚持经常性军事演练，提高军队整体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

印军认为，训练有素的军人比武器更重要，“要想最充分地发挥先进武器系统的作用，就必须进行卓有成效的训练”。近年来，印军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军事战略的调整，不断增加训练内容，突出训练重点，改善训练方法，以提高部队遂行各种任务的整体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

在训练内容上，随着印军职能的调整，在有针对性地强化未来作战训练内容的同时，增加应付国内突发事件、保持局部地区和平以及抢险救灾等方面的内容，使部队具备遂行多种复杂任务的能力。印军十分重视将训练与可能担负的作战任务密切结合，训练针对性较强。为使部队人员及装备适应特殊环境下的作战，减少非战斗损耗，印军加强了在沙漠、丛林和高寒山地条件下的演练。印巴边境的大片沙漠，印中边境和印巴北部边境地区的山地丛林，都是印军组织训练和演习的重要地点。印军甚至还组织登山、赛车、跳伞、水上漂流等大规模探险活动，以提高军人的综合素质。

在训练重点上，仍以现代条件下的合同训练为重点，突出沙

漠、丛林、山地、高寒以及核条件下的作战训练，加强快速反应部队的特种训练。同时增加高科技知识与现代军事技术训练的比重，提高基础训练和专业训练的质量，培养新型指挥人才。印军规定所有军官都要接受计算机正规课程的训练；所有人员必须接受计算机普及课程的训练；作战学院和战术中心要增加计算机程序作业的专业训练，以使全体官兵具有“计算机意识”。

在训练方法上，注重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充分发挥模拟训练、联合演习，包括联军演习的作用。使用模拟器材进行的训练逼真、高效、费用低、效果好，能够很好地解决标准提高与经费不足之间的矛盾，印军近年来不断加大模拟训练的力度。空军于1994年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的“空战模拟器”，采用先进的数字和计算机技术，帮助飞行员掌握战斗机驾驶、特技和空中格斗技能，战斗机驾驶员在“空战模拟器”上培训3个月即可实际操纵战斗机。海军为东西两舰队各引进一套技术先进的海军模拟控制装置，能逼真模拟海战环境，模拟课目包括反潜、反空袭和各种攻势战斗队形，并能通过计算机存储、处理有关导弹直接命中、接触、反应时间等各种数据。目前，计算机模拟作战演练在印度军事院校中已逐渐普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还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派出顾问、观察员、参谋人员以及维和部队，利用这些机会以战代训。例如，1994年美军在索马里遇到困难后，印军向索马里派出了1个步兵旅。1994～1996年，印军向卢旺达派出了一支分遣队，包括1个步兵营、1个通信连、1个工程连和部分参谋军官。1995年2月《今日印度》载文，声称“在联合国维和部队里，印军在动乱和低强度冲突中能够应付自如”，认为印度拥有打城市战并对付游击战的“作战经验和相应理论”。外派部队既扩大了印军的影响，又在实践中锻炼了部队。

军事演习是印军训练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举行的“湿婆神力

量”、“进攻99”等演习，特别是在2001年5月举行的“全胜行动”演习，体现了现代战争的作战规模和作战样式。

2001年5月2日至14日，印度在西部邻近巴基斯坦的拉贾斯坦邦塔尔沙漠举行了代号为“全胜行动”的军事演习，演习目的旨在帮助部队提高核战争条件下的战场生存能力和防御进攻能力。在这场演习中，印军出动陆空6万名官兵、100多架战机，还有重型装甲武器，如俄制T—72重型坦克和其他先进武器。据印度军方发言人称，印军此次演练是继1987年“铜钉”演习以来，印度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演习体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演习时间最长。高强度的演习持续8天时间，分两阶段进行，加上演习的准备时间，前后加起来有1年多的时间。

参演兵力最多。其中陆军就有1个突击军、1个炮兵和特种兵部队混编的机械化作战兵团、1支重型坦克部队，总人数多达6万人。

投入装备最全。其中有刚刚装备空军和陆军的无人驾驶侦察机“拉克什亚”首次出台亮相，越过演习中模拟的敌军防线，进入敌军腹地，密切监视演习假想敌装甲机械化部队的快速集结和突击情况；刚刚研制成功尚属绝密的设备——“英迪拉II”雷达首次投入使用。

演习范围最广。印空军西方司令部5个最重要的基地——纳尔空军基地、苏勒德格尔空军基地、锡尔萨空军基地、阿格拉空军基地和德丁格尔空军基地全部进入实战状态，苏勒德格尔空军基地和卢迪亚纳还同步举行与主演习场地相呼应的次一级规模的秘密演习。

演习强度最大。战机演习前5天共起飞720架次，后3天起飞280架次，昼夜轮番出击。极其恶劣的大漠天气——座舱内50摄氏度的高温、能见度不到200米的沙暴，使喷气式飞机的性能大

打折扣，被迫低空飞行的飞机因此很容易成为防空武器的靶子。坦克舱内的气温更是高达60摄氏度，枪炮烫得让人简直不敢触摸，装甲车、坦克和直升机掀起了一阵阵灰尘和直往衣服里钻的滚烫的细砂。这些对于参演官兵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印度西部空军司令部指挥官克里希纳斯瓦米中将指出：“ 这是极端苛刻条件下的战争。我们的军队必须训练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作战。我们不仅仅检验人的耐力，也检验飞机在这种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

演习课目最齐。5月2日至6日，主要演练空军与陆军各部如何进行联合整编课目；5月6日至9日，演习渐进高潮，在迅速突击和反突击课目演练中，空军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部队进行拦截敌方空对地导弹、摧毁敌方空防系统的训练，装甲部队在一天内要机动数百公里的距离；5月7日，印军的新型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 拉克什亚 ”越过演习中模拟的敌军防线，进入敌军腹地担负侦察、搜集情报和为炮兵指引方位的作用；5月8日，空降部队深夜举行最大规模的空降课目演练，大约有600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士兵乘坐大型运输机潜入敌后，实施快速空降，夺取敌方阵地，这些特种部队士兵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在克什米尔的高山地区进行过高原训练；5月10日起，演习进入高潮，当天举行最大规模的对地攻击和地地导弹攻击课目的演练，空军参演的120架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全部出动，向地面的“ 敌军 ”发起攻击，陆军则配合空军向“ 敌人 ”猛烈发射地对地导弹；14日，空军和陆军将举行演习结束前的火力大展示；同时，印军医疗部队将在演习中演练如何使印军士兵在极高温的环境下仍能积极作战的能力。

演习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据亲临演习现场的军事专家们的观察及印军部分高级将军透露的情况，是演练如何应付核战争，印度空军在演习开始后，出动了750架次飞机对演习划定的敌占区

实施轰炸。飞行员接受了拦截敌机以及在发生核袭击的情况下如何反应的训练。假设的战役情景包括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袭击。根据演习方案，携有核武器的“敌方”战机向印度扑来，印军战斗机紧急起飞实施拦截，这主要是训练印空军战斗机拦截核战战机的战术；拦截结果是“敌方”大部分战机被击落，但仍有少数核战机成功突破印空军防线，击中了印军的一些目标，污染了食品和水源，此时，印军战机必须能够穿越辐射污染区，并确保飞行员安然无恙。而陆军则要想方设法粉碎“敌方”的阴谋，此时，陆军第1军及时出动来消除污染。本次演习的裁判、印度中部司令部司令乔希中将对外界表示，尽管未来战争无疑具有核背景，但迫于国际压力，使用核武器的机率很小。同时，他还煞有介事地强调，印度的核战略本质上是“防御性”的。

印度军方称这是最接近实战情况的一次演习，主要目的是要吸取以前战斗的教训，加强陆军和空军的协同配合能力，增强军队在现代战争情况下的打击能力，在控制损失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两年前，印度军队曾在克什米尔的格尔吉尔地区发动了清除“巴基斯坦渗透者”的攻势，当时就是陆军与空军部队协调不够，导致几百名士兵阵亡。此次军事演习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在今后的战斗中避免这种大规模的伤亡。法新社认为，这次空军与陆军协同演习，旨在向印度邻国发出信号：任何跨越边界的冒险行动都将招致印度的快速报复。印度军方希望通过此次演习，显示印度具有充分的核反击的能力。

## 地区称霸的资本——印度的三大军种

### 1.“世界第三”的陆军

印度陆军具有悠久的历史，它的前身——英国皇家印度陆军

先后参加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英国皇家印度陆军的前身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1600年在印度建立“东印度公司”后招募印度人组成的“东印度公司警卫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看守货栈，起看家护院的作用。历经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些英国殖民当局货栈的保卫人员，逐步演变成了训练有素的军队，主要任务发展为维护地方安全，或者与英国军队合作对付其他势力的侵犯，维护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利益。

19世纪中叶，英印统一的陆军开始组建。到1939年9月，英国皇家印度陆军兵力发展到约36万人（其中6.1万为英国人）。印度陆军的地位不高，所使用的武器装备都是英国军队淘汰下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当局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扩大在印度的募兵员额，印度陆军的地位有所提高。作为大英帝国武装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印度陆军在二战中先后到北非、欧洲和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执行作战任务。

1947年印巴分治时，印度分得英印陆军步兵部队的72.4%，包括步兵团15个、装甲团12个、炮兵团19个、工兵连61个、山地团2个，共计26万余人。由于英国殖民时期印度陆军上层指挥权大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到1947年独立时，印军只有一名将军——蒂迈雅，这位惟一的印度籍将军在战争中也仅仅指挥过一个旅。印度陆军主要依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旧式武器，战斗力较为低下，在第一次印巴战争中没能如期达成战略目标。这次战争之后，印度政府把发展陆军作为军事力量发展战略的重点。特别是到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中吃到苦头后，印度陆军开始了现代化建设，并得到迅速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印度陆军已经成为一支兵种齐全、武器装备精良、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军队。根据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世界军事力量对比》公布的资料，到2000年，印度陆军的总兵力共计

110万人，是印度三军第一大军种，居世界第3位，编成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5大军区，装备各型坦克3504余辆、装甲车1607余辆、各种火炮8855余门，近程地对地导弹发射装置约5部，防空导弹1795枚，陆航直升机约160架。今天的印度陆军已经基本具备了在平原、山地、丛林、沙漠等不同战场环境下与其他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具有较强的火力和机动性，不但能在旁遮普平原上对巴基斯坦实施大纵深突破，而且还能在中印、中锡边境地区对中国实施攻势防御作战。

2．“世界第四”的空军

印度空军是在英印时期“英国皇家印度空军”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皇家印度空军”初创时的指导思想是满足皇家印度陆军作战的需要，或用以恫吓和镇压部落叛乱、摧毁其据点，完全是一个支援军种。

1930年，第一批6名印度飞行员被送到英国接受飞行训练。1932年4月，英国下院通过了组建皇家印度空军的议案，10月8日正式宣布成立“英国皇家印度空军”，并任命了首批印度空军军官。

1933年4月，皇家印度空军的第一个飞行中队成立，1941年3月和10月又分别成立了第2和第3飞行中队，至此皇家印度空军已初具规模，并能执行一般性的作战任务，到1942年，英印政府为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展，尤其是远东地区的需要，决定扩充皇家印度空军，将飞行中队增加到10个。皇家印度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与英国空军一起，先后参加了抗击入侵东南亚日军的第一、第二次缅甸战役，在若开和英帕尔前线与日军作战。

从以上发展简史可以看出，英国皇家印度空军的初创时期发展较慢，直到1944年才拥有11个飞行中队，兵力约3万余人。

1947年印巴分治时，印度分得7个战斗机中队和1个运输机

中队，各种飞机约200架，兵力约1.2万人。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印度自己的空军部队，其任务是负责印度领空的安全，支援陆军、海军作战。刚刚诞生的印度空军便参加了由克什米尔的归属引起的第一次印巴战争，“ 空军在支援印度陆军在克什米尔作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们在战场上紧密配合，空投物资，支援被围困的军队 ”。这次战争使印度政府看到了空军在战争中的作用，因而决心扩大空军部队。1950年后，印度从英、法等国引进喷气式飞机，到1957年，印度空军的战斗机基本实现喷气化，各型飞机增加到800架。印度空军最初计划建立20个中队，实际获准组建10个中队，后来又增加到15个。

20世纪60年代后，在苏联的大量军事援助下，印度空军有了进一步发展，实力从1962年的3.5万人发展到1982年的15万人。50年代末，印度空军已扩大到25个飞行中队，并建立了直升机部队。在1962年的印中边境作战中，印度空军没有直接参加作战活动，以致于印度在总结战败的教训时认为，没有使用空军是最大的失误。但印度空军仍然发挥了一定作用，有效地保障了地面部队的供应，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印度地面部队所蒙受的损失。1962年的这场战争结束后，印度政府决定将空军扩充到45个飞行中队，即35个战斗机中队和10个运输机中队，后来战斗机中队又增加到39个，并一直保持至今。其主导思想可能是想在与中国的再次较量中夺占空中优势。在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中，印度空军的“ 作战思想是着重于获得空中优势，但缺乏进攻精神，在巴基斯坦先发制人的空中攻击中，印度空军遭到相当大的损伤 ”。战后印度大量购买飞机，扩充地面支援设施和调整作战指挥体制。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印度空军在东部战区（现孟加拉国）很容易地获得了空中优势，成功地压制了在达卡的巴基斯坦飞行中队；在西部战区，印度空军在与地面部队的有效配合的作战中也

获得了成功。第三次印巴战争后，苏联对印度空军装备的援助激增，使印度空军能够继续扩充。苏联援助印度各种类型飞机近千架，并帮助印度建成三座米格飞机场。

20世纪80年代，印度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被列为优先发展的军种。为加速空军航空兵器的更新换代，这期间引进了包括幻影—2000、米格—29、米格—27在内的一大批先进作战飞机和地空导弹，着手本国轻型作战飞机（LCA）和地空导弹的研制工作，计划开发一种可以取代90年代初开始淘汰的米格—21的战斗机。空军整体作战能力与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得到较大提高。1987～1990年，印度空军的运输机、直升机和攻击直升机部队在斯里兰卡维和行动中表现良好，1988年为援助马尔代夫政府成功地进行了空降兵战略空运，引起了近、远东亚洲国家对印度空中力量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空军更加致力于发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机种和兵种更加齐全。随着远洋作战能力的发展，远程海上侦察机伊尔—42的引进，以及印度空军定期在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驻训，印度海军的动向也开始引起如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对印度战略意图的疑问和担心。普什宾达尔·辛格在《印度的国防观点与武装部队》一文中声称，“ 印度空军拥有了超高速战斗机、强击机、战斗轰炸机和后勤保障部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训练水平最高的空军之一 ”。

根据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世界军事力量对比》公布的资料，到2000年，印度空军实力已达17万人，是印军的第二大军种，编成东部、西部、南部、西南和中部5个地区空军司令部，装备各型飞机1651架（其中作战飞机约808架），防空导弹发射装置280部以上。印度在其“ 印度空军2020设想 ”中指出，印度要建设“ 战略性威慑空军 ”力量，印度空军要从防御型向进攻型转变。遵照这一指

导思想，印度空军计划在未来15～20年内组建20个多用途飞机中队。目前空军基本完成了由国土防空型向空中攻击型的转变，具备了较强的空中攻击和纵深打击能力，其作战半径可达到巴全境以及中国西南边境纵深地区。印度1996～1997年的国防部报告强调说，从其作战飞机的数量和装备来看，印度空军已位居世界第四位。印度空军在南亚地区已是一支超出防御所需的强大空中力量。

据印军将领声称，印度空军的地面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好，机场布局合理，地面防空系统完善，训练设施、空地勤人员的训练标准在世界上堪称一流，作战与战术训练的课目和标准也很严格。拥有专业维修和大修设施的保养司令部的建立，更加确保了空军的良好战备状态，并提高了空军的自给自足能力。拥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和工作，加上一支装备了搭配良好的高、中性能作战飞机和武器系统的部队，印度空军应当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空军之一。与此同时，在印度空军高速发展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少严重问题：

其一，其他军种与空军的恶性竞争影响了空军的正常发展。印度空军专家认为，首先，海军抢走了本属于空军职责的海上侦察任务，而且还在时刻觊觎空军的海上打击任务；其次，陆军又抢走了直升机方面的任务，同时，引进大量防空导弹系统，把触角逐渐伸向所有的防空领域，造成了防空指挥控制的混乱。在军事学术界常常可以听到“ 在陆军指挥控制之下，地空导弹比飞机的效费比更好 ”等观点。这些都反映了狭隘的军种竞争思想，它严重地干扰了印度空军的建设。

其二，过分依赖进口，飞机造价昂贵，影响了武器装备国产化的进程。印度空军的作战飞机至少有80%是从国外进口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印度空军的规划者们已经意识到，由于

飞机造价及武器系统价格的不断攀升、卢比在国际市场的一再贬值和油价的上涨等因素，它已经很难再保持一支庞大规模的空军了。高额的国防开支、军火丑闻、外汇危机等问题都曾导致印度空军现代化进程的停滞。1991年，它的主要武器供应国苏联的解体，使苏联条件优惠的货源不复存在，印度空军80%的零配件供应突然之间发生了问题，印度空军的现代化进程一度受到致命打击。过去30年里一直号称是自力更生生产米格—21的印度斯坦飞机制造公司也不得不承认，在一些关键性材料和部件生产上存在着严重问题。这就是印度工业所谓自力更生的可悲写照。

其三，引进飞机种类庞杂，给武器装备的维护和保障带来难题。印度长期引进型号庞杂的新机种，确实加快了空军现代化的进程，但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引起了空军专家们的担忧——只顾购进装备，却忽视了技术消化和吸收。这反映了政府与空军在专业问题上的分歧，其后果是给空军的工程、后勤和训练设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为空军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基础设施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和大量的资本投入，而且意味着要有整洁的机房、空调和专业电源等为代表的复杂配套设施。提高效费比的惟一途径是减少飞机类型，最有效地利用资本密集型的地面支援系统。但是“苏制装备的廉价吸引力抵消了这些应有的考虑”，“印度空军自此再也未能从这个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

其四，训练器材落后，飞行事故多。至少有4位印度空军参谋长曾先后提出购买高级教练机的要求。一位空军将领指出：“战斗机飞行员一直使用旧式喷气机进行训练，但他们在将来却要使用价值10亿卢比的战斗机参加下一场战争。有鉴于此，当新闻界援引空军消息报道每年发生22～24起飞行事故属于正常现象时，我们就不会对此感到吃惊了。”和平时期过高的事故消耗又导致了战斗力水平的持续下滑。印军专家建议迅速在高级喷气教练机问题

上做出决策，在维持部队训练水平的同时，减少飞机的非战斗损失，同时相应开发这种高级教练机的作战潜能。为此，印度政府在2000年决定从英国购买66架“隼”式先进高级喷气教练机，总价值10亿英镑。根据初步协议，英将直接供给印空军24架“隼”式飞机，另42架将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根据许可证生产。“隼”式飞机是当今国际上最先进的高级教练机之一，目前共有17个国家拥有该型机，计750余架在役。印空军购买此种飞机的计划由来已久，由于经费和其他原因一直未能落实。

综合以上问题，印军专家认为，印度空军现代化进程仍处于表面化阶段，而这种表面化带来的浪费，使它至今没有建立空中预警／控制系统、空中加油能力、精确夜间导航／攻击能力、电子战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等重要的“力量倍增器”。

3．“世界第七”的海军

印度海军的前身是英印时期的英国皇家印度海军。英印政府不大重视英印海军的发展，而是特别重视陆军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大英帝国的海军当年已称雄世界，其霸权地位无人敢于问鼎，大不列颠的海上力量对印度漫长的海岸和海洋权益完全可以起到屏护的作用。因此，英国在完全取得在印度的统治地位后的一个漫长时期，一直没有建立印度海军。

英印时期最早的海上武装，是英国商人们为了商船的安全和海上航道的畅通，招募印度人武装起来的护航船队。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印度的海上安全则一直由英国皇家海军负责，20世纪初成立了皇家印度护航船队，但这个船队的基本任务只是运送军队和测量航道。直到1934年才正式组建“英国皇家印度海军”，但其兵力有限，基本上没有形成作战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皇家印度海军得到发展，力量有所增强，兵力从战前的1300人增加到了战争高潮时的3.3万人。1947年

印巴分治时，印度分得28艘轻型舰艇，共约1.1万名官兵。

独立后印度海军的发展，大体经过三个阶段。即取得独立地位到1961年为第一阶段，1962年到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为第二阶段，战后至今则为第三阶段。

印度独立后，为确保其海上利益，制定了建设一支印度能够维持的海军计划。1948年自英国购得了巡洋舰“德里”号、驱逐舰“拉加普特”号、“拉那”号和“兰吉特”号，这标志着印度现代海军的开始。印度海军的发展是在1955～1961年，在此期间，印度从英国购得8艘反潜与防空护卫舰，4艘海岸扫雷艇和一些保障船只。1953年，印度海军航空兵正式组建。但是较大发展还是在60年代初“维克兰特”号航母加入现役之时。这艘航母是在经过相当现代化的改装之后，带着它的舰载建制飞机“海鹰”式战斗轰炸机和“阿里兹”式反潜机编入现役的。

从印度当时所面临的情况看，印度海军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印度独立后面临着许多矛盾，可以说举步维艰。在对外关系上与巴基斯坦交恶，内政方面力不从心，经济发展不景气，国内治安不稳，民族矛盾尖锐，在军事上缺经费、缺乏高级军官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仍比较重视海军的发展。海军司令部于1948年建立，同年组建了第一个舰艇中队，随后相继组建了驱逐舰中队、快艇中队和扫雷艇中队。1952年组建海军西部舰队，1953年组建可城航海站。尤其1958年卡塔利中将出任海军参谋长，这是印度人首次担任海军的最高首脑，标志着印度海军已基本完成改组、组建任务。而“维克兰特”号航母加入现役，以及1961年配合陆、空军参加收复果阿的战役作战，则标志着印度海军已初步形成支援、配合其他军种的作战能力。

从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到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是印度海军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结束后，失败情绪和

对中国的惊恐笼罩着印度朝野，印度政府把海军的发展壮大作为扩大军备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海军当局由于严重缺乏具有战略头脑、能够谋划全局的高级军事人才，因而对海军的发展没有形成整体计划，提出的项目带有很大盲目性。据G·C·托马斯披露，当时“印度海军方面最关心的主要是装备潜艇，尽管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潜艇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1964年4月，国防部长恰范通知人民院说“印度政府已经承认，印度海军有必要装备一支潜艇舰队”，其理由据说“印度政府深知中国海军在孟加拉湾和印度洋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是年11月，仍然是这位国防部长说，虽然“国防部还没有接到任何有关中国海军在孟加拉湾进行活动或中国海军对安达曼群岛构成明显威胁的明确报告……我们不能排除将来是否会和他们在空中和海上作战的可能性”。显然，印度海军之所以必须拥有一支潜艇舰队，其目的在于对付中国海军。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恰范的这项计划未能实施。

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海军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逐步加强计划性，克服无计划发展的倾向；二是把过去“以英国军舰为主的印度海军舰队改为由更多的苏联军舰组成”。1964年，印苏签订协议，印度从苏联购买到包括4艘登陆艇在内的海军舰只。

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是印度海军飞速发展的契机，成为其大规模扩充兵力和装备逐步现代化的起点。这次战争使印度领导人认识到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海上力量已构成了对印度的严重威胁。60年代中期，印度海军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加快了发展海上作战力量的步伐。从1966年起，印度海军军费开始逐年上升。到1970年，印度海军在三军总投资额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空军，跃居第二位从60年代下半期起，印度海军采取了先装备、后发展的策略，即从发展海军造船工业、建造国产军舰入手，同时依靠苏联全面发展海军。

1968年是印度海军获得大发展的一年。3月1日，印度海军参谋长被提升为上将，印度海军确立了与陆军、空军同等的地位。1968年6月至12月，苏联开始批量向印度提供海军武器装备，其中包括2艘F级常规动力攻击型潜艇、2艘“别佳”级轻型护卫舰，若干艘“黄蜂”级导弹艇、1艘“乌格拉”级支援舰、几艘后勤补给船及多套舰载精确制导武器系统。苏制F级进攻性潜艇“卡尔维里”号正式编入印度海军服役，标志着印度真正进入了潜艇时代。同年10月，印度自行建造的“林德”级“尼尔吉里”号护卫舰下水，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主持了仪式。11月，果阿海军基地扩大规模，并组建了第一支“云雀”3型武装直升机中队。也是在这一年，印度海军东部和西部舰队司令部先后分别在维沙卡帕特南和孟买成立。为此，在当年的海军节上，印度总统侯赛因说：“印度海军已经羽毛丰满了”，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当时的海军参谋长查特吉上将甚至狂妄地宣称：“如果英国海军舰队在1971年从苏伊士以东撤出，印度海军也将会完全控制整个印度洋”。显然，正是从1968年开始，印度海军建设的计划性增强了，速度加快了。

1971年，印度海军又组建了第一个“海王”式反潜直升机中队。到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开始的时候，印度海军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一艘航空母舰、4艘潜艇、2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9艘驱逐护卫舰和6艘护卫舰，总兵力达到4万人的综合性海上作战力量，取得了对巴基斯坦的海上优势，并具备了相当的近海作战能力。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印度海军的导弹快艇对卡拉奇的海岸设施和燃料库的攻击给对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海岸部队则遏制了卡拉奇港的巴基斯坦海军，并有效地阻止了巴基斯坦海军的活动。自此以后，印度海军以自己的实力取得了印度洋周边地区海军大国的资格。

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后，印度海军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即现代化建设阶段。为加强对印度洋的控制，印度提出建立“远洋海军”计划，把加强海军建设作为70年代军队建设的重点。在这个阶段，印度海军的发展战略始终以向印度洋扩展为目标，以适应国家经略海洋的需要。随着印度海军实力的扩大、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印度海军在印度整个防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得到了增强。1974年2月，印度海军参谋长S·M·南达上将说：“随着印度海上力量的不断增强，印度海军的重要性也必然随之而增大，印度的整个海上力量的发展是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

从20世纪70年代起，印度开始推行“保陆制海”军事战略，即在巩固和扩大陆上霸权的同时，通过“三个控制区”来完成对印度洋的控制。印度政府确定的海军建设方针是，以控制印度洋为目标，把印度海军扩充为有效的制海部队，不仅能对付实际威胁，而且还能对付来自邻国和由于全球局势发展而产生的潜在威胁，确保印度6100余公里长的海岸线、200海里专属区和分布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岛屿领土的安全，保卫海上贸易通道，并能兼顾其他合法权益。印度认为，在海上力量尚不足以控制整个印度洋时，应首先控制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以保障印度东西侧的安全；对于进出印度洋的海峡，印度更加意识到它们具有的特殊战略意义。1978年，印度组建海岸警卫队。

在完善了初期战略之后，进入80年代，印度海军发展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武器装备的更新速度更快，渠道来源更加多元化，武器装备不仅从英国、美国、法国等国进口，而且还大量从苏联、德国等购买。为了提高武器装备的自行研制能力，印度大力加强本国的军事制造业与武器装备的科研力量，陆续建造与扩建了各型修造船厂。80年代，印度海军自行研制装备了3艘“戈达瓦里”级护卫舰、2艘“库克里”级护卫舰及登陆舰艇；与它国合作研

制了导弹驱逐舰。1986年，印度以5000万英镑的低价从英国购买了“无敌”级航空母舰“竞技神”号，接着又对其进行了现代化的改装，增设了舰艏12。的滑橇式飞行甲板，将搭载的“海鹞”式飞机数量增加到30架，同时更名为“维拉特”号。该航母加入印度海军行列，揭开了印度建设远洋型海军的序幕，再加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装更新的“维克兰特”号航母，到80年代中期印度海军共拥有2艘航母，这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1988年1月14日，由苏联租借的核潜艇加入印度海军行列并开始服役，标志着印度海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在迅速成长为世界上强有力的海上力量之一。1988年12月10日，印度海军参谋长纳德卡尼上将在接见《印度时报》记者时宣称，“印度海军已有能力在印度洋地区充当警察”。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为实现控制印度洋、走向太平洋的战略目的，更是加大了海军的建设力度，以求尽快使之变成一支能攻能守的远洋海军。印度海军不但自己制造了重达6700多吨的“德里”级导弹驱逐舰，还与俄罗斯签订了购买“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的合同，使其海军特别是远洋的作战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印度自称它的海军位居世界第七，已初步建立了“强大的蓝水海军”，在实现其“称霸印度洋，进军太平洋”的战略构想上迈出了大胆的一步。根据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世界军事力量对比》公布的资料，到2000年，印度海军总兵力共计5.3万人，编成东部、西部、南部3个地区海军司令部，装备各型舰艇132艘（其中水面作战舰艇90艘，常规潜艇16艘），海航飞机185架（其中作战飞机109架）。印度海军不仅能控制整个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而且还能在印度洋北部广大水域活动。今后，印度海军将着眼三维作战的需要，努力提高远岛登陆、远洋反潜和力量投送等远洋作战能力，逐步形成舰种齐全、装备精良、可遂行水上、水下和空中作战的

海上攻击力量。

印度海军未来的发展趋势仍将是以购买武器装备为主，不断引进新技术，加强海军的战斗力。同俄罗斯签订的10年合作协议，将有助于加速印度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印度海军将是印度洋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到2010年前后，印度海军将新增数十艘各种舰艇和船只，海上作战力量将由包括3艘航母在内的20余艘较先进的大、中型作战舰艇组成，其海军总兵力将达到10万余人。

印度海军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经费一直是印度海军的主要问题，每年只占国防预算的最少一部分，主要资源的80%用于还债，用于实现现代化计划的经费所剩无几。同时，由于印度海军依赖于进口的增长，本国的造船能力停滞不前，导弹发展计划落后于规划。导弹对印度海军来说也一直是个问题，由于印度国防研究开发组织不生产急需的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只能依赖进口。1997年，印海军“德里”号战舰曾希望装备本国研制的“三叉戟”舰空导弹，但已被证明不可行，只得由俄罗斯制造的SA—N—7“飓风”导弹取而代之。

## 庞大的后备军——印度的非正规武装力量

除陆海空三军外，印度还拥有大量的非正规武装力量。它们负有内卫治安和边境作战双重任务，是正规力量的重要补充。非正规武装力量按其性质和任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准军事部队、警察和后备力量。

1．准军事部队

印度的准军事部队，是指除正规军以外的其他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是正规军的辅助力量，共计106.9万人，装备飞机29架，巡逻艇36艘。

印度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准军事部队的建设和运用，准军事部队种类较多，规模较大。国防部所属的准军事部队有：海岸警卫队、拉达克侦察部队、国防保安部队、国家步枪队、边境公路组织。内政部所属的准军事部队有：边境保安部队、中央后备警察、阿萨姆步枪队、中央工业保安部队、国家安全卫队、特种边境部队、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

准军事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边远地区，平时负责边防与海防守卫、情报搜集、抢险救灾等任务，也用于维持社会治安、镇压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和群众运动；战时统一由陆军指挥，配合正规部队作战，或守卫军事要地、交通枢纽和重要通信设施、管理与后勤保障体系。

准军事部队在军事方面具有以下三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一是人员适应能力强。印度9亿多人口，入伍适龄青年极为充裕，准军事部队的兵源也十分充足。一些驻守在印巴、印中边境地区的准军事部队实行就地招募政策，新兵质量得到较好保证。他们生长在高寒山区和沙漠干旱地带，对高山缺氧、气候寒冷多变、昼夜温差大等艰苦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且熟悉边境情况，这往往是正规部队不常具备的优势。

二是编制精干。准军事部队与三军编制大体相同，但一般以营（连）为建制单位，每营辖4～9个连不等，连的编制为二三制。部队最高领导为总监（现役中将级军衔），下属各级指挥官一般也都是现役军官。

三是装备轻便。主要有轻武器、摩托车、轻型车辆、攀登器材、橡皮舟、巡逻艇、护卫舰、直升机、侦察和巡逻机等。部队便于在战时担负快速突击和独立机动作战任务。

准军事部队是印度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的中印边境武装冲突，1965年的第二次和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以

及1987年印度出兵斯里兰卡，均有准军事部队直接参战，显示了这支部队相当的作战能力。在内卫治安、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中也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可以预料，准军事部队将在其现代化建设方面继续采取一些重要举措。1993年5月24日，印度在有三军参谋长、内阁秘书、内政秘书和国务秘书参加的一次秘书委员会议上，曾经拟定了一个详细的准军事部队训练计划。边境保安部队将装备反坦克武器，以便更有效地保卫边境安全。边保航空部队的现代化也开始执行新的计划，其中包括增加飞行员、加强训练、更换飞机等。

鉴于印度国内政治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准军事部队近年来连续扩编。根据几个邦提出的部署准军事部队的强烈要求，印内政部还于1994年批准8个邦成立15个后备营。后备营对内政部和邦负有双重责任，但中央保留调动该部队的权力。此举旨在减轻中央警察组织—边境保安部队、中央后备警察和印藏边境警察的任务。内政部计划只让边境保安部队负责边境邦，让中央后备警察负责维护法律与秩序，安全任务则由印藏边境警察负责。

印度报刊反映，准军事部队的频繁动用已经达到精疲力竭的程度。必要的训练和应急的储备也往往缺乏足够的保障。有些部队所用非所训，大大影响了完成任务的质量。印国内有种动议，要求组建一支永久性与陆军配合行动的准军事部队。但内政部对所属准军事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和实力扩充计划”的统计、分析表明，所有部队都在抱怨任务过重，训练太少。

2．警察

印度警察约有100万人，大致分为中央和地方警察两类。

中央警察，包括铁路保安部队、中央工业保安部队、国防保安部队、印藏边境警察和警察快速行动部队，由内政部等有关部门直接领导，主要负责铁路、工矿企业和国防设施的保卫工作，有的在

边境地区担负边防和情报搜集任务。

地方警察，包括武装警察和民警，主要执行地方性治安任务。

印度的警察待遇较差，为争取改善福利，经常闹事。继1973年5月北方邦武装警察哗变后，1979年5至6月期间又爆发了遍及北部各邦的大规模警察骚乱，印政府曾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并被迫对警察的福利待遇进行了一定改善。

3．后备力量

印度的后备力量约有310余万人，是指不脱产的民间武装，印度将其划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防务力量，其组织比较松散。后备力量平时协助警察维持社会治安和参加抢险救灾，接受军事知识和技能训练，战时应征入伍，补充正规军、或配合军队执行作战任务。经费开支一般由政府和邦（中央直辖区）按2：1的比例分摊。

第一线防务力量（西方称之为预备役），包括两类人员：一类是在陆、空、海三军中服现役期满后必须再服5年预备役的人员；另一类是从陆军中退出现役后必须再服预备役到50岁的人员。上述两类人员没有编成建制单位，只处于待命状态。其中，陆军预备役官兵注册人员90万人（30万属甲类预备役人员，60万为乙类预备役人员）。每年定期集训期间，待遇与现役官兵相同。海军预备役力量，又称“海军志愿后备队”，注册人员5.5万，由21～26岁的普通大学、航海工程院校工科毕业生和国民学兵团海军生组成空军预备役力量注册人员14万，主要成分为与空军相关专业有联系的技术人员（维修、医务、飞行专业除外）和民航飞行与维修人员组成。每年定期集训，战时应召入伍。

第二线防务力量由民间志愿者组成，编有建制单位，定期接受训练，并承担维持治安、抢险救灾等任务，备受印度政府器重。二线防务力量主要由地方军（国土军）、国民学兵团、民防志愿队（民防组织）、家乡卫队（民间卫队）和消防队组成。

尽管印度的正规武装力量已经十分庞大，但准军事部队、警察和后备力量这些非正规力量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特别是在维护国内局势稳定和边境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战时，他们将是国家兵员的重要补充。

# 第六章　谋求大国地位的王牌

## ——印度的核威慑战略

印度对发展核武器痴迷已久，把“中国威胁论”作为其悍然进行核试验的挡箭牌，在核试验15个月后抛出“最低限度有效的核威慑”战略思想，把核武器当做威慑邻国和称霸印度洋的利器，仿照美、俄模式建立“三位一体”的核力量，还在印巴边境举行设定核背景的军事演习，为打赢核条件下的战争预作准备。

1998年5月11日至13日，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沙漠腹地的博克兰地区，沙暴肆虐，热浪滚滚，大地震颤不止。这里发生了里氏5.4级地震。这次地壳震动，既不是陷落地震、火山地震，也不是构造地震，而是印度突然进行两轮5次地下核试验造成的人为地震。它产生的政治冲击波也震撼了国际社会，毁坏了国际防止核武器扩散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这次地震还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印度公然跨过了“核门槛”，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15个月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公布了印度核武器政策草案，印度的核战略理论开始浮出水面，核威慑成为印度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疯狂的核痴迷——印度的核发展轨迹

## 1998年5月核爆炸的冲击波是印度数十年来一直处心积虑进行“核”积累的一次必然性释放。当核不扩散、核禁试等军控条约机制在全世界日益深入人心的时候，正如印度外交部长贾斯万特·辛格在《印度的防务》一书中所写的，“印度可选择的范围显得非常窄小。印度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这个国家几十年一直进行开发与保护的核选择不因自我克制而销蚀掉。事实上，这样的销蚀将对国家安全即刻产生不利影响。印度政府此时面临着困难的抉择，作出决定的惟一标准就是国家安全。于是，5月11日与13日进行的核试验不仅已是不可避免，而且事实上也是我们政策的一种延续，这种延续几乎可从最初独立时的岁月算起”。

1．核武器发展历程

印度历届政府对发展核武器可谓心仪已久。从独立初期，印度就立志要成为一个有威慑力的国家，核武器是实现这一企图的首选。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印度发展核武器的步骤始终与它的大国梦相伴随着。

印度的核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7～1964年）——核工业的初创时期

印度独立后，就将核发展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1948年，印度联邦政府就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家原子能政策。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首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国际协议的建议。随后，一些国家先后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就在呼吁国际社会禁止核试验的同时，尼赫鲁自己领导的印度政府却建立了原子能部，尼赫鲁亲自兼任部长，负责实施原子能计划。该部

下设原子能矿藏开采局、塔塔核子科学研究所、萨哈核子物理研究所和特罗姆贝原子能机构（后更名为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尼赫鲁提出并委托物理学家霍米·杰汗格尔·巴巴制定的印度核计划，也是在1954年拟就的。1955年成立了原子能研究所（后来更名为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当时印度政府打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旗号。印度领导人称印度制定和实施核计划的动因有两个：一是印度传统的主要电力资源不能满足印度工业化建设的需求；二是印度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核能资源，在加尔各答有储量4600吨的铀矿床，还有全世界最大的、储量31万吨的钍矿床。

除建立和完善核开发、研究机构外，在这期间共建立了3个核反应堆，4个核燃料厂和1个重水厂，为印度核工业体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们建立的以天然铀为燃料的传统核反应堆，使印度不必依赖工业国家而进口浓缩铀。除了孟买附近的特罗贝和塔罗普尔两个核反应堆外，印度所有正服役或修建中的核反应堆都是“加拿大氘铀22万千瓦型”，以天然铀为燃料，由重水来调节和冷却。

第二阶段（1964～1974年）——核力量的发展时期

印度在实施民用核计划的同时，已经开始秘密研究核的军事用途。1964年10月，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印度抓住这个机会对其核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主要内容有：一是极力渲染印度面临核威胁，声称要在适当时候进行核试验，以对中国的核试验进行“对等回应”。二是调整核发展方向，决定加快民用核技术向军用核技术的转化，重点加强军用核技术研究。三是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强调印度有核选择权。四是加紧核试验准备工作。1965年，印度制定了核试验计划，核武器研制工作正式上马。经过9年的研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74年5月15日在拉贾斯坦邦的博克兰试验场成功地爆炸了当量为12千吨级的第一个核装置。

第三阶段（1974～1998年）——核技术的突破时期

自1974年5月进行第一次原子弹爆炸之后，印度已经实际上跨入了“核门槛”。但由于受到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印度还只是一个没有实战核武器的“空头核国家”，实行的是“最后一根导线”的核发展战略，即在平时秘密生产和储备核武器零部件，但不生产核武器。一旦需要，在24小时内进行组装，接上最后一根导线，就可以“无可非议地制造2万吨级原子弹”。根据这一战略，印度采取了大力发展、全面提高的方针。在这期间，他们首先是建立增殖反应堆。1985年在法国的援助下，印度在马德拉斯附近的卡尔帕卡姆建成了第一个1.5万千瓦的实验增殖反应堆。随后，又于1990年开始建造另一个5万千瓦的实验增殖反应堆。其次是提炼浓缩铀。铀不仅是传统核反应堆的燃料，而且可以在增殖核反应堆中，通过转换钍矿石而使自己也得到增殖。在外国的技术援助下，印度已掌握全套核试验工艺及重水制造技术，具备了相当可观的核设施和核生产能力。

印度实行这种“秘而不宣、实而不虚”的核战略，一方面可以在政治上保持自己不制造核武器的和平形象，避免走核军备竞赛的道路；另一方面又能得到拥有核武器的地位和“好处”，以遏制自己的对手。按照其“最后一根导线”的核战略，几十年来印度大力发展其核能力，秘密生产核武器原料和零配件。这期间，印度已拥有核电站9座、重水工厂6座、核反应堆7座、核燃料后处理工厂2座、铀浓缩工厂1座。另有8座核电站、6座重水工厂、1座反应堆和1座浓缩铀工厂正在兴建中。

第四阶段（1998年以后）——核能力的全面提高时期

1998年3月19日，印度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人民党主席瓦杰帕伊出任总理，印度当局一改前政府奉行的核政策，决定把准核威慑能力转化为正式的核威慑能力。瓦杰帕

伊政府在其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将重新审议印度的核政策，并行使引进核武器的选择权”。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也公开宣称：“如果引入核武器是必要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对此敬而远之。”1998年5月11日印度新政府最终通过公开进行地下核试验，将这一核政策付诸实施。随即，印度总理宣布，印度已经成为核武器拥有国，并建立了相应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声称在必要时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消息传来，举世为之震惊。

印度政府为什么对核武器发展如此青睐，以至于要急于跨进“核门槛”呢？这其中在政治上的首要因素是巩固脆弱的联合政府地位的需要。因为当时印度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堆积如山，而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联合政府的政治基础又十分脆弱（在国会中只有一票的优势），政府内部各党派在政治主张、经济政策和社会问题上分歧比较大。如果处理稍有不当，新政府随时有垮台的危险。印度新政府选择进行核试验，一方面希望在世界上制造轰动效应，以此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想利用印度民族的狂热情绪，用核爆炸的轰隆声，转移国民和世界舆论界对印度国内种种问题的注意力，以巩固其执政地位，缓解国内矛盾，振奋民族精神，冲淡党派斗争的硝烟。印度四大左翼政党就此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印度人民党草率地采取了这一冒险主义政策，其政治动机是激起人们的沙文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情绪，以掩盖自己在管理一个步履蹒跚的聚合政府时遇到的政治困难”。

如果从国家和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在这种核爆炸的冲动表象中，蕴含着印度统治者跻身核大国行列的一贯决心。印度历届政府无论秘密还是公开发展核武器，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以下观点的诱惑：

第一，核武器是国家安全的保证。

印度把核武器看做是战争的避风伞。印度的防务专家认为，

“战后的历史证明，战争不会降临到有核国家的头上”，海湾战争中伊拉克之所以惨遭失败，正是因为没有核武器。作为具有巨大杀伤力和持久破坏性的一种威慑力量，印度如果有了核武器，就可以基本免除战争的侵害。核武器以它巨大的杀伤力，自然会产生一种威慑效应，尤其对那些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更是如此。在核俱乐部成员日渐增加的今天，只靠常规力量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威慑效果。从世界范围看，印度“处于三个核大国相互作用的十字路口”，过去一向依赖苏联的核保障来对付“同美国友好并拥有核武器的中国”，这种形势使得苏联的核保障显得“软弱无力”。如果拥有核武器的印度得到友好的苏联支持，那就会在印中之间造成“对称的关系”。可是，如果中苏再度恢复友好，印度又将成为“无核保障”的国家，这在当今核武器与弹道导弹在全世界日益扩散的情况下，对于没有核武器的印度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印度必须“依靠自己的核力量”，“勇敢地迎接核挑战”，才能确保本国的核安全。

印度未来战争将在核生化武器的威胁下进行，而“慑止这种威胁的惟一可能的途径是要拥有报复的能力”，要拥有核能力和第二次打击能力。因此，“印度如果不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就只有屈服于有侵略野心的邻国的核讹诈，这无异于坐以待毙”。

第二，核武器是大国地位的象征。

印度认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都是核国家“显然不是偶然的”。由于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恰好是当今世界的5个核大国，印度新政府认定进行核试验和掌握核武器是印度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因此，在1998年5月进行5次核试验后，印度新政府立即宣布“印度已进入世界核大国之列”。

按照国际社会的约定俗成，国际社会只允许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英、法、俄、中拥有核武器。这是由历史和国际政治所决

定的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世界上选择了美、中、俄、英、法五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核武器，而是因为他们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可见，大国地位取决于一个国家对世界事务的参与程度、影响力和贡献，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反映。而且，大国地位不是自封的，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然而，印度仅从5个核国家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巧合现象出发，片面地认为有了核武器就拥有了大国地位。印度的倒行逆施，是对国际社会的公然蔑视和挑衅。它得到的只能是国际社会的谴责、反对和制裁，而不是大家认可的大国地位。

印度防务专家认为，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地区性大国，仅有常规的军事力量，哪怕在印度洋沿岸周边各国中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也还不能算作一个军事大国，还会受到有核国家的讹诈，始终存在着被排挤的危险。印度政府要求以核弹对等的原则谈判签署核禁试条约的立场，就集中反映了印度试图与核大国平起平坐的欲望。他们认为，在许多方面印度与中国相似，然而中国在亚洲、在全世界却享有越来越高的威望，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是五个核大国之一。印度只有掌握了核武器，才能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大国。以“核大国”身份争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乃至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的地位，被印度当局认为是一种捷径。正如著名防务专家K·苏布拉曼耶姆所说：“印度要实现自己的国家发展目的，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那就是发展核力量。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美国可能会认识到，他们不能忽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7亿人口的大国”。

的确，1974年拉贾斯坦沙漠首次核爆炸的结果，使世界不得不正视在次大陆雄踞支配地位而且将握有核弹的印度，这使印度当局备受鼓舞。因此，到了1998年5月，印度当局终于按捺不住，不顾世界舆论的压力，硬是通过核爆炸公然跨进了“核门槛”。从

形势的发展看，印度以核武器谋取大国地位的企图已经获得了初步成功。美国当局就认为，一旦一个国家取得了核大国地位，就不大可能左右它。已经进入“核门槛”的印度不可能再退回去，因此美国的政策应该“进行适应性调整”。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00年3月访问南亚的动向就可以看出，美国已开始把印度当做一个大国对待了。与此同时，印度当局采取灵活的全方位外交策略，拉拢西方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较短的时间里逐渐摆脱了核试验以来的孤立局面。但要借此当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它在核试验方面的一意孤行，破坏了世界人民在限制核军备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遭到了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在核试验后一段时期内处境极为孤立。印度一些防务专家至今还为其核大国地位得不到世界公认而苦恼，因为这直接影响到其极力追求的威慑效果。

第三，核武器是保住既得利益的王牌。

印度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殖民统治时期遗留的问题，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和争端可能诱发武装冲突。与印度存在矛盾和争端的国家首推巴基斯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目前都拥有核武器。尽管目前印度对巴基斯坦在常规力量上占有压倒性优势，对中国在边境地区保持着局部军事优势，但印度仍然不能安枕。对巴基斯坦，印度要遏制其与印度保持平衡欲望的发展，力图不仅在核武器研制速度上，而且在质量、手段和投送方式上都要超过巴基斯坦，始终对巴保持巨大的军事（包括核武器）优势，使南亚次大陆以印度为主导的战略均势不致被打破。对中国，印度数十年来一直瞄着中国发展核武器，核试验也是打着“中国威胁论”的旗号进行的，建立核武库的规模也试图以能与中国核力量相抗衡为目标。印度一向认为，只有具备了与中国相称的核威慑能力，它在印中边境的常规军事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尽管印度是南亚大国，但它仍感到称霸南亚次大陆还有些力不从心，这种状况使印度失去心理平衡，也使它急于从核弹那里寻找出路。长期以来，由于实力的局限，印度很难在南亚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印度认为，核武器是“更值得、更有效、更可靠、更适合在南亚次大陆起必要威慑作用”的工具，可对南亚诸国形成不可逆转的优势。有鉴于此，印度把核武器作为遏制中国、巴基斯坦以及其他邻国用武力夺回被占领土企图的王牌，认为要使自己的实力增强到足以在平时能威慑敌国、战时能保障胜利的水平，就必须大力研究和制造核武器，不仅要拥有核武器，而且必须始终保持对巴基斯坦的核优势，能与中国的核能力相匹敌。

在1998年的核试验中，印度政府和科学家采取了审慎的措施。他们选择在5月进行试验是因为这期间印度上空沙尘弥漫，使卫星摄影的效果明显降低，白昼的高温也使红外线探测不能发挥作用，再加上严格的保密措施，使得美国的情报部门事先对印度的核试验没有丝毫察觉。印度此次进行的5次核试验，只有其中强度最大的一次为遍布世界的数千台地震仪监测到。此事也引起人们对禁止核试验条约实行情况进行监测的有效性的怀疑。

印度于5月11日当天就进行了3次核试验。第一次爆炸的是原子弹，它被设计用来安装在印度的新型“烈火”导弹的头部。这个试验的目的是显示印度已经具备发射核弹头的能力。第二次试验爆炸的是一个低当量氢弹的引爆器或适用于战术核武器的装置。第三次试验的是一个热核聚变装置，表明印度已经能够制造氢弹。

印度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际研究发展机构的联合声明称，印度爆炸的热核装置的当量为4.3万吨TNT。这个数字要比美国政府和民间科学团体估计的数字大一倍。美国的估计数字，包括热核装置在内的印度第一轮三次试验的总当量为1.5万至2.5万吨TNT。

印度核科学家说，其他两次试验，裂变装置释放的当量为1.2万吨TNT，低当量装置释放的能量为200吨TNT。5月13日的两次试验分别为500吨和300吨TNT，都是低当量试验。印度进行这两次试验是要获取更多的数据，以改进核武器设计的计算机模拟，以及使科学家能够进行不产生链式反应的原子核试验。许多核大国都进行过这种试验，以检验核武器的可靠性。

总之，印度此次核试验的目的是要验证印度其是否已经具备了生产各种核武器的能力，从小型的、用于战场上的战术核武器到远程导弹携带的具有摧毁城市力量的核弹头。这五次试验为今后设计具有不同用途、不同当量、适用于不同运载系统的核武器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此次试验表明，自1974年第一次核试验以来，印度在核技术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确实如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所宣称的那样，印度已经可以制造“巨型核弹”，即氢弹。与此同时，印度科学家在减少裂变装置的尺寸和重量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印度核武器的发展，也是印度科学家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的结果。

印度发展核武器的奠基人是霍米·杰汗格尔·巴巴。他于1930年起在英国剑桥大学从事核物理研究，是印度已故总理尼赫鲁的好朋友。印度孟买附近的现代化核研究实验室即为巴巴所创建。巴巴于1966年因飞机失事而丧生，享年56岁。拉贾·拉曼纳称巴巴的遇难使“印度科学技术发展史的一个章节就这样戛然而止。巴巴对印度科学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不可估量的”。现在印度的原子研究中心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印度发展核武器的核心人物是拉贾·拉曼纳，生于1925年。拉曼纳早年在印度马德拉斯大学毕业后，到英国伦敦大学深造，获裂变物理学博士。当1974年印度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时，他是印度

原子研究中心的主任，是该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此后，他被任命为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并曾担任适合的国民阵线联合政府的国防部长。1998年4月拉曼纳再次被任命为印度原子能委员会成员。

组织和领导印度科学家成功地进行了五次核试验的关键人物是阿博杜尔·卡拉姆和拉贾古帕尔·奇丹巴拉姆。卡拉姆，生于1932年，早年研究航空工程，是印度有名的导弹工程师，领导了发射印度第一枚空间卫星的工作和设计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计划，后担任印度国际研究发展机构主任，是印度发展核武器计划的首席顾问和领导。卡拉姆被公认为是推动印度参加核俱乐部的中心人物。奇丹巴拉姆则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现任主席。

2．“核武器情结”

为了进行核试验，印度就要寻找一个能够“打动”世界的借口。在印度进行5次核试验的前后，印度领导人从国防部长到政府总理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为核试验寻找“理由”和借口。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一再公开宣称“中国是印度的头号威胁”，并无中生有地说“中国侵占了印度3.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写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中声称：“有一个公开的核武器国家与我们接壤，这个国家1962年对印度发动了武装侵略。虽然我们同这个国家的关系最近10年来有所改善，但是主要由于边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种不信任的气氛持续存在。”

印度为了替核试炸寻找一个可以搪塞世人的借口，从国防部长到内阁总理，都以不同的方式大谈“中国威胁”，并且一再声称，印度所进行的核试炸是为了应付邻国（即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威胁。似乎以此做挡箭牌，可以招来国际舆论的同情和理解。但实际上招来的仍然是世界同声的抗议。

显然，印度的所谓“应付邻国的威胁”云云，只是它编织的不能

令人置信的借口，而隐藏在借口背后的则是不便公诸于众的企图。人们似乎低估了印度拥有核武器的野心，因为24年来，印度从未放弃过进行核实验的打算，也正因为这样，印度在1996年声明不在日内瓦谈成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就已表明其拥有核武的决心。可以说，印度的这次核试验是长期以来处心积虑的结果，并非是心血来潮之举。印度有着漫长的核追求。国际社会也一直把印度列为“核门槛”国家。印度内部，尤其是军方，对这个地位一直不满。而且，印度许多人，包括新闻舆论长期把核武器和大国地位联系起来。印度一位前国防部长曾说，“核武器是使一个国家得以在宴会桌吃饭的东西”。以为拥有核武器就拥有了大国地位的“核武器情结”在印度颇为流行。

实际上，到1998年，无论是印度周围的局势还是国际大气候，都已和24年前大不相同了。今天的印度其实应该觉得它的安全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印度这次核试验的真正用意，并不是要应付什么威胁，主要还是要展示它的国力，证明它不但有能力制造核武，而且是一个必须受到国际重视的亚洲大国。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包括美、俄、中、英、法等国，通常都是把核武器的拥有与它们全球的战略观而不是与它们所假想或认定的威胁挂钩。但印度试炸与发展核武器的出发点似乎不大一样，它也必然刺激与它关系不佳的邻国这么做。因此，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印度的核试验的确不应与上述几个国家等同看待。

印度试炸的行动虽然在国际上引起非议与抗议，但在印度国内，却似乎是很得人心的。这从印度报章以及街头群众的反应可见一斑。印度主要舆论媒体几乎都把这次成功试炸与印度作为大国的地位扯为一谈。虽然这种心理不难理解，但如果一个政府不懂得适可而止，一直利用这类事情来挑起人们的情绪，维持群众对自己的支持，那最终可能与玩火无异。5月中旬印度刚核爆时，国

内一片额手称庆，鞭炮锣鼓，那些并不赞同印度变成核国家的有识之士一时也不好公开反对，避免被戴上不爱国的帽子。一阵狂热已过，大家认真讨论国家前途，意见分歧就出来了。

核爆以前许多年来，印度专家智囊们就在核问题上分成两大派别，求核的、反核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现在这两大意见壁垒又按昔日的楚河汉界摆得分明了。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在一个战争容易爆发的地区，掌握了核武器是否是保持和平、稳定的有效保证。曾于1971年统率印度军队在东巴基斯坦战场上接受巴军投降的退休将军阿罗拉中将认为，印度掌握了核弹就能维持南亚的和平稳定。他说，世界上出现了核武器的半个世纪以来之所以没打大战就是因为核威慑力使得发动大战的因素消除了。

反对这一意见的以文人居多，但也包括已退休的将军。曾任陆军情报部长、现任新德里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两所长之一的班纳基少将说：“核武器具有威慑力是成问题的论断，根本无法证明它的实践性。”

论述得最全面的是另一位退休将军拉格文中将，此人写过很多书，还读过《孙子兵法》。他认为，印度要抓核武器，就得承受沉重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与“机遇”的四大“成本”。这“机遇成本”是存在的，但无法测量与估计。经济成本主要不在于国际制裁与禁运，而是印度在世界上所受欢迎性的丧失。他还说，核武器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安全性，包括政府不能正确估计核战危机。导弹的存在把不安全性提高好几个层次，政府在敌人发射导弹后的几分钟内就得作出使用核武器的决定，等于把极端困难的危机决定加到印度政治领导身上。况且有了核武器，对制止轻微军事冲突以及第三者在幕后操纵的战争根本不起作用。

他还指出，强调核威慑价值与印度一贯主张和平、合作的传统是相违背的，而国际政治的总趋势则是从核武器的立即使用走向

协商控制核军备。因此他主张印度新获得的核武器国地位应该与印度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用核克制去换取长远的发展经济的利益，应该善于运用核武器的“协商价值”而不着眼于它的“威胁价值”。

事实上，在今日世界，拥有核武器与否，不一定等同一个国家的实力。并不是只有大国才有能力制造核武器，也不是所有能制造核武器的国家，都可以称得上大国。这基本上并非能与不能，主要还是为与不为的问题。如最被印度耿耿于怀的巴基斯坦，就具备生产核武器的条件。所以，印度这次核试验，即使能满足它想跻身于“核大国”的心理于一时，它在区域及国际上引起的恶性反应，却不是容易平息的。印度进行核试验后，巴基斯坦政府感到自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象脚之下难余生”，随即做出强烈反应，于同月的28日、30日针锋相对地进行了6次地下核试验，使南亚地区又达到了新的、更加危险的安全平衡。印巴之间的冲突，带着浓厚的宗教背景，它们自分裂为二以后，已经有过三次战争。这两个国家之间如果陷入核军备竞赛，其危险性难免特别令人忧虑。

印度不顾国际道德进行核试验，挑起南亚核军备竞赛，对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美国、日本、加拿大等一些国家以及一些国际机构纷纷宣布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实行经济制裁，或冻结援助，或取消贷款。据报道，美国公布的对印度制裁清单就涉及207亿美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也宣布中止对印度的贷款，涉及的资金数目更大。截至1998年，印度共向上述三大机构借款440亿美元，主要用于84个大规模基本建设项目。这些贷款一旦中止，印度将蒙受重大损失。在印度挑起南亚核军备竞赛后，美、英、法、德、意、日、加、俄八国领导人5月15日在伯明翰举行了经济首脑会议。八国首脑在会议声明中对南亚地区增长的核武器和

导弹技术扩散的危险表示严重关切，要求印度和其他国家不再进一步试验和部署核武器，要求印度无条件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同历史上其他核大国所进行的核试验相比，印度核试验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鲜明特点：

第一，来势凶猛，逆历史潮流而动。印度一直被视为三个“核门槛”国家之一。瓦杰帕伊政府上台之初就宣称印度应成为核大国。起初人们还以为瓦杰帕伊政府只不过像历届政府那样说说而已，然而，仅仅53天之后，印度政府真的启动了核装置。印度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无疑是在向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宣战。

第二，规模庞大，核试验水平高。印度这次连续核试验，充分证明印度在核控制、引爆、检测、计算机软件等技术方面以及航天回避技术等方面都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美国科学界估测：“印度大概达到我们（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

第三，态度强硬，孤注一掷。核试验之后，面对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和制裁，印度政府态度强硬，多次表示不签署“两个条约”；不接受国际组织对其核设施的监督和检查；不怕制裁和压力，坚持核武器化的选择；不允许第三国插手克什米尔问题；不接受联合国1172号决议等“五不”政策。

第四，准备充分，筹划周密。印度此次核试验是经过多年精心准备和谋划之后进行的。在时机上，选择在世纪之交世界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各“极”忙于自身事务、未来地位尚未确定、国际社会难以形成统一力量和政策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政治上，做好了应付国内、国际及外交上处于困境的准备和对策；在目标上，指向中国，把中国作为其进行核试验的“挡箭牌”，以便取得国际上的同情；在技术上，作了全面的、一步到位的安排，把多种核爆炸技术集

中在48小时内完成，同时巧妙地避开了美国人的太空监测而一举成功。

3．印度核技术能力评估

印度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核工业体系。印度发展核工业起步早，从1948年开始，印度在西方几个大国的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潜心努力，已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核工业体系。印度的核科技工业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统一和集中管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印度建立了一系列核科研基地。印度也很重视核科技人才的培养，他们不惜重金将核科技人才派往美、英、法、俄等国家深造，并以高薪和优越的物质条件吸引大批科学家回国效力。到核试验期间，印度拥有核理论研究与工程技术人员2.5万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核技术研究体系。印度因1998年核试验受到国际制裁，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受到限制以后，更加重视依靠本国技术力量发展核武器。印度政府在财力上对原子能工业也给予很大支持，据统计，印度在军事研究和发展方面的费用占印度政府科学基金的68%。

印度还拥有完备的核设施和巨大的核材料储备。几十年来，印度一直把核研究的重点放在核原料的开发和提炼方面，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从而使武器级钚的生产、提炼技术不断提高。目前，印度已建有10座核电站，调整后也可用于军事目的。其中1956年从加拿大引进的希罗斯反应堆可年产8～10公斤武器级钚。1985年投产的兹鲁瓦核反应堆是世界上目前仅有的几座快中子反应堆之一，可年产30～50公斤武器级钚。印度拥有丰富的核资源——钍，储量达32万吨，占世界已探明总量的2/3。比哈尔邦兰契高原铀矿储量达5.3万吨。正是丰富的核资源和雄厚的核工业基础，奠定了印度后来者居上的核能力。据西方估算，到1995年底，印度可能积累了425公斤钚。如果按8公斤钚可制造一颗原子弹计算，印度可制造53颗核弹，预计到2005年可扩大到

100颗左右。此外，据西方专家估计，印度利用重水生产氚的技术已居世界较先进的水平。印度原子能委员会（AEC）主席拉贾戈帕拉·奇丹巴拉姆博士说，根据核试验结果，印度已获得非常有价值的科学数据，并将形成确实有效的核威慑力量。至此，印度成了事实上的核国家。

印度正积极向亚临界核试验技术迈进。印度拥有较先进的计算机技术，1998年5月的5次核试验为印度掌握亚临界核试验技术提供了关键数据。1998年研制成功的新型超级计算机“帕拉姆10000”（Param10000），可以用于模拟核爆试验，奠定了亚临界核试验和模拟核试验的技术基础，对核武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奇丹巴拉姆曾在孟买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有必要，我们可能会进行像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那样的亚临界试验。”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印度有可能与五个核大国一样，在不进行核试验的条件下继续发展核武器。可见，印度的核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水平。鉴于此，继续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印度已无太多的实际意义，印度的核军控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英国《简氏防务评论》认为，印度的核武器潜力比英国还大，与法国属于同一等级，有能力制造近百枚核弹头。如果把商用反应堆也纳入军用，到2005年，印度至少可制造400枚左右核弹头。

## “最低限度有效的核威慑”——核战略思想

1999年8月17日，也就是在核试验15个月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公布了印度核武器政策草案，提出了印度核武器的发展、部署和使用的原则，阐明了印度未来的核战略。至此，印度彻底撩开了长期笼罩在其核武器问题上“神秘”的面纱。

核武器政策草案提出了所谓“最低限度有效的核威慑”思想。这个核理论文件对印度核武器的使用目的和原则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设想。

印度拥有核武器的根本目的是“阻止任何国家或实体对印度及其军队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声称“如果印度及其军队遭到核打击，它将动用核武器进行惩罚性报复行动”，给对方造成无法承受的重创。

印度的核力量使用原则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会使用核武器进行惩罚性报复；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也不与任何核国家结盟；在和平时期的核立场是使潜在的侵略者相信，任何对印度使用核武器的威胁都将引发印度采取相应措施，任何核打击都将导致印度以核武器进行惩罚性反击。印度政府和战略家们承认，一旦威慑失败，印度在遭受敌人第一次核打击后和进行任何形式的报复之前将付出巨大代价。因此，印度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理论要求印度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完备的和不会被超越的核威慑力量，以确保印度不会遭受核打击。草案还设想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从和平时期部署向战时部署的过渡，甚至在遭受首次核打击情况下，能够拥有二次反击能力。

印度核武器的规模、组成、部署和使用将取决于战略环境、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需要，投放和使用核武器的权力属于印总理等最高政治层，核武器按钮由总理直接掌握。“在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上，印度不接受任何限制”。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对所有国际军备控制动议作出反应，力避加入任何束缚印度未来灵活进行核选择的协议”。

“核武器政策草案”反映了印度当局决心要发展核力量和跻身于核大国的战略企图，也反映了印度以核武器为后盾，巩固其南亚霸主地位的战略目标。其建立核武库的计划远远超过了“最低限

度核威慑”的需要，引起了国际间的广泛关注。作为曾经是无核国家和人口在世界占第二位的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其核战略出台，无疑对南亚地区安全乃至世界和平产生了巨大影响。

印度迄今拒绝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它们的官方看法是：该条约没有规定在具体时间内全面销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这是对国际社会争取在全球建立无核世界努力的打击。由此印度发表声明说：“在实现全面销毁核武器之前，印度认为自己在这一问题上别无选择”。显然，核武器是印度决不会放弃的“看家法宝”。

印度核战略还陆续对核战略目标、核威慑原则、核力量指挥控制等方面做了规定和初步设想，使其得到逐步完善。

1．核战略目标

2000年，一名前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霍克斯利虚构了一部名为《火龙》的小说，这部有描述中国向印度首都新德里以及金融中心孟买发射核子弹情节的荒诞小说，却引起了印度政府中一些“鹰派”人物的浓厚兴趣。身为国防部长的费尔南德斯就借题发挥说，其他读者如何领悟《火龙》这部小说是他们的事，但是印度人必须睁大眼睛看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费尔南德斯已经再明白不过地把中国作为印度的敌人和核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

印度在政治上以核武器作为谋求大国地位的筹码。掌握核武器，跨入世界核大国的行列，是印度的既定发展目标。印度防务专家从本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幅员、人口、资源以及所拥有的科技力量出发，提出印度“应成为现代国防环境中制定独立政策的一个中心，而不是做一个瑞士或芬兰”。为此，印度就需要“从第六个核拥有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表明，印度意识到，若要提高本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跻身世界大国的行列成为世界的一极，就必须拥有核武器。这是印度掌握核武器

的首要目标。

在军事上，印度则以核武器作为争夺地区霸权的后盾。印度防务专家指出，印度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三种潜在威胁。它们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核武器与常规能力，已拥有由核“劝阻”发展为核威慑能力的中国。为此，他们提出了核战略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

印度核战略的近期目标是对巴基斯坦和中国形成有效核威慑。

一是慑服巴基斯坦，对巴基斯坦实行全面核威慑，具备与巴打一场核战争的能力，以终止其“代理人”的角色，使巴不敢在边境地区轻举妄动。印度要力图不仅在常规武器上，而且在核武器上压倒巴基斯坦。

二是威慑中国，对拥有核武器的中国采取低度局部核威慑，逐步发展为全面核威慑，以慑止中国在解决边界问题时使用武力，并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对中国持强硬态度。

此外，还要震撼周边无核国家，防止它们对印度安全构成威胁。印度防务专家G·沙马中校在《印度北部安全》一书中指出：“战略环境要求我国核化，在我国的能力、资源及发展计划的范围内能确保不让支配性的军事影响出现在我国周围。”目前，印度对巴基斯坦在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方面都已经构成绝对优势，而对中国则只是初步形成了力量均势。所以，印度把威慑中国作为近期的重点目标。一位防务专家这样写道：印度自1962年军事上受挫以来，经过20余年的艰苦努力，已具备同中国在常规武器上的“平衡”。然而，面对拥有战略核武器的中国，在常规武器上的平衡充其量只能使印度对其潜在对手具有采取“劝阻”姿态的能力；只有在印度能够部署核导弹时，印度才能对中国保持“慑止”姿态，其“最大的好处是在同中国谈判解决边界纠纷时，中国的核弹

不再能使我们屈从于不利的地位”。据该文透露，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印度才在1983年制定了综合导弹发展计划。

印度的远期目标是通过核威慑确立对印度洋的霸权。印度认为，对付企图染指印度洋的区外大国，仅靠常规军事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核威慑。印度要在南亚乃至印度洋地区建立起一支更全面的核力量，并通过把区外大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军队作为打击目标而起到威慑作用，阻止其他力量插足南亚事务。印度防务专家认为，印度的核能力“还需要将超级大国的星球大战能力考虑进去，尽管它实际上属于非核打击军事力量”。

2．核威慑基本原则

印度核理论认为，其核力量要真正能够对敌方形成威慑力，必须具备以下基本原则：

可信性。印度核武器的威慑力要能够让任何敌手确信，如果对印度及其部队使用核武器，印度有能力而且一定会以足够的核武器进行报复，给对方造成其无法承受的破坏和惩罚。印度陆军总参谋长孙达尔拉詹·帕德马纳班宣称，如果威慑不起作用，印度必须具备二次核打击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是极具毁灭性的，从而使对方在主动发起攻击前必须三思而行”。G·沙马中校也指出：“我们需要有适当的军力，并以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后盾，向未来的任何侵略者表明，要在印度周围进行干涉的代价将十分惨重，使之望而却步。”

有效性。通过包括可靠性、及时性、准确性和打击的效果在内的所有因素的增效作用，使印度的核威慑效应达到最大限度。核理论要求由多部门组成的印度核力量成为反应迅速、能打持久战、灵活高效的准确打击力量，能在最短时间内完全投入使用，甚至在遭到敌方打击、作战能力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也能采取有效报复行动。

生存能力。一是要求核力量及其指挥控制系统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其编成和部署能确保其经受住突然袭击和多次磨擦性冲突，保持足够的报复能力，能迅速做出惩罚性反应。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将通过多样化系统、机动能力、分散和伪装相结合而得到提高。二是要求保障指挥控制连续性的程序能够确保连续有效地使用核武器。为增强核力量的生存能力，核力量必须集多种投放系统、机动性、分散性和迷惑性于一体。

为提高核战备水平，增强核力量的抗毁生存能力，印度对其核武器的保护主要将采取机动运载与固定储藏相结合的办法，即建设较为发达完备的铁路网，修建若干个由铁路线连接的防区。运送核武器的火车平时停在某一防区内，不定期地在防区间运动，使敌方摸不清核武器储藏的确切地点，以防止敌方破坏和袭击。一旦发生战争，可以快速机动，迅即疏散，并立即组织反击。此外，印还在积极采购并自行研制先进的防空电子及雷达系统，以增强对敌方袭击印目标的武器预警、识别和监测能力。

3．核力量指挥控制

有了核力量，到底该由谁掌握核力量的指挥权？谁来负责核力量日常的管理和作战训练呢？对于第一个问题，目前似乎没有太大争议。印度自建国以来，历来是文官掌握军权，为加强核武器使用的安全性，印度一直坚持由文官政府中少数最高层人员控制核按钮的原则，以避免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同时对核武器控制系统设置了专门装置，只有特定人员输入密码后方可启动。印度总理无疑将是惟一能启动印度核按钮的人。1998年11月印度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后，其核武器指挥控制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特别是明确了指挥和控制的分工程序，确保在国家遭到核打击、文官政府受到破坏时，始终有人继续履行指挥和控制职责。在此基础上，印度军方在1999年向政府提交的《印度战略核指挥机构框架方

案》中，建议成立由总理、国防、内政、外交和财政部长，各军种参谋长和国家战略司令部领导组成的“国家指挥机构”，决策核力量的运用；由三军高级将领及原子能、信息技术、通信和防务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国家战略核司令部”，负责战略核力量的指挥控制；成立一个具有接收情报信息和发布作战命令能力的“国家指挥所”，以便在“国家战略核司令部”被毁时执行“国家指挥机构”的决定。

但对于第二个问题，军方内部争论不休，海陆空三军各有考虑，至今尚无定论。有方案建议成立统一的核部队指挥部，由一名中将统一负责海陆空三军的核发射系统的管理，通过目前正在拟定建立的国防参谋总部向总理负责。

印度核理论草案为该国全面核武器化指明了方向，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说：“自1998年5月以来人们的普遍感觉是，政府将在核问题上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但核理论草案则表明政府传统的核威慑立场没有改变。”然而，不少反对者对印度核计划的风险和代价感到担心。《印度教徒报》专栏作家雷迪说：“如果这些核理论付诸实施，那么核武器化不仅将使印度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将大大加剧南亚的军备竞赛，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之一。”他在题为《愚昧的黩武主义》的文章中指出，如果印度按照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实施其核武器计划，在未来十年它可能将为此付出5000～6000亿卢比（120～140亿美元）。

## “三位一体”——核攻击力量的发展模式

在成为“第六个核大国”后，印度又在仿照美、俄的做法，建立自己的“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其发展核军备的基本目标是：加

速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力争在21世纪初形成“陆基、空基、海基”相互支撑的“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系统，跻身世界“核大国”行列。

由于“三位”各有优缺点，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组成一体，才能大大提高整个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和攻击能力，在遭到第一次核打击后，仍能确保己方有足够力量给对方实施反打击。防务战略家认为，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的所有三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目前，印度正在为建设这样一支核威慑力量而努力。印度政府已正式将其核武器项目从原子能管理委员会中分离出来，并成立了新的机构，专门负责核武器项目。

根据“陆、海、空三位一体”核力量建设构想，印度计划在未来30年内，耗资7000亿卢比（约合160亿美元），建立起拥有350～400枚核弹头的核武库，在陆海空三方面进行部署。原计划到2030年建立起陆军25枚洲际弹道导弹、40枚中程弹道导弹和25枚原子弹，空军70架苏—30MKI远程攻击机、70枚空地导弹和70枚核航弹，海军4艘核潜艇和47枚潜射弹道导弹，以及50枚储备核弹头。2000年10月印俄签署的协议又使苏—30MKI飞机的生产数量提高了一倍，达到140架。印度在加紧研制核武器的同时，积极进行核运载具的研制工作，计划建立一支由战略轰炸机、机动陆基导弹和海基武器系统组成的具有二次打击能力的“三位一体”核战略力量。该计划已取得了长足进展。2001年5月31日发表的印度国防部《年度报告》称，印度要建立“可靠的、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发展精确的核武器运载系统也应包括在内。

印度的核运载工具主要有弹道导弹、飞机和核潜艇。其中弹道导弹和核潜艇是目前印度研制的重点。

1．弹道导弹

印度的弹道导弹发展是与其空间计划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印

度于1962年成立空间研究组织，1972年成立内阁空间部，由总理兼任部长，该部下设空间委员会，重点研究空间技术和运载火箭。印度从苏联引进了气象火箭、火箭发射装置／雷达站、遥测站及其他发射火箭的配套设备。苏联解体后，它又于1992年同俄罗斯签订了购买以液态氧为燃料的低温火箭发动机合同。1980年7月和1983年4月，印度先后两次发射SLV—3火箭取得成功。这种火箭只要加上弹头就可变成中程弹道导弹，因为实际上发射导弹和发射卫星的惟一不同只不过是火箭运载物不同罢了。2001年4月18日，印度新一代GSLV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将一颗重达1.54吨的试验通讯卫星成功地送入对地同步轨道，则又表明印度已经具备了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1983年，在当时的英·甘地总理主持下，印度制定了《综合导弹发展计划》，该计划迄今一直在稳步发展，并且取得了很大成果。到20世纪末，印度已先后研制成功了两种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

一种是射程在350公里以内的“大地”（Prithvi）近程导弹，包括“大地—150”、“大地—250”和“大地—350”型3个改进型号。其中“大地—150”型是供陆军使用的弹道导弹，最大射程150公里，已进入部署阶段；“大地—250”型是供空军使用的弹道导弹，最大射程250公里，在1997年2月试射成功；“大地—350”型是供陆军和海军使用的弹道导弹，最大射程350公里，而且机动性较强。“大地”导弹作为战术核打击力量使用，可携带常规或核战斗部，目前正陆续装备部队。2000年，印政府决定为陆、海、空三军采购300枚“大地”导弹，其中陆军150枚，海军100枚，空军50枚。“大地”改进型近程弹道导弹的射程可以抵达中国西藏纵深地区。

另一种是射程为1500～5000公里的“烈火”（ER-Agni）中远程导弹，这是“综合导弹发展计划”的一出重头戏。这种导弹是在SLV—3运载火箭和“大地”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程弹道导

弹，目前也有三种改进型号，其中：

“烈火—Ⅰ”型，体长21米，直径1.3米，重19吨；有效载荷1吨，射程为1000～1500公里；采用二级火箭发动机，第一级使用固体燃料，第二级使用液体燃料；制导系统为惯性制导，圆概率误差为300米；可携带破片杀伤弹、高爆弹头、油气弹头、集束弹头和核弹头等。该型导弹分别于1989年5月、1992年5月和1994年2月进行过三次成功试射，目前已形成战斗力。到2000年，印度已经生产部署了10枚该型导弹。

“烈火—Ⅱ”型，是一种两级固体燃料导弹，能够携带1吨重的核弹头，采用中段惯性制导加末端雷达制导，射程达2000～2500公里，导弹圆概率误差为100米左右，发射准备时间不足15分钟，可携带集束弹、制导弹头、油气弹、生化弹头及核弹头等。由于实现了全固体燃料，导弹系统具有良好的机动性和快速反应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该型导弹第二级发动机是专门开发的，其伸缩喷口可在飞行中对推力方向进行微调，从而可以在软件控制下对弹道进行调整，使导弹在重返大气层阶段拥有更强的机动性，可以躲避导弹防御系统，有效攻击目标。该型导弹的另一特色是能从容易组装的活动发射台上发射，能通过铁路机动发射装置进行发射，降低了导弹系统的易攻击性，且便于操作。从战略角度看，它与固定发射台相比是个很大的飞跃。能用活动发射台发射的烈火导弹使得印度在导弹部署上有了巨大的灵活性，印度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甚至在安达曼岛上进行部署。发生战争时，导弹可以通过铁路或者公路运至可以组装发射台的目的地。目前，“烈火—Ⅱ”型的国产率在90%以上。经过1999年4月11日和2001年1月17日两次成功试射，已经基本定型，并开始“限量”生产，计划2001～2002年投入现役，作为印度核威慑力量的重要一环。该型导弹被认为是印度导弹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表明印度已具备中远程核威

慑能力，其射程可以覆盖中国腹地，包括西南、西北、华南和华北地区的大部分目标。

“烈火—III”型，根据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公开披露，其开发在2001年5月31日得到印度政府正式批准，此前该型导弹一直处于秘密研制中，其射程将达3500～5000公里，可使中国的大城市全部处于印度核火力覆盖之下。该项研制计划的披露，表明了印度推进战略威慑体系现代化的决心。

“烈火”导弹同样可以运载核与常规两种战斗部。在研制实战用核弹头方面，印度已研制出可供“烈火”系列导弹使用的各种弹头，包括核弹头。其目前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已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构成一定的核威慑。

研制中的还有射程在5000公里以上的“太阳神”（Surya）洲际弹道导弹。据美国《国防新闻》报道，“太阳神”，是由“烈火”系列导弹衍生而来的，采用固体—液体混合燃料技术。随着GSLV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在2001年4月18日发送卫星成功，“太阳神”洲际导弹的发射已经提上日程。第一枚“太阳神”（也称“烈火—IV”型）准备在2002年1月进行试射，其射程超过5000公里。“太阳神”导弹的试验还包括对采用“低温发动技术”的单级液体燃料导弹的试验，希望在这项技术上尽快赶上美国、俄罗斯、法国、中国和日本。鉴于印度核弹头小型化的技术已基本过关，制导技术也日趋成熟，再加上已拥有数台俄制低温火箭发动机，国际军事专家认为，印度不久就将拥有洲际导弹，具备全球核打击能力。到2003年，印度还将开始试验更大射程的“太阳神—II”式导弹，射程可达1.2～2万公里，一旦加载核弹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将处于印度的核导弹的射程内。

2．飞机

印度空军将装备更多的中远程运输机、战斗机和预警机，装备

空中加油机，更新电子战装备，使空军成为核威慑战略的主要力量。印度从俄、法等国引进了数量可观的战斗机，主要有米格—27、苏—27、苏—30、幻影—2000H、“美洲虎”等第三代战机，2000年又增购10架“幻影—2000H”型战斗机。在经过精心改装之后，它们都具备运载核武器的能力。这些飞机作战半径有限，从诸如新德里以北200公里处哈里亚纳邦境内的安巴拉等空军基地起飞，携带1000公斤重的核武器，作战范围可覆盖巴基斯坦全境。

苏—30MKI型战斗机将是印度空军未来主要的核武器远距离投射工具。这是一种双座多用途歼击机，是在对苏—30K加以改进的基础上制造的，它的基本性能被认为超过了美国空军的F—15E。2000年10月，印俄两国达成协议，印度可以凭借俄罗斯的许可证，在17年内生产140架该型机。印度将是第一个获得这种飞机的国家。

印度还向俄租购图—22M3远程轰炸机，与俄谈判希望采购30架图—26“逆火”轰炸机，以增强其战略打击能力。这种轰炸机曾因在2001年2月俄罗斯举行的战略军事演习中神秘穿过日本上空而轰动一时。而幻影—2000和图—22将作为本世纪初印度空基核力量的主力。

3．核潜艇

目前印度还没有自己的战略核潜艇，但印度当局非常重视发展核潜艇，认为核潜艇是实施第二次核打击的最安全有效的工具，把发展导弹核潜艇作为印军核战略发展的重要方向。早在1977年，印度就组成了建造核潜艇工程队，进行核潜艇反应堆的设计。1988年，印度曾从苏联租借过一艘核潜艇。根据一项代号“75号工程”的计划，印度准备在2010年前后使5艘同型核潜艇加入印度海军现役，真正形成“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印度正在研究租借俄罗斯核动力潜艇的可能性，以用来支持

发展其“先进技术舰艇”（ATV）计划，即核潜艇研制计划，该计划是印度实施三位一体核威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印度海军希望通过租借俄罗斯的潜艇，继续保持印度海军在“查克拉”级核潜艇上训练的要求。早在1988年1月，印度就从苏联租借了一艘名为“查克拉”号的核潜艇，租期为3年。1991年1月租借期满后，该潜艇按期归还。几乎与此同时，印度制定了一套系统的核潜艇研制规划，由印度原子能部、国防研究发展机构和印度海军共同实施。近几年来，印度政府每年都拔出充足的经费，用于核潜艇的研制。军方决策部门甚至认为，在武器装备的发展顺序上，核潜艇的研制应排在新型航空母舰之前。

印度于2000年8月开始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开工建造第1艘核潜艇，计划在3～5年内建成投入使用。另外，印度也一直在努力自行研制核潜艇，核潜艇的艇体建造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之中。

研制中的潜射导弹包括“萨加里卡”（意为“海洋”）导弹和海军用“大地”（也称“丹努什”）导弹。“萨加里卡”导弹是印度在俄罗斯帮助下自行研制的第一种潜射导弹，目前已进入成熟期，准备在2001年9月进行首次试射，其设计飞行距离为322～5000公里，计划装备在2005年前后服役的印度国产核潜艇上。印海军专家称，“萨加里卡”并不是西方所说的弹道导弹，而是一种潜射巡航导弹，俄罗斯提供了火箭发动机和技术帮助。印度海军已经完成了试射“丹努什”弹道导弹的准备工作。“丹努什”导弹长9米，是在印度陆军射程为150公里的“大地”SS—150地对地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该导弹的发射重量为4吨，弹头重500公斤，理论射程为250公里。这两种导弹都能装载核弹头。

印度防务专家认为，发展海基核力量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但相对地不易遭受攻击，因此对其需求不可避免。若使核力量在第一次打击后得以生存下来，就要确保核武库中至少有50%～60%是

潜射导弹。在核潜艇服役后，印度将具备水下隐蔽作战能力，在实战中可以避开对方第一次打击，从而能对对方实施核反击。因此，核潜艇浮出水面之时，应是印度“三位一体”核威慑力量成军之日。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一个庞大的核发展计划，为此，印度将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印度人均年收入不到400美元的情况下，国家将为此背上沉重的包袱。

## 打击与防护并重——对核战争的准备

2001年5月2日至14日，邻近巴基斯坦的大漠深处。印度在这里举行了13年来规模最大的、代号为“全胜行动”的军事演习，演习中最引人关注的则是演练如何应付核战争，重点是核战术演练。假设的战役情景包括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袭击。根据演习方案，携有核武器的“敌方”战机向印度扑来，印军战斗机紧急起飞实施拦截，结果“敌方”大部分战机被击落，但仍有少数核战机成功突破印空军防线，击中了印军的一些目标，污染了食品和水源。此时，印军战机必须能够穿越辐射污染区，并确保飞行员安然无恙。印军飞行员在演习过程中接受了拦截敌机以及在发生核袭击的情况下如何反应的训练。

印度的核选择主要是针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它认为，不能完全排除目前的中国政府依仗核威胁在将来进攻印度的可能性。而对巴基斯坦的估计是，为了达到民族的利益，巴完全可能凭一时冲动对印度实际施用核武器，印度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反击巴基斯坦的核威胁，同时应付中国的核威胁或者以核威胁为后盾的常规部队入侵。因此，印军重点准备打高技术常规战争，但不排除核战争，必须做好对可能发生的核战争的准备。印度陆军总参谋长帕德马纳班在2001年1月公开宣称，由于印军“受到核武器袭击的

威胁将始终存在”，印军必须“在理论、战术和计划上”做好核战争准备。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在加紧核武器研制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打赢核战争的各项准备。印度进行核战争准备的举措主要有：

建设防核基础设施，提高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帕德马纳班称，全国各地的防核生化武器的培训机构正在加紧训练，而为最终确定印军对可能遭受的核打击的应对措施所作的大量策划工作也在进行之中。印军还在建立能抵御核打击的特殊结构的掩体，并在2010年之前建立一套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提出要制定防御性措施，保护重要核设施与人员的安全，将民防措施与国家整体核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

改革作战指挥体制，提高核打击能力。为改善战略打击力量的指挥，提高武器系统的效率和快速反应能力，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所长贾斯吉特·辛格提出成立“战略空军司令部”，负责指挥战术、战略侦察以及包括轰炸航空兵部队、装备“烈火”式和“大地”式弹道导弹的导弹部队等在内的打击力量，此项建议已得到军界首脑的支持。

改善武器装备，提高在核生化环境下的战斗力。印军近年来注意改善对机械化部队、快速反应部队和野战部队的武器装备，旨在提高其在核生化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战斗力。印军新装备的坦克、装甲输送车和军舰都具有密闭防核生化的能力。并在2010年之前建立一套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

加强各种训练，提高部队“三防”能力和核报复能力。《印度步兵杂志》提出，要“组织和训练一支能在核战与化学战的条件下进行作战的专业队伍”，并以他们为骨干组成分队配属野战部队，协

助部队开展“三防”训练。空军也十分注意在核生化条件下的空战演练。各军事院校还开设了三防课程。有关准备在敌方核武器构成威胁条件下的作战问题，还明确写进了印军《作战纲要》中《山地战斗》、《居民地战斗》以及《机动防御》等训练教材中。

印军在训练和演习中也增加了核条件下的作战课目，以提高核条件下的自我保存能力，适应核条件下的战场环境，提高综合作战能力。2001年5月印军在西部拉贾斯坦邦的塔尔沙漠举行的代号为“全胜”的演习，就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由地面部队、炮兵部队、战斗机和特种部队共同参加，通过模拟战，训练军队应付包括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袭击在内的未来战场的情况。

印度防务专家认为，在未来战争中遏制使用核生化武器威胁的惟一可靠途径是拥有核报复能力。他们还提出制定一旦巴基斯坦首次秘密或直接使用核武器，印度将采取的报复计划。有人还主张，空军应建立“反核袭击部队”，将其部署在孟买—印多尔—巴雷利这条假设主线的以东地区，意图是当巴基斯坦发动核袭击时，为赢得装配核武器的时间，集结一支能阻滞巴军的反突击部队。外电曾报道，印军就此进行了核武器轰炸程序演习、装备一定数量的机载原子武器、将新研制的核弹头装配于战役战术导弹等。

战术研究也是核战争准备的一项重要内容。帕德马纳班提出，一旦遭受核打击，陆军将运用“广为分散战术”，使其能够在一个相对易穿透的战区，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迅速出击打击敌人。在几乎可以确定会出现的无线电通讯中断的情况下，营长、旅长和小型特种部队必须有效行使其职能以完成预定的目标。他说：“和其他任何战争一样，核战争不容许优柔寡断。”这位陆军总参谋长还特别强调后勤支援的重要性。他说，后勤支援必须跟上，必须在广阔的地区建立起后勤保障体系，从而为常规部队完成任务提供“足够的持续作战的能力”。

# 第七章　印度洋是“印度之洋”？

## ——印度的海洋战略

控制印度洋，做“海权国”，是印度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为了弥合“安全圈”上的“海洋缺口”，印度运用“文”、“武”两手“遏制威胁”，向广阔的海洋空间推进，把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远洋海军作为实现其海洋战略目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印度海军又开始把战略触角伸向南中国海。

2001年2月17日，古吉拉特邦大地震余波未消，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舰队检阅活动已在印度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孟买如期拉开帷幕。印度借庆祝印度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机承办了这次活动，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南非等19个国家派出120余艘海军舰艇前来捧场。作为东道主的印度海军精选了55艘舰艇，与19个国家的海军舰艇一起参加检阅。印度总统纳拉亚南、总理瓦杰帕伊和各国海军嘉宾出席了开幕式。为期5天的国际海军检阅式，向世界展示了印度目前不断壮大的海上力量和强劲的发展势头，引起了世界众多军事专家的关注。

## 追求“海权国”——印度长期的海洋战略目标

印度是一个世界性的滨海大国，海岸线长达6100余公里，在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分布着1175个大小岛屿，其中有的远离印度本土达1500余公里。在印度洋沿岸的40多个国家中，印度国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地理位置最好，它依赖和利用印度洋的历史也最悠久，既有过因掌握海上霸权使国家强盛的美好时期，也有过因忽视海防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痛苦经历。印度洋这种地理战略环境，注定了印度的战略利益与印度洋休戚相关。控制印度洋，做“海权国”，是印度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

古代的印度曾经作为海上强国称霸过印度洋。后来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加之保持大陆传统的中亚穆斯林长期统治印度期间，忽视了对海洋的经略，尤其在16世纪以前，外部势力基本上过西北方向的陆路入侵印度次大陆，致使传统的防卫只注重西北陆地而轻视海防。以致到了近代，被远在另一大洋彼岸的大不列颠帝国从海上轰开了大门。印度以莫卧儿王朝的覆灭为代价，屈服于欧洲海洋强国的殖民征服。历史的教训是惨重的。

在英国统治印度的鼎盛时期，英国的势力范围西到霍尔木兹海峡，东到马六甲海峡。英国完全掌握了进出印度洋的战略咽喉要地，尤其将新加坡建成在当时具有先进水平的海港以后，印度洋的控制权就牢牢地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中了。印度洋与太平洋和大西洋情况不同，它的辽阔洋面上岛屿较少，因此对进出印度洋要道的控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能够控制印度洋的咽喉要道只有两个，即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当这两处战略要地在英国掌握之中时，有谁还能问鼎印度洋呢？印度洋控制权的确立，为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几经征战，从东

南亚到西亚，包括南亚次大陆在内的各国，基本上都被英国囊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英国皇家海军的旗帜在印度洋上飘扬，印度洋实际上成了大英帝国的内湖。

印度独立初期，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对印度洋的局势很少关心。他们当时致力于把英国人从次大陆赶走，并在本国土地上获得政治上的自由。独立以后，他们继承了英国过去所面临的防务问题，而且主要采取了和英国同样的防务战略。他们的注意力，同英国一样集中在陆上，而不在海洋边境上。主要的防务问题是在次大陆内部，即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不论是尼赫鲁或其他杰出的印度政治领袖，对印度洋都不甚关心，他们有其他的当务之急。他们认为，对印度洋局势的特别关注其实并无必要，英国人势力还在，印度洋是控制在朋友的手中，印度的海上安全无须多虑。当然，他们也没有力量来争夺这个控制权，即使他们有这种意图的话。基于这些认识，在印度独立后的20年里，印度对印度洋的防务一直没有投入多大注意力。20世纪50年代中叶，由印度世界事务理事会组织的一个研究小组曾讨论过印度洋的防务和安全问题，并在1957年提出了一份简略的报告，但显然这份报告并未引起重视。印度的防务计划很少涉及到海洋的防卫。印度海军在陆海空三军中是最被忽视的，尽管印度海军占有局部的优势，并且是沿海国家中最强大的。

K·M·潘尼迦是试图克服印度防务计划中忽视海洋因素的一位杰出的印度人。潘尼迦甚至在印度独立之前曾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谈到印度洋的战略问题，以及印度洋对印度未来的重要性。潘尼迦在《印度和印度洋》一书中明确提出：“印度海上战略的长期目标应该是成为海权国，足以独立地在安危攸关的海上捍卫本国的利益，而执牛耳于印度洋地区”。除他以外，几乎没有一个稍具影响的人对印度洋的重要性曾予以多大重视。可能出于反对当时

对印度洋颇为流行的漠视态度，潘尼迦在试图唤起人们对印度洋的注意力时，又往往过分强调了海洋问题的重要性。例如他提出：“印度的未来毫无疑问将由海上决定。它是与印度洋上的发展分不开的。……印度洋对其他国家仅是重要海洋区域之一，而对印度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海洋。”潘尼迦断言“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潘尼迦对印度洋与印度的发展和国家安全关系的论述，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印度与印度洋沿岸的不论哪一个国家都称不上有真正的密切关系。它与次大陆最大的邻国巴基斯坦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有时导致武装的敌对行动。由于对斯里兰卡的印度裔侨民处理问题，它与斯里兰卡的关系也搞得很复杂。印度的兴趣在于同中东诸国发展友好关系，在于防止巴基斯坦挑拨这些国家和印度疏远，在于不受限制地通达波斯湾石油资源，并使用苏伊士运河作为商品进出的通道。1956年至1957年苏伊士运河的停止航行，以及在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的再度关闭，都给印度经济带来了大为不利的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起，印度洋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出于经济上的困难和战略上的困境，被迫从印度洋地区撤军，逐步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几乎全部的海外军事基地，使印度洋地区一时出现了“力量真空”，也使印度的海上安全出现了空白。但随后，美、苏海军舰队进入印度洋，把超级大国间的紧张争夺和角逐引向了南亚，“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的角逐，以及集中于印度洋周边地区的尖锐复杂的冷战和争斗，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印度国防部1985～1986年度报告对印度洋的形势这样写道：“不幸的是，70年代以来，印度洋已成为反映大国敌对关系紧张的舞台。由于超级大国加倍在印度洋的存在，他们干预印度洋

沿岸国家事务的能力剧增，人们可以想见国际紧张的主要场所是在印度洋沿岸的非洲之角的南非、西南亚和东南亚。由于印度半岛的地理位置及其最近的历史进程，印度不能不关注其邻近地区的这些发展。”这一时期，靠着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印度的军事实力得到大幅度增强，特别是通过肢解巴基斯坦和吞并锡金，印度最终确立了在南亚战略格局中的“支配地位”。在陆上的后顾之忧基本消除后，印度便把战略重点从邻国、从南亚转向南部浩瀚的印度洋，开始实施其军事战略的下一个重要步骤——控制海洋。印度抓住时机，在夺取和巩固其次大陆战略支配地位的同时，着手发展海上力量，以谋求在印度洋沿岸的海上优势。

战略重点由陆地向海洋的转变，激发了印度防务界对印度洋问题的广泛探讨。印度的防务专家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有认为印度的地理特点决定了“历史的悲剧不能再重演，海洋这个曾使印度沦为殖民地的工具，应成为今日使印度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助产婆”的“历史论”者；有念念不忘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关于“不论谁控制了印度洋，它就控制了亚洲，21世纪世界的命运将在印度洋上见分晓”的预言的“海权论”者；也有认为人类大陆资源日益枯竭，海上资源将成为人类争夺的新领域，“今后对印度的长期威胁都将来自海上”的“威胁论”者。综观印度当局的政策规定和防务界的学术研讨，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战略在整个军事战略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南下印度洋，控制印度洋，继而走向亚洲并成为世界强国，已成为印度人设计的“必由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防务专家提出，国家安全的形式已由公开化转为隐蔽的海上争夺，只有使本国成为强大的海权国家，才能使自己在经济和国防上最迅速地发展起来。为了填补印度洋的真空，实现“印度人的印度洋”，印度全面推行“印度洋控制战略”，重点发展远洋进攻力量。拉吉夫·甘地总理曾经直言不讳地

说，印度应在控制五大海峡的基础上，继而“控制从地中海到太平洋之间广大地区的形势”。此后，印度加紧实施“南进”的部署方针，在对印度洋邻近国家海域形成有效控制后继续“东扩”、“西出”和“南下”，将其影响和活动范围向印度洋以外海域延伸，企图把印度洋变成印度的“内湖”。

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开始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经济成为各国的重点。海洋在印度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印度认为，从经济发展上看，未来世界将日益转向海洋寻求原料和资源，21世纪的印度洋将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重点。

首先，国际法已允许各国开发其附近海域的资源，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多的战略资源，为保卫国土提供更大的防御纵深。印度拥有印度洋地区最长的海上边界线和最大的经济专属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经获得了200多万平方公里蕴藏多种自然资源的专属经济区、12个大型港口、200多个中小型港口以及数百个大小岛屿。印度沿海的石油储藏量估计为11亿吨，地处阿拉伯海的孟买浅海油田储有22吨，其他海洋资源更是亟待开发。

其次，在世界自由市场经济下，各国经济不断加大的相互依赖性及各种能源的进出口，也要求确保海上航线的安全。印度95%的对外贸易途经海上，约50%的石油与80%的天然气来自近海，许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商品要从印度洋上进出口。这些都使得保卫近海安全和海洋资源在国家整体安全中的比重大大增加。印度只有进一步提高海洋战略的地位，建立一支强大的“远洋型海军”，奠定向海洋发展的牢固基础，将来才有可能建成海上强国。

与此同时，印度认为，它面临的“海上威胁日益严重”。随着海洋地位的日益提高，印度将不得不去面对和应付世界上各大国为维护其自身利益在该地区部署的海上军事力量。

美军并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从印度洋撤离，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比过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军设在迪戈加西亚岛上的军事基地正日益成为美军在印度洋的“心脏”，成为美国控制中东、西亚及印度洋地区局势的前沿基地。今天的迪戈加西亚岛经多年修建，已成为一个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的大型综合军事基地，并建有岛屿防御中心、战略空军指挥中心和反潜作战指挥中心等设施。该基地距印度陆地的最南端科摩林角大约1800公里，它控制着自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到非洲达累斯萨拉姆的航道，也是从好望角到新加坡几条航线的汇合点。美国控制印度洋地区的企图，与印度一直坚持把外部军事力量从印度洋排挤出去的主张正面相撞，使印度的安全和利益受到某种挑战。

此外，巴基斯坦试图通过从英、法等国引进各型先进舰艇和武器装备，修建瓜达尔大型海军基地等措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以图在战时封锁、攻击印度沿海或海上的重要经济、军事目标，切断印度的海上运输线；“中国日益强大的海军正从印度的东、西两翼进入印度洋”；日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也在觊觎印度洋上的利益，将来也有可能与印度在海上发生利益冲突。

印度认为，未来印度与周边或区外国家发生的战事将不再局限于陆地边界，很有可能发展到海上。只有具备远洋作战能力，才能保卫“海上疆域”，并为保卫国土提供更大的防御纵深，也才能防止区外大国染指印度洋。

鉴于印度洋地区新出现的这些因素，印度提出，要做世界军事大国，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印度的海军力量除了要确保印度半岛周边海域的自由、漫长的海岸线不被侵犯外，还要能够慑止其他国家违反国际规范，保卫通向远海通道安全，保卫印度的经济专属区不被别国开发。

根据印度洋当前的战略态势、印度在印度洋的战略利益及印

度海军现有的实力水平，印度提出在印度洋奉行一项“既维护印度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又保卫印度本国安全的双向战略”。其实质是以“维和”为名求扩张之实，以“安全”为名行称霸之为。按照印度防务专家的解释，所谓“地区稳定”，就是要排除外来军事力量，建立以印度洋为核心的印度洋和平区；推行不结盟政策，消除外国在本地区的军事设施；促进以印度为主体的地区合作，加强印度同本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实际上，印度是要通过“维护地区稳定”、“支援友好国家”和充当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国际警察”，来确保印度在北印度洋对中小国家的支配地位。所谓“保卫自身安全”，就是要维护印度的领土完整，保卫本土和远海岛屿免受“来自海上和空中的攻击”；确保印度的“独立与安全”，包括采取措施使大国“不敢冒犯印度的重大利益，慑止超级大国对印度洋地区事务的干涉”；保卫印度的海上经济资源和权益；平时“牵制”巴基斯坦在海上的发展，战时“封锁它的港口并攻击它的商船”。

以海洋取向的防务政策来补充陆地取向的防务政策，从而使印度成为一个西从苏伊士运河，东到新加坡之间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走海上强国之路。这就是印度21 世纪为之奋斗的国家战略目际，也是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建立“印度中心”的关键性步骤。目前，印度正在努力把印度洋这个昔日曾使其沦为殖民地的“征服工具”变为来日使印度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强的“助产婆”。印度将不遗余力地以此为目标、为标准，增强国力与军力；而随着国力与军力的提高，随着战略环境的变化，印度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

## 战略方针——文武并举

鉴于海洋对印度战略安全和利益至关重要，为了弥合“安全

圈”上的“海洋缺口”，保障海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也为了在与地区强国的海洋角逐中建立有利的海洋“阵地”及海洋战略态势，印度在海洋威慑战略中推行“文武并举”的战略方针，运用“文”、“武”两手“遏制威胁”，向广阔的海洋空间推进。这就是：“外交必须以军事为后盾，军事必须以外交为补充”，通过文武并举的方针，最终确保印度未来的海上利益得到保护和发展。

1.“文”——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加强印度在沿岸国家中的地位

印度一直主张“采取政治主动”，发展与沿岸国家的新型关系，在印度洋地区营造一个对印度更为有利的战略环境，以保障其在该地区战略利益的顺利实现。为此，印度加强在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外交活动，寻求理解和支持，加强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增强在东南亚、中东乃至非洲等地区的影响力，谋求印度在该地区的安全主导地位，维护其重要的战略利益。在“不结盟”的旗帜下，印度积极倡导“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印度洋和平区”、“和平与裁军”，力图扮演作为第三世界特别是印度洋沿岸国利益代表者的角色，一方面阻挡“外部大国势力卷入”印度洋地区，同时在有利情势下，以“热点”调停者面貌出现，抬高自己的国际声望。

在印度的新海军战略中，已经把从西面的阿拉伯海到远隔千里的南中国海全部纳入了它的“势力范围”。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起，印度更加积极主动地接近和拉拢这一带的海上国家，在外交上同时向东、西两个方向出击，确立了以东盟国家为目标的“东顾外交”和以西亚、中亚及海湾国家为目标的“西进外交”路线。

在东面，对包括东盟在内的东方海上诸国，印度采取积极联合战略，企图通过拉拢这些潜在盟国，维护海洋权益，发展经贸关系，增加外交筹码，提高国际地位，开通印度进入太平洋地区的捷径和门户，为将其势力进一步延伸到太平洋地区，以及更多地参与亚洲

及国际事务奠定基础。这种以加强经济和军事合作为背景的“东顾外交”，使印度与东盟的关系获得稳步发展。2000年10月，印度海军进入南中国海与越南、新加坡等国举行联合演习，表明印度的“东顾”政策取得重要突破。需要指出的是，东盟的扩大及印度与其发展关系，都包含所谓共同对付中国“威胁”的战略图谋。印度通过介入南海地区事务，推动其“东扩”计划，企图在太平洋方向上获得一个新的战略支撑点。

在西面，印度向中东两面出击。尽管直到1992年印度和以色列才正式建交，但两国关系一直相当亲密，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从1992年的1.92亿美元猛增到1999～2000年的10亿美元，以色列同时成为印度军事装备的第二大供货商，仅次于俄罗斯。2000年以来，印度外交向伊斯兰世界发动全面攻势，几乎是西起北非的马格里布，东至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印度对伊斯兰国家的外交活动空前频繁，成果显著。印度外交部长贾斯万特·辛格在首次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大谈两国必须合作，中东的安全和南亚的安全密不可分。伊拉克已经恢复了同印度的高层接触。在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一直是印度在该地区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土耳其和印度在打击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活动中展开了合作。伊朗则是印度从非阿拉伯国家进口石油的最重要的来源，两国关系在近期发展迅速。“西进外交”使印度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印度在西部海域的战略地位。

总之，印度既抓住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不放，又在极力争取加入东盟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努力赢得伊斯兰国家的好感，还与南非等国家一起致力于印度洋经济圈的建立。印度与澳大利亚的双边防务合作也在新世纪初得到恢复和加强。通过与印度洋及附近海域国家的广泛接触，有力地配合了以武力控制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举动。

2．“武”——提高海军实力，实行海洋控制和海上威慑

在政治、外交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印度加快了军事介入印度洋的步伐。印度一方面大力加强海军力量，建立和巩固对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绝对优势；另一方面谋求发展海洋威慑手段，遏阻企图染指印度洋的区外大国势力。印度制定了为期25年（1990年至2015年）的海军持久现代化计划，发展海洋威慑手段，提高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印度海军被赋予海洋控制和海上威慑双重战略任务。其中，海洋控制针对的是印度洋地区的中小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海上威慑针对的是区外大国，主要是美国海军。

首先，针对印度洋地区的中小国家实行海洋控制。

1988年2月30日，印度前总理拉·甘地在海军C级核潜艇命名仪式上说：“印度要不惜一切保卫自己。如果我们要把印度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就必须完全控制我国周边的海域”，“印度的防务需要我们对通往印度的海上通道进行无可争议的控制。”印度前海军参谋长S·N·科利海军上将在《海权与海洋》一书中写道：“印度海军成功的关键在于对海洋的控制能力”。关于海洋控制的实质，印度防务专家提出，就是“一方面剥夺敌人使用海洋的机会，另一方面维护自己使用海洋的权利”。为了完成对印度洋的海洋控制任务，印度防务专家以印度为核心，把印度洋划分为“完全控制区”、“中等控制区”和“软控制区”，并据此向印度海军提出了以下不同的战略任务：

一是确保印度本土、沿海岛屿专属经济区以及近海的安全。印度防务专家把上述区域划为“完全控制区”，即“内层防区”，其范围为专属经济区以外300海里以内的海域。在东部包括整个孟加拉湾，在西部和南部包括阿拉伯海和沿海岸线600海里以内的印度洋海域。为取得对内层防区的制海权，要求印度的海上力量（包括印度近海海军部队、岸基航空兵和海岸警卫队）遂行“海上拒止”

任务，在敌人来犯之前就能先行攻击敌目标。其主要手段是岸基反舰导弹、岸基飞机、空中预警机、载有反潜反舰系统的海上中程巡逻机、舰载巡航导弹、轻型护卫舰、护卫艇、巡逻舰、导弹艇、扫雷艇、海岸潜艇以及由海上作战室提供的C3I系统和电子战支援系统等。为加强近海防卫能力，印度不断加强海岸警卫队的现代化，扩充其实力，使之在将来能接替海军承担更多的近海防卫任务。在这个“完全控制区”内，印度海军制海的主要对象之一是巴基斯坦，即在战时“封锁它的港口并攻击它的商船”，切断巴的海上通道。

二是有针对性地取得对远海的控制。印度防务专家把内层防区以外300～600海里的海域划为“中等控制区”，即“外层防区”。该区由远洋舰队防守，其任务是：保卫印度的远海岛屿、海上通道、商船队，对广大海域进行“中等控制和监视”。遇有突发事件，“能遂行海上力量投送任务”，充当海上国际警察和早期预警将进入内层防区的敌人；战时则要取得控制5个印度洋通道的能力。使用手段有航母特遣大队（包括航母、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潜艇（包括核潜艇）、海上远程侦察与反潜飞机以及其他各种远洋专业舰只。为了加强对远海的控制能力，印度重点加强了远洋海军的实力，包括增加航母、核潜艇、新式常规潜艇、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远洋扫雷舰和远洋反潜侦察机等远程攻击型武器装备，并加强对沿岸主要海军基地，尤其是对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上的布莱尔港海空基地的现代化建设。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对控制孟加拉湾和马六甲海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支撑着印度海军内外层两个战略区域，在印度国防战略的棋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加强对阿拉伯海的控制，印度海军还耗资16亿美元，在西海岸加尔瓦尔建造大型现代化海军基地。此外，为了加强海上

投送力量，印度成立了两栖作战旅和海上特种部队。在这个“中等控制区”，印度海军的一个“优先战略任务”是保卫它的对外贸易，特别是战略商品——石油通道。

三是向远洋实施“软控制”，伺机向印度洋以外海域发展。印度防务专家把印度半岛7000公里以外的其余部分划为“软控制区”。随着印度海军增加了能够横跨印度洋的核潜艇和图—124远洋反潜侦察机，印度防务专家认为，有必要“把海军实力真正扩展到从海湾到好望角的广大海域”，以为印度远洋商船护航，并为21世纪驶出印度洋进入世界海域成为世界级远洋海军预做准备。为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海军与外国海军互访次数激增，范围空前扩大。印度海军的远洋军舰不仅访问印度洋沿岸国家（包括波斯湾、红海、非洲东海岸和东南亚国家），其新建国产“戈达瓦里”级数艘导弹护卫舰还周游全球，航迹遍及三大洋（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四大洲（非洲、亚洲、欧洲、美洲）各国，以熟悉世界海域，并扩大印度海军的影响。

当前印度海军已具备对印度洋“内层防区”的控制能力；正在大力发展对“外层防区”的控制能力；积极准备对“软控制区”的控制能力。

其次，针对区外大国海军实行海洋威慑。

印度前海军参谋长S·N·科利提出：“综观海军平时的职责，我们发现其主要任务是威慑。从印度海军方面来说，威慑并不意味着具有攻击超级大国的能力，而是具有影响印度洋冲突的可能结果的能力……”他的继任泰希利亚尼海军上将也说：“不能期望印度海军战胜超级大国施加的压力，但可以使他们的干涉付出更高的代价，威慑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此。”印度实行海洋威慑，就是要遏阻区外大国进入印度洋和染指印度洋地区事务，最终达到挤走区外大国海军、独霸印度洋的目的。在1988年2月4日印度从苏联

租得第一批5艘C级核潜艇中的第一艘后，印度前海军参谋长A·K·恰特吉对记者说：“核潜艇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有了核力量，美国要进行干涉就要三思而行了。”这说明，印度海军实行海上威慑主要是针对企图染指印度洋事务的区外大国，特别是在印度洋驻有军事力量的美国，防止在未来同巴基斯坦发生冲突时，重演1971年美国海军企业号航母进入孟加拉湾之类的事件。目前印度海军担负的任务中，还有一条日渐明朗和突出，那便是慑止所谓中国“突入印度洋”。

印度海军正在不断提高遏制、威慑和打击能力，不断加强国际间海军领域的合作，掌握包括中国海军在内的外军海洋作战思想的变化，并准备在印、中发生陆上武装对峙时，试图通过海洋威慑对中国实施牵制。这些均已成为印度对华军事战略调整的重点。

## 战略举措——建设现代化的远洋海军

印度认为，“海军是力量的象征，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国，就必须拥有一支世界一流的海军”。印度还认识到，要真正达到控制印度洋这一战略目标，惟有实行远洋战略，因为印度沿海并没有太多的岛屿屏障，6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又很难处处设防，惟一的办法是把敌人挡在远距印度之外。为此，印度把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远洋海军作为实现其海洋战略目标的主要途径。长期以来，印度坚定不移地执行“控制印度洋”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印度海军也确立了相应的“沿海防御——区域控制——远洋进攻”的发展思路，提出发展一支大型远洋舰队，逐步实现从“区域性威慑和控制”向“远洋进攻”的战略转移。

目前，印度海军舰艇数量及总吨位已进入世界前十强，并成为

印度洋周边地区最强大的海上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以维护从阿拉伯海到南中国海广大范围内的战略利益为借口，大力发展包括航空母舰和核动力潜艇在内的海上军事力量，使其海上作战能力大为增强。目前，印度的海军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七位。按照印度海军的规划，到2010年前后，印度海军将新增数十艘各种舰艇和船只，海上作战力量将由包括3艘航母在内的20余艘较先进的大、中型作战舰艇组成，其海军总兵力将达到10万余人。为了进一步提高海军的水上、水下和空中三维空间立体作战能力，保障远洋作战能力，印军在海军建设中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1．大力扩充大中型水面舰艇，增强远洋作战能力

首先，要打造亚洲最大的航母舰队。

在印度南部城市科钦的一个造船基地，制造航空母舰的基础设施筹建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印度政府为此已投入了 450 万美元的资金。一旦设计工作完成且资金全部到位后，有关人员将立即开始建造航空母舰。按计划，这艘印度自行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完工大约需要7年时间，总耗资将达3亿美元左右。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说，建造航空母舰的目的在于扩大印度海军的活动范围和加强印度的空中防卫能力。

印度海军对航母可谓情有独钟，视其为远洋作战能力和海上威慑力量的主要象征，计划为其东部、西部舰队和远东海军司令部各配备一个航母战斗群。航空母舰是现代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也是世界各国海军实力的重要标志。航空母舰的主要作用是夺取制海权、控制海上交通线，航母上的舰载机则可以有效地控制海上制空权、对敌方水面舰艇或是岸上目标实施突击。对于印度海军来说，发展航母的意义更为突出，因为印度地处南亚次大陆，国土三面环海，其海上力量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印度一直在致力于发展本国的航母舰队。1957年，印度从英国购买了“维克兰特”号轻型航母，成为亚洲最先拥有航母的国家。该航母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成功地执行了海上封锁任务，共击沉、俘获巴商船43艘，充分展示了航母在海战中的重要作用，也进一步坚定了印度海军发展航母的信心。80年代后期，印度当局确立了“大国海洋战略”，航母舰队在其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1986年，印度从英国海军手中购买了退役航母“竞技神”号，将其改名为“维拉特”号，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装。这艘航母曾在英、阿马岛战争中大出风头，其排水量为2.9万吨，装备有8架“海鹞”式战斗机和8架“海王”反潜直升机。至此印度海军已经拥有了包括两艘航母在内的相当强大的海上力量。

1997年，航母“维克兰特”号退役，印度海军仅剩下一艘航母，使其维护日益膨胀的海上霸权明显感到了力不从心。印度海军认为，要控制住印度的东西部海域——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湾，必须拥有两艘航母，同时还要有第三艘航母能够及时出动到其他“利益攸关”的海域，所以印度海军计划打造三支航母编队。为此，印度海军采取了三大举措：

一是改造一艘。印度投资5500万美元对“维拉特”号航母加以维修，改装先进的雷达、防空和预警系统，延长其服役寿命。由于“维拉特”号航母已经超期服役，印度海军从1999年开始对它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维修和改装。在孟买和科钦军港进行的改装工程中，技术人员为“维拉特”号更换的钢材达到500吨重，还安装了以色列的“巴拉克”舰防系统，使该舰如虎添翼。据悉，经过改装，“维拉特”的寿命将延长到2010年。目前该舰已经重新加入战斗序列。

二是自建一艘。印度政府1998年7月就同意由科钦造船有

限公司承建航母。印度科钦造船有限公司目前还只能建造2万吨级的轻型航母，载12～15架直升机，船体造价约3亿美元，预计将在7年内完工。该舰将是印度的第一艘国产航母。

三是引进一艘。印度早就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2000年5月，印度海军同俄罗斯达成了大笔的武器订购合同，其中最重要的项目就是俄罗斯同意向印度转让退役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空母舰。“戈尔什科夫”号是“基辅”级的四号舰，满载排水量4.45万吨，全长273米，最大宽度50米，吃水深度10米，飞行甲板189×20.7米，航速29节，续航力7000海里（18节）。尽管是“白捡”的，但这艘巨舰已破旧，印度要先花上3亿美元大修费，改装费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并再掏12亿美元购买60架米格—29K舰载战斗机（舰上搭载30架米格—29K和6架直升机，另有30架进行轮替），前后至少也要向俄方交上约18亿美元。印度不惜耗巨资改造“戈尔什科夫”号航母，就是试图获得其海上的军事优势，谋求在印度洋乃至太平洋及其他海域的支配地位。

这样，数年后印度将同时有3艘航母在印度洋上游弋。一旦这个雄心勃勃的海上扩军计划得以实现，印度海军就将拥有3个航母战斗群，从数量上跻身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航母大国，海上作战能力也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其次，要扩充大中型水面舰艇。

印度造船业已经比较成熟，能自行建造驱逐舰和护卫舰等大型水面主战舰艇。1997年，印度自行建造的“德里”级导弹驱逐舰首舰下水。该舰排水量6700吨，配备了印度国产预警雷达，主要武器系统包括4部SS—N—22反舰导弹发射架和6具反潜鱼雷发射管及1门77毫米舰炮，搭载2架英国产的“海王”式直升机。“德里”号现在印度海军东部舰队中服役，2000年曾访问过中国上海。

为把海军建成一支“世界一流的远洋作战力量”，增强战略威慑能力，印度把从国外订购或自行建造大中型先进水面舰艇作为其海军建设的重点。1997年初，印度海军即从以色列订购了2艘总价值1000万美元的“德沃拉”多功能巡逻舰，舰上装备了先进武器和侦察系统，可遂行沿海侦察、监视、海空协同、搜索营救及截击入侵高速舰只等任务。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印度还将在以色列的帮助下于近期建造2艘该型舰艇。同年10月下旬，印度政府还批准了从俄罗斯购买2艘潜艇、3艘现代化护卫舰的计划。同时，印度海军在20世纪90年代末装备数艘国产现代化水面舰艇的基础上，将再建造并装备2艘导弹驱逐舰、2艘护卫舰、1艘训练舰和1艘油轮。

2．重点发展常规潜艇和核潜艇，建设强大的水下作战力量

为增强远洋作战力量，除发展航母战斗群外，印度海军也在重点发展水下作战力量。几次印巴战争的经历，使印度当局深切地认识到核潜艇在海战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一艘巴基斯坦潜艇秘密潜入印度港口，险些击中“维克兰特”号航母。也是在这次战争中，美国的“企业”号航母编队部署在印度洋对印度进行威慑，而印度海军却对其无能为力。这两次教训使印度认识到，只有核潜艇才能对付航母。

印度海军现拥有17艘常规潜艇，包括3艘陈旧的F级、10艘“基洛”级及4艘从德国引进和组装的209型。据悉，印度计划在2007年前斥巨资11亿美元，从俄购买2艘“基洛”级和1艘第四代的“阿穆尔”级潜艇，再自行建造12艘仿209型、12艘“基洛”级和2艘“阿穆尔”级潜艇，同时对现役仿209型艇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并为现役潜艇加装更先进的武器系统。目前，印度政府已批准马扎冈造船厂建造2艘常规潜艇，并决定在今后二三年内拨款40亿卢比（约9300万美元）对5家国有造船厂进行现代化技术改造。

2000年7月中旬，印度海军参谋长库马尔上将访问俄罗斯，从圣彼得堡造船厂接收了第10艘“基洛”级潜艇。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常规动力潜艇，其静音性能无与伦比，水下攻击力很强。同时，该艇还配备了可从鱼雷管发射的“俱乐部”反舰巡航导弹，其战斗部威力450公斤，最大射程300公里，可用于攻击海上和陆上目标，据说甚至可以攻击航母。这是俄首次对外出口这种先进导弹。另据印度海军一位资深官员透露，印度海军将为10艘“基洛”级潜艇购置300枚这种导弹。2001年5月，五号艇“辛杜拉特纳”号返抵俄船厂改装9M45E1反舰导弹和91RE1反潜导弹（均属“俱乐部”导弹系列），此前已有3艘潜艇完成了这种改装。

印度海军一直梦想拥有核潜艇，致力于建立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核武器发射系统，完善核打击力量。印度前海军司令曾指出，当前的核威慑在陆海空军种中应优先依靠海基核威慑，这对一个声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来说是惟一的出路。印度已把加强潜艇特别是核潜艇部队建设置于核计划的优先位置，加快发展潜射核运载工具，进行以核潜艇为核心的海上核力量的建设。

目前，印度已初步具备自行建造核潜艇的能力，正在借助外国技术援助快马加鞭。印度海军在孟买开工建造的第一艘国产核潜艇将于2004年前后建成，这是印度为建立一支“强大的蓝水海军”而实施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这项代号“75号工程”的建造计划准备在2010年前后使5艘同类型核潜艇加入海军现役，届时印度将成为世界上第6个拥有陆海空“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国家。

根据目前公布的材料，“75号工程”核潜艇造得并不大，全长73.8米，宽9.9米，高6.6米，水面排水量2300吨，水下排水量2850吨，比法国制造的世界上最小的红宝石级核潜艇大不了多少，显示出印度设计师们较为保守的倾向。“75号工程”核潜艇的

壳体用24～27毫米的高强度钢板焊接而成，焊接处加厚到30～35毫米，最大潜深达400米，据说即使一枚普通的324毫米鱼雷直接命中也不碍事。为加强静音效果，“ 75号工程 ”核潜艇采用短粗的水滴型艇形，以减少水中航行阻力，降低与水摩擦声音；外壳还嵌满规格为16平方厘米的方形塑胶消音瓦，并用反声纳橡胶涂层将艇体包装起来，以吸收潜艇自身噪音，防止敌主动声纳的探测，甚至把核反应堆安装在软垫上工作。通过这些措施，印度核武器专家卡拉姆夸口说，“ 75号工程 ”很可能是未来“ 印度洋海底的黑洞 ”。“ 75号工程 ”的动力源为1个功率90兆瓦的核反应堆，外加两台辅助发电机，水上最高航速16节，水下最高航速20节，续航力42天，最大航程14万公里。

“ 75号工程 ”核潜艇究竟将配备何种导弹，是人们最关心的焦点，现在印度核潜艇存在着三种选择：要么配备一种新型“ 萨加里卡 ”（SAGARIKA）潜射巡航导弹，它名义上是印度自行研制，实际上许多技术，尤其是惯性导航系统，印度根本无力自制。俄罗斯已为印度巡航导弹提供技术援助，主要是涡喷和制导技术。目前该导弹已处于全尺寸试验的最后阶段，该型导弹可攻击300公里远的目标，未来射程可以进一步延伸，攻击范围可达1000公里。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曾透露印度成功地研制大地型近程弹道导弹的海军型——射程320公里的弩弓式导弹，但它的体积实在是太大了，“ 75号工程 ”能否消受得了，没有人可以打保票。再有就是俄罗斯极力推荐的3T54Y1“ 俱乐部 ”型潜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达300公里，战斗部威力450公斤，俄方的军火广告称其“ 甚至攻击航母都不在话下 ”。印度新买的“ 基洛 ”636型柴电潜艇就配备了该型导弹，“ 75号工程 ”也许会步其后尘。

印度研制核潜艇的目的，就是对付所谓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传统对手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在该地区活动的核大国，包括曾经在

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对印度进行海上威慑的美国。印度海军的战略就是，封锁敌方海军在印度6000多公里海岸线和200多万平方公里排他性水域活动的能力。印度许多战略学家认为，配备远程导弹的核潜艇将使印度海军具备这种海上封锁能力，大大增加敌方海军战略和战术行动的复杂性，一旦作战，可以避开对方第一次打击，从容地对对方进行核反击作战，使印度具备第二次核打击能力。

3．加强海军航空兵建设，提高海空立体作战能力

印度海军还加强了航空兵的建设，努力提高侦察、反潜等方面的作战能力。印度计划逐步淘汰现装备的英制“海王”MK—42D直升机及俄制图—142M远程侦察机和伊尔—38反潜机，向英国、俄罗斯等国家采购较先进的作战飞机和机载设备，其中包括图—142M型远程反潜侦察机、“海鹞”垂直／短距起降飞机、新型“海王”直升机及预警系统、空对舰导弹的超视距制导系统等，引进俄制卡—31型舰载海上远程无线电侦察机、卡—50与卡—52型武装直升机和美制P—3C“猎户座”反潜机等作战性能更为先进的飞机。

印度也一直在努力自行研制生产各型舰载飞机。它在ALH轻型直升机基础上研制的可遂行预警、反潜及海上攻击等任务的先进轻型舰载直升机，已于1998年初完成了在“维克兰特”号航母和较小舰艇上的试飞工作。据称，印度陆、海军计划装备200架该型飞机。印度自行研制的陆、海、空三军通用的“尼尚特”无人驾驶飞行器也取得突破性进展。该型飞行器载有先进的电子传感器，可昼夜进行空中侦察和监视，并通过自动化数据网向指挥官提供及时、准确的战场信息。同时，印度还正在LCA先进轻型战斗机的基础上研制了一种可在航母上起降的TD—2型战斗机。此外，印海军还计划对其现装备的21架“海鹞”式舰载机进行现代化改装。

除重点发展以航母为主的舰载航空兵外，印度还在大力加强岸基航空兵建设。印度海军航空兵现有各型飞机200余架，计划再引进90余架，包括60架米格—29K舰载机、6架图—22M3型战略轰炸机、4架卡—31预警直升机、6架卡—28反潜直升机和6架图—142H海上巡逻反潜机及配套的空舰导弹等，以强化海空立体作战能力。

4．加速建设远洋舰队的支援基地，提高远洋作战的保障与维修能力

2000年4月14日，印度海军首艘国产补给舰“布拉马普特拉”号服役，在此之前，已有3艘油船服役，印度海军远洋补给作战能力大大加强。印度海军知道，尽管眼下海军兵力达6万余人，装备各型舰船180余艘、作战飞机150余架，在印度洋36个国家中首屈一指，但其远洋保障能力严重不足。所以，印度海军决定除继续加强两个主基地（孟买和维沙卡帕特南）的现代化建设外，还将扩建科钦和布莱尔港基地，以减轻主基地的负担，满足海军远洋纵深作战的需要。

此外，印度海军还在逐步提高反潜、海上侦察及空海攻击能力；组建精干的海军陆战特种部队；大力扩充海岸警卫队；建立一支由多种功能的船只组成的海上后勤补给船队；成立海洋勘测船队；等等。通过这些综合措施，保障远洋海军的安全航行和国家对海底资源的开发。

## 进军南中国海——海上扩张的新尝试

1999年4月14日，印度最新的战舰“布拉马普特拉”号正式下水。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亲自赶来为这艘战舰主持下水礼，这位善于以“强调国家利益”、“联系人民生活”的煽动性言辞打动

人心的军界“狂人”，这次也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一通高谈阔论。他向海军官兵们公布了他的新海军战略构想，宣称印度将调整与它“有利害关系”的海上活动区域，而这些“有利害关系”的地区将从阿拉伯海北部扩大到南中国海海域，从阿拉伯海到南中国海都有它的战略利益。他的这番话明显地反映出，目前印度正在迫不及待地推行其面向东方、进军南中国海的“东进”战略。

南中国海是进出印度洋的门户，是连接印度洋、太平洋航线的要冲，其海底石油等海洋资源早就吸引了众多国家的广泛关注，而环南中国海周边地带又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实施海上“东扩”，向南中国海及太平洋地区延伸活动范围和扩大影响，是印度海军近年来一个较为明显的战略动向。印度认为，其东部诸邻国，包括隔海相望国，都国力弱小，无法对印度构成威胁，社会制度的相似性又使它们成为印度的潜在盟国，故而应该采取联合战略。印度实施“东进”战略的目的有三个：一是通过与这些国家的联合，解决后顾之忧，避免陷入东、西两线对敌的境地，以集中精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和对付西线的巴基斯坦。二是通过与这些国家的联合，达到牵制、遏制中国的目的。印度认为，这些国家大多与中国有过不愉快的历史，现在又对中国有疑虑，且有些国家同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执，与它们联合既可从侧面牵制中国，也可阻止中国对印度的霸权行径进行干预。三是借助同它们的联合，为印度在将来突入亚太地区提供战略立足点。南中国海一带的国家处于印度进入太平洋的前哨，一旦与日本、东盟及大洋洲国家联合，可为其实现向太平洋渗透的长远目标奠定地缘战略基础。

为扩大海上霸权，印度海军在不断加强舰艇装备建设的同时，还积极向海外拓展势力，提出所谓的“东方海洋战略”。

1998年4月17日，印度宣布在南中国海附近的安达曼海建立远东舰队；1999年1月，印度宣布在南安达曼岛的布莱尔港建立

远东海军司令部，使其成为印度海军的第三个作战中枢；2001年8月，印度宣布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建立印军历史上第一个跨军种的“联合防御司令部”。据报道，印度政府已经要求其空军必须在安达曼群岛上建立一个设施完备的机场，并具备从岛上机场起降作战飞机的能力。这不仅能赋予印度空军前所未有的覆盖半径和威慑能力，更为印度空军在印度洋和周边地区进行侦察飞行提供了一个理想据点。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印军要在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航道充当“门神”的角色，形成潜在的战略威慑能力，同时用以保证更有效地向太平洋地区拓展势力。该群岛地处马六甲海峡西部出口，与印度次大陆主体隔海相望，在战略上与次大陆主体形成环抱孟加拉湾之势。2000年4月14日，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公开宣称南中国海是印度的“利益所系地区”，再次反映了印度海军战略的新动向。这些征候表明：印度海军已不满足于只在印度洋上游弋，而是越过马六甲海峡，把目光投向了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的南中国海，旨在保留和扩大它在马六甲海峡的影响和存在，进而将它的战略触角延伸到太平洋。这既是其“南进”印度洋战略的必然之举，也是其“东扩”之所需。为了实现扩张计划，印度海军舰队不断出入于南中国海地区，加强与该海域周边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合作，制定和实施向海外部署部队的计划，在南中国海与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等东盟国家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甚至举行单方面军事演习。自美国海军力量从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前苏联海军大批舰艇从越南金兰湾撤走之后，印度海军自感其实力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独占鳌头，因而加强了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其意在充分显示海军的强大实力，对其他国家起威慑作用，从而确定在该地区的霸主地位。

1998年10月，印度派出了以最新型的“德里”号驱逐舰为旗舰的特混舰队，由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访问了新加

坡、越南等国家，并于11月参加了韩国举行的“98国际海军展”。这是印度海军新型导弹驱逐舰首次驶向南中国海，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2000年，印度海军采取了更大的动作。9月，印度海军派出4个舰艇编队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活动，其中导弹驱逐舰“德里”号和导弹护卫舰“科拉”号对中国和日本进行了访问；导弹驱逐舰“拉吉普特”号对印尼和越南进行了访问；导弹护卫舰“库塔”号和油船“阿迪蒂亚”号对韩国进行了访问；“基洛”级潜艇“辛杜维”号对新加坡进行了访问。印度派出如此大规模的舰艇编队到南海及西太平洋地区活动尚属首次。10月，一支由5艘战舰、1艘潜艇以及若干补给舰船组成的印度海军特混舰队，浩浩荡荡开赴太平洋，前往南中国海进行所谓的“远航训练”。10月和11月，印度海军分别与韩国、越南等在南中国海举行了双边军事演习。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对此评论道：“进入南中国海是一个大胆举措。印度正在走出它的势力范围，到新的地区进行尝试。”印度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从阿拉伯海北部扩展到南中国海海域，这种咄咄逼人的行径不仅对南中国海的国际航运和沿岸国家构成了威胁，而且打破了这一海域海军力量的平衡，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近年来，印度还与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军事强国结成安全纽带或战略伙伴，与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加强军事合作，这些都明显具有针对中国的一面。特别是印度在与美国、日本和越南的安全合作与军事交往中，明显表现出要“联手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这是值得中国警惕的。2000年4月17，印度与越南签订了15项合作协议。越南已经同意印度在越建立远程通讯及情报收集机构，双方共享情报成果。同时，两国决定加强建造海军舰艇的合作，将定期在南中国海举行海防巡逻、岛屿后勤补给及反海盗演习。印度将提供训练越南海军军官的资讯及其

软件。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还准备向越南新生的军工企业提供技术。

为保障远洋扩张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印度海军正在坚持不懈地取得深海经验，获取有用的情报。为了搜集海洋情报与资料，印度不惜动用紧缺的硬通货订购数艘海洋考察船、地球物理支援船、大地构造支援船。

可以想见，一旦印度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把海军活动范围从阿拉伯海北部扩大到南中国海，这将不仅改变该地区海军力量的对比，还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的动荡。目前，中国已是石油纯进口国，印度海上力量的不断壮大，首先将会对中国海上石油供应线构成较大威胁。对此，应当予以足够的关注。

# 第八章　扩张与冒险

## ——印度推行军事战略的实践

印度崇尚武力在实现军事战略目标过程中的作用。在建立地区霸权的战略实践过程中，印度与巴基斯坦屡次兵戎相见，把中国当做最大的潜在威胁和主要作战对象，控制周边弱小邻国，排斥区外势力，企图独霸印度洋，最终实现它的世界大国梦。

印度军事战略所固有的扩张性和威慑性，决定了印度历届统治者崇尚武力在实现军事战略目标过程中的作用。印度独立后，在推行军事战略的实践中，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采取政治高压、经济拉拢的政策，推行强权政治，以谋求在南亚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确立在南亚的支配地位为近期目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为其最终目标。

### 不共戴天的“孪生兄弟”——印巴在对抗中成长

1947年《蒙巴顿方案》的实施使南亚次大陆上出现了两个新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由于这里过去的“主人”——英国人在“分家”时有意留下一份“家产”没有归属，两“兄弟”在自立后不

久便反目成仇了。这份“家产”便是查谟和克什米尔。作为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印巴两国本应通过谈判加以解决，但由于两国都不仅坚持自己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而且坚持该地区不容分割和独立，克什米尔问题便成为长期困扰印巴关系的“死结”。印度首先还对巴基斯坦的“另立门户”强烈不满，先后两次企图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1971年11月印度在苏联策动和支持下，再次发动侵巴战争，肢解了巴基斯坦，解除了它在南亚次大陆的后顾之忧。但两国民族、宗教间的积怨日深，两国关系在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改善。

1.“印巴分治”种下祸根

英国史学家戴维·唐宁说：“在印度次大陆，由撤离的英国人做出的分治决定仍然是令人苦恼的争端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走向衰落，在印度各民族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压力下，不得不答应印度人民的独立要求。但英国殖民者不甘于在印度次大陆的失败，在撤离时更加变本加厉地利用宗教矛盾挑起大规模的教派仇杀事件。1947年2月22日，英国政府发表了所谓的新政策，就印度自治问题开始与印度各党派进行谈判。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英国殖民者竭力在印度各民族、各教派、各党派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裂。

同年3月24日，蒙巴顿出任印度最后一任总督，他在6月3日发表了被英国政府称之为“印度独立法”的新宣言，通常称为“蒙巴顿方案”。该方案按“宗教特点”把印度分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将穆斯林占多数的信德省、西北边境省、俾路支省的全部以及孟加拉、旁遮普、阿萨姆等三个省的一部分划为巴基斯坦，余为印度，而各土邦可自愿加入其中一方或仍与英国保持旧关系，但不给予自治领的地位和权利。这个方案的公布实施，实际上便将印度分割成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巴基斯坦国，包括东、西巴基

斯坦，有人口7000万；二是印度联邦，包括英属印度的其余部分，有人口2.25亿；三是王公土邦，共有562个之多，占印度总面积的2/5，有人口8100万。

当时，印度国大党力主全印统一，而穆斯林联盟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国家。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独立问题上采取“分而治之”的分裂政策，致使穆斯林联盟同国大党的矛盾加剧，之后则在英属印度的广大范围内发生了教民的大迁徙和教派大仇杀。据统计，仅在旁遮普的分治中死于教派仇杀者就达50多万人，无家可归者竟达1200万人。圣雄甘地便是死于调和印、穆教派仇杀的关头，印、巴分治后宗教仇杀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仅在1947年八九月间由巴基斯坦逃往印度和由印度逃往巴基斯坦的难民就达数百万人。印巴分治就在这血流成河的宗教仇杀中完成，它所造成的巨大阴影此后始终笼罩着印巴之间的关系，给两国民族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心理创伤。

尽管印巴分治是按宗教特点进行的，但并未使印度在分治后形成清一色的印度教，同样也没有使巴基斯坦成为纯粹的穆斯林国家。至今印度国内仍有占总人口11%的穆斯林教徒，而巴基斯坦也还有占总人口1.6%的印度教徒。这就必然形成跨国界的宗教和民族矛盾，这些矛盾又往往会波及对方国家的相同教派的民族，从而上升为国家关系问题。而对立的双方只要利用这种矛盾插手对方内部事务，就必然会进一步恶化已存在的宗教和民族矛盾，导致国家间的进一步敌对。这种恶性循环造成了印巴两国之间和本国内部宗教、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积怨日深，是导致印巴关系长期紧张的根本原因之一。

印巴分治还使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统治者建立“大印度联邦”的设想受到重大打击。尼赫鲁曾对巴基斯坦的建立十分痛心，他认为印巴终将会有合并的一天。印度的印度教徒更是公开宣

称，要为分治时所受到的损害“报仇雪耻”，要取消分治。

在制止印度境内一些王公土邦的独立企图方面，尼赫鲁政府也采取了坚定的不妥协的立场。“分治”前后，在英国官员的暗中支持和鼓励下，许多较大的土邦纷纷企图借此机会宣布独立。例如，面积相当于法国、人口约1600万的大土邦海德拉巴便在印度独立前宣布独立，其他土邦也欲效仿，印度面临四分五裂的严重局面。为此，尼赫鲁对内拒绝任何土邦的独立，对外他发出严正警告：“我愿意让世界各国知道，我们不承认印度境内土邦的独立，而任何国家承认这种‘独立’将被视为对印度不友好的行动。”随即，尼赫鲁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将这些土邦并入印度。1948年9月，尼赫鲁派出两个师的军队，开进了海得拉巴，粉碎了这个印度最大的土邦的独立企图。

在处理土邦问题上，令印度政府最为棘手的便是如何处理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因为查谟—克什米尔位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对两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克什米尔原是印度西北部的一个王公土邦，在地理位置上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接壤，包括查谟和克什米尔两个部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该地区在1846年第一次锡克战争后落入英国手里。当时英国无意自己去占领，而宁愿把克什米尔树立起来作为“北部边境的守护者，以避免因并吞它而树敌、花费金钱和增加责任”。当时的印度总督认为，谁企图吞并克什米尔，就应当“受到惩罚，而不是封官晋爵”。因此，英国开始在克什米尔当地扶持傀儡，进而制造了查谟—克什米尔邦，把印度教的统治者强加在穆斯林人头上。英国人的初衷是给这个地区制造矛盾和内斗，以便对其分而治之。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在次大陆的英国权力的两个继承者之间撒下了激烈争吵的种子。

克什米尔地区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印巴分治时人口约500

万，其中78%是穆斯林，20%为印度教徒，其余为锡克教徒和佛教徒。按“蒙巴顿方案”的原则，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应划归巴基斯坦，但分治中又规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既可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任何一国，也可宣布独立。巴基斯坦认为，克什米尔居民大多数是穆斯林，它应该加入巴基斯坦；而印度则认为，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并不反对印度，宗教信仰并不妨碍克什米尔加入印度，而且当时的克什米尔王公有意归顺于印度。巴基斯坦总理阿里·汗提出：“克什米尔就像是巴基斯坦头上的一顶帽子。如果我们允许印度取走我们头上的这顶帽子，那就会永远受印度的摆布。”印度总理尼赫鲁则说：“没有克什米尔，印度就不会在中亚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对于尼赫鲁来说，将克什米尔并入印度，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而且还包含一份他个人的感情。他的祖辈曾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他的新婚蜜月曾在这里度过，他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曾多次来到这里休养度假。他以最美好的言词赞美这片故土，“它宛若一位天姿国色的女郎……以淙淙涓涓的流水、幽静的山谷、涟漪荡漾的湖泊和婆娑多姿的绿树，把自己梳妆打扮得分外妖娆”。因此，当克什米尔出现不利于印度的变化后，尼赫鲁一反平素惯有的沉着冷静，显得十分暴躁冲动。他告诉蒙巴顿：“克什米尔的名字铭刻在我的心灵上。”

印巴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造成了日后的多次兵戎相见，至今仍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2．第一次印巴战争

印巴分治仅2个月后，1947年10月下旬至1949年7月，双方便围绕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爆发了长达一年多的战争，史称第一次印巴战争。

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分治，从而结束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但独立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印度与巴基

斯坦便在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矛盾。对于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印巴两国本应依照国际惯例，通过谈判加以解决。但印度由于本来就对巴基斯坦的建立强烈不满，对巴态度强硬，企图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1947年10月30日，印度通过该土邦王宣布克什米尔归属印度，这就挑起了事端，拉开了第一次印巴战争的帷幕。

1947年10月27日，印度以武装的帕坦部落从巴基斯坦进入克什米尔为由，在查谟—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实施空降，开始向巴基斯坦部队发动进攻。印军参战兵力约为4万余人，占有明显优势，先后占领了克什米尔谷地以及南部和西部一些较大的城镇。年底，由于天气寒冷，大雪封山，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印军停止了进攻。随后，双方展开了政治外交斗争。1948年初，印巴两国均以对方派军队进入克什米尔地区为理由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动议。联合国进行了干预，要求印巴双方首先停火，然后撤出外来军队，举行公民投票。而印度反对撤军，并于1948年4月间再次发动攻势，先后又攻占克什米尔谷地西部的一些城镇，直逼巴基斯坦边境。面对不利态势，巴基斯坦又派出部队于5月初进入克什米尔，并向印军实施了反击，巴军参战兵力达5万余人，逐步控制了克什米尔北部喀喇昆仑山脉一带。接着，双方又在斯利那加西南73公里的蓬奇展开了激战，战争不断升级。为此，联合国安理会派出联合国印巴委员会调查和调停印巴争端。该委员会于1948年6月15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8月间，通过了停火、非军事化和公民投票等分三阶段解决克什米尔纠纷的决议。对此，印巴双方都表示接受。1949年1月，双方根据联合国决议实现停火，同年7月27日在卡拉奇签订了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定，划定了克什米尔临时停火线，并得到双方政府的批准。协定规定：停火线南起马纳瓦尔，北至开伦，然后由开伦向东至冰冻地区。印度控制了克什米尔

地区约占3/5的土地和约400万的人口，巴基斯坦控制了约占2/5的土地和约100万的人口。

通过这场战争，印度虽然没有达到夺取克什米尔全部领土的预定战略目标，但控制了克什米尔的大部分地区和人口，控制了对巴基斯坦农田灌溉具有重大意义的杰纳布河、拉维河的上游，在战略上已经占了便宜。但即便如此，印度至今仍有人认为，尼赫鲁政府当时不该过早地把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因为“军事将领们认为，他们有能力在一两周内拿下现在称为阿扎德·克什米尔（注：指巴占克什米尔）这块地方，可以把巴基斯坦军队赶回国际边界那边去”。这种说法一方面暴露了印度一心将整个克什米尔据为己有的打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印度在独立初期正面临国内重建经济、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急迫需要而力不从心的客观实际。

3．第二次印巴战争

中印边境战争结束还不到三年，1965年8月24日至9月23日，印度再次为克什米尔问题与巴基斯坦交战，史称第二次印巴战争。这次战争没有分出胜负，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调停下结束的。

1949年第一次印巴战争结束后，印巴两国曾就克什米尔问题多次举行谈判，由于双方态度都很强硬，未能得到解决。印巴双方在边境地区都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克什米尔地区的局势也随之而保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相对平静。1953年8月20日发表了两国总理联合公报，宣布将举行公民投票以解决克什米尔的争议问题。但是，印巴双方在停火线附近地区重兵对峙，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1961年7月后，印度总理尼赫鲁多次宣称整个克什米尔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拒绝与巴重开谈判。同年7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在访美回国后，也强硬表示“克什米尔得不到解决，巴基斯坦绝不会罢休”。1964年5月，巴基斯坦政府重申了自己的立场，

同时谴责印度在印巴边境大量集结军队，并要求英联邦出面调解。而印度政府拒绝由英联邦调解，并于同年12月正式宣布克什米尔为印度的一个邦。这期间，印巴双方都一面宣称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一面争相扩军备战，战争的阴云一直笼罩在南亚次大陆的上空。

1965年8月5日，克什米尔印占区的穆斯林居民为了反抗印占克什米尔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宗教迫害，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并获得了巴基斯坦的支持。巴方明确表示：“ 我们正在做的只不过是我们始终坚持不渝要做的事，那就是支持克什米尔人民行使其自治权。 ”

为了镇压穆斯林的武装起义，印度政府派出了大批的军警部队。8月6日，印军在克什米尔地区动用的部队已达6个师之多。从8月9日到9月16日止，印军共打死打伤穆斯林战士5000多人，已完全控制了印占克什米尔的局势。然而印军却没有就此罢休。1965年8月24日，印军开始越过印巴停火线，对巴占克什米尔地区的帖斯瓦和乌里以南地区发起进攻，首先攻占了巴基斯坦3个边防哨所。

巴军对此早有准备。为了抵御印军可能对巴发动的突然袭击，巴军自8月初就已开始向印巴停火线附近大量集结兵力，并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9月1日，巴军开始实施代号为“ 大满贯行动 ”的对印反击作战。9月2日，巴陆军第7师在攻占了原为印方控制的查木布后，渡过狭窄的塔维河，并在河的东岸建立了桥头堡。9月5日，巴军攻取了乔里安后，继续向阿克努挺进。到此为止，巴军已经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夺取了印占克什米尔约2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对阿克努以南和查谟地区的印军形成了钳形攻击的态势。

面对这种不利的局面，印军大举增兵克什米尔地区，于9月6

日开始向巴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第二次印巴战争全面爆发。

当时，印军的作战企图是：以拉合尔为主攻方向，以锡亚尔科特和卡苏尔为助攻方向，分三路发动进攻，以分散巴军兵力，力求一举夺占拉合尔，从而将巴占克什米尔地区分割开来。然而在实际作战当中，印军不但没有造成巴军兵力的分散，自己的兵力反倒分散开来，使总体上的优势变成了局部的劣势，因而一直没有实现其最初的企图。

在拉合尔方向，印军共动用了2个师的兵力，而巴军只有1个师的兵力。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在空军的有力支援下，巴地面部队经过4天的激战，终于击退了印军的进攻。

印军在拉合尔方向受挫以后，加强了在锡亚尔科特的攻势，企图以此牵制查谟方向的巴军，尔后进逼瓦处巴德，威胁拉瓦尔品第。9月12日，印军以2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的兵力开始发动进攻，但在巴军1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的顽强抗击下，印军进展十分缓慢。9月14日以后，印军的进攻基本陷入了停滞状态。

在卡苏尔方向，印军于6日开始发动进攻以后，7日就被巴军击溃。随后，巴军乘胜追击，并于8日夺占了印方的克姆卡兰。此后，双方战线呈现出胶着状态。

交战持续到9月下旬，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谁也无法在战场上取得绝对的优势，战争已经陷入了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印巴决定接受国际社会的调停，于9月23日签订了停火协议。第二次印巴战争至此告一段落。翌年1月，印巴政府又签订了《塔什干协定》，巴基斯坦承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不使用武力而是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互不干涉内政的义务”，双方将各自的军队撤回到1965年8月5日前的位置。

从印巴双方的参战兵力来看，印军的地面部队约为巴军的一倍，而印巴空军兵力对比则为4:1。其中，印陆军共动用了6个步

兵师和1个装甲师，总数约为15万人；巴陆军则投入了3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总人数约为8万。虽然巴军在人数上居于明显的劣势，但巴军依靠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天之骄子——空军，却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战绩。在战争中，巴空军不仅击落了数十架印空军的作战飞机，还为巴军的地面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并对印度后方的重要城镇、交通线和空军基地进行了猛烈轰炸，大大削弱了印军的作战能力，打击了印军的士气，在巴基斯坦军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次印巴战争基本上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印巴两国关于克什米尔地区的争端，两次诉诸武力，但矛盾并未解决，而“分治”遗留下来的边界划分、教派及飞地等问题的矛盾时而激化，时而缓和，一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印度的战略家们认为，当时印度的夏斯特里政府“决定跨过国界，占据巴基斯坦的某些重要地区是非常实用和及时的”，使印度“具有在谈判桌上的优势”，确保了印度在战争之后将军事上的优势应用于政治和外交方面，这是政府在战略决策和指导方面的成功之处；它的缺陷是，由于政府“不了解战争中空间与时间是可以互换的”，下达诸如“决不丢失一寸国土”的命令，“致使印军无法充分发挥其威力”，这不能不说是政府在政治目标上的过失。

4．第三次印巴战争

1971年11月21日至12月16日，印度政府利用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动乱局势，在苏联的支持下，向巴基斯坦发动了全面进攻。经过短短27天的激战，印度不仅将东巴分裂出去，而且侵占了西巴基斯坦信德省及萨克尔的3600平方公里的领土，取得了巨大胜利。

印巴分治以后，特别是经过两次战争，双方积怨日深。东、西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使印度感到腹背受敌。因此，印度一直蓄意

肢解巴基斯坦。1971年3月，以穆吉布·拉赫曼为代表的东巴新兴资产阶级掀起反对西巴统治的分裂自治运动，给印度实现肢解巴基斯坦的企图带来了绝好时机。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下令在东巴平叛后，印度便鼓动一些人进行反巴活动，并积极策划和加紧对巴基斯坦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其主要做法：一是制造侵巴舆论，公开支持东巴的分裂活动。二是大量增兵印巴边境，加紧战前的军事部署，频繁举行以入侵东巴为背景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断扩大对东巴的武装挑衅活动。三是在国际上，积极寻求靠山。1971年8月，印度同苏联签订了带有明显军事同盟性质的《印苏友好合作条约》。在苏联策动和支持下，印度经过长期准备，于1971年11月悍然发动了侵巴战争。

这次战争是在东巴和西巴两个方向先后展开的。印军决定采取东攻西守、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力求一举夺占东巴基斯坦。印军在东巴战线集中了3个军部、7个师部、36个旅的兵力，在强大空、海军的配合下，分东、西、北三路于11月21日开始向东巴进攻。从12月2日开始，印度出动空军飞机连续袭击达卡等城镇和重要军事设施，并派兵切断了东、西巴基斯坦的海上交通，封锁了东巴所有港口。印军为加速进攻，采取了避实击虚、多路迂回的战术。12月8日，东路印军已进抵梅格纳河东岸；西路印军在7日攻占杰索尔要塞后，其先头部队于9日进抵恒河西岸重要渡口高隆多；北路印军也越过兰格普尔、迪纳杰普尔等城市迅速南下，12月11日动用直升机与运输机将印步59旅和步95旅以及独立伞兵50旅之一部空运、空降至坦盖尔、纳西格迪地区，以配合其主力向达卡发动进攻。15日，印军从四面突破达卡外围防线，对东巴守军形成包围。16日，东巴守军被迫投降。印巴在东巴地区攻防作战，历时27天，以巴守军的失败告终。

在西巴方向，印军主要是为配合入侵东巴实施钳制西巴的行

动。印军以其优势的空军力量对西巴发动空袭，同巴空军进行空战。从12月4日开始，印度空军每天出动飞机200余架次，有时多达500架次，不断对西巴的军事设施和重要城镇实施轰炸。印度海军舰艇也连续炮击卡拉奇港口。12月11日，印步36师和步54师向萨克加尔发起进攻，步11师和步12师进攻西巴信德省。印巴在印、西巴边境重兵相峙，互有攻守，各有得失，巴失地更多一些。随着东巴战场的巴军宣布投降，印军认为入侵行动已经得手，便于12月17日宣布，在西巴边界实行“单方面停火”，巴方接受印度的停火建议，历时14天的印、西巴作战行动结束。

在这次战争中，印军共伤亡1.1万余人，包括失踪的2238人，损失坦克81辆、飞机42架、舰艇1艘。巴军损失飞机35架、舰艇8艘，伤亡及投降的军、警共达8.9万人之多。战争最终以巴军失败而结束。1972年7月，印巴签署了《西姆拉协定》，双方同意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尊重1971年双方停火后形成的实际控制线。此后，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不断发生小规模冲突，这种冲突每年约100余起，使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第三次印巴战争的结果，给印度带来了较丰厚的战略果实。印度得以肢解和削弱巴基斯坦，解除了东、西两线受敌的不利地位，在巴基斯坦东部领土上建立了孟加拉国。同时印度占领了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32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次战争后，印度牢牢地占据了南亚次大陆的支配性地位；巴基斯坦则失去了国土面积的20%，人口的60%，它的下场莫不让南亚次大陆其他国家心惊胆寒。

5．冷战后的对立

三次印巴战争都没有解决双方固有的矛盾和遗留问题，克什米尔至今仍是印巴武装冲突的焦点地区。印度开始走上大国路线，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问题在其对外关系中已经不再占据首要

位置了，两国都分别与大国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维持着一种印苏对巴美的格局，印度与美国关系冷淡。巴基斯坦在被肢解后，其国力和军力已大不如前，很难再与印度进行一场大规模面对面的直接军事对抗，这也是至今没有爆发第四次印巴战争的一个原因。但克什米尔的居民并没有因此而过上安宁的日子。

冷战结束后，南亚地区的战略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正处在政治、经济过渡的阵痛期，减少了对南亚地区事务的参与，美国也减少了对这一地区的投入和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印巴双方在克什米尔争端、地区军备竞赛以及核武器问题上的较量却愈演愈烈。印巴两国始终存在着极其深刻的政治、宗教、民族矛盾和领土争端，积怨甚深，斗争激烈，不仅政治上相互攻击，经济上彼此封锁，而且在军事上严重对抗。

克什米尔问题对印巴两国都是不能让步的问题，既不允许被对方占领，也不同意克什米尔分裂和独立。印度认为，分裂是“插在自由印度机体上的一把刀”；巴基斯坦认为，克什米尔独立有悖于巴基斯坦成立时的口号：“巴基斯坦是印度次大陆所有穆斯林的祖国”。显然，这首先关系到各自国民的统一理念。另外，克什米尔的战略地位和水资源也是双方谁都不肯轻易放手的主要原因：

——在战略地位方面，克什米尔的一些山顶能够鸟瞰各个中亚国家，在这个焦点地区，聚集着原苏联国家、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克什米尔是东亚、西亚、北亚和南亚之间的主要关节，印巴双方都渴望保留自己在克什米尔的份额。

——在水资源方面，盘踞在喜马拉雅山中心的克什米尔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是流经该地区大部分国家的朱木拿河、喀布尔河、杰赫勒姆河和奇纳布河等许多河流的发祥地。

处于弱势的巴基斯坦在历次冲突中似乎都是处于下风。比如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本来与巴基斯坦关系密切的克什米尔，却有2/3的土地眼睁睁地归印度把持。在孟加拉问题上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新德里的怂恿和支持，巴基斯坦就不会分裂。这些往事都令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民族刻骨铭心。为此，巴基斯坦人视印度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每次战争皆是虽败犹荣。而印度人对巴基斯坦当然也缺乏好感，他们认为，巴基斯坦一直在利用克什米尔主权问题向印度挑衅，与近邻中国过从甚密也决说不上是友好之举，因为中国与印度同样存在领土争端，并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战争。

印度认为，巴基斯坦从没有停止过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动作，该地区的穆斯林民族暴乱和游击队活动受到巴基斯坦的暗中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以脱离印度为目标的恐怖活动越来越猖獗。巴方正在从台前走到幕后，以低烈度冲突和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向印度施加着强大压力。

虽然南亚已经摆脱了冷战格局，但印巴对立依旧。印巴关系虽然受过冷战格局的影响，但是主要是受与冷战无关的因素的制约。1998年的印巴核试验、1999年的拉合尔宣言和格尔吉尔冲突这三个接连发生的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1998年5月，印巴两国相继进行了核试验，使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骤然升温，南亚次大陆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之一。巴基斯坦在核军备竞赛方面与印度针锋相对，核试验和导弹武器试射都是紧随其后，使印度靠核力量慑服巴基斯坦的企图落空。印巴的核军备竞赛，加上宗教和民族冲突、领土争端久拖不决，区域合作止步不前，使整个地区的形势变得更为错综复杂。1999年10月巴基斯坦发生政变促成军人上台执政，也使印度极度不安。印度对巴基斯坦采取强硬政策，加强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军事力量和对激进分子的清剿。内政部长阿德瓦尼等要人先后对

巴基斯坦进行核讹诈，逼巴在克什米尔等问题上作出让步。克什米尔再度成了考验印巴关系的“ 烫手山芋 ”，两国对抗加剧，并在克什米尔地区再次发生武装冲突。

克什米尔这片19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始终是印巴两国的一个解不开的仇结，两国领导人经历逾半个世纪的努力，通过和谈及战争，都无法取得和解，也无法迫使对方屈服。如果要再使用战争手段，除了只会给该地区的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和痛苦之外，可以肯定的还是解不开的死结。

印巴核试验后，南亚出现新的战略平衡，同时这一地区也成为世界上最有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地区。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印巴两国领导人决定加强接触。1998年11月5日，双方官员在新德里恢复和谈。1999年1月两国开展“ 板球外交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9年2月的“ 巴士外交 ”更是着实让印巴人民兴奋和憧憬了一阵子。

1999年2月，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积怨最深的国家举行了元首峰会。耐人寻味的是，印度总理瓦杰帕伊首次乘坐跨越印巴边境的公共汽车，越过曾经多次发生流血冲突的边界地区进入巴基斯坦境内，前往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与谢里夫举行会晤，受到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热烈欢迎。两国总理紧紧拥抱在一起，瓦杰帕伊眼睛里饱含的泪水，谢里夫脸上经久不散的欣慰表情，以及欢迎人群的欢腾喜庆场面，被许多记者作为历史性镜头拍摄下来，转化为世界性的永久记忆。自1989年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伊斯兰堡以来，两国领导人已有整整10年没有互相走动。“ 老死不相往来 ”的结果是仇视升温、对抗加剧，证据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边界冲突几乎从未间断，要么是印方指责巴基斯坦边防军侵犯，要么是巴方宣称印度军队越界，伴随而来的是两国士兵的流血与牺牲。二是克什米尔主权问题表现为两国最大的冲突根

源，目前印度占领该地区的2/3，而巴基斯坦则占据1/3，僵持不下，互不相让。在这10年内，大约有1.5万人为此丧生。就在瓦杰帕伊动身前夕，还有21名印度人遇害。三是1998年以来，两国对抗忽然大幅度升级，在极短的时间内分别进行核武器试爆，令世界震惊不已。

现在，两个势不两立的国家的领导人走到一起，并且紧紧拥抱，在世人看来，庆幸之处依然多于不可思议。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敌对和拼杀，毕竟这一天来之不易，这反映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和印巴人民对和平与安宁的期待。在人类文明迅速发展的今天，确有必要摈弃依靠战争解决争端的原始观念，在崭新的理念下反思昔日某些非理性行为。也难怪两国媒体兴奋地指出，瓦杰帕伊的“ 破冰之旅 ”无论对印巴两国，还是对于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因为这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印度颇有影响力的《经济时报》，甚至把瓦杰帕伊和谢里夫的高峰会，与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以色列之行以及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与尼克松总统握手相提并论。前者使中东和平首次出现一线曙光，后者使东西方两个长期对抗的巨人走到一起。

在两天的峰会上，双方讨论了两国之间所有的分歧和争端，包括曾把两国卷进两场战争中去的克什米尔领土纠纷和1998年5月两国展开的核爆炸竞赛等非常棘手的问题。两国领导人决心建立互信，为南亚次大陆的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两国领导人都主张放弃战争，声称“ 战争不能消除双方的对立 ”。据共同签署的《拉合尔声明》显示，两国达成的协议有多项，比如降低彼此导弹误射的可能性，避免有人擅自使用核武器、建立类似西方国家之间的首脑热线联系机制、讨论克什米尔争端等等，可以说已超过人们的预期。显然，这次“ 巴士峰会 ”是印巴两国领导人务实精神和勇于面对现实的一次表现，因为敢于打破坚冰，走向对话，本身就是一大

进步。人们有理由希望这种务实精神能在今后的两国关系中不断地发扬光大，特别是在处理两国复杂的领土争执过程中不断地表现出来。

然而，人们的良好期盼只持续了两三个月。4月份印巴两国的导弹竞相试射就给初见晴朗的南亚上空罩上了一层阴云，5月份克什米尔控制线附近的隆隆炮声，则再次打碎了该地区人民的和平美梦。

克什米尔地区被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割成两个部分，双方控制区之间的边界线长达1300公里。仅仅过了3个月，印巴“巴士外交”的信誓旦旦还言犹在耳，在这里就被格尔吉尔的战火和硝烟淹没了。冲突来得很突然。但如果人们从巴士峰会期间的喜庆中注意到这样一些事件，即巴基斯坦不少伊斯兰激进分子冲击峰会所在地拉合尔，高呼“瓦杰帕伊滚回印度”、“归还克什米尔领土”等口号，而印度的右翼政党领袖在稍早以前更是主张瓦杰帕伊应该弃巴士改乘坦克——他们认为对待巴基斯坦那样的国家，只能用武器说话，那么，对后来发生的风云突变就不会感到特别震惊了。

客观地讲，两国相互敌视半个多世纪，要在一夕之间走向和解是难以想象的。对此，当时就有不少人不以为然，认为两个总理在会晤中表现得太刻意、太夸张了，是做样子、摆架式、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的成分居多。更有人说，两国根本就缺少对话基础，与其说是为了解决两国现存障碍，倒不如说是为了摆脱各自的政治困境。这些说法不无道理，印巴两国确实面临许多共同难题。首先，两个国家经济层面都十分不妙，贸易下跌、赤字巨大，各种危机纷至沓来。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现在是解决双方争端、举步向前的时候了。这个地区的发展，已远远落后于人”。其次，两国本来就一贫如洗，穷兵黩武无异于雪上加霜。它们都希望减少武装对抗，发展经济；再次，由于核武器问题，两国都面临强大的国际压

力，都遭遇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对于瓦杰帕伊来说，还多了一重难题，即反对党的压力。国大党在1998年地方选举中连连取胜，如果瓦杰帕伊不改弦更张，他所领导的脆弱的联合政府几乎可以肯定会在下次大选中败北，尤其是他的一系列施政计划都会受到挫折。他的社会保险私有化计划、拨出1/3议席由女性出任计划以及常年预算案，相继受到反对党强有力的抵制，不另辟蹊径也难以为继。与巴基斯坦和解，可以说是瓦杰帕伊的一招险棋，如进展顺利便有可能全面改观执政劣势。这也是有人对他在与谢里夫拥抱时刹那间留下的热泪究竟有多少是发自心底颇多怀疑的原因。印度官员曾说，瓦杰帕伊的巴士访问首重“接触”，而非达成协议，实际上已经为这次峰会定下了基调。

1999年4月以来，上千名伊斯兰游击队员，包括印度后来所称的主要是巴基斯坦正规军的游击队员，越过有争议的克什米尔边境，在印度一方高海拔地区建立山区军事要塞。印度指称大约400名穆斯林游击队和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分子渗透到克什米尔北部的格尔吉尔地区，控制了一些制高点，企图凭借地理优势，居高临下封锁印度在克什米尔北部由东至西的战略公路，遮断印度在星峡冰川对巴作战的战场，同时以此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推进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进程。印度为了“收复领土”，立即调集重兵，并动用重炮和百余架战斗轰炸机，竭力夺回被占领土。印军不惜动用大量的喷气式战斗机和米—17武装直升机，对格尔吉尔地区进行轰炸。巴军也动用大口径火炮和导弹等重武器装备对印作战。双方在该地区的军事冲突急剧升级。两国都没有正式向对方宣战，但均宣布处于战争戒备状态，不仅下令全军进入等级战备，而且还向各自边境一线和阿拉伯海毗邻海域大量集结部队，一度剑拔弩张，面临全面战争危险。印度向渗透者发动军事进攻，与此同

时，印巴双方重新开始在克什米尔边境用大炮互相轰击。此次战斗打破了印巴最高领导人2月在历史性的拉合尔和平会晤后印巴边境维持了3个月的宁静。由于国际社会的干预和压力，巴方于7月下旬被迫从格尔吉尔地区撤出了武装“渗透”人员，与印军缓解了冲突。

格尔吉尔冲突共持续73天，印军死伤1200余人，巴方死500余人，成为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以来的最严重军事冲突，双方几乎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的能在山区使用的所有常规武器，险些酿成第四次印巴战争。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布拉杰什·米什拉说，印度通过精心计划和密切配合打败了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游击队，“表明了我们”在一场常规冲突中的“克制和负责的态度”。冲突虽由巴方挑起，但根源却是双方克什米尔领土争议以及宗教、民族矛盾激化的必然反应，它不仅使两国总理于2月下旬在巴拉合尔达成的改善关系的协议化为泡影，而且进一步加深了本已根深蒂固的成见与矛盾。

与此同时，传闻标榜伊斯兰教、敌视美国的乌萨马·本·拉丹参与了在印控地区的解放克什米尔的武装运动。拉丹被认为是1998年发生的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同时被炸事件的幕后指使人，现隐藏在阿富汗。据说克什米尔武装团体还在阿富汗接受过战斗训练。这样，克什米尔问题就越来越具有跨地区的“扩大的南亚”的性质，已经很难把围绕克什米尔的印巴关系作为双边关系来看待了。而且，由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浪潮已经波及到现在的中亚，并牵扯到能源问题，中亚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因此克什米尔问题将变得更加纠缠不清。

格尔吉尔冲突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两件大事——巴基斯坦军事政变和印度民航飞机被劫事件，使印巴恢复和谈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两国关系陷入更大的对抗之中。

1999年10月12日，巴基斯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以谢里夫为首的民选政府。据报道，巴基斯坦这场政变一个很重要的导火索就是格尔吉尔冲突。在格尔吉尔失利后，谢里夫指责穆沙拉夫应对这场冲突负主要责任，而穆沙拉夫则认为整个行动计划是谢里夫批准的。正是他们的相互指责，导致了巴军方和政府矛盾的激化。穆沙拉夫是格尔吉尔冲突的直接策划者和指挥者，而最后不愿从格尔吉尔地区撤军的也正是穆沙拉夫，印度政府不愿意同他直接打交道，在国际上采取了孤立巴军人政权的政策，拒绝同巴对话。穆沙拉夫上台后公开宣称要向展开克什米尔“圣战”大开绿灯，也使印度态度更趋强硬。

同年12月24日，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载有180多人的客机在从加德满都飞往新德里途中遭5名恐怖分子劫持。在印度政府被迫于12月31日释放了3名极端分子后，机上人质才获救，但劫持客机的5名恐怖分子此后去向不明。印度政府声称5名劫机分子目前就在巴基斯坦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要求巴基斯坦遵照国际公约引渡这些劫机分子。瓦杰帕伊公开指责巴基斯坦政府是这起劫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并敦促美国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将巴宣布为“恐怖主义国家”。巴官方断然否认印度的说法，他们称印航客机被劫持是印度情报部门一手策划的，其目的是为了给巴脸上抹黑。巴外交部发言人还发表声明，反驳印度政府对巴参与印度客机劫持事件的指责，并重申巴政府反对包括劫机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恐怖活动。

格尔吉尔武装冲突和随后这些事件的发生，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双方的矛盾与斗争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克什米尔领土争端，二是军备竞赛。

克什米尔领土争端是影响印巴两国改善与发展关系的最大障

碍。由于双方政府的执政地位都较脆弱，两国又都存在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该问题的解决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为了避免格尔吉尔冲突之类事件再度发生，印度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克什米尔地区实际控制线一带的兵力部署。尽管印占克什米尔地区仍活跃着反印的穆斯林武装，且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但在实际控制线一侧的巴军处于弱势，未敢再组织大的战役行动。印军处于优势，既得利益较大，掌握主导权，维持现状对印度有利。因此，两国在克什米尔争议区仍保持着对抗而未交战的僵持状态。

印巴间的军备竞赛十分严重，且愈演愈烈，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担忧。受格尔吉尔冲突的影响，印度在2000～2001财政年度的预算中大幅度增加防务开支，由1999～2000年度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提高到3.3%，使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在核武器方面，两国都在加速核装置的武器化和小型化研究，并大力发展运载工具。印度的目标是尽快建立陆基、海基和空基“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决定用30年时间，研制并部署350～400枚核弹头，具备“最低限度的有效的核威慑能力”；巴基斯坦则定位于“不与印寻求核武器数量对等”，仅“寻求在南亚地区与印核威慑能力的相应”。在常规武器方面，印度通过从国外购买、引进许可证在印生产、对现役武器装备进行改造、自行研制开发等多种方式，全面加强印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推行其新近确定的以打高技术条件下“有限战争”为特征的“惩戒威慑战略”；巴基斯坦则针锋相对，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大量资金从乌克兰、法国等国购买坦克与战斗机等重装备。但在激烈的军备竞赛中，印强巴弱的态势难以改变。

21世纪初，印巴对抗仍没有减弱之势。由于双方分歧严重，又各持己见，以谈判解决克什米尔等问题难以达成一致。两国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对峙都使战争的危险性增长。这已成为影响南亚

地区局势稳定的最令人担忧的因素。尽管近来两国领导人互伸橄榄枝，使两国关系的松动又现一缕曙光，但表现为虚多实少，各有企图，前景仍荆棘丛生。

## “中国威胁论”——印度对华扩张与遏制政策的装饰

中国和印度同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有着遭受外国殖民主义势力奴役、欺凌的历史，同时两国在历史上都曾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卓越贡献。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友好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世纪50年代，两国曾经友好相处。但是，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坚持从英国殖民主义地缘政治观念出发谋划国家安全利益，鼓吹中国是印度“主要的潜在威胁”，在印中边境长期推行以扩张蚕食为特征的“前进政策”，甚至还挑起了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在战争遭到惨败后，印度同时把中国和巴基斯坦作为它的两个主要敌人，在两线作战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展开了全面的战备活动。在巴基斯坦被肢解和削弱后，印度开始把中国的威胁视为战略性的、长远的和最为严重的威胁。

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冷战思维出发，认定中国是潜在的敌人，因此，“中国威胁论”不时泛起，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不时散布“与中国的冲突”的怪论，毒化亚太安全环境，为印度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遇。印度认为这种形势是可以大加利用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当局开足宣传机器，一再向国内外鼓吹“中国威胁”，甚至将其作为公然进行核试验的堂皇理由，破坏了两国人民改善关系的努力。

1．印度对华军事战略的基本目标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没有放弃实现其对华军事战略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的努力。

印度对华军事战略的近期目标，是坚持以喜马拉雅山的分水岭为印度的“边界线”，保住其已非法占领的地区。几十年过去了，国际形势、南亚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印度政府坚持以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分水岭”和“麦克马洪线”为印度的“边界线”的立场依然没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20世纪50年代末，印度在中印边境推行前进政策，非法占领了中印两国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大片领土，其面积相当于阿根廷与英国争夺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的10倍。显然印度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它在处理中印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策略是：坚守已经侵占的中国领土绝不退让，并伺机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在边境地区保持局部军事优势，遏制中国可能做出的反应；以武力为后盾，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有利于印度的政治解决。众所周知，中国与14个国家有共同边界，除印度外，几乎与所有周边国家都划定了边界，惟独与印度的边界问题始终看不到解决的迹象。反观印度方面，除了已被其吞并的锡金外，印度还同6个国家有共同边界，而除了不丹外，它与其他5个国家都有边界争端。所以，就连印度一些专家也认为，在边界问题上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国。1988年12月印度前总理拉·甘地访华前，曾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表示，他的访问虽然将在同中国的关系上“开辟一个新时代”，但是他“将不会做出任何领土上的让步”。这表明，现阶段印度的战略目标是要保住其已非法占领的地区，慑止中国以武力收复这些领土。

印度对华战略的长远战略目标，是使西藏成为印中之间的缓冲国。印中边界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的西藏问题。西藏的地位以及印度对西藏地位的看法，一直是中印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使西藏脱离中国成为印中之间的缓冲国，是昔日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印度在独立后完全继承了这一防务思想，并使“西藏问题”成为印度在解决印中边界问题时向中国施加压力的

一张“底牌”。印度《战略分析》1988年7月号的一篇文章称：“无论过去和现在，在南亚居主宰地位的国家，无不从战略上考虑把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视为极端重要的地区”，“谁统治这个地区（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谁就取得了对于敌手确定无疑的优势”。文章还指出：“20世纪初，西藏曾是英、俄、中三国的角逐之地。50年代出现了中国和印度两个新的国家政权，西藏成为引起这两国之间的剧烈争论之地”，“争论的焦点是：谁应占据这个居于两个巨人之间具有战略意义的边境地区”。印度的很多防务专家至今仍在批评尼赫鲁政府当年没有阻止中国收复西藏，使它失去了一个“缓冲国”。他们怀念过去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两面派政策，英国人的做法是制造一个“宗主国”封建概念，使人们对西藏的地位模糊不清，结果是，西藏既不独立，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就采取两面派做法，在公开场合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收留达赖集团以印度为基地大搞分裂活动，甚至帮助达赖组建藏族突击队，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甚至纳入它的势力范围。达赖喇嘛多年来一直四处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与印度的暗中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西藏达赖问题上，还是印度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讲得好，他主张印度政府应吸收和消化这样一种观点，即“达赖回拉萨的最近的政治路线是经过北京，而不是越过喜马拉雅山”。由此可以看出，印度对华军事战略的长远目标是使西藏成为印中之间的一个缓冲区。

2．印度在印中边境推行的“前进政策”

独立后的印度统治者不但要继承英国殖民者对其邻国非法享有的特权和领土，还要沿着其侵略的足迹向北面中国领土再进行新的扩张。为了实现其无理的领土要求，他们不惜使用武力推行“前进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使西

藏得以和平解放。尼赫鲁政府对于这一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企图加以阻挠。此举失败后，便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在边界问题上，尼赫鲁宣称“麦克马洪线不管有没有地图，都是我国的边界”，“自古以来，喜马拉雅山脉一直是我国广阔的边疆。”印度戈拉克普尔大学学者阿帕尔纳·特里帕迪硕士把尼赫鲁这个讲话的精神称为“尼赫鲁主义”。20世纪50年代末，尼赫鲁主义在对待历史遗留的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上表现特别突出，印度政府置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于不顾，制定了蚕食中国领土的“前进政策”，一味沿着扩张的道路下滑。

所谓“前进政策”，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1961年在议会是这样解释的：“它不是关于庞大军队作战并相互消灭的问题，而在于这样一个问题：组织强有力的武装小队，每队人数比较少，派去占领一个地方，或把对方从该地赶走……后面要有强大的基地支持他们。整个战略得依据这个思想观察……以使我们最终能够采取行动收复他们现在占领之下的领土。”为了达到迫使中国军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走的目的，尼赫鲁在人民院声称，可以“采用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手段……”从这些咄咄逼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印度所谓的“前进政策”，就是要在北部中印边境全线实行北进的强硬军事方针，“在积聚足够的力量后向中国发动进攻，迫使中国人从已经建立的阵地后撤”。

在50年代前期，印度对华政策是在外交上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而在军事上却加紧向“麦克马洪线”以南未占领地区推进。通过这种“前进政策”，到1954年底，印度基本上控制了中印边境东段“麦线”以南包括达旺地区在内的9万平方公里属于中国的领土，1954年后又侵占了巴里加斯地区约45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对中国3.3万平方公里的阿克赛钦地区和日上宗部分地区公开

提出领土要求。与此同时，印度当局还在1959年策动西藏农奴主叛乱，并在叛乱失败后收留了逃亡印度的达赖集团。

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建议，双方武装部队沿整个边界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停止在撤出地区进行巡逻。这条线后来被称为“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它“并不等于两国的边界线，承认和尊重这条实际控制线，并不妨碍双方保留各自对边界的主张，而能为重开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创造良好气氛”。但从1961年开始，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43个军事据点，企图用军队推进线来替代“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为进一步扩张奠定基础。据当时一位印度记者报道说，“西段印军已在2500平方公里的广阔战线上全面推进”，并吹嘘已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总理下令把中国军队从其所谓的入侵地区——实际是中国领土——全部“清除掉”。于是，从10月17日起，印军便开始在中印边界东、西段全线“前进”，抢占中印边境争议区，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在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中方一侧建立军事据点139个（印度当时在中印边境共有据点249个）。与此同时，印度迅速扩充武装部队实力。到1962年印度挑起中印边境冲突前夕，印军总兵力已由1959年的41万人增至51万人，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兵力较之1958年增加了6倍。一场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在即。

印度当局之所以在中印边界地区如此猖狂进攻，完全是基于它对当时国际形势与中国反击决心的错误判断。它认为中国当时正处在一个国内外形势都相当严峻的时期，“不敢冒苏美大国进行干预的风险而对印度进行军事反击”。印度当局打错了如意算盘，更违背了不能根据敌人不会做出反应的假定来制定军事计划——这样一个战争的基本常识。面对印军多次猖狂进攻，在忍无可忍、

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实施坚决的自卫还击。印度推行“前进政策”的结果，导致了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全线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并以印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前进政策”至此也宣告失败。

3．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争

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印军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起了一场蓄谋已久的边境局部战争，中国边防部队对入侵之敌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并取得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重大胜利，惩罚了印度对中国的扩张和挑衅。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印度独立后，利用中国处于建国初期忙于医治战争创伤并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困难时期，肆意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侵占了该线以南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自1952年起，印军又侵占了中印边境中段中国的巨哇、曲惹、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和西段的巴里加斯等地，共约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959年8月和10月，印度先后在中印边境东段的朗久和西段的空喀山口挑起流血冲突，使边境局势不断恶化。1962年4月起，印军大举对中国进行蚕食，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占了中国克节朗地区。与此同时，印军飞机频繁入侵中国领空，进行侦察骚扰活动。9月21日至29日，印军又连续攻击中国在择绕桥的边防部队，打死打伤中国官兵47人。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多次向印度提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而印度政府却视中国为软弱可欺，决意诉诸武力。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中国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主要是在中印边境的西段和东段进行的。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到11月21日基本结束，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2年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在击退了印军的

大规模进攻后，随即实施反击。东线主要在克节朗方向上。印军第7旅等部约3000余人在克节朗河右岸一线展开，成进攻部署。发起反击的中国西藏边防部队针对其前轻后重、翼侧暴露、横宽纵浅的特点，采取两翼攻击、侧后迂回、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先后迅速攻克了枪等、卡龙、扯冬和沙则、仲昆桥等印军据点，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第7旅大部被歼，小股溃逃，该旅旅长G·P·达维尔准将被俘。随即，中国的反击部队兵分五路实施追击，收复了达旺地区，取得了反击作战的首次战役——克节朗战役的重大胜利，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部分中国领土，为以后的军事、政治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西线，印军部署在中印边境西段地区的入侵兵力约5600人，分布在600多公里正面上的77个侵略据点内。中国新疆边防部队采取逐次转移兵力、集中兵力拔点的战法，对加勒万河谷和奇普恰普河谷两地的印度侵略军发起反击，全歼了该地区的印军，乘胜扩大战果，全部拔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印军侵略据点，并对巴里加斯及其以北地区的印度侵略军实施反击。印军大部被歼，其余溃逃。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印度政府不甘心第一阶段作战的失败，拒绝中国政府的建议，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成立了“应付紧急情况内阁”，大肆进行军事动员，加紧从全国调兵遣将，决心与中国再度进行军事较量。至11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地区和西段地区增调了2个师部19个旅以及炮兵、装甲部队各一部，总兵力增加到3万余人。其中在中印边境东段有2个师，重点是西侧第4师4个旅，分布在西山口至邦迪拉一线；中间是第2师的2个旅；东侧为瓦弄地区第2师的另一个旅；并以3个旅置于传统习惯线附近，作为机动部队。在中印边境

西段，第3师的1个旅位于楚舒勒及其以北地区。11月14日和16日，又以瓦弄、西山口地区之主力，再次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为了进一步打狠打痛印度侵略者，以利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谈判解决，中国政府命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再次进行自卫反击。

第二阶段：1962年11月16日至21日，中国边防部队主要反击方向为西山口至邦迪拉和瓦弄地区。

东线在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上，印度侵略军为其陆军第4师战术司令部指挥的4个旅共约8000余人，沿达旺至邦迪拉公路及其两侧地区作线式部署，防御重点在西山口。中国西藏边防部队针对印军“铜头、锡尾、背紧、腹松”的布势特点，采取“打头、切尾、击背、剖腹”的战法，向印军第4师实施反击。一部兵力攻击西山口，牵制当面入侵印军；一部兵力实施迂回；主力沿西山口两侧集中夹击敌人，从而对西山口、德让宗地区的入侵印军形成了多路向心合击、分割包围的态势。在瓦弄方向，中国边防部队对印军第11旅等部队发起反击。经过激烈战斗，基本歼灭印军第4师和第11旅等部队，收复了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瓦弄、里米金、梅楚卡等地，进占邦迪拉以南的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萨木维尔和金古底一线，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迫使入侵中国领土的印军残余部队全线溃逃。

在中印边境西段地区，中国新疆边防部队采取以主力迂回敌后、严密包围、侧后突击的战法，向班公湖地区的印军侵略据点展开反击，经过激烈战斗，拔除据点6个，歼印军一部。至此，设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领土上的印军侵略据点全部被扫除。

在对入侵印军进行了应有的严厉惩罚之后，中国政府为促成10月24日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三项建议的实现，于1962年11月21日再次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遵照政府声明，中国的西藏、新疆边防

部队于11月22日零时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开始全线后撤，至1963年3月1日，全部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内地区。

中国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历时1个月。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西段地区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43个，在东段地区收复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的地区。全歼印军3个旅，重创印军3个旅，另歼印军5个旅的一部，击毙和俘虏印军旅长以下官兵共8700余人。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停战后，中国政府主动将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交还印度，并于1963年5月26日前释放了印军准将以下3213名全部被俘人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打退了入侵中国领土的印度军队，保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沉重打击了尼赫鲁政府的地区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以正义之战缓和了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并开创了胜利军队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物资的先例。

对于印军在这场战争中遭到惨败，印度朝野都极为震惊。战后，印度的防务专家们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归纳起来主要有8条：一是政治上对中国的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当时正值中美对立、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况，国内又连遭天灾人祸，将无力反击印度的军事进攻；二是政治与军事脱节，军事决策权掌握在“全然不懂军事”的文人手中，这些人狂妄地要求将中国军队“赶出去”，而在军事上却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把军事行动计划建立在中国军队“不会进行反击”、“一赶就退”的一厢情愿的基础上；三是兵力部署前重后轻，翼侧暴露，被中国军队抄了后路，吃了“口袋战术”的亏；四是预备队小、配置远，不能在紧急关头对前沿部队实施及时有力的支援；五是武器装备落后、火力弱，部队由平原仓促赶来上阵，未曾受过山地训练，抵挡不住中国军队的猛烈反击；六是后勤“尾巴大”，边境交通差，不能满足山地

作战的需要；七是对中国空军能力估计过高，因害怕中国空军轰炸加尔各答而未敢动用空军支援地面作战，是个“战略性的错误”；八是情报系统的混乱与无能，直接导致战略决策的失误。自此以后，印军回复到由专业人员指挥，对军队的政治干预宣告结束。印度铭记惨败之辱，卧薪尝胆，进行了长期持久的扩军备战，准备有朝一日同中国在边境再“决一雌雄”，报“一箭之仇”。

时隔36年，印度总理A·B·瓦杰帕伊在1998年5月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为其政府的核试验辩解时，再次提出所谓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的武装侵略”。但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内维尔·马克思韦尔在《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一文中所指出的：“1962年的边界战争并不是那么回事。印度制造了边界争端。它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武力回应是被强加到北京头上的，当它来临时，它得到恰当的估量。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他现实的选择余地。”马克思韦尔引用了一位印度评论家的话：“（中国的）‘未经挑衅的侵略’这个警句在边界战争后广为传播，纯粹是为了政治目的——它是一种为争取同情而玩弄的政治花招……”马克思韦尔进一步指出：“由于这种黑白颠倒可以抚慰印度政治阶层的深受伤害的自尊，它便被立即当做真理接受了，并且在印度一直成为一种受到珍视的谬见。瓦杰帕伊在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表明，印度政府依然想从昔日的虚构中图谋好处”。

4．后继者推行新“前进政策”

1962年中国军队强有力的自卫反击，沉重地打击了印度当局的嚣张气焰，使其外强中干的“前进政策”受到重创。印度当局不得不重新审查它在中印边境地区的战略。但它并没有就其“前进政策”这一造成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本身进行检讨。相反，许多防务专家惊呼“在这个现实政治残酷的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

武力”。印度在重新估价了印度安全环境、反思以往的国防政策后，总结了三点教洲和启示：一是印度在过去十多年里对国防建设未予足够的重视，致使军事力量“在实现国家目标时”力不从心，以后应将国防建设置于优先地位考虑。为此，印度政府从1964年起推行第一个国防五年计划，拨款500亿卢比，大规模扩充军备。二是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综合国力来说，印度尚不是中国的对手，尚缺乏抗衡中国的实力，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应采取纵深防御方针，加强实力建设，积蓄力量伺机“报仇雪耻”。三是印度已面临西部来自巴基斯坦和北部来自中国的两面“威胁”，应从思想上准备在西部和北部两线作战，但在策略上应采取“西攻北防”的军事战略方针。从此，它对中国的战略方针由“北进”转变为“北防”，在下大力量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对中国开始采取以维护既得利益为核心的战略防御的方针。

为了达到长期占领非法侵占的领土的目的，印度首先采取立法形式使这些非法占据的领土“合法化”。这一步骤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1950年1月26日开始实施的印度宪法，将它已基本控制的“麦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阿萨姆邦，1954年又将其与阿萨姆邦部分地区合并，将这块领土先命名为“东北边境特区”，后于1972年更名“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986年12月8日和9日，印度议会上、下两院又分别通过法案，将其正式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妄图使其侵占永久合法化。从名称的更改和规格的不断升级可以看出，印度占领这片领土先是战战兢兢，后来就明目张胆了，最后索性把这片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以立法形式“合法”地变成了印度的一个正式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即发表谈话，指出印度政府这一做法又一次严重地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1987年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竟前往该地出席“阿鲁纳恰尔邦”成立大

会，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

其次，在现有的和新控制的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部署和战场建设。印度向印中边境地区增派作战部队，组建了专门针对中国的擅长山地作战的山地师，加强空中力量建设，逐步形成了一支以山地部队为主、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的对华作战力量。这支规模庞大的部队在边境地区以寓攻于防的作战态势展开，在战略战役要地等敏感地区形成对中国边防部队的较大优势。在控制和开发边境地区的同时，印度政府鼓励和指导印度军事力量大力加强以保障作战部队实施灵活反应为核心的战场建设，兴建了大批平战结合的战场设施。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已建成了一条横贯阿萨姆走廊的东西铁路干线；通往中锡边境的铁路将成为印军战略机动的命脉。在大力改善边境公路的同时，边境各前沿据点已形成以直升机为主的空运网。在通信建设上，除装备有较现代化的野战通信系统外，重要方向和地区还建立了卫星地面通信等先进设施。经过长期苦心经营，印军在中印边境的军事实力早已大大超出其防御的需要。

1962年的自卫反击战，中国边防部队在惩罚了印度侵略者之后，主动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并立即做出了从实际控制线主动后撤20公里的善意举动。在中印东段边界，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并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在中印中段和西段边界，中国边防部队同时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然而，对中国所做出的一系列有利于双方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行动，印度政府不仅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反而趁中国边防部队回撤之机，再次使用军事力量重新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有损两国关系的做法。这实际上表明，印度政府并没有真正放弃推行扩张主义的前进政策。马克思韦尔在《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一文中对此评论道：“ 中国在边界战争中的胜利是完满的，印度

的失败是绝对的，但是通过其他办法作为外交的继续，中国的惩罚性远征只取得了部分的暂时的成功”；“中国使用武力并没有决定性地和持久地完成其两项政治目标中的任何一项：使印度回到谈判桌来，并向印度人表明，在这种谈判前试图以武力将印度的领土主张强加给中国是徒劳的和在自我毁灭”。

在认真总结战争失败的教训后，经过十年的厉兵秣马，印度军事实力大增，在1971年的对巴战争中获得巨大胜利，并逐渐恢复了信心。到了20世纪80年代，印军在印中边境的军事部署已经今非昔比，对中国形成了明显的局部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当局从80年代中期起，又恢复了“前进政策”。

新的“前进政策”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20世纪60年代时，印军的行动突出表现为孤军深入，后方兵力空虚，后勤补给跟不上；而在25年后的80年代中后期，印军已经建立起巩固的纵深防御、完整的后勤设施和雄厚的后备兵力，使战场环境发生了对其有利的巨大变化。驻防在中锡边境的印度陆军第33军军长S·M·辛格中将透露，1986年旺东事件后，印度国家领导人决定通过在印中边界修筑防御工事而将部队前推。“根据国家领导人的明确指示，印度陆军开始全力建设保证分水岭部署计划所需的后勤和防御设施”。这位将军认为，“国家政治领导人现在已经有能力同中国解决边界问题。我们的谈判地位得到加强，我们可以以实力为后盾同中国进行谈判”。关于印军实行新的“前进政策”的背景及其战略思想，《印度防务评论》1989年7月号的社论则作了较清楚的阐述。该社论点明新的“前进政策”思想的倡议人是前任陆军参谋长K·R·克里希那·劳上将（任期1982～1986年）。社论写道：“1985年夏，印军奉行上述‘前进政策’，突入印中边境未被占领的争议地区，随之又前调齐装满员的合成部队，以加强印度同中国2350公里边境的薄弱边防力量。其战略似乎是以主力部队在尽

可能靠前的战术要地打一场大的防御战，把领土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以期在这场短期高强度的战争结束时，能在谈判中使之发挥力量倍增器的作用。此外，以主力前推，在战术上便有可能发动有限攻势，越过边境进入对方防守薄弱或未占领地域”。军方的上述论述，比较明确地阐明了印军新的战略思想：在印中边境全线重点地区以主力部队尽可能前推，并准备越过边境打一场短期高强度的进攻战，占领中国防守薄弱或未占领的地域，以期加强印方在边界谈判中的地位，迫使中方做出让步。在这种理论指导下，1986年夏季，印度又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起了同中国面对面的对抗。

1985年，中印边界东段的局势变得再次紧张起来：印度人坚持有权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北那些他们认为当地地形说明麦克马洪将线划得太过靠南的地区（他们从来没有发现他将线划得太过靠北的地段）。当春天冰雪融化巡逻季节再次开始时，印度人派出的一个分遣队成员在桑德洛河上建立了一个观察哨所。那个地点使哨所对中国在塔格拉山脊背后的军事部署一览无余。而且这个新哨所不仅是位于地图上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中国一边，而且还曾是1962年边界战争的爆发点，因而是个具有特别意义和敏感地区。1962年人民解放军单方面撤军时曾经提出：在地图上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不丹边界和塔格拉山脊之间三角地带的领土要成为非军事区。如果印度进入该地区中国将保留“反击”的权力。但中国从维持对印关系的大局出发，没有因新哨所的建立立即与印发生直接对抗。直到冬天降临时印军撤离前，该哨所没有受到挑战。在察看撤走的地点时，中国边防军注意到印度人已经开始设法要把这个地点变成一个长年性的哨所，于是他们捣毁了那些结构，并建立了自己的哨所，还开辟出一个直升机场。1986年7月，当印军返回要重占阵地时，他们发现中国人已牢牢地把守在那里。于是印度官方发言人同往常一样，又将它说成是“未经挑衅的”对印

度领土的入侵。8月8日，印度政府正式谴责中国故意派出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马克思韦尔在《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一文中写道：印度陆军参谋长森德吉将军利用这件事作为陆军必须采取行动的一次挑战，接着进行了一次新的“猎隼行动”演习。“猎隼行动”是要同中国对抗以在其边界显示巨大的进攻力量，如“铜钉”演习对巴基斯坦一样。森德吉将军的考虑是，如果中国像他们1962年那样被招引作出反应，使用轻装步兵开展迅速移动，猛烈打击扫荡周围的印军阵地，那么他们的行动将被具有一定优势的印军从准备好的防御基地制止、包围或者消灭——一种被森德吉称为“围歼”的策略。如果中国人以武力作出反应，他的战略还要求对西藏实行有限的反攻，伴随着印度空军对步兵起支援作用，必要时扩展到确保制空权，轰炸中国在西藏的空军基地。但中国并没有像他们在1962年时表现的那样作出反应，只是对西藏进行了增援。5月间，北京正式警告印度它坚持“侵略”的严重后果。尽管中国要求和平解决问题，如果印度坚持在边界沿线进行侵略性的刺探，它将不得不作出反应。

印度这次挑起边界风波，显然没有得到美、苏任何一个大国的支持。1987年夏末，新德里不得不在其声明中把调子放低了，因而对抗得以缓和。

5.“中国威胁”老调常谈

自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后，印中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印度人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却仍然对中国政府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缺乏信任，特别是在以下三方面，印方深陷于其思维的怪圈中：第一，该政府认为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中国对印度进行了侵略，且中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态度僵硬，不利于两国领土争端的最终解决；第二，认为中国政府一直反对印度把锡金并入所谓的印度联邦，是为日后插手锡金埋下伏笔；第三，印度政府对中国与巴基

斯坦之间在核开发领域的正常合作心怀疑惧，并不断指责中国向巴出售危及印度安全的导弹技术和向巴转让核武器相关技术。另外，印度政府还指责中国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印度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流强国。

从印度人民党的对华政策与印度历届政府政策的对比来看，1988拉·甘地访华前，从尼赫鲁到英·甘地，甚至拉·甘地政府前期的对华政策和今天的人民党政府大同小异。印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戴什卡尔认为，“正是这种无端的猜忌使印中关系僵持长达近30年，两国之间改善关系的许多大好时机由于领导人的短视就这样白白丧失”。几乎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尤其是苏联和美国果断地跳出自设的藩篱，迅速打开了对华关系的新局面，捞取了许多战略上的好处。而历届印度政府一直抱着僵死的教条不放，始终固执地认为两国之间的边界不存在任何“争端”，是中国政府顽固地拒绝承认已有的“事实”（注：即所谓两国之间已有麦克马洪线划界）导致两国关系的紧张。至于1962年的那场战争，自以为受委屈的印度一直要求中国对印方道歉，并要让中国承担“侵略者”的责任。戴什卡尔指出，正是这种自认为基于“正义”的对华政策使印度为之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虽然北部边疆长期以来一直相安无事，而印度却在那里驻扎了重兵，这既造成了资源和人力的巨大浪费，也不利于两国建立起码的信任措施。而且这种人为造成的紧张局势极有可能因为一方处理不慎而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时至今日，中印之间的边界已不再紧张。在过去的10年里一度棘手的边界问题有了很大的缓和，双方一致努力保持着“实际控制线”两侧的和平与安宁。1998年经过长期谈判，两国签订了在军事领域加强信任措施的双边协定。然而，事隔不久上台的瓦杰帕伊政府竟然开始怀疑这个协议签订的理论基础。随后，在1998年5月，印度政府公然进行核试验，并再次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对

中国进行无端攻击，使中印关系再度严重受挫。以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为代表的所谓“鹰派”多次口出狂言，高唱“中国威胁”论调。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也在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中提出所谓中国的威胁是印度当局进行核试验的理由。中方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之后，印度政府在反华言行上有所收敛，并通过各种渠道与中方接触，寻求修复两国关系。1999年2月，中印两国外交部官员在北京举行会晤，确认中印互不构成威胁。6月中旬，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应邀访华，双方确认中印关系发展的前提是互不视对方为威胁，基础是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愿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继续恢复和改善。此后，两国关系才又走上正轨。2000年5月28日～6月3日印度总统科切里尔·纳拉亚南访问中国，2001年1月9～1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访问印度，以及两国外长的互访，都进一步推动了中印睦邻友好关系在新世纪的持续、健康发展。但是，中印关系中的暗流仍然值得关注和警惕。从印度国防部在历年发表的《国防报告》中无一例外地借口“中国威胁”倡导发展军备，印度积极发展同越南、日本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合作，以及印度公开支持美国的NMD计划这些战略举动中，都可以感受到它对中国的疑忌甚至利用其他国家联合遏制中国的因素。

印度和中国是近邻，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重大历史使命。正如戴什卡尔先生所提出的，“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现在是该到了瓦杰帕伊政府抛弃对华的短视政策，拿出诚意改善两国关系的时候了”。

## 稳定“后院”——控制弱小邻国

印度历届政府都相信武力在处理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在对周

边各国的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手就是，在实行政治高压、经济控制的同时或效果不明显时，立即运用军事手段加以解决。尼赫鲁及其后来者，对周边各国几乎都使用过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法国《解放报》1999年8月16日文章称，“对周围的‘小’邻国，印度奉行的政策也是：什么政策都可以奉行，就是不能奉行非暴力政策”。除通过三次印巴战争最终肢解了巴基斯坦外，印度还在1975年吞并锡金王国，接着又把不丹置于它的“保护”之下，同时严密监视尼泊尔的动静，对斯里兰卡进行军事干预，到马尔代夫充当警察等，印度在对周边国家推行强权政治的过程中毫无顾忌地使用武力，已经暴露无遗。

20世纪80年代，印度进一步提出了“印度利益的新主义”。据说这个“印度利益的新主义”是英迪拉·甘地夫人在1983年提出的，它的实质是，南亚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和秩序若出现混乱都应该求助于印度帮助稳定局势。这个“新主义”强调，印度作为南亚的一个大国，在任何地区性的发展中，特别是地区安全中都不能被排斥在外。也就是说南亚各国都应当服从印度安全的需要。这就为其后来出兵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国提供了理论依据。

1．控制三个山麓王国

印度统治者从地缘战略观念出发，继承了英帝国主义建立缓冲区的战略安全思想，坚持要以喜马拉雅山的分水岭为印度的“边界线”，企图倚仗喜马拉雅山天险，构建确保印度北部边境安全的所谓安全屏障。为此，印度一方面推行“前进政策”，将其边界向喜马拉雅山一带扩张，另一方面，加强对尼泊尔、锡金和不丹三个山麓国家的控制，力图把它们变成印度的“保护国”甚至使其加入印度。

锡金王国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夹在中国、尼泊尔、印度和不丹之间，可瞰制中国的亚东县，又可扼控印度的西里古里走廊，对印度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在其军事战略的天平上分量很

重。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对于锡金王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已经十分关注，认为锡金王国是英印帝国“警戒安全线”“内线”上的重要一环，并于19世纪末攫取了对锡金王国的控制权。锡金沦为英印帝国的保护国后，成了英印帝国入侵中国西藏的桥头堡。印度当局更是把锡金视为其“防卫最敏感的地区之一”。1947年印度刚刚独立，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府就急不可耐地迫使锡金同它签订了《维持现状协定》。印度终于全盘接受了英印帝国对锡金王国的控制权力。1949年6月，印度正规军队开进锡金王国，建筑营房、构筑工事以做长期踞守。翌年又强迫锡金签订“印度锡金和平条约”，将其从昔日的英印殖民地保护国变成独立后印度的保护国。但即便如此，锡金重要的战略位置没有完全控制，仍让印度的战略决策者们寝食不安。尼赫鲁的后继者们便借口锡金有不甘心“保护国”地位的“离心倾向”，在1975年置国际舆论于不顾，将锡金王国合并到印度，变为印度的“第22个邦”，从而结束了锡金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这一公然侵略行径的成功，使印度受到了鼓舞。防务专家们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认为锡金作为印度的一个邦，使印度“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得到了自然的解决”，印度北部的战略态势得到了极大改善，不仅占据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极为有利地位，更重要的是使形如孤岛的阿萨姆地区获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国家和印度具有深远的政治和战略意义”。

尼泊尔和不丹“位于印度的自然安全范围内，成为印度北部边境安全的重要因素”。为了防止尼泊尔、不丹脱离印度的控制，印度仿照当年英帝国的手法，于1948年与不丹订立了“永久和平条约”，条约规定不丹对外关系必须“接受印度意见的指导”，“印度有权对不丹的外部事务进行磋商，不丹为增强国防力量和促进稳定所需的武器弹药的进口由印度监管，印度完全控制不丹的一切通

讯设施，印度军事训练小组负责监督不丹陆军的发展”。印度在1950年与尼泊尔订立“和平友好条约”，以此确定了两国间的“特殊关系”。尼泊尔必须完全按照印度的意图制定其国防、外交和内政政策，并保持印度在尼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中的垄断权。尽管如此，印度后来的防务专家们还是批评印度政府当年“坐失了”把尼泊尔和不丹像锡金那样纳入印度版图的“良机”，以致于两国后来经过积极努力都加入了联合国，表现出对印度的离心倾向。这些人的代表性观点是：“从政治、地理和历史情况看，这些小王国也应合并到印度，如果印度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采取这一立场，那么，国际社会和尼泊尔、不丹也就会承认这一事实。这些王国也无力逆潮流而动或者是反对人民的愿望，他们的抵制也不过像刚开始时的克什米尔的马哈拉贾和海德拉巴德的统治者以及类似的小王国一样无力罢了。”印度的地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思想在这些观点中可见一斑。

就这样，印度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惟一吞并别国和将邻国视为保护国的国家。为了使自身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安全利益得到可靠保证，印度在吞并锡金后还不断向尼泊尔和不丹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使之增大对印度的依赖性，以增强其“喜马拉雅山战略安全屏障”的稳定性。

2．出兵斯里兰卡

1987年7月至1988年12月，印度政府利用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问题，一手策划了对斯里兰卡的武力干涉行动。印度为了达到自己的战略企图，先是支持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后又直接出兵镇压泰米尔人猛虎组织，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斯里兰卡是印度的隔海近邻，历史上常常受到南印度泰米尔诸王国的侵略，印、斯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关系一直延续到两国共同沦为英国殖民地。印度历来把斯里兰卡看成是印度的一部分。

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前的1945年就说过，从文化、种族以及语言上看，斯里兰卡“同任何省份一样是印度的一部分”。1949年4月印度国大党主席帕塔毕·悉达拉马尼也宣称：“印度迟早会同锡兰人民达成协议，使其成为（印度）政体的有机部分。”印度军方更是声称，斯里兰卡对印度在战略上如同爱尔兰对英国、台湾对中国那样重要，印度决不会容忍出现该岛被印度的敌对大国支配而“危害其领土完整”的局面。

历史上印度对斯里兰卡的多次侵略，使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大量流入斯里兰卡北方。斯里兰卡独立后，占全国总人口71%的僧伽罗人占统治地位，而占23%的泰米尔人受到歧视和排挤，致使民族矛盾日趋激化。进入80年代以后，斯里兰卡的种族问题更加严重，恐怖主义活动遍及城乡，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破坏了斯里兰卡的经济建设。自1983年起，印度利用斯里兰卡发生的种族骚乱，公开插手斯国内的民族矛盾，使两国关系趋向紧张。1987年4～5月间，斯里兰卡政府不顾印度的压力，对泰米尔人的猛虎组织进行大规模围剿。印度政府在多次警告斯政府停止军事镇压行动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公然派空军、海军，对被围在贾夫纳的泰米尔人猛虎组织实行“紧急援助”。当印度船只被斯里兰卡拦截退回后，印度又用飞机向猛虎组织空投救援物资。对于印度这种“炮舰外交”，斯里兰卡政府当即向印度当局提出强烈抗议，斯里兰卡的《太阳报》惊呼“现在又出现了孟加拉幽灵”（注：指1971年印度肢解巴基斯坦）。正当两国关系更趋紧张的时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于1987年7月29日突然出访斯里兰卡，印度迫使斯里兰卡签署“和平协议”，规定在斯里兰卡政府的“邀请”下，印度可向斯派出“维持和平部队”监督泰米尔武装停火，并让其交出武器。

实际上，两国突然签署“和平协议”各有所图：斯里兰卡总统企

图假印度人之手平息泰米尔人的暴乱，尽管协议对斯里兰卡是屈辱的，但避免了与印度的直接军事对抗；印度则完全是出于自身和地区安全战略的需要，认为如果对斯里兰卡的内乱置之不理、不予干预，将会危及印度泰米尔地区的稳定，而且将导致美、巴的插手，使斯里兰卡落入美、巴的势力范围，届时其具有战略意义的东部海港亭可马里将会被美国海军所占用，这将“严重危害印度东部海域的安全”。

1987年7月30日，印军首批约3000名快速反应部队在斯里兰卡的贾夫纳半岛登陆，开始执行维持和平的任务。然而，以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为主的泰米尔武装并不买印度的账，拒不接受“和平协议”的有关条款，还与印军展开了激烈的武装斗争，致使斯国内局势更加恶化。为了维护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印度紧急增调部队，开始对泰米尔武装实施围剿作战。

印军在斯主要作战行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7年10月6日印军向泰米尔武装大举进攻开始至同年10月26日攻占贾夫纳城止。主要战场在贾夫纳半岛，作战样式为城市争夺战。10月6日，印军集中优势兵力，出动坦克、装甲车、大炮，在直升机掩护下，兵分四路向泰米尔武装集结地发起猛烈进攻。双方经过几天的激战，印军相继攻克了泰米尔武装占据的10多个营地。10月14日，印军在控制了贾夫纳半岛大部分地区、包围了泰米尔武装总部所在地贾夫纳城之后，又紧急从国内向贾夫纳增调了约2000人的部队，其中包括300多名经过专门训练用于巷战的特种部队。10月19日，印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向贾夫纳城内发动最后一次强攻，并一举攻占了市府大楼、各主要电信局、公共汽车终点站和微波通信站等地。到10月26日，泰米尔武装寡不敌众，被迫弃城转入丛林，印军基本控制了贾夫纳半岛。

第二阶段：从1987年10月27日泰米尔武装撤离贾夫纳城到

1988年年底双方同意停火止。这一时期的战场分散在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广大丛林地区，作战样式为丛林游击战。泰米尔武装利用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以地雷、陷阱和狙击为主要内容的游击战。泰米尔武装经常神出鬼没，声东击西，使印军清剿作战不仅收效甚微，而且部队伤亡不断增多。此时，斯里兰卡继任总统普雷马达萨采取与泰米尔武装对话的政策，得到了泰米尔武装的积极响应，从而结束了斯政府与泰米尔武装的敌对行动。

印度为维持在斯里兰卡的军事行动每日要耗资3000万卢比（合240万美元），一年耗资达9亿美元，约占当年印度军费开支的10%，给国家经济建设带来了影响。尽管如此，印度在泰米尔武装活动平息后仍不愿从斯撤军，因为消除斯里兰卡对印的离心因素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为此斯里兰卡政府不得不向印度发出必须限期撤军的“ 最后通牒 ”。为了能放心地撤出，驻斯印军从已控制的斯里兰卡东北省中“ 对印有信任感 ”的泰米尔人中招募人员，组成“ 辅助市民志愿军 ”，对其进行训练，还在亲印的斯“ 泰米尔人民革命解放阵线 ”中征招了数千泰米尔青年入伍，并将其送到印度南部受训，留下这些种子以便今后派上用场。在一切安排基本就绪后，在斯政府的坚决要求下，印度终于在1990年3月24日将驻斯印军撤出斯里兰卡。至此，这场历经2年半时间，耗资数十亿卢比，伤亡、失踪近4000人的所谓“ 微风 ”军事行动才算收场。

印度维和部队先是应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的邀请抵达斯里兰卡，后又在总统的继任人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的要求下离开斯里兰卡。从平息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反叛活动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是印度导演了一场初期支持动乱，继而“ 帮助 ”平息动乱的闹剧，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 地区警察 ”角色，没有得到冲突任何一方的好感。这次行动同时也说明，印度对南亚次大陆各国使用武力就像在自己国内那样方便自由，可以在任何地方以它认

为比较合适的方式进行。日本《朝日新闻》1987年6月28日评论说：“印度自己使周围国家再次想到印度是南亚的超级大国。”

尽管如此，印度为这次军事干预行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至于在十余年后斯里兰卡再次出现动乱时，它已不愿再次为此踏上这块“伤心之地”。

《印度时报》2000年5月10日一篇题为《印度缘何不愿介入斯里兰卡的流血冲突》的文章指出，印度参与“这场痛苦的战争的结果是造成大约1200名印度人失去了生命，其中包括在1991年被暗杀的总理拉·甘地”。1991年5月，拉·甘地被猛虎解放组织的人员暗杀。在此后的几年中，印度一直在斯里兰卡周围的海域巡逻，以确保泰米尔纳德邦没有被猛虎解放组织用来作为他们的一个基地。印度也决不会轻易忘记在它介入斯里兰卡冲突的那些年月里得到的教训，那就是“在它不能打赢一场在它的东北部和克什米尔的无休止的内部冲突的同时，它在另一个国家几乎同样也无法做到这一点。斯里兰卡人对于印度的干预的确从来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即使印度的维和部队是在为他们火中取栗。而且在印度国内，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说服印度公众，他们并不相信有什么必要让印度的孩子们去为斯里兰卡的事情卖命，即使他们穿的是‘维护和平’的外衣”。

鉴于以往的深刻教训，作者引用印度人的话说：“一次被咬，下次胆小”。在2000年四五月间斯里兰卡再次因泰米尔猛虎组织问题向印度发出呼吁时，大多数印度人决心与斯里兰卡发生的事情不发生任何关系。印度议会在同年5月8日召开的所有政党会议上空前性一致地通过了政府在斯里兰卡问题上采取不干预政策的决定。

3．出兵马尔代夫

1988年11月3日至4日，印度再次扮演地区警察角色，派兵进入马尔代夫，挫败了那里发生的一场军事政变。

马尔代夫是印度洋上的珊瑚岛国，位于斯里兰卡西南方向。这个国家虽小，但位置十分重要，印度对马尔代夫的事务历来十分关注。1988年11月3日，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发生军事政变。凌晨，由斯里兰卡泰米尔游击队成员组成的200名武装袭击者，乘船直抵马累，强行登陆后迅速与先期偷渡的先遣部队会合，向总统府发起猛烈进攻。马尔代夫驻首都的卫队与警察寡不敌众，纷纷败退。武装分子迅速占领总统府。随后控制了主要街道，扣押了包括马议员、文职官员和警察在内的近2000名人质。在激烈的交火中，共有200多人死亡，受伤者不计其数。马累机场和广播电台一度关闭，大部分国际电话线路被切断。事件发生后，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向外界发出紧急求援呼吁。

印度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刻派兵前往马尔代夫平息叛乱。当日，印军出动2架空军大型运输机和3艘海军战舰，运载2个伞兵营约1600人向马尔代夫出发。3日下午，印军先于其他有关国家出动军队抵达马尔代夫，其伞兵部队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登陆，很快控制了马累机场和军事要地。武装分子见大势已去，未与印军正面交火就急忙挟持人质向海上逃跑。次日，马尔代夫局势基本得到控制。

此次印军出动的兵力并不大，但行动迅速，显示出较强的远程奔袭作战能力。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政治、军事含义也是十分明显的，它再次向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印度不仅有兴趣关注周边国家的事务，同时也有力量维护南亚次大陆的地区秩序，完全可以在南亚次大陆发挥领导作用。

## “新德里版的门罗主义”——排斥区外势力

在“印度中心”论的影响下，印度一直坚持遏制和排挤外部军

事力量进入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的主张，并在战略实践中将其作为一条长期起作用的战略原则。

印度把南亚次大陆看做一个战略实体，强调次大陆的稳定与安全对于印度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在区内，为防止对印度的“离心倾向”，印度提出要建立一支具有“足够威慑能力”的快速反应部队，提高机动能力特别是战略空运能力；对区外，印度推行“南亚是南亚人的南亚”的观点，决不允许本地区以外的国家在印度周边任何一个小国建立军事基地，或对印度施加不利的政治影响。

经过长期的扩军备战，印度自认为已经成为第三世界的超级大国，现有军事实力虽然根本无法与超级大国相比，但在数量上确实可算作是世界性军事大国。独立后的印度当局在接过英殖民者移交的政权的同时，以当年大英帝国统治南亚的天然继承者自居，视南亚为印度的家天下。一方面，印度对南亚其他国家的独立愿望和要求感到不能容忍，急欲将其完全置于印度的监控之下；另一方面，印度的统治者公开宣称，印度不能容忍外来势力干涉任何南亚国家的内部冲突，任何南亚国家不得接受具有反印倾向的外来军事援助。印度的这种明确企图被西方称之为“新德里版的门罗主义”。印度对周边邻国频繁用兵的目的，在于使南亚次大陆各国具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安全观乃至统一的政治见解，这就是各国都要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从而在南亚地区建立有利于印度的地区新秩序，避免外部势力进入本地区。因此，印度把外部势力企图进入南亚次大陆、印度洋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企图，均视为对印度利益的侵犯，必须加以排斥，以确保印度在上述三个地区的战略利益。

印度反对美国在印度洋查尔斯群岛的迪戈加西亚建立军事基地，把中国海军对南亚国家的友好访问说成是企图染指印度洋，它还认为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也有在印度洋向印度提出挑战的可能性。印度要求印度洋沿岸国家“为自身的安全而坚持独立和不结

盟政策，并抵制大国要与之军事结盟的诱惑”。印度在1987年极力出兵干预斯里兰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以此避免美国等大国插手斯里兰卡事务，特别是防止美国海军得到它觊觎已久的亭可马里港。否则，印度认为，就等于把美国人招到了家门口，印度在印度洋的战略安全和利益将会受到极大威胁。印度还表示支持毛里求斯对包括迪戈加西亚岛在内的查戈斯群岛的主权要求，呼吁早日归还毛里求斯的领土。印度退休中将P·N·卡特帕利亚建议“印度应继续为实现上述目标不倦地在各种国际场合进行活动”。

印度从独立之日起就梦想着要成为地区大国、世界强国，企图称雄于南亚次大陆、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而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是大国争夺的主要地区。20世纪70年代，继英国势力退出这一地区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继进入，为谋取各自的战略利益角逐。这些大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必然发生激烈碰撞。由于当时的印度经济落后，综合国力弱，军事力量不强，达不到推行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印度只能在一定时期内把基本着眼点放在依靠超级大国的力量、重点发展军事实力上。它先是接受美援，后又与苏联结盟，在两大政治集团的对立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战略利益，实力有了很大增强。但是，它不能容忍超级大国动摇它在南亚次大陆所居支配地位的根基。例如，当美国与它的死敌巴基斯坦亲近时，印度便冷淡了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投靠苏联；而当美国调整了南亚政策，开始冷淡巴基斯坦后，印美关系迅速升温。印度可以大量接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当其邻国巴基斯坦接受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时，印度则指责美、巴是在搞针对印度的阴谋。一件事情，两个标准，其实质就是在南亚次大陆只能允许印度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和支配地位。

## 先发制人——战略实践中体现的战略原则

印度独立后所发动的几场战争证明，印度十分注重对战略上先发制人原则的运用。印度认为，战略上先发制人可以有效地制止敌人入侵。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国家间使用常规武器的战争，一般都是时间短暂的战争，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形成长期的持久战争。所以，在进行战争准备、拟制战略计划时，必须贯彻战略上先发制人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从战略态势的总体上形成有利于印度的条件。战争一旦爆发，印军在战略上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就能够预先阻止敌人大规模进攻，使战争在敌方国土上进行，并迫使对手陷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因此，对战略上先发制人这一战略原则的成功运用，不但可以有效地制止敌人的入侵行动，而且可以对整个战争进程产生有利于己方的影响。1971年印度发动第三次侵巴战争，就是以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揭开战争序幕的。

战略上先发制人可以夺取战争初期的主动权。现代条件下的战争，由于侦察和反侦察手段的不断改进，加之交战双方战前广泛采取战略、战役伪装及其他方面的保密措施，使战争的突发性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认为，它有可能在战争初期处于战略上的守势地位。要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就要在实施防御的同时，集中兵力，选择敌人要害，实施先发制人的战略进攻，一举夺得战争初期的主动权。印度的邻国除中国外，其余各国战略纵深小，为印度采取战略上先发制人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尽管中国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和战略纵深都比印度大，但从中国腹心地带到印中边境地区的运输线长，空中机动、运输能力有限，不可能在边境地区集结强大兵力对印发动全面战争。而且中国的军队尚不具备出国作战的能力。而印军在边境地区处于优势地位，并且便于支援，便于

发挥空中优势。在印度看来，对其邻国，包括中国在内，它都有条件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进攻，而且容易得手。

印度陆海空三军已经基本具备了对周边各国实施战略进攻的能力和条件。印度空军作战范围目前限于南亚次大陆和位居喜马拉雅山地的印中边境地区，其现有作战能力已经能够满足“以先发制人为形式的攻势作战”的需要。同时，印军也在积极发展战略空运力量，并将其视为提高快速反应部队机动能力的关键。印度的海军在冷战后发展很快，在未来战争中完全可以在海上向其邻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隔海相望的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实施先发制人的战略进攻，使用部分力量即可满足配合陆、空军作战的基本要求。在重点发展海、空军的同时，为提高陆军的快速反应能力，印度在陆军中增编了快速部署部队，对空降兵在未来战争中的运用进行了深入研究。陆军以作战任务编组部队，在平时装备的基础上，稍作调整，即可立即执行作战任务，极大地缩短了战争准备时间。

基于巴基斯坦和中国分别为印度现实与潜在敌人的分析，印度将继续从巴、中的军力水平、战场环境、地形条件等不同情况出发，不断提高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和先发制人的攻势防御作战能力。其中，为提高山地部队的机动、火力、防御、生存以及防护等多种能力，印军将继续加紧对部队的改编并强化其训练。印军部署已经按照预定的作战方向展开，在西线采取重兵压境的进攻性布势，在印中边境地区采取寓攻于防的攻势防御布势；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交通方便、地形条件良好、便于支援一线部队作战的机动位置；空军基地配置恰当，可随时准备出动，遂行支援陆、海军或独立作战的任务。印度陆、海、空三军的这种部署，有利于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类型的战争中遂行战略进攻任务。

2000年1月，印军确定了重在进攻的“惩戒威慑”战略，更加

强调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给敌方以教训和惩罚。预计随着印军作战能力的进一步提高，这种指导思想将使印度在军事上更具扩张性和冒险性。

# 附　录

## 印度“核武器政策草案”全文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于1999年8月17日出台的“核武器政策草案”，提出了印度核理论，全文如下：

（一）导言

1.1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使用核武器，对人类以及国际制度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与其他两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同，如国际条约禁止使用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核武器仍然是保证国家与集体安全的手段，人们一直设法在1995年5月通过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附加条款中使选择性地拥有核武器合法化。核武器国家声称，它们将继续依赖核武器，其中一些国家采取了甚至在非核情况下也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这些事态的发展等同于实际上放了核裁军。这使得国际社会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努力严重受挫。

1.2印度的首要目标是在一个和平与民主的框架内实现经济、政治、社会、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这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保证和平与稳定不会遭受潜在的威胁。印度将与全球的民主潮流进行合作，努力朝着这个总目标前进，在国际制度朝着公正、公平与和平秩序的发展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1.3在事态发展过程与战略问题上的自主决定权是印度人民

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在一个设法让挑选出来的少数国家的核武器在不确定的未来合法化的世界里，在一个日益复杂、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武力的世界里，印度将不遗余力地维护这种权利。

1.4印度的安全是其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印度将继续着眼于扩大周边的和平与稳定区域，这样，最为优先发展的目标就能不受干扰地得以实现。

1.5然而，与首先使用核武器有关的进攻性理论的存在，以及一些核武器国家坚持要让它们甚至对非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合法化，这些对一个国家的和平、稳定与主权构成了威胁。

1.6本文概述了印度核部队的建立、部署和使用的概括性原则。关于核部队的结构、部署与使用的政策和战略细节将源自这一框架，将分别制定，并不断进行检查。

（二）目标

2.1在不存在全球性核裁军的情况下，印度的战略利益需要可信、有效的核威慑力，以及在威慑力未能生效的情况下足以采取报复行动的能力。这是符合赞成有自卫权的《联合国宪章》的。

2.2对威慑力的规定应该根据印度核部队的设计，根据能够提供最大限度的可信性、生存能力、有效性、安全保障和安全能力的战略仔细衡量。

2.3印度将奉行拥有可信的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的理论。在“仅为报复”这种政策下，我们武库的生存力至关重要。这是一个与战略环境、技术的必要性以及国家安全需要有关的动态概念。核部队的实际规模、组成部分、部署以及使用取决于这些因素。印度的和平时期的立场旨在让任何潜在的侵略者相信：

（a）任何要对印度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将导致反击这种威胁的措施：

（b）对印度及其军队发动的任何核攻击将导致动用核武器的惩罚性报复行动，它会给侵略者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失。

2.4印度拥有核武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阻止任何国家或实体对印度及其部队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印度不会首先发动核打击，但是如果遭到核打击，它将以惩罚性报复行动作出回击。

2.5对于不拥有核武器，或者没有与核武器国家结盟的国家，印度不会诉诸于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

2.6威慑力要求印度保持：

（a）足够的有生存能力的做好战斗准备的核部队；

（b）强大的指挥和控制系统；

（c）高效的情报和预警能力；

（d）与战略相一致的综合作战计划与训练；

（e）使用核部队与核武器的意愿。

2.7保持高效的常规军事能力，以提高爆发常规军事冲突和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门槛。

（三）核部队

3.1根据可信的最低限度的威慑力的概念，印度的核部队将是高效率的、能打持久战的、由多种部门组成的灵活的能迅速作出反应的部队。这些部队将按照上述目标的要求，建立在飞机、移动陆基导弹和舰载资产三合一的基础上。部队的生存能力将因为集多套系统、机动性、分散性和迷惑性于一体而得以增强。

3.2这种理论设想了确保在和平时期部署的军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化成完全可以使用的部队，以及甚至在遭到敌方打击、作战能力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能采取有效报复行动的能力。

（四）可信性和生存能力

以下是印度核威慑力的中心原则：

4.1可信性：任何敌人都必须知道，如果对印度及其部队使用

核武器，印度能够而且一定会用足够的核武器进行报复，给侵略者带来他们将发现是无法接受的破坏和惩罚。

4.2有效性：通过包括可靠性、及时性、准确性和进攻的分量在内的所有因素的增效作用，印度的核威慑力效应可以达到最大限度。

4.3生存能力：

（a）印度的核部队及其指挥和控制系统将按照遭遇突然袭击时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并能迅速作出惩罚性反应的要求来组建。部队的设计和部署要确保部队能在首次打击中生存下来，能经受多次摩擦性冲突，以及拥有足以对侵略者进行无法接受的惩罚性打击的报复能力。

（b）保障核指挥控制连续性的程序将确保连续有效地使用核武器的能力。

（五）指挥与控制

5.1核武器由最高政治层严格控制和投放使用。投放使用核武器的权力属于印度的总理，或者指定的接班人。

5.2建立有效、有生存能力、有必不可少的灵活性和迅速反应能力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综合作战计划，或者取决于战略目标和目标政策的一系列的序列计划，将是该系统的组成部分。

5.3为了有效地使用核部队，将确保核部队的指挥与控制的统一性，包括双重投放系统。

5.4要确保核武库以及有效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情报和信息（C412）系统的生存能力。

5.5印度的国防部队应准备在核—生—化（NBC）环境中进行作战，并且将作战能力的下降减少到最低程度。

5.6应该建立空间和其他资产，提供预警、通信、损失或起爆评估。

（六）安全与安全保障

6.1安全：采取特别谨慎的措施，严密防止核武器及其生产、运输和储存出现被盗、遗失、破坏、毁坏或未经授权的接触和使用的可能性。

6.2安全保障是一种绝对必要的条件，应该制定防篡改的程序和制度，确保不会发生未经授权和因疏忽而激活和使用核武器的情况，避免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6.3灾难控制：印度将研制能够处理可能发生的核武器和核材料事件的特殊情况的相应的灾难控制系统。

（七）科研

7.1印度应该加强科研工作，紧跟这个领域中的技术发展。

7.2印度在致力于坚持部署最低限度和可信的威慑力的同时，将不接受对发展科研能力的限制。

（八）裁军与军备控制

8.1全球性的、可核实的、非歧视性的核裁军是国家安全的目标之一。印度将继续努力，尽早实现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目标。

8.2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印度的基本承诺，因此印度将尽一切努力说服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加入禁止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条约。

8.3印度作出了完全的消极安全保证，印度还将为核武器国家向非核武器国家作出有国际约束力的无条件的消极安全保证而努力。

8.4设法让核武器控制措施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以减少潜在威胁，保护我们自己的能力及其有效性。

8.5鉴于核武器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应该寻求、谈判和制定相应的减少核威胁和建立信心的措施。

# 后　　记

本书从孕育军事战略的印度战略文化入手，对印度军事战略的发展演变、主要表现及其实质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力图把握印军发展的脉络，反映出印度军事战略的最新变化。在写作过程中，参阅和使用了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有关印度问题的大量文献与资料，并得到总参谋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成都军区等单位一些专家的指导，在此谨表谢忱。

参加本书编写的是国防大学、成都军区装备部、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以及北京军区有关单位几位长期从事外军战略研究的专家学者，除了三位主要作者外，赵玉梅、李大光、韩旭东、周柏林、侯小河等同志也参加了本书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作为一部研究性的学术著作，书中的学术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由于写作时间仓促，资料来源不一，纰缪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作　者

2001年9月

# 主要参考书目


1．《印度的发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1956年中译本。

2．《印度对华战争》，内维尔·马克思韦尔著，1971年中译本。

3．《印度国防战略》，萨廷达尔·辛格著，1987年中译本。

4．《印度国家安全展望》，（退休）中将P·N·卡特帕利亚著，1985年新德里英文版。

5．《印度北部安全》论文集，高塔姆·萨尔马编，1986年新德里英文版。

6．《印度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美］A·J·科特雷尔、R·M·伯勒尔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7．《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

8．《印度军事思想研究》，陈平生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9．《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姜兆鸿、杨平学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印度军事基本情况》，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1．《印度人》，［英］特雷弗·菲希洛克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

12．《印度的防务》，［印］贾斯万特·辛格著，中国人民解放军

56279部队，2000年印。

13．《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孙士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印度——月亮之国》，郑玉松编者，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版。

15．印度近年主要报刊资料。

16．《外国军事学术》近年主要文章。